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译丛



美国社会经济五个基本问题

[美] 詹姆斯·M. 斯通◎著
忠华◎译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财政收支平衡／分配不平等／教育／医疗保健／金融改革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社会经济五个基本问题

作者:[美]詹姆斯·M.斯通

译者:忠华

ISBN:978750867374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

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0月25日

序

我认真阅读了詹姆斯·M.斯通的新作，受益颇多，也感慨颇多。

斯通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是美国普利茅斯·洛克（Plymouth Rock）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在美国金融市场从业多年，对这个市场有着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经历。他又长期担任保险业和商业期货的州一级和联邦监管者，对金融市场的看法比较均衡和全面。

斯通先生还是一个思想者，对金融之外的领域广有涉猎并进行了深入思考，包括财政平衡、收入不平等、教育、医疗保健，它们与金融改革一起，并列为本书的五大重点议题，也是涉及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解决方案和建议也是见仁见智。斯通先生基于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和独立观察，认为这五大难题并非无解。解决方案其实十分简单、显而易见，关键是政治层面要有勇气和决断力。

美国是全球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国是正在快速成长且体量很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美国经济中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存在，在今后的发展中或早或晚也可能遇到。比如，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杠杆率过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保可持续性问题，教育与就业脱节问题，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斯通先生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中国市场从业者、决策者及其他读者都会带来一定的启发。他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还会受到警醒并为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风险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当然，中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创新在美国是过度的问题，在中国则更多是创新不足；社保和医疗在美国有过度支出和效率问题，在中国则是保障水平不高和范围偏窄的问题。读斯通先生的这本书，不一定要同意他的观点，也不一定要把他的解决方案搬到中国来。我所欣赏的，是他能够从市场、监管者和学术等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给出的建议也充分考虑到现实可操作性。走出象牙塔，不囿于利益或成见，多角度、平衡而独立，才是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式。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2016年8月3日

导言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本书的题目。美国人民在整体上很不满意政府的无能，因为它未能很好地解决明显有深远影响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解决难度，因为政府还没找到公正处理赢家与输家失衡问题的折中之道。但是，当今政府的无能比没有答案更糟。我们的政治体系似乎无法处理明显可以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讨论美国五个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就当前几个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给出了直截了当的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本书坚持认为，针对一些问题，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似乎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我希望大家多多呼吁，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实在危险。而更糟糕的是，当下的政治辩论很少关注这些关键问题。两党政客刻意回避他们本应处理的问题，却热衷于接受媒体采访，钩心斗角，玩一些“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沉湎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承认，本书书名有些哗众取宠，因为关于这五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辩论过，而且政治对此似乎无能为力。但我要强调的是，政客们不能再回避这些问题了。如果要换一个书名，我觉得可以用《大到碰不得》（*Too Big to Touch*）。请不要把本书后面的叙事语调平淡或者故意不高谈阔论，误解为它提出的一些建议影响不大或者容易被人接受。同时，这些建议意味着一次大转型，极有可能遭到拒绝。

美国人民一向对许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敢打赌，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关注以下5个问题：

●你相信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Medicare）在你和你的子女需要它们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并兑现它们的承诺吗？

●你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极少数的人和公司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比以往更大？如果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你会觉得它是富有成效和稳定的（且不论你是否觉得幸福）吗？

●为什么你需要支付的医疗保健（Health Care）费用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人的两倍，而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服务却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差呢？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里，学校却不能为了那些不能读大学的学生提供实在的技能培训？为什么许多大学生饱受学费和未来生活的困扰？

●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怎能允许我们金融市场的衍生品比金融危机前还多？怎能让资产和巨量的经济收益集中在比以前更少的机构中？

我是民主党人，但这本书没有党派性。每一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右派、左派、中间派、政见不确定的人甚至不问政治的人——都关心这些问题。许多人说，美国正在随波逐流，危险的旋涡就在眼前。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待遇，而且我们的子女将来获得好待遇的希望甚至更为渺茫。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短期内应该也会保持这个地位。但是，当今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留给下一代的社会比我们继承的更差。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你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并非必然如此。

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政治却似乎越来越狭隘。各阶层公民通常认为，民主要求当权者在代表与领导之间、在遵从选民意愿与按自身信念行事之间找到平衡。类似地，在公职竞选中，那些希望在某些关键时刻遵从民调的人与那些希望候选人展现勇气与坚定理念的人之间经常发生辩论。这些张力无法避免，但当下的平衡却不是这么回事。目前，只有极少数政客敢于无视眼前的民调，那些无视民调的人经常被媒体作为主流之外的无希望者而剔除。

如何认真审视这个禁区，许多人也许已经认定，当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为自己和家庭带来任何真正的收益。也许你觉得你的子女已经很难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些人抱怨美国正在沉沦，“美国世纪”渐成历史。我认为这种想法没有意义。我很难认同，事实上这正是我希望挑战的态度。人们说美国已过了巅峰期，这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依然是多数人最喜爱的国家，至少在对行事成规发起智识挑战的私人部门和学术部门是这样。美国社会的创新、创造动力无与伦比，而且优势仍然明显。在本书中，我将努力证明公共部门能够发挥潜力，并在其他领域成为有价值的伙伴，只要它采取某些具体的共识型政策。路线明确，缺的是行动意志。

我在本书提出的改革建议基本上尚未进入美国的政治议程。真正的政治进步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目前这三者全无。第一个要素是，有清晰的远见，即对确实起作用的行动路线的务实思考。我将提供一点儿看法。第二个要素是政治领导力，这是我个人无法提供的，它需要坚定、有魅力和沟通才能的政治领袖在适于改革的关键时刻领导一场艰难的变革，即使冒着失败的风险，即使民调显示公众尚未做好追随的准备。政治对于一位民选官员就像在走钢丝。如果落选，就将从钢丝上掉下去。即使当选，若浪费了领导机会，还是会掉下去。一个人被选任公职是获得一次机会，以展示其在理念和行动上推行所信奉的价值观的领导力。若公职人员没有理想信念，政治家不努力改善自己选区的境遇或者不推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就跟碌

碌无为的职业混子没什么两样。

这并不是说一切未能推行变革的人都是寄生虫。在公共生活中，有些最优秀的人试图推行改革但未能成功，无论他们多么令人钦佩，改革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洞察力和个人勇气以产生卓越的领导力。当然，时机也很重要。改革有时需要妥协，有时需要勇气。在危急时刻，有几位敢于领导并能聚合民意的伟大领袖，是一个国家的大幸。这就是他们被当作伟大人物被人们记住的原因。我们现在处于隐性危机时期。在没有产生重大事变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能激发民意和果敢地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领袖——或者有没有适合他们出现的时机——现在还有待观察。

改革需要的前面两个要素，有清晰的远见和具备政治领导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改革的第三个要素是有力量对抗高度戒备的现状维护者。建设性的改革总会遇到反对者，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公众唱反调。这是民主所固有的内在特性。即使在最佳时期，改革的政治博弈也一直是爬坡战。在这方面，现在看来还不是最佳时期。近期的潮流有利于权贵。目前，很难指望在改革需要的这三个要素方面战胜保守派。理想，乃至清晰的理想，肯定将时不时地被提出来。历史偶尔也会提供勇敢和天才的改革家。反对既得利益者的“战争”很难打。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明确日程，且在战斗之前不出现勇敢的领袖，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多年前，一位敏锐的朋友告诉我，美国是由两院制政府领导的，但不是公民课本所描述的那样。他说，我们有一个“管钱的院”和一个“投票的院”，前者负责日常事务，而后者是一条睡龙，它可能醒来，在适当挑动下暂时控制局面。如果本书能使这条龙从沉睡中苏醒，我将为此而自豪。

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写书时一度考虑主要对本党说话；虽然我的许多建议并不迎合两党的主流政治意识。我希望超越党派的人、思想开明的人比两大党内党派性最强的人更能推动进步。在这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并没有清晰的远见，共和党也不愿做出改变。太多的民主党人支持选民认为不大可能改善其生活和财务状况的温和政策；共和党人则不能摆脱关乎富人利益的明显狭隘的目标。

目前，民主党人明显地受损于轮流执政的自然钟摆效应。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摆到了里根革命[注]。崇高的期望没有得到兑现，钟摆仍在摆动。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钟摆在摇摆。从卡尔·马克思时代到最近，理想的平等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流行。许多知识分子期望社会十全十美，这注定徒劳无功。无情的事实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是不完美的物种，永远处于无私与自私、和平与好战、合作与竞争、秩序与骚乱、同情与冷漠的冲突之中。左派始终未能从坠入幻想梦境的尴尬中恢复过来。正

如当代伟大的生物进化学家威尔逊注（Wilson）常说的，“伟大的理想，错误的物种”。

我们需要不断弄清一个理想社会到底应是什么样的。漫画家常常把天堂描绘成天使坐在云上弹竖琴。若请你尝试描绘你在永生极乐世界中每天将做的事，你也会毫无头绪。因此，本书并不试图提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的普遍建议。不过，我偏爱自由企业式的民主。受恰当监管的市场经济经得起合理怀疑。多元民主，即使不那么强健有力，也已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有力的思想。开明的利己主义对经济有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作用，对健全的监管也有好处。所以，本书不是提倡牺牲、缩减财政支出或崇尚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提出解决方案，是为了使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以及未来几代美国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不会要求美国人民寻找更美好的天使。需强调的是，我也不指望人类本性可能得到改变。我只是想请读者用逻辑来思考，并努力为了国家利益而把政治派别和诡辩机会放在一边。否则，未来出现的将是不那么多元化、不那么民主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

我在此提供一些个人历史和资历证明。我出生于纽约，毕业于纽约州佩尔汉姆（Pelham）郊区的寄宿中学，然后进入哈佛大学及其研究生院。奥托·埃克斯坦注（Otto Eckstein）点燃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并且慷慨地传授学问给我。他告诉我，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沉闷乏味的科学。霍华德·拉伊发注（Howard Raiffa）教授的课程使我学到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贝叶斯注（Bayese）决策方法，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自那以后，它一直成为我处理几乎每项工作和知识方面挑战的重要方法。就在那一年，偶然地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注（Wassily Leontief）的一声未曾预料的咆哮使我坚定做职业经济学家的信念。列昂节夫含泪告诉我，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职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已被细小而不重要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能通过数学给出肯定性答案。与此同时，他说，经济学正使最有天赋的青年人丧失雄心壮志，因为他们想探索对人类更重要但不能予以精确证明的问题。几年后，当列昂节夫将近90岁时，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他，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已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他紧紧地拥抱我并欢欣鼓舞地说，“你相信了”！

我现在从事的是我的第三份工作。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讲授证券市场经济学课程。列昂节夫曾经建议我寻求担任非全职的讲师而不是做终身教授，同时开始我的商业生涯。后来在1975年，我完全改变了方向。在没有教课任务的日子里，我在保险业界做顾问，我很快在那个行业里取得了一些出色的资格证书。我还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个职业组合使我被马萨诸塞州时任州

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注（Michael Dukakis）任命为保险业总监。州长曾允诺为这个职务找一位有保险业专长而且与这个行业纠葛不深的人。这个行业比他预期的要小，我正适合任此职。当时我看上去如此年轻，以至于在我礼节性地拜访州参议院主席时，他的助理把我说成是从高级中学来做为期一天的保险业专员的实习。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4年后，在31岁时成为一名老练的公务员，并准备回归成为学术与商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我原本计划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工作一个学期，但运气又来了，我没去伦敦，而是去了华盛顿。

那时吉米·卡特（Jim Carter）是美国总统。他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的职位而亲自接见我。我通过了艰难的国会听证过程，这段故事比本书长得多。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我的新职位将面临一堆棘手问题，这个预言已为力图在这个职位上把事情办好的那些人遇到的麻烦所证实。在CFTC任职对我而言教育意义大于成就感。当我回顾那几年时，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品格塑造”。

CFTC拥有监管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执法权，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国会半心半意的授权以及被监管的集团的强大政治诡辩使这个执法机构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所作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西部牛仔式狂野行径是应该受到约束的原则问题。

1979年，这些金融衍生品纷纷涌现；我不喜欢它们，因为它们缺乏对客户的保护，且杠杆率过高。监管这股浪潮并使之退却从来不是有很好结果的任务，我并不比卡努特注国王（King Canute）幸运。事实上，是运气更差，因为卡努特实际上试图向宫廷内的溜须拍马者们说明，他无法控制这股浪潮。我却天真地认为我能控制住，以为可以轻松地防止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危害国家。

我设定了很难有机会成功的不同标准。我可能是联邦监管机构历史上唯一喋喋不休地对主要政策问题发表看法的主管，但未能使任何人信服，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下属。更重要的是，我曾试图让不止一位同事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相信杠杆率过高、监管不足的衍生品交易可能引发金融海啸。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我收到了令人敬畏的保罗·沃尔克注（Paul Volcker）的一条不带偏见的短信，是说如果我当时能使他相信杠杆效应的危险，情况会好一些；我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后来我在里根政府又工作了几年，1983年初离开了CFTC。

离开学术界8年之后，我若不重新学习文献资料就没有资格执教经济学。政府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在谴责监管和尽可能地增加华尔街的资产方面

竞相模仿竞选得胜的共和党。私营企业界展现出吸引一切的力量。我没有陷入在华盛顿工作4年之后的“旋转门综合征”[注]，而是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一家保险公司。这正好符合我之前的自我认知。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我的父母曾羡慕地说，他们认识的某人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了高级执行官的职位；当时我告诉我的父母，我宁愿推着小车在纽约大街上卖苹果，也不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我曾被告诫，保险业不是一个容易创业的行业，而且我缺乏领导私营企业的经验，任何人都会抓住这个弱点；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1984年1月1日凌晨，即将成为我妻子的凯西（Cathy）和我从纽约的年末宴会回来时，我请她注意，有2000多人在那晚清醒地开着车去参加各种宴会，并有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车险，但是现在他们大都喝得醉醺醺地从宴会出来，他们将由我们的新保险公司承保。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就在那天半夜诞生了。从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建立一家在下述三个方面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的公司。

首先，最大的保险公司似乎认为它们有固定的客户和代理商，我只有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才能取胜。为此，我们必须善待员工。培育强有力的服务文化，不仅要求领导者要以身作则，还要同时使办公室政治的色彩减到最少，因为它会破坏高端的服务品质。

其次，可能由于我有数理解析背景，所以我能够建立一家比其他公司有更多数学技巧的公司。数学和统计学是车险公司和住宅等财产保险公司的基础。不过，这一深刻的洞察很快就被本行业内领先的一些公司共享。然而，幸运的是，在最初几年里，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公司并不在我们所在的两个主要州积极开拓业务。

最后，我决定以一种对监管不对立的态度运营这个公司。当政府告诉消费者在开汽车前必须买保险时，政府就有责任确保消费者买得起并买得到保险。当人们花钱买一个金融产品时，只有当卖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诚实和完整地回购，这个产品才对他们有价值。监管机构必须保证金融产品的真实性，且有偿付能力。此外，在汽车保险业，市场定价迫使推出的产品有内在和严格的营业收入回归。你所居住的街区越贫困、刑事案件越多和越拥挤，你的汽车保险费就越高。这是监管制度的另一个坚实基础。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从不反对合法的保险监管，而我们的许多竞争者常常将精力浪费在反对监管上，好像监管履行的是某种宗教责任。

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从未寻求在汽车和住宅拥有者保险业务领域进行革命化的巨大创新。有一个古老笑话，是关于森林里的两位露营者的。一位看到一头凶猛的饿熊朝营地走来。他警告另一位露营者，熊过来了；他的

同伙穿起了他的胶底运动鞋。第一位露营者问："你要干什么！你跑不过一只饿熊的。"另一位露营者说："我知道，但是我跑得过你。"在商业界，不必创建十全十美的公司，只要你的公司比竞争者稍微好一点儿就行。普利茅斯·洛克公司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它不是国内最大的为汽车和住宅拥有者提供保险的公司，但它进入了领先的几十家公司之列。它现在为约100万汽车和房屋拥有者提供保险，每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我依然领导着这家公司，公司约有员工1400名，在近30年里，公司给它的股东的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17%。在2014年，普利茅斯·洛克公司的雇员们投票认为它是波士顿地区的最佳雇主之一。在过去40年中，它在波士顿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超过任何总部设立在波士顿的公司。一位在CFTC的对手曾对我说，我的观点不值多少钱，当他知道我支付给公司员工的薪金总额时就不这样看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赢得的声誉。

我在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的商界和非营利业领域也赢得了一些声誉。我曾任《波士顿环球报》董事会执行董事达6年之久。我对新闻媒体很感兴趣，现在还是《环球邮报》的副总裁，这是一家获过奖的、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全球互联网新闻服务企业。大约在12年之前，我在纽约帮人建立了一家私募基金公司，我现在仍担任顾问，同时是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这家基金公司总计募集了130亿美元的资金。除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之外，我曾创办了另外三家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都得到过华尔街的资助，它们在发展成熟后就都卖给了更大的公司，我从没想过出售我个人拥有的普利茅斯·洛克公司。

在非营利性工作方面，我与一个为波士顿的公立学校筹措私人资金的组织合作。在那里，我作为一个部门主管，每年给波士顿进步最大的公立学校提供大量的现金奖励。为了加深我们对教育的了解，我的妻子和我各自选择了一个学校，更深入和直接地参与其中。凯西参加了波士顿最有影响力的政府特许中学的管委会，而我选择了标准考试成绩最差的公立高中。纽约州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注]（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基因研究中心。自1983年起，我就是这家中心的信托财产管理者，并在其执委会任职，我主持它的学术事务并管理商业关系委员会。最后，我还是科学管理健康（Management Science for Health，MSH）委员会的主席，它是波士顿地区一家大型的非营利性的人道主义组织，约有2500名职工，主要为世界上约40个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加强其基本的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建设。迄今为止，凯西和我怀着共同的热情访问了70多个国家，包括MSH有项目的一些国家。

本书将聚焦于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当然，它也会涉及一些道德、文化和社会问题，如果它们与经济问题直接有关。同时，本书还将涉及一些环保问题，它很重要，许多有见识的作家都在讨

论。环保领域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既重要又难办。更概括地说，本书不是雄心勃勃、面面俱到地列明具体改革细则，也不奢望“包治百病”；也并不是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它只是公共政策分析，旨在说明，只要遵照一些众所周知的常理，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事关美国人利益的问题。我谈的是：“几个基本问题”。

---

1. 里根革命指奉行供给学派的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削减政府预算中的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以减少生产成本。他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劫贫济富”。在减税的同时大量增加军费，导致联邦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罗斯福的政策则是国家奉行全民福利社会的“新政”（New Deal）。——译者注

2. 威尔逊是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2014年时已85岁，出版过25部著作，提倡社会生物学及“生物之友假设”（Biophilia Hypothesis），主张保护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认为一切物种都有在地球上生存的理由和权利，无论其对人类有利或有害。他曾两次获普利策新闻奖。——译者注

3. 奥托·埃克斯坦（1927—1984）是德国裔的美籍犹太人，1939年随父母移民美国；他是经济学界的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公共产品收益原则分权论”，即全国受益的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各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由各地区政府自行提供；他在1963年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经济数据提供机构——“数据资源公司”，并从事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型研究；他除了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外，还担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注

4. 霍华德·拉伊发曾是哈佛大学的管理经济学教授，1994年退休；他是贝叶斯统计决策论方面的专家，研究博弈论、行为决策、风险分析、谈判分析等。——译者注

5. 贝叶斯（1701—1763）是英国的数学家，他在世界上首先提出概率统计的概念，研究统计推断、统计估算和决策函数等。贝叶斯决策是指，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随机事件中，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计算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译者注

6. 瓦西里·列昂节夫（1906—1999）是移居美国的俄罗斯数学家，他首先提出用“投入—产出矩阵”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因此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自193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75年转到纽约大学；他的学生中有两人（萨缪尔森和索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7. 迈克尔·杜卡基斯是民主党人，曾两次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1975—1979年和1983—1989年）；他在州长任期内在该州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该地区有“东部硅谷”之称。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输给了共和党的老布什；在竞选失败后他淡出政坛，到东北大学任教。——译者注

8. 卡努特（995—1035）是从丹麦来的英国国王（1016—1035），他自1018年起也兼任丹麦国王。据历史资料记载，他向他的大臣们表示他不能控制浪潮的来临，即凡人的力量不能与神力相比。——译者注

9. 保罗·沃尔克曾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采取高利率政策，压缩了通货膨胀，却引起了经济萧条，因此而被里根总统解职；接替他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取低利率政策和放松金融监管，虽然激发了经济增长，却因金融衍生品泛滥而导致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的金融危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调拨8000亿美元救市。——译者注

10. “旋转门综合征”是美国政界常用的谚语，指离职的政府官员在通过“旋转门”出了政府大厦后，利用其在政府的老关系谋私利。——译者注

11. 冷泉港实验室在1890年成立于纽约州长岛，是一家私营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研究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基因及人工器官移植等。——译者注

第一章　财政平衡

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未来，通过借贷投资来发展经济是完全正常的。然而，了满足我们共同的目标，不断扩大已经令人担忧的国债是毫无意义的。每年联邦预算的最理想底线仍有合理的争论余地，而且主要争论的是哪些应作为优先事项。没有人愿意看到纳税人的钱被浪费掉。然而，追求当前的储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误导。最不合理的开支不是过多的项目性支出，而是源于非生产性的税务补贴。况且，官方的国债记录完全忽视最具威胁性的未来责任：为老年人提供的赋权项目注（Entitlement Programs）正在加速增长。社会保险的缺口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弥补，但是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恢复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近期和远期的财政结构都应该而且也能够安排妥当。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珀洛尼厄斯注说，“既不要做借债者，也不要做放债者”。但是，各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同意，适当借债对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事实上，大多数家庭、企业和国家都无视珀洛尼厄斯的告诫，多少都会借债。一个负责任的实体应该借多少债，比它该不该借债更难回答。关于公司最佳资本结构的参考文献非常多；一个家庭到底能负责任地承担多少债务，也有没完没了的讨论。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关于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多少债务令人信服的理论。

对于政府而言，应借债多少，与其通过借贷和投资在未来能够创造多少财富有关；还与其基于投资收益的偿债能力有关，即使利率上涨增加了借债成本。随着债务增加，这还与其利用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来偿还债务的诱惑力扩大有关；另外，这也与经济学家所说的资金“挤出效应”有关，挤出效应一般发生在资金从为经济健康增长所需的私人投资领域向公债市场转移的时候。在这里，我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有关国债负担的统一理论。

现在，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债务负担已经太重，而且国债增长过快使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也有理由担忧，美国的债务正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许多已承诺的赋权项目缺乏资金支持，我们举债本应该是为后代创造财富和机会，而我们总在为其他目的举债。

我承认，我对举债是有偏见的。因为我的父母，亨利和芭碧蒂·斯通过去常常为房贷发愁，所以我很早就觉得要避免这种担心。我曾靠借钱上学，后来靠借钱付房贷，我自那时起就想避免借债。我创办的企业——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债务。这可能不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策略，但是对我来说，更多的睡眠比获取更多的财富更有价值。

一位经验丰富的理财顾问曾告诉我，个人债务的最佳规则是：“永远不要在你需要时借钱，只在你不需要时借钱。”政府举债的规则可以不同，但一个国家永远不应为了规避政治不安宁而举债，只有当其下一代将因此感激它时才举债。

国债持续膨胀，不包含在债务计算中的未来还债额度的累积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养老支出和国家安全项目的支出，则从当前和未来的开支中能够大幅削减的部分其实很小。

常识告诉我们，国债应该在经济周期中的某些年份有所增长，而在某些年份增速减缓或下跌。这就好比勤俭持家。然而在过去40年里，联邦预算只在5年中有过盈余的记录；更准确地说，其中1年只是持平而已，其余4年中没有1年的盈余额接近过去40年的年均亏损额。[注]其余35年都有赤字，而且往往出现巨额赤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实际赤字数额太大，让人难以想象。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是6800亿美元，2014年是4860亿美元；2015年跟2014年差不多。[注]好消息是，这些数额及其趋势表示，美国联邦预算从2009年前的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赤字的历史性常态已有所逆转[注]。[注]坏消息是，这意味着财政部在相对体面的2014年仍然给美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带来了约1500美元的新债务。

当然，每年新产生的赤字自然要加到多年来累积而尚未偿付的国债总额上。这个国债总额，包括政府间的债务，现在已超过18万亿美元，即每个美国人负债超过5.5万美元。[注]如果只考虑有工作的美国人，则每人的债务超过10万美元[注]。[注]这些债务是由政府债券持有者来承担的。除了美国本身以外，日本和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注]其他国家政府及国外的私营机构持有的债券总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和日本持有的数量。债券持有者是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合法债权人。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人发行债券和其他美国人持有债券是无害的。同一个家庭中的个人互相欠钱不会使整个家庭变得更贫困；但是，为了今日的享受而欠家庭以外某人的未来债务肯定就不是那么回事。美国债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经济实体承担的，这意味着，这些经济实体有权从美国未来经济中分享一大块“蛋糕”。

在解读国债时，用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达可能比用美元表示的国债绝对值更有意义，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注]但是，这个比重比美国“国内战争”[注]以来的其他年份都高，而且还在增长。这还不包括大量已承诺但尚未到期的赋权项目。随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陆续步入老龄化并开始领取政府高额的补助，正

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有关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未来前景堪忧恐怕终成现实。这就是人们对财政不平衡的最大担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似乎无法解决目前的和潜在的财政不平衡问题。两个政党的执政偏见阻碍着双方合理的妥协。共和党人宣称，有时只要削减项目开支就会缓解债务压力。他们出台的减税政策加剧了财政不平衡，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1世纪初美国财政收入的锐减[注]。在经济景气时，提出减税的理由是应由家庭而非政府来决定怎样花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减税成了刺激经济的最佳工具。逻辑学家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如果经济良好，那就可以减税；如果经济不佳，那就必须减税”。当税收难以抑制经济增长时，就可以通过减税来发展经济，但在今日的美国完全不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土壤”。请记住这句话：美国不能依靠进一步减税来恢复财政平衡。

民主党人在此问题上态度僵硬。在经济景气时，他们说我们能通过慷慨的社会项目增加福利开支。在经济不景气时，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更大的赤字振兴经济，减少人们的痛苦。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遵循提高税收或扩大赤字的原则。这个逻辑与共和党的逻辑相同，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刺激消费或者扩大福利支出而不是减税。民主党的主要领导明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所面临的困境，但同时又幻想他们能在一个不太令人难堪的危机中等待，直到在政治进程中找到解决方案。他们通常认为，削减任何已批准项目支出都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这也许有助于澄清国债与未来债务负担之间的区别。联邦政府使用的赤字定义完全正确，但过于狭窄。人们在报纸上经常读到的官方债务和赤字，往往忽略了已累积和预期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联邦养老金体系的负债。这个结果可能有欺骗性，除非读者能注意到，这些公布的数据只反映一部分联邦财政状况。如果按照私营企业发布财务报告的方法计算，美国国债将会大得多。

一家像普利茅斯·洛克那样的公司必须在它的财务报告中记载应计收入和支出。“应计”指的是预期将在未来某个时间有现金收入或现金支出的可确定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制度，每一位财务报告的阅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公司当前正在发生什么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未来预计将发生的情况。以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为例，其客户在未来的几年是否将依然喜欢它的产品、价格和服务是无法预测的，或者只能预测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所以，对未来的预测无法全面、准确。尽管如此，分析未来确定能得到些什么以及估算应计收入和支出，远比简单的现金预算更具有参考价值。正式的政府预算较接近于现金预算。它就像计算个人所得税那样，只计算一年内的资金流入和流出。

再想想你的家庭预算，它也是在类似的现金基础上构建的。如果你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入大于流出，那么你就有储蓄。反之，你就不得不动用以前的储蓄存款或者向别人借债。联邦政府也与此类似。当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时，财政部就可以通过发行票据和债券来借款，当然这些在未来都是要支付利息的。在一些国家，中央政府干脆通过印刷纸币来解决失衡，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弊病。我们较为庆幸的是，美国一直较少产生这样的危险，但是，在美国政府会计制度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可承诺为赋权项目支付现金。账簿是足够仔细准确的，但是内容不全面。

另外，再想想你的日常生活。假设你对现金的进出很谨慎，且从来没有入不敷出的情况。你不像联邦政府，近年来的收入均大于支出。你的现金预算和资产负债表也处于极佳状态。此时，你能宽心且认为自己很富裕吗？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你对3个子女允诺，将为你的8个孙子支付学费，但却还没有足够的储蓄做好这件事，你就无法宽心。此外，如果你还有一位老母亲，她将搬来和你一起住或需要长期为她支付住养老院的费用。那么，这个平衡的现金预算就更不能保证你富裕了。

未来的应付义务并不增加你对当前现金的需求。然而，承诺的未来支出项目并不表示总现金需求有任何实际减少。联邦政府也处于类似境况中，它的大部分未来支付承诺是针对老年人的，政府总说，到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果追求财务稳健，你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就都应做现在和将来的预算。如果做不到，就会发生危机。若真如此，大家有可能不得不违约，除非突然发现新的收入来源，或者削减开支，抑或以宣布破产告终。

当然，即使准确的未来现金流量可以纳入联邦政府的账户，这也不能充分反映整个政府部门的财政情况，因为仍然遗漏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这个遗漏不能置之不理。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开支几乎占了政府总支出的一半，这些政府面临即将到来的赋权困境，尤其是养老金的问题。[注]但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不是本书的主题。

图1.1是按美国官方分类标准统计的2013年联邦预算。[注]图1.2是为便于读者了解而将2013年的美国联邦预算按另一种方式分类。它不同于任何官方报告，但是它在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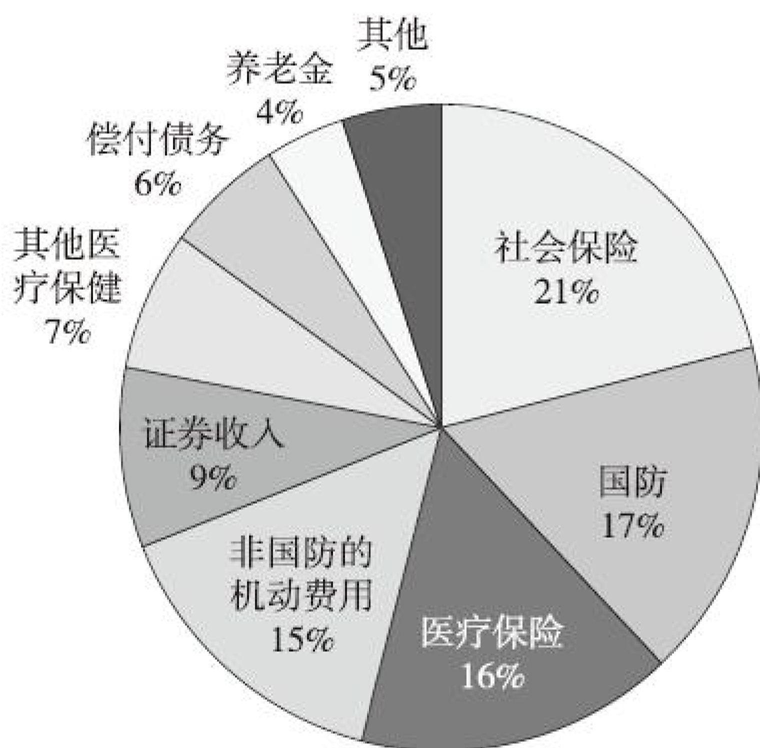


图1.1　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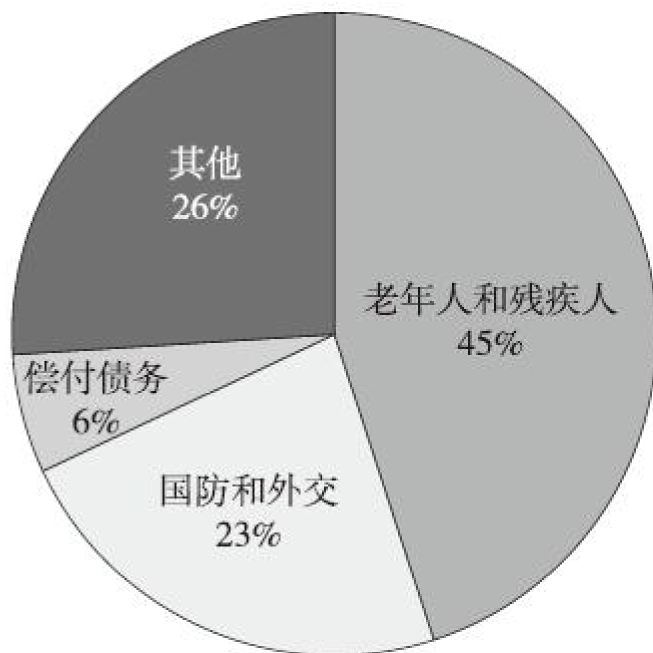


图1.2　2013年美国联邦预算（2）

图1.1和图1.2无法用于推测未来数据。联邦预算的诸多类别数据，特别是国防预算，只是专家们不太认可的粗略预计。应计负债的估算及对未来趋势的估计主要对权益保障计划有意义。把这些进行归总，得到图1.2，从中你会发现，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支出部分几乎占联邦预算总额的一半。国防和外交支出合在一起约占总额的1/4。图1.2中的“其他”是与医疗保健有关的项目，比例也变大了。这才是财政预算的真正核心。若不考虑未来权利保障计划或不预估国防方面的未来需求，任何对财政稳健性的预测都是不完整的。然而，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联邦支出属于国会激烈争论的项目。大量的美元事实上会流向通常不被考虑削减的项目。在图1.2中，被称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由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联邦养老金组成，包括早就被联邦政府接管的铁路工人养老金。军人的养老金本来也属于这一部分，但它已明确划入“国防和外交”部分。为了提高准确性，需要把非老年的社会保险受益者从“老年人和残疾人”中分出来，把它归并到退伍军人养老金中。然而，为了直观地了解钱的去向，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可能的调整。

“国防和外交”这部分包括军队和国务院及其他有关外交政策的机构。“偿付债务”这一部分不言自明。它代表需要偿付的国债本金和利息，一旦发行了国债就必须偿付，别无选择。这一点必须注意。疲软的经济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债务利率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正常的预警信号几乎不存在。如果利率回到它不久前的水平，那么国债利息支出将是现在的两倍多。

这里的教训是，谈论对支出有意义的改变，却把支付给老年人、国防的费用及债务利息除外，这些都是选举言论。除了图1.2中的“其他”这一部分之外，没有多少可讨论的。这一部分包括许多项目，如联邦调查局、食品检验项目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国家公园等。明智之人都不会愿意从事这些政府服务。即使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项目被排除在外，白宫的预算与行政管理办公室还是把这一部分中的另外几项列为不可自由裁量。这种分类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有些所谓不可触动的项目可以通过改变法律来触动，但是这种区分在华盛顿（美国政府）被广泛使用，而且有些项目确实是不能随意改变。

目前在美国，社会保险不是赤字的主要源头。事实上，2010年是社保信托基金（一部分社保储备金存放在那里）的福利支出超过税收收入的第一年。如果把信托基金的利息看作收入，则直到2020年社保系统的资金流不会变成负的。医疗保险尚无赤字。尽管如此，这些项目的严重失衡还是将摆在我们的面前。

有些最大的支出并没有引人注意，也没有引发挑战。这些不是以政府拨款方式支出的，而是以减税和免税的方式支出的。其中有些是对公众福利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好处的预算支出项目。个人和公司的利息税前抵扣很少受到质疑，但应首先被列入为数不多的废止项目。

虽然由于对未来支出做出的承诺而产生的不平衡比目前的赤字更令人担忧，但每年的预算缺口还是值得讨论。更多的收入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导致目前赤字的部分原因是不合理的浪费。关于这方面的政治辩论只专注于支出，实际上，更多的奢侈浪费是在收入方面。政府通过支票给援助受益人、国防部、公路承包商、士兵以及公务员的款项只定义了一种支出。请注意被经济学家称为“税务支出”的那一部分。税收抵扣、免税以及因国会相关政策导致的法律漏洞都可能导致税务支出，这使得某些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费低于他们本来应缴纳的税费，据说这是为了实现增进人们福利的目标。这是精明的说客长期努力谋求的挚爱，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回报是如此慷慨而审查又少之又少。同样是这些政客中的某些人声称，他们在为直接支出中被浪费、盗用和滥用掉的每一美元而艰苦奋斗，

却对这些很少受到审查的税务支出如此轻描淡写。

税务支出像其他形式的支出一样代价高昂。对我们所有人征税，与把钱花在国会青睐的项目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换句话说，政府通常会通过降低税率让企业来运作一些项目，同时通过向老百姓征收更多的税来弥补国家的财政损失。给国会出主意的说客知道，其实获得和保持这种补贴比要求国会直接支付更容易。在支出项目需要再次被授权时，国会甚至对大部分税务支出视而不见。已经实施了100年的“石油枯竭补贴”是税收开支中为人所熟知的。取消它以及其他免税项目相当于削减约80亿美元的支出。[注]给日益增长的烟草业补贴造成的直接支出小于此数额，但是如果把鼓励吸烟导致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计算在内，就可能达到此数额。在过去10年内，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所有补贴，包括保险费及除烟草之外的其他农作物和奶制品的补贴，平均每年超过150亿美元。[注]另外，至少还有200项其他此类税务支出。自1991年以来，即使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税收支出的总成本也增加了一倍。[注]在你默许这样做的时候，请记住，你正从其他国家借债，而且你的子女将要为此偿付债务。税务支出花的是你的钱。

鉴于缺乏透明度，你应该怀疑一切税务支出。对慈善支出的减税也并不是毫无争议的。几乎一切慈善事业都有一些含糊而似是而非的理由，以证明其值得称赞；但是，我怀疑其中有多少能经得起审查，以至于你愿意开个人支票以帮助它们募集资金。它们在诸多领域的公众知名度较高，然而不幸的是，这与评估其行善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并不十分吻合。我最想取消的这项税务支出却是最受欢迎的[注]。

当一项税务支出导致预算不平衡，且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在整体上是负面的时，它应该被废除。无论它多么受欢迎，也应该这样。个人和企业支付的利息可以税前抵扣是很受欢迎的一项政策，然而它们是代价高昂且有些浪费的税务支出。此项政策还包括很有诱惑力的房贷利息税前抵扣，这是许多人心中所喜爱的。

大部分纳税人支付的利息，是不能税前抵扣的，房贷利息除外。个人由于商务活动而支付的利息可以在个人报税时抵扣，但只能从这一项活动取得的利润范围内税前抵扣。信用卡借款利息和车贷利息完全不能税前抵扣。1986年，一度被国会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信用卡借款利息税前抵扣政策被废止，且没有将其恢复的呼声和迹象。学生贷款的利息税前抵扣只适用于某些贷款，而且以2500美元封顶。房贷利息税前抵扣事项只涉及1/3的纳税人，他们逐项列举抵扣额，这部分居民的收入高于美国的人均值。[注]不过，这个税前抵扣政策的渊源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早期，国会在地产

开发商和银行的要求下制定了它。这在当时似乎未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只有约35万住户纳税。现在，100万美元以上房贷的利息才不能税前抵扣，但它已成为一个巨大项目。税务联合委员会估计，税前抵扣政策会使政府每年少收入将近1000亿美元。这大约是过去24年来联邦赤字均值的1/3，目前年度赤字的1/5。

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房贷利息可以税前抵扣的这点儿好处，能使自有住房人的比例大大增加。此比例在近40年来没有增加。我怀疑，如果没有税前抵扣的影响，也许这个比例本来会下跌的。其实，大体上固定不变的统计数据已证明了这一点。银行和地产开发商仍然相信房贷利息税前抵扣的作用，显然它们不知道这对于购房在整体上激励很小。在纳税人中，税前抵扣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将中低阶层的钱重新分配给更富裕的纳税人，这个目标当然令人怀疑。低收入群体因纳税太少而感受不到作为纳税人受到的影响，而且不逐项列举报税的人或租房住的人得不到国家补贴的好处。在纳税少的低收入群体中，只有16%的纳税人逐项列举报税；在纳税多的高收入群体中，90%的纳税人逐项列举报税。后者有资格从这个补助中得到好处，他们一般拥有最大的住宅。年收入达5万美元的典型纳税人从税前抵扣中得到约600美元的好处。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这个数目是5000美元。这里并未创造财富。相对于工薪阶层纳税人，较富裕的中产阶层纳税人得到更多好处，而最需要住房补贴的租房者什么也没得到，同时却为弥补国家税收的缺口做贡献。

如果有任何当权者建议废除这个“逆向减税”方案，政治天空可能崩塌，但经济天空不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早已没有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它们的私有住宅比例都高于美国。英国在2000年取消了此政策，它的政治天空没有崩塌。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设立的专家小组建议进一步限制美国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甚至有些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的支持者也同意用纳税信用代替比较合理，因为这适用于每个人，而不仅仅适用于逐项列举报税的富裕群体。如果不能废除利息税前抵扣政策，或许可以对适用于利息税前抵扣的房贷加以更严格的额度限制，这将是有用的一步。如果能让国库节约1000亿美元的冗余成本，并阻止收入从中产阶层下层向上层转移，当然可喜可贺，但最好彻底废除利息税前抵扣政策。

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更加不合理。然而，这件事很少受到质疑。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始于1918年，也就是个人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开始

的前一年。它的最初目的只是抵消“一战”后利润税过高的影响。现在，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总额是个人房贷利息税前抵扣总额的许多倍。一位公共政策观察家建议，只要取消30%的此类抵扣项，就可以每年为国库节约1200亿美元。公司通过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每年减免的税款总额超过全年财政预算赤字的80%。

废除公司应付利息税前抵扣政策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此政策是促使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以及在为收购而筹资时利用借债扩大资产负债规模的动力。并非所有公司的收购都对国家有害，在资产负债表上保持债务与资产平衡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一次收购能把一家自鸣得意却管理不善的公司转移给更有雄心壮志、更能干和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团队，就是有意义的。当一家公司拥有者知道自己已筋疲力尽时，或者当第二代拥有者宁可变现而不愿再继续运营公司时，控股权收购同样是有价值的。何况，还有一个被认为在经济上容易做到的理由：在正常的营运过程中资产负债表上有一些债务，或者为了扩大公司而在利率低的时候借钱，这都比发行更多股票潜在地稀释股东权益的伤害小。借债以弥补公司资产的可行事例很多，也很有说服力。问题是，你作为纳税人是否需要去补贴这种债务，如果需要，补贴多少。

通常情况下，企业往往坚称自身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足进而要求补贴。一旦市场失灵，或者需要推动一项有用的社会活动并研究其可行性时，就会发生此类情况。所以，请问问你自己，近来是否有人使你相信，一些美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太少，或者美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公司收购活动。如果有人使你确实相信，你的资金情况优于举债融资能力甚低的公司和收购公司，而且无法得到联邦援助以至于你要自掏腰包，那么一切都应该是那样。但是，你要小心。那些为财政赤字和国债而感到不安的人，应审慎思考公司应付利息是否应税前抵扣。可疑的政策不会因为存在了一个世纪而变得合理。

一般而言，利润无法获得补贴。通常靠发行股票而增长的资产是得不到税款减免的。有些人说，这实际上是惩罚，因为付给股东们的分红来自纳税后的纯收入，股东们收到红利后又一次纳税。对于公司，债务利息是可以税前抵扣的，但是股权分红不行。债务利息税前抵扣是税务规则中有利于公司资本的唯一形式。假想一下：有个人大声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是一位联邦政府雇员。他希望像我这样的纳税人自愿每年捐献数千美元，帮助某些美国公司举债或某些华尔街的并购基金参与公司并购。我拒绝了，我想你也会拒绝。

也许你觉得自己无法确定美国经济是否需要有债务补贴或并购补贴。你想

听听专家们的想法。如果是这样，请了解联邦储备银行和货币监督管理局注（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近来警告华尔街的银行降低对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收购有风险的贷款量。注它们在2014年发布指导意见，敦促银行避免资助在大多数行业中的融资杠杆收购，这种收购使一家公司的负债超过其收入的6倍；然而，当年有40%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交易利用了高于6倍的杠杆率，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比例。注毋庸置疑，正是由于金融收购中伴随的税务补贴有足够的吸引力，银行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才能无视监管机构的软性指导。

请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家公司以10亿美元出售。收购方，当下最可能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或者一个同行竞争者，可以拿出3亿美元的现金并举债7亿美元完成这笔交易。如果这个靠举借新债收购的资产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升值60%，收购方就可以在计算债务利息之前使其初始自有资金投资获得2倍收益（6亿美元）。有许多理由使沉重的债务负担依然有吸引力。理由之一是债务利息可税前抵扣。如果这笔债是以4%的利率借来的，每年需支付2800万美元利息；不过，这是在缴税之前。然而，纳税者们每年将把其中的900多万美元返给收购方作为税务补贴；如果收购方是以个人税率缴税的合伙企业，补贴甚至会更多。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收购方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债务由被收购公司承担。如果被收购公司失败了，也许是因为新的债务负担，这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本身只会损失声誉。如果我的普利茅斯·洛克公司，为收购而借债，我们公司自己而不是被收购公司将陷入圈套。而且，我们不能像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那样反复借债了。第三个理由是，这笔债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当前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若没有税务补贴和低利率，收购量将接近自由市场应有的水平。你无法轻易改变利率，银行可能继续青睐它们的常客，但是如果你告诉国会代表这些理由，国会代表肯定能放弃税务补贴政策。

税务法还有其他条款可以更改，以降低你的负担。我将在下一章叙述另一个税务漏洞；而且，在国会预算的拨款中肯定有浪费性的开支。然而，无论庞大的赤字是否有用，此处讨论的目的只是希望你相信，保持房贷利息和公司利息税前抵扣不是造成赤字的正当理由。审视当前的预算可知，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你希望财政更平衡，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为了节省大量开支，削减为下一代的投资，减少必要的监管或政府的基本服务。政府若能更多地为基础设施、研发和其他公共投资花钱，情况会更好。但是，如果我们能一起行动以制止无效益的税务支出，那就更好。我们都应该坚定反对赤字滋生。

最严重的问题是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的长期不平衡。不根本改变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就不可能修复医疗保险；但是，如果我们及时采取行动，强有

力的社会保险很容易得到保障。

短期的预算不平衡大体上是偶然情况。长期失衡则比较危险，缓解社会保险基金失衡是重中之重。许多人以为社会保险是一个保障性的计划，它像私营保险业那样运作：从一群职工那里定期收取保费，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然后在这群人退休时把大部分本金和利息退还给他们。这种天真的认识是可为政治目的所用的神话，实际上这顶多是半真半假。私营保险业必须保持精确的储备金，以便在投资回报率合理时把储备金用于投资，从而使储备金增长以保证预期支出。对于私营保险业，每个参保者都是潜在的利润来源。

社会保险系统比私营保险业更复杂。它的保障性质与其大体上边收边付的筹资模式及明显缺乏精确的储备金相冲突。给予退休人员福利费的资金，主要来自按就业者工资收取的工资税。确实有过去收取、现在尚未花完的钱，即所谓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但是没有一个人依靠这笔结余的钱作为未来付费的来源。这是幸运的，因为基金受托方预言信托基金将在2033年用完它的现金。如果到那时的收入大于福利费支出，那就算不错；但是，如果不改善现金流收支失衡，没有人会相信有这种事。如果你对自己和子女在退休时美国主要社会保障网保持无损有所质疑，是很正常的。

2014年，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受托方发布报告指出，收来的工资税与支出的福利费之比将很快达到75%。当然，这不是第一次预警。在1996年由一个顾问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就已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组建了一个由参议员丹尼尔·P.莫尼汉（Daniel P.Moynihan）主持的“加强社会保险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委员会的成员们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改变社会保险的支出和筹资模式。9年后，奥巴马总统组建了一个跨党的国家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即著名的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Simpson-Bowles Commission），其责任是为国家的未来财政问题提出一揽子的全面治理方案。这个委员会针对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紧迫性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将有更多的退休人员（花钱者）需要就业者（挣钱者）供养。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强化了这个趋势。

社会保险计划，即针对老年、孤寡、残障人员保险（Old-Age、Survivorsand Disability Insurance，OSADI）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最严重的大萧条时期提出来的。它在1935年以压倒性的比例在国会获得批

准。注那时，公众已准备好接受它。在早期，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家庭农场，习惯于老年人在家中或附近生活，帮助、照顾子女。这是人类最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这种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很多乡村人口移居城市，城市人口达到50%以上，许多人在制造业做小时工。家族内互帮互助的模式逐渐消失了。少数职工从雇主那里得到足够生存的养老金，但确实只是少数。社会保险计划被设计为强制储蓄计划，要求雇员和雇主长期共同提供，给更多居民提供福利；那时，这种福利只有最开明的雇主提供。它的目标是这样的："就业者支付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费用，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努力为他人提供适当的保障"。注这肯定听起来像保险计划。

社会保险一直备受欢迎，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那些敢于质疑其好处的政客往往折翼政坛。何况，社会保险基本是有效率的。它不同于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它的行政运营费不到收入的1%。注在迄今为止的80多年时间内注，它的运营没有丑闻或严重失误，而且随着老年人独立生活方式的流行，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增强了。研究表明，半数的老年夫妻和3/4的孤寡老人依靠社会保险取得他们的一半收入。注他们的月均社会保险收益稍多于1300美元；对于退休的一些人，最高福利费约为每月2700美元。注

社会保险信托基金自设立以来，已从就业者工资中获取8.7万亿美元，其中支出了7.4万亿美元作为社保福利费，其余用于投资国债。注如果受托者把信托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显然能赚更多，但这条途径在早期就被否定了。投资国债的一个理由是股权投资的内在不确定性，还有另一个理由是，美国养老金计划即使只依靠信托基金筹到部分资金，仍能在企业界很快成为最大、最强的投资者，成为拥有股权和债权的混合体。这是自由企业社会中的政府扮演的一个危险角色。注

纵观社会保险历史，其财务状况表面上令人安慰，甚至到现在，工资税收入仍接近于每年的支出。然而毫无疑问，未来之路并不平坦。在社会保险计划实行的第一年，许多就业者加入，而合格的退休者寥寥无几。然后，出现了婴儿潮和预期寿命增长的转折点。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社会保险计划无法兼顾目前的合格退休年龄、工资税税率和福利费水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程序上是成熟的，那个资金富裕的年代也将宣告结束。在设立这个计划之初，专家们考察了已经建立初步退休系统的30个州规定的退休年龄。约有一半以65岁作为退休年龄，其余的大多是70岁。选择65岁的决策在20世纪30年代比在21世纪头10年更合适。

当时的国会没有想到预期寿命会如此戏剧性地增长。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的1932年，美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60岁。现在已超过80岁。男性职工在1940年满65岁开始拿社保福利费时，平均还能活13年。今天，男性职工在65岁退休后，平均预期还能活19年。在1940年，女性职工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已发生改变，而且她们的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同男性大致相同。在1940年，65岁的女性平均预期可以再活15年；今天，达到了23年。你可以为此而感谢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公共健身设施、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少的贫困以及更积极的老年病人看护。然而，长寿对于社保信托基金却是增加了困难。

人口老龄化相对无法抗拒。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二战”结束，美国每年约有250万新生儿。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人们不愿成家；在战争年代里，大量年轻人难以成家。在那之后的十几年，即从1946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有400多万新生儿。我的父亲服完兵役就结婚了，让我也成为婴儿潮的一员。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生儿数量又回到年均300多万。400万在职人员为250万退休老人支付社保福利费，是容易的。随着人口的相对变化及婴儿潮一代相继退休，300万在职人员为400万退休老人支付社保福利费，就越来越困难。现在，每天约有1万个婴儿潮出生者签字退休，开始领取社保福利费，这个数字在几十年里不大可能变小。

这就好比“蜡烛两头烧”。最清楚的解释是，1950年，美国7.1个就业者就足以为每个退休者支付社保福利费，但事实上当时有16个就业者在为每个合格的退休者支付社保福利费；现在，每个合格的退休者只对应着2.8个就业者。这个比值预期将在20年内降到2.1。随着时间的流逝，比值将趋向2。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活到85岁，而且生育率保持不变，则25至65岁的人数将正好是65至80岁的人数的2倍。

对于这些现实情况，国会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因为应缴纳工资税的收入曾经只有3000美元，而现在是118500美元。早期，工资税税率对于雇员和雇主都是2%，现在（社会保险覆盖下的退休计划和残障计划）是12.4%。此外，领取全部社保福利费的退休年龄正在逐渐上调。对于1960年及此后出生的职工，有资格领取全部社保福利费的最低年龄将是67岁。然而，也有反向的改变。为了使退休后的社保福利费与退休前

的收入之比尽可能恒定，社保福利费多年来随着每年工资的增加而提高。[注]与此同时，更长的寿命进一步增加了社保计划的开支。为了保持替代率[注]恒定，每年社保福利费中增加的美元累计超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通货膨胀影响，因为工资涨得比CPI快。以固定美元计算，平均的终身社保福利费比1970年几乎多66%，比1990年多33%。[注]

不做痛苦的政治变革，只靠这种简单计算作用有限。莫尼汉委员会中有影响力的罗伯特·珀臣[注]（Robert Pozen）指出，应使低工资收入者看到社保福利费将以现有方式增长，同时使高收入者看到将与CPI挂钩的每年较小的增长。随着工资税及其上限递增的变化，这补丁也许有用；但是，如果当时预见到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国会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强制性的法案中增加一个条款，本来可以有更完善的修补。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保险法案的起草者们曾希望或期待有一个永恒的积累社保福利费的时期。科学家们告诉我，我们将看到预期寿命继续增加一段时期，最后在达到100岁时趋于平稳。即使没有病毒入侵、癌症或其他各种疾病，人体也不可能永生不灭，但是制服这些致命的杀手还是能把寿命延长到一定限度。

提高退休年龄当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青睐的方案，但是说它们认为不需要采取行动也不公正。有些执政者，大多是共和党人，鼓吹用退休金投资的私有化来解决老年人收入问题。民主党人通常主张提高富裕的纳税人应缴纳工资税的上限。这两种做法都有精巧的论据。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的论据立足于国债回报率与股权市场回报率之间的利差。股权收益可以在任何足够长的时期内大大超过国债。当前可以预期这二者之间的差距达到年化利率5%。只要考虑到以8%的复利投资于某个项目在20年后可以拿到5倍的回报，而在相同时期以3%的复利投资只能有3倍的回报，就可以知道这个利差的作用力多么巨大。

在经济平稳时期，投资公司股权总是能比投资公司债券有更高的预期回报，而公司债券回报率又比超级安全的国债高。因此，私有化的鼓吹者们声称，假如社会保险信托基金从一开始就投资于各种股票组合，就不大可能有或者干脆不会出现筹资问题。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承认，社会保险设计者不让政府选择股票市场，从而避免资本市场的配置发生扭曲，或者让政府控制的信托基金在私营公司中拥有投票权，是明智的。他们提出的办法是，让个人控制自己的那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就像未来的退休者处理他们的401（k）[注]账户那样。总之，股权或证券组合的回报大致能在长时间内击败信托基金购买国债的回报。这个方案以增加职工退休后的整体收入为目标，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社会保险信托基金账户的偿付能力；因为这个基金计划本身的预期回报不会太高。

其实，私有化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在居民层面上，任何严肃的私有化建议都有附带的复杂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离婚和再婚成为常态的时代[注]。不过，最大的问题来自普遍存在的难以预料的市场不稳定性及每个人的特殊情况。虽然在足够长的时期内，高度分散的股票组合的表现总体上应该超过债券投资，但是对于整个市场在具体的某一年，甚至某十年，并不能准确地这样说。对于任何单一的具体股票组合，把这种观点普遍化甚至更不靠谱。而且，投资的技巧和知识绝不是居民普遍具备的。如果不受限制，有些人可能做出愚蠢或高度冒险的投资。如果把投资限于蓝筹股或指数基金，这也许能缓解技巧问题，但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政府偏爱大公司，而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小企业，但后者以比它们自身规模大得多的能量推动着经济发展，并提供了创新动力。

个人决策的结果差异极大。这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有一小部分社保参加者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已花光了这份私人储蓄。美国不会无情到听任不名一文的老年人挨饿。所以，政府提供的另一个社会保险计划不得不作为最后的救世主向他们提供生活费。这还意味着其他比较聪明或幸运的纳税人将肩挑两副重担：他们既需要保持私人的社保储蓄，又要为那些花光了私人储蓄的可怜人提供社保福利费。这将诱使一些乐于冒险的社保参加者孤注一掷。

私有化还有另一个难题。虽然一旦新的私有化方式趋于稳定，把公民视为一个整体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在向新方式过渡的时期，转型的代价是无法避免的。在我们的现收现付系统中，从共同的信托基金提取大量款项给个人账户，将使这个系统缺乏现金支付到期的社保福利费。私有化的反对者们倾向于高估这个转型的代价，推测这大概只能通过提高工资税来弥补。但是，支持者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可以忍受的。一位鼓吹私有化的主要人物，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总结说，“在过渡时期，年长员工造成的额外净成本很小，通常低于他们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收入”。[注]我不能肯定有多少年长者喜欢占子女的便宜。

对于资本市场的扭曲、用双重社保弥补那些失去积蓄者、逐步提高工资税上限等问题，一个缓解方法是允许私人只控制自身社保储蓄账户中的较小部分。虽然我的一些朋友可能认为这是背叛之举，但我从来不认为在私有化方向上走出足以缓解困境的一步是令人反感的，尤其是如果将其作为对现有社保计划的法定补充而不是代替。然而，向私有化大跃进将是武断且不计后果的。更重要的是，这将涉及社会保险的核心问题，政界很少有人愿意直接谈论它。对于社会保险的保险性质（指根据风险及此前的缴纳比例支付保费）与它的财富转移性质（指根据支付能力及整体效益确定保费，或者向最需要的人群倾斜）之间如何平衡，从来就没有被人弄清楚过。许多主张完全私有化的人赞成私有化路线，正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保

险私有化阻碍了财富转移。

社会保险的核心，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一个保险因素和财富转移因素的混合体。它的再分配性质使低工资雇员能在未来提取多于已缴纳的养老金，而高收入的纳税人被要求缴纳多于他们最终能提取的养老金。在设定工资税上限的情况下，再分配程度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工资税上限。目前上限基数是118500美元，它源于政治而不是数学，它筹到了比高收入者未来所得社保福利费更多的资金，但是只能做到上限之下允许的再分配。民主党偏向于更高的上限是为了使该计划的平衡朝它的再分配和支付能力方面倾斜，就像私有化把它的核心转向保险精算。这是这场辩论的真正核心。

目前，一位纳税人必须把每年收入的6.2%贡献给社保信托基金，不过只到工资税上限为止。所以，一位在职人员每年最大的贡献少于7500美元。提高工资税上限不应轻易地被否定。高收入者肯定付得起社会保险金的增加部分，而且这只是抵消近年来向金字塔顶部的巨大财富转移的一个温和措施。何况，这只对6%的报税单家庭有不利影响。[注]

然而，工资税在本质上是现有累进税制的不完善工具。那些有巨大支付能力的人享受着红利和投资收入，政府在设定工资税上限时完全没有考虑这些积累财富的方式。还有另一个与大幅提高上限有关的麻烦问题，即此方法在某个关键时刻将削弱对社会保险本身的支持。社会保险不仅是福利，而且是一种安全体制，它不是神话。它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保障机制而普及，过高的工资税上限会阻碍其普及性。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工资税上限很难实现，这也许不是应对社保计划支出困境的最佳手段。如果用这种方式为未来的赤字充分筹资，显然必须完全取消工资税上限。[注]

逐步提高工资税上限是合理的。然而，把退休的合格年龄与退休后的预期寿命相联系，依然是避免终身实际收益每年悄然扩大同时摆脱其困境的最稳健方式。如果使社保专家们称为“门槛”的合格退休年龄随着预期寿命增长而提高，这个系统的长期财务稳健将得以保证。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一个理由是，某些职业必须提前退休，因为它们对老年人来说过于危险或紧张，或者长期从事某些工作使人早衰。煤矿工作是一个例子。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工作还是低工资的，就业者远远不到70岁就得退休，而且也没有多少积蓄。如果这类情况不是很多，在合格退休年龄之外设立一些例外，应该不会被反对。把一些检测手段与有害职业的名单综合起来，可以制定出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方案。

反对提高合格退休年龄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统计数据显示，某些种族的预期寿命低于全体居民平均水平。有些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理由是，男性

美洲原住民及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比白种人短。这是比工种特殊论更无说服力的论据。我们应把大量的社会保险金分发给95%的居民以回应5%的居民感觉到的“需要”。这一点值得予以强调。它经常出现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当一小部分居民需要帮助，而整体的大部分能够以对每个人合理的代价提供帮助时，可以增加福利的全面性。如果大部分人需要帮助，而小部分极其富裕的阶层能提供帮助，这可能是全面性得益。但是，从少数富人那里拿到足够分配给其他每个人的钱，只是为了使这些有同情心的少数富人能享受些许全面再分配的乐趣，这不大明智。

此外，无论退休年龄定在多少，不同的居民群体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别总是存在的，而且预期寿命的差别在晚年比在出生时小很多；这些事实常被提出上述理由者置于脑后。注但关键在于，为了帮助多数人中的一小部分有差别的人，而让少数人增加工资税缴纳额，并把它分配给多数人，这种想法明显很笨拙。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按性别和种族划分来制定针对美国居民的政策。如果在性别和种族上存在结果差异的所有项目和情形，都通过普遍增加福利来处理，国库就会空空如也。

社会保险是一项混合计划，它应该被这样保持着。无所顾忌地提高工资税上限，把少量的或数量逐步增加的个人账户私有化，以及采用指数化累进，都是“次优法”。所有这些都能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辅助力量。但是，工资税及福利的改变，都无法让退休年龄的设定符合现实。若把退休年龄硬性锁定，而预期寿命却在上升，这相当于假定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保持恒定，而每年降低合格退休年龄注。

事情的实质不难把握。老年人要保持收入替代率，即不让退休后的收入比工作时低，这可以理解。这个目标合乎逻辑。挑战在于未来的人口统计。修补社会保险缺口的大多数建议是为了恰当地应对婴儿潮所带来的压力，但是它们只能预测更长的预期寿命会造成多大的问题。最近发行的《时代周刊》把现在出生的婴儿活到140岁的可能性作为封面故事。这个岁数是基于最近在实验室内试验小老鼠的结果，其实只是杂志引人注意的手法；但是，我认为预期寿命不久将达到90多岁是现实的。如果替代率保持不变，合格退休年龄也不变，则预期寿命的每一次升级将增加受益人得到的钱数，从而增加社保支出。这是没有争议的。然而，预期寿命将增加多少显然有争议，因为这关系到在癌症、心脏病及其他致命疾病方面的科学突破，这不是经济学家和保险精算师的专长。如果退休者平均活到95岁，那时为应对每个月的福利费支付，政府将需要把筹资增加50%。

围绕替代率提出的政策建议，必然不同于围绕社保参加者预期终生费用提出的政策建议。前者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社会目标，后者的核心则是社会保险系统的偿付能力。目前，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系统在方法和时机两方面的

最终完善，还存在疑问。信任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还处于低位，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的安全性、可靠性没有把握，这毫不奇怪。因此，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之间非政治性自动关联，可能是使公众确信社会保障安全性的唯一办法。本书指出了联邦政府在多个领域能够节省开支或提高收益的许多方法。如果在确保社会保险系统的偿付能力及恢复人们对它的信任之后，国会还希望把资金用于确保替代率，那将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议题。我不是在建议调解主张保持中产阶层退休潮的受益者有恒定替代率的人们与主张随着寿命增长而降低每年福利的人们之间的争辩。我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确保我们的下一代在退休后的收入，他们正为此付费。

2014年社保信托基金受托方报告提出了一个逐步完成寿命指数化的途径。这个途径将从2017年开始把正常退休年龄（以63岁为例）每年提升3个月，直到在2037年达到70岁为止。同时，它将把2021年的最早退休年龄提升到64岁。此后，它将把退休年龄指数化，以保持预期的退休年龄与工龄之比不变。这份受托方的报告估计，单靠这个改变就能消除60%的社保基金缺口。[注]根据需要，把它与“次优法”清单上的一些小调整相结合，人们将不必再担忧社会保险的偿付能力。社会保险计划无能为力的部分有它自己的问题，需要抓紧时间重构。若要对正常退休年龄做出重大调整，则须重新考虑失去能力者的资格和福利，但这不是本书的主题。

医疗保险和联邦的养老金也需要予以关注和改进，但是解决方法不像妥当安排社会保险那样明显，而且更复杂。

另外两个庞大的长期预算项目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养老金不在本书讨论之列，医疗保险问题将在另一章再次出现，但是这两者都值得注意。在社会保险立法十年后，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全国性的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当时，社会保险为老年人负担房租和食品支出，但是老年人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杜鲁门未能使他的计划获得通过。十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做成了这件事。约翰逊在签字仪式上说，“对这项行动的需求是如此明显，这么多年才通过实在令人惊讶”。[注]约翰逊值得被赞扬，他有卓越的政治才能。随着该计划的实施，一度似乎不可战胜的反对派投降了；今天，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人。新闻界喜欢引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保守分子[注]最近的说法，他警告众议员，“你的政府之手别碰我的医疗保险”。[注]

医疗保险不像社会保险，它并不是完全受资助的保障计划。社会保险计划中有一部分是信托基金，但是医疗保险的开支基本上是由常规税收、工资税和受益者的保费组成的，它大约构成财政部预算的20%。[注]可以预期，医疗保险将来也会出现财务不平衡，这是它与社会保险的共同点。

1966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预计1990年美国的医疗保险支出约为120亿美元。然而，1990年美国的实际医疗保险支出是1070亿美元。而且，与社会保险计划面临的人口结构困境类似，医疗保险的未来远非美好。随着更好、更昂贵的治疗，更长的预期寿命以及婴儿潮所导致的就业者与退休者的比例失衡等情况的出现，医疗保险费用将不断攀升。

1964年，缴纳医疗保险的工资税税率是统一的0.7%，年均约60美元。参加者在退休期间每年支付医疗保险费35美元。50年后看这些数据，你可能觉得这是印刷错误。现在，缴纳医疗保险的工资税税率平均是2.9%，相当于平均每年缴纳约1000美元，而退休后每年平均医疗保险费也是1000多美元。按人均计算，医疗保险的开支在过去4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7.7%，比通货膨胀快。有些专家基于近来的好消息预计增速在放缓，我对此表示怀疑。没有什么能改变人口老龄化及医疗费用增加的趋势。比较保守的预估显示，每年的医疗保险总支出注定会在10年内从现在的5000多亿美元增加到至少8500亿美元。

我不会建议取消医疗保险或降低贫困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门槛，但是有些时候医疗保险对于一部分人没必要那么慷慨。举个我个人的例子。我已故的父亲是个健步爱好者。他直到晚年，因坐骨神经痛使左腿在行走时有疼痛感，才有所停歇。于是，他去看一位又一位医生。当我提出为他付钱时，他让我放心，因为看病完全是免费的。他说免费的意思是，费用由老年医疗保险支付。他虽已超过了每年的免费额，却仍能轻易地支付任何附加的自付额。

自那以后的多年内，我听到过几十个类似的例子。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或者几乎是免费的，它的使用者就干脆不考虑通常程度的谨慎或节俭。事实上，本来即使付少量的钱，人们也会犹豫一下。现在的医疗保险既有部分自付额又有免费额，但其水平从来不是为最大的公平或效率而设计的。社会财务成本很高的服务不应该被用户理所当然地免费使用，何况有许多人付得起比他们自付额更多的钱；同时，几乎没有任何服务比医疗保健服务更看重公平和质量。

对于医疗保健的一揽子改革是必要的，这将在本书第四章进行阐述。然而，一个好的起点是在自付额与免费额之间进行的累进制比例的扩大。我们国家需要改变医疗保健文化，而改变付费比例是个良好的开端，当然免费医疗保险全覆盖的国家并不需要这些规则。这个比例应这样设计，对于最需要的人们的付费影响最小，但只在富人面临危机情况时才予以补贴。低收入人群应只支付个位数比例的医疗费用，而且每年只保障一个合理的

上限。高收入人群自付比例应高达80%，而且只在达到年度支出最高额时才保障。

这个做法的优点是，社会保险计划将通过自付额的累积获得更多收入，而在支出方面将更为谨慎地使用昂贵的医疗。由于有些人的行为会因此改变，所以这个数据很难预测。让更多美国人知道，不是每个健康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任意花钱，这没有坏处。

养老金是有关联邦预算辩论中常常被忽略的“拖油瓶”。我在此不进行详细论述，只提出几个可供参考的建议。联邦文职工作人员至少有两种养老金体系。传统的固定收益计划年代久远、规模较小，处于固定收益与固定缴款之间的计划比较新颖、规模较大。这些养老金合计使联邦政府每年花费约750亿美元。[注]军队的养老金完全是固定收益式的。这部分养老金使联邦政府每年花费约500亿美元。[注]在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后，每个人都认识到将来可能入不敷出。正如一位民主党众议员[注]所说，“我们的庄严承诺与老兵们没有任何依靠之间脱节了”。[注]

私营企业雇主必须设立储备金，以资助职工的养老金计划。虽然大多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甚至未能充分资助养老金计划，但至少留出了一部分资金。联邦政府没有拨款，而且没有为这项支出设置专项税收。累积的养老金缺口必须在到期时付清，而且全部用税收支付。目前，联邦政府没有合法、合理的方法，为现有的养老金缺口募集资金。然而，我们可以防止这个缺口继续扩大。现在被绝大部分私营雇主广泛应用的是401（k）计划，此计划做出的安排大体上没有资金不足的技术风险，虽然雇主和雇员们留出的资金低于许多人的预期。401（k）计划是否能为任何退休者提供足够的养老金，取决于每个人愿意把多少现金放入这个计划，以及雇主提供的匹配数额。我们在30多年前成立普利茅斯·洛克保险公司之初，就采用了典型的401（k）计划，当时曾担心401（k）计划提供的收入在退休后是否够用，但我从未听过有人抱怨这个计划的基本模式，也未听过针对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固定收益计划应该被彻底废弃的议论。

从逻辑上讲，地方、州和联邦三个层级的养老金系统应该相同，而且应同私营企业的养老金模式一样。401（k）计划的做法足够好，只要激励雇员增加账户存款、雇主提供相匹配的数额，就可以成为新的政府雇员养老保障模式，这种做法是强制性的，可以改善养老金计划。通过立法强制性规定雇员和雇主的最低标准，401（k）计划在改善保障养老金计划上还可以更有作为。至少，每个此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有更高额的自动储蓄，他们对未来养老将有更高的期待。在一个理想的水平上退出参与，或者超标准地多存入一些，人们通常倾向于后者。401（k）计划的结构理想，但远

远没有提供足够的退休保障。其因覆盖范围过窄而饱受诟病，但它可以改进。对于所有公营的和私营的养老金计划使用同一个标准模式，有另一个巨大的优点，标准化可以加快养老金系统的真正完善——养老金可自动发放并方便快捷。

只要取消一些产生反作用的税务开支，就可以消灭目前的联邦赤字，长期的财政平衡也可以实现。第一步应该是使社会保险与人口年龄分布现实相吻合。

这一章的“基本问题”是：当前的和未来更麻烦的联邦预算的财政平衡都可以被恢复。根据常识和自我利益，你应该不再对个人或公司的借债给予补贴。取消这两项利息税前抵扣得到的结余就足以使目前的联邦预算平衡。何况还有其他许多利息税前抵扣值得重新检查。只要能确保社会保险支出和收入相抵，长期预算也可以得到平衡。这只比恢复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初始关系稍麻烦一点儿。其实，健全的财政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

这一章中涉及的其他建议或未给出答案的问题不属于“基本问题”。我们虽然可以通过强制实施按照使用者支付能力确定免费额，改善医疗保险平衡，昂贵的医疗费用依然是个问题，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还有一些更大的问题。未来值得认真考虑的是，联邦政府可以采用私营企业的401（k）计划模式。美国最终将走向完全便捷的养老金自动发放之路，但是养老金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取消被利息税前抵扣政策浪费的税务补贴而使预算得以平衡，剩下的问题将是如何恰当处理这笔可喜的新收入。一些难题总是与一些相对容易的问题相伴相生。这些容易处理的问题足以告诉我们，只要两党有勇气、有担当，把财政秩序整理得更好就不是难事。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下一代在回顾政策推行进程时，会奇怪为何花了那么多年它们才获得通过。

---

1. 赋权项目是指政府保证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例如年龄或收入）的个人或集体给予特定的福利待遇或补助。作者此处是指人口加速老龄化加重了国家给老年人福利待遇的负担。——译者注

2. 珀洛尼厄斯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丹麦国王哈姆雷特的御前大臣。国王被王后和她的情夫谋杀。小哈姆雷特在父亲阴魂指引下决心复仇时刺杀了偷听其复仇计划的珀洛尼厄斯，珀洛尼厄斯的女儿奥菲利娅恰巧是小哈姆雷特的爱人。作者只是借用该剧中的关于借债问题的一句话。——译者注

3. 1.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Table 1.1, “Summary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Surpluses or Deficits (-): 1789-2019," Whitehouse.gov, 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4. Ibid.

5. 2009年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小布什政府对外的军事征战和对内的财政扩张政策使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一万亿美元。——译者注

6. Ibid.

7. TreasuryDirect, "The Debt to the Penny and Who Holds It," Treasury Direct.gov, http://www.treasurydirect.gov/NP/debt/current, accessed June 13, 2015.

8. 在2014年，美国的就业人数约为1800万。——译者注

9. Kate Rogers, "Sticker Shock: U.S.Debt Is ＄123K per Working American," FoxBusiness.com,October 17, 2013, http://www.foxbusiness.com/ personal-finance/2013/10/17/sticker-shock-us-debt-bill-is-123k-per-work ing-american/,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10.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mfh.txt, accessed June 13, 2015.

1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2014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July 2014, Figure 1-1, "Federal Debt Held by the Public," https://www.cbo.gov/ sites/default/files/45471-Long-TermBudgetOutlook_7-29.pdf, accessed June 13, 2015.

12. 美国的"国内战争"是指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译者注

13. 新千年的头8年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执政，依照前共和党总统里根的供给学派经济学，给企业减税以刺激经济，使政府收入锐减。——译者注

14. See note 1 for federal spending data showing approximately ＄3.5 trillion R in outlays in 2012.State and local expenditures in that year totaled ＄3.2 trillion.See Jeffrey L. Barnett, Cindy L.Sheckells, Scott Peterson, and Elizabeth M.Tydings, "2012 Census of Governments: Finance —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Summary Report," Census.gov, December 17, 2014, http://www2.census.gov/govs/local/

summary_report.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15. Author's calculations.Underlying data from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4 to 2024,” CBO.gov,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45010; and Medicaid data from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Medicaid — Baseline Projections,” April 2014 Baseline, CBO.gov,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44204, accessed June 13, 2015.

16. Jacob Lew, Thomas Perez, Sylvia Burwell, Carolyn Colvin, Charles P.Blahous III, and Robert Reischauer, “The 201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s,” SSA.gov, http://www.ssa.gov/oact/tr/2014/tr2014.pdf,accessed December 29,2014.

17. 企业或个人在报税时以各种名目（例如捐助公益事业或抚养几名亲属）使一部分收益免税或让税务局退回一部分已缴纳的税款。国家的税务局少收入多少钱就相当于国家多支出了多少钱。——译者注

18. 利息税前抵扣是指个人和公司为其获得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可以作为支出而从其应纳税收入中扣除，从而少纳税。——译者注

19. 国家因退税和免税而少收取就相当于多支出，这个少收取的税款被称为“税务支出”（Tax Expenditure）。——译者注

20. “Big Oil's Misbegotten Tax Gusher: Why They Don't Need $70 Billion from Taxpayers Amid Record Profits,” AmericanProgress.org, May 5, 2011,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tax-reform/news/2011/05/05/9663/big-oils-misbegotten-tax-gusher/, accessed January 2, 2015.

21.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2012 Farm Subsidy Database,” Ewr.org, http://farm.ewg.org/, accessed April 10, 2015.

22. William McBride, “A Brief History of Tax Expenditures,” TaxFoundation.org, August 22, 2013, http://taxfoundation.org/article/brief-history -tax-expenditures,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23. 富人和盈利的大企业捐款给慈善机构是受到大众欢迎的。但是，捐款者的目的往往是使其收入进入较低税率的档次，收入额和税率的双重降低带来的少纳税可以抵销其捐款额。——译者注

24. Sean Lowry, “Itemized Tax Deductions for Individuals: Data Analys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February 12, 2014, 2 - 3, http://www.fas.org/sgp/crs/misc/R43012.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25. Bruce Bartlett, “The Sacrosanct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13,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3/08/06/the-sacrosanct-mortgage-interest-deduction/,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26. U.S.Congress,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Estimates of Federal Tax Expenditures for Fiscal Years 2011–2015,” January 2012, https://www.jct .gov/publications.html?func=startdown&id=4385, accessed June 14, S 2015.

27. According to my calculations, the average federal deficit from 1989 to 2014 was about ＄366 billion.See note 1.

28.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2010 Census Shows Second Highest Homeownership Rate on Record Despite Largest Decrease Since 1940,” U.S.Census Bureau Newsroom Archive, October 6, 2011,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2010_census/cb11-cn188.html,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29. Benjamin H.Harris and Daniel Baneman, “Who Itemizes Deductions?,” Tax Notes, January 17, 2011,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 UploadedPDF/1001486-Who-Itemizes-Deductions.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30. Anthony Randazzo and Dean Stansel,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 Saves Middle Class Taxpayers All of ＄51/Month,” Forbes, December 18,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realspin/2013/12/18/mortgage-interest-deduction-saves-middle-class-taxpayers-all-of-51month/, accessed December 29,2014.

31. 利息税前抵扣使一小撮富人少纳税，而大量低收入的人则全额纳税，导致后者填补富人少纳税造成的国家税收缺口。所以说是“逆向减税”。——译者注

32. Steven C.Bourassa, Donald R.Haurin, Patric H.Hendershott, and Martin Hoesli,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s and Homeownership: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Swiss Finance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12-06, March 13, 201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02865, accessed June 14, 2015.

33. James Surowiecki, "The Debt Economy,"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11/23/the-debteconomy,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34. 纳税信用（Tax Credit）是把已缴的税款保留在税务局，不退税，而在下次纳税时用于缴税。——译者注

35. Alvin C.Warren Jr., "The Corporate Interest Deduction: A Policy Evaluation," Yale Law Journal 83 (1974): 1585.

36. Bob Pozen and Lucas W.Goodman, "Capping the Deductibility of Corporate Interest Expense," Tax Notes 137 (2012), http://papers.ssrn.com/ 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90966, accessed April 10, 2015.

37. This calculated number is derived from the Pozen and Goodman article (ibid.) and was confirmed with Pozen subject to its underlying assumptions.

38. 货币监督管理局是美国财政部内的一个独立局，它是根据1863年的国家货币法案设立的，其职责是批准、管理和监督国内的一切银行和储蓄借贷机构及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和代理处的货币流动性。——译者注

39. Gillian Tan, "Debt Rises in Leveraged Buyouts Despite Warning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0,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 2702304422704579574184101045614,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40. Ibid.

41. "工资税"是指按工资收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不是所得税，"上限"即"最大的应纳税收入"，收入中超过上限的部分无论多大都不必按工资税税率缴纳工资税。——译者注

42. See note 10.

43. See note 10, Figure IV.B3.

44. 丹尼尔·P.莫尼汉（1927—2003）是社会学家，也是国际关系学的博

士；他曾连任四届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1976—2000）；此前，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和印度的大使。——译者注

45. Commiss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and Creating Personal Wealth for All Americans,”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csss/reports/Final_report.pdf,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46. 共和党人辛普森是代表怀俄明州的参议员，民主党人鲍尔斯是白宫的办公室主任。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由两党各出3名参议员和3名众议员，加上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局长、1名工会代表和两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组成。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多半是难以实现的空话，例如，到2075年把退休年龄逐步延迟到70岁，冻结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裁减20万政府工作人员，每增加1美元税收必须减少3美元支出，到2020年增加税收10万亿美元等。公众的评论是，两党实际上未达成协议。——译者注

47.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The Moment of Truth,” December 2010, http://www.fiscalcommission.gov/sites/ fiscalcommission.gov/files/documents/TheMomentofTruth12_1_2010 .pdf,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48. “Committee Reports and Initial Passage,” 1935 Congressional Debates on Social Security, http://www.ssa.gov/history/tally.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49.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citing 1939 Repo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Board, SSA.gov, http://www.ssa.gov/history/briefhistory3.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0.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Expenditures, 1957 - 2014,” ssa.gov, http://www.ssa.gov/oact/STATS/admin.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1. 从1935年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代国会通过OSADI法案至今已80多年。——译者注

52. “Social Security Basic Facts,” SSA.gov, April 2, 2014, http://www.ssa.gov/ news/press/basi-cfact.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3. “Fact Sheet, Social Security: 2014 Social Security Changes,” SSA.gov, http://www.ssa.gov/pressoffice/factsheets/colafacts 2014. 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4. See note 33, at “Trust Funds.”

55. 美国式的“自由企业社会”不容许国家向私有企业投资控股，也不允许国家资金到证券市场上炒股。——译者注

56. “Life Expectancy for Social Security,” SSA.gov, http://www.ssa.gov/history/lifeexpect.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7. 2014 OASDIA Trustees Report, Table V.A4, “Cohort Life Expectancy,”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OACT/TR/2014/lr5a4.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58. See note 38.

59. See note 39.

60. See note 38.

61. See note 39.

62. “Live Births, Birth Rates, and Fertility Rates, by Race: United States, 1909 - 2003,” CDC.gov, http://www.cdc.gov/nchs/data/statab/natfinal2003.annvol1_01.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63. Ibid.

64. Ibid.

65. D'Vera Cohn and Paul Taylor, “Baby Boomers Approach 65 — Glumly,”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20, 2010, http://www.pewsocialtrends .org/2010/12/20/baby-boomers-approach-65-glumly/, accessed June 16, 2015.

66. James A.Dorn, “The Real Costs of Social Security,” Cato Institute, August 20, 2010,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real-costs -social-security, accessed April 12, 2015.

67. Table IV.B2, “Covered Workers and Beneficiaries, Calendar Years 1945 - 2085,” SSA.gov,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OACT/tr/2010/lr4b2.html, accessed June 16, 2015.

68. Ibid.

69. Ibid.

70. “Benefits Planner: Maximum Taxable Earnings (1937 - 2015),” SSA.gov, http://www.ssa.gov/planners/maxtax.htm,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71. Tax Policy Center, “Historical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s,” January 20, 2015,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content/pdf/ssrate_historical.pdf, accessed June 16, 2015.

72. “Full Retirement Age: If You Were Born in 1960 or Later,” SSA.gov, http://www.ssa.gov/retirement/1960.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73. “Cost-of-Living Adjustments,” SSA.gov, http://www.ssa.gov/oact/cola/ colaseries.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74. “替代率”是指为了保持退休后生活水平不变所需的福利收入与工作时的工资收入之比。——译者注

75. The statistics apply to a two-earner couple, each making ＄44,800 in 2013 constant dollars.The 2015 lifetim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re about ＄601,000, 33 percent higher than the 1990 benefits of ＄455,000 and 66 percent higher than the 1970 benefits of ＄360,000.See C.Eugene Steuerle and Caleb Quakenbush,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es and Benefits over a Lifetime: 2013 Update,” November 2013, Urban Institute, http://www.urban.org/sites/default/files/alfresco/publication-pdfs/412945-Social-Security-and-Medicare-Taxes-and-Benefits-over-a-Lifetime.PDF, accessed June 16, 2015.

76. 罗伯特·珀臣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及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担任莫尼汉委员会委员（2001—2002）后，回到马萨诸塞州任经济事务管理局局长。——译者注

77. 401（k）是美国在1978年制定的《国内税收法》第401款，它为雇主和雇员的养老金存款提供优惠。企业为每个员工设立401（k）账户，员工从每月工资中拿一定比例存入，雇主也配以相应的数额；员工自主选择投资于哪一种证券组合，收益计入该账户；退休后可以一次性或分期取出或转存到银行账户。——译者注

78. 工资收入是夫妻共有的，如果离婚，丈夫的工资收入应分给不工作的妻子。401（k）账户是以职工个人名义设立的，存入401（k）账户的退休金归丈夫个人，这就容易引起离婚时的纠纷。——译者注

79. Martin Feldstein and Andrew Samwick, “The Transition Path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i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ed.Martin Feldstein, 256 - 8, http://www.nber.org/chapters/c6251.pdf,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80. Nicole Woo, Janelle Jones, and John Schmitt, “Raising the Social Security Payroll Tax: How Many Workers Would Pay Mor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ss-2013-01.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81. See Option 18 under “Revenues” in “Options for Reducing the Deficit: 2014 - 2023,”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November 13, 2013, https:// www.cbo.gov/budget-options/2013/44811, accessed June 16, 2015.

82. The additional expected years of life left for whites compared to blacks is 4.3 at birth but only 1.3 at age sixty-five and 0.9 at age seventy.See Elizabeth Arias, “United States Life Tables, 2009,”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62, no.7 (January 6, 2014), http://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2/nvsr62_07.pdf, accessed June 16, 2015.61.“This Baby Could Live to Be 142 Years Old,” Time, February 23, 2015.

83. 例如，退休年龄锁定在60岁，预期寿命从80岁升至90岁，退休后享受福利由20年增加为30年。这相当于预期寿命80岁恒定不变，而合格退休年龄降为50岁，退休后享受福利也是30年。——译者注

84.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 “Provisions Affecting Retirement Age,” provision C2.5, September 18, 2014, http://www.ssa.gov/oact/solvency/provisions/charts/chart_run249.pdf, accessed June 16, 2015.

85. Lyndon B.Johnson, “Remarks with President Truman at the Signing in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care Bill,” Social Security History: Lyndon B.Johnson, SSA.gov, July 30, 1965, http://www.ssa.gov/history/lbjstmts.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86. 根据章末注64，这个保守分子是前参议员吉姆·戴明特（Jim DeMint）；他在约翰逊总统时期（20世纪70年代）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共和党保守分子，在1998年成为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连任三届（每届2年）后于2004年成为参议员，在连任第二届参议员后仅2年就于

2012年辞职去担任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主席。他激烈反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改。——译者注

87. Philip Rucker, “Sen.DeMint of S.C.Is Voice of Opposition to HealthCare Reform,”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09, http://www.washington 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7/27/AR20090727 03066_2 .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88. “Policy Basics: Where Do Our Federal Tax Dollars Go?,”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rch 31, 2014,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1258,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89. Walter E.Williams, “Washington's Lies,”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September 22, 2010, http://fee.org/freeman/detail/washing tons-lies,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90. See note 53.

91. “Social Security History: History of SSA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SSA.gov, http://www.ssa.gov/history/ssa/lbjmedicare3.html#21,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92. “Part B Costs,” Medicare.gov, http://www.medicare.gov/your-medicare -costs/part-b-costs/part-b-costs. html,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93. “The Facts on Medicare Spending and Financing,” Henry J.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July 28, 2014, http://kff.org/medicare/fact-sheet/medi care-spending-and-financing-fact-sheet/,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94. Ibid.

95. See Option 8 in “Options for Reducing the Deficit: 2015 - 2024,”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November 20, 2014, https://www.cbo.gov/budget -options/2014, accessed June 16, 2015.

96. Dennis Cauchon, “Federal Retirement Plans Almost as Costly as Social Security,” USA Today, September 29, 2011, http://usatoday30.usatoday .com/news/washington/story/2011-10-11/federal-retirement-pension -benefits/50592474/1,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4.

97. 根据章末注74，这位民主党众议员是吉姆·库伯（Jim Cooper），他来

自田纳西州，自1982年至1995年连任6届众议员，1995年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去大学教书，2002年返回政坛，竞选众议员成功，连任至今。他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强烈主张放松枪支管制。——译者注

98. Ibid.The representative quoted is Jim Cooper (D-TN).

第二章　不平等

美国的价值观令人敬佩，但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却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这种分化正在扩大。财富分化比广泛研究的收入分化更为严重，影响也更长远。资产向富人转移，正在让我们失去精英制度、生产力、同情心和向上流动性[注]。它最终会让我们丧失民主和社会团结。许多原因产生了这些现象，其中一些是技术时代的方方面面造成的，而且几乎无法抗拒。然而，有些是源自拙劣的政策抉择。有效的遗产税可以缓解极端的不平等；但是，要逆转这一趋势，需要对未变现资本利得[注]征税，并取消垄断企业的税收优惠。

在20世纪70年代，我担任马萨诸塞州保险总监之前，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正在逐步恶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美国已经达至人类至善境界，并继续稳健地朝一个人们普遍钦佩的公正的方向前行。我们很幸运，不必忍受像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注]、欧洲的世袭贵族制或古老的东方帝国那样的不平等对我们的良心的考验。我被教导说，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国家相比，美国的分配公平水平更高，社会流动性更大。那时，不少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克服种族和性别歧视，我们的社会就接近完美了。回顾过去，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完美似乎并不明确；有些人寻求纯粹的、不受约束的精英体制，有些人倾向于追求平均主义，实际上这两者都不是明智的终点。更重要的是，无论分配公平的完美定义是什么，美国显然都没有实现过；事实上，即使我们往那个方向走过，我们也错过了该拐弯之处，现在我们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行。

在马萨诸塞州保险业监管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汽车保险业竟然根据投保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确定保费，而且美国大多数地区都在使用这个方法。收入并不是太糟糕的索赔费预测因素，而且在统计上优于多数其他因素，这听起来是个可以接受的定价因素，比如更容易找到代理商。这种做法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它无法激励负责的驾驶行为，后者本来可以改善理赔支出状况并在整体上降低民众付费；另一方面，它往往导致贫困街区行为端正的司机无法负担保费，却给富裕街区记录不良的司机优惠，从而扩大分化。我对这个问题钻研得越深入，就越了解我们的收入和财富的普遍差距，我很快就放弃了对美国经济平等的美好而失真的看法。很久以前，我就不再从事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工作，但一直对不平等问题很感兴趣。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关注者很少，包括学术界在内。这让我很失望。

最近，不平等问题受到的关注有所增加，财富的集中已变得非常明显而不容忽视。不平等还相应地表现为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下降了。这两者的结合是对多元化民主的威胁。此结合有许多原因，有些是不可逆转的。

近来的事件使人更关注分配不平等问题。如果你纳闷2008年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尽管它缺乏领导或明确目标），你可以想想经济衰退之后3年的复苏成果几乎完全被收入最高的1%的人拿走了。具有讽刺性的是，“茶党”运动也获得了这种助力。自2000年以来，至少70%甚至更多的美国人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金融危机是产生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尽管同样经历了金融危机，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财富还是以两位百分数的速率在增长。在2009—2011年的初始恢复期，收入最高的7%的顶级富人的家庭平均净资产增长了28%，其余93%的人的财富却下跌了4%。所以，毫不奇怪，许多人认为经济衰退尚未结束，有些人甚至非常愤慨，这是不足为奇的。唯一值得宽慰的是，政界和学术界最终注意到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我们长期引以为豪的社会流动性的降低。

延长评估时间并不能让我们乐观起来。40年来，美国的收入中位数没有实质性增长。自我们大多数人出生以来，美国积累的财富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但这个果实总是被金字塔尖的人摘走。中间阶层的收入40多年来停滞不前，与此同时，顶部1%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增加了3倍。20世纪中叶，占美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占有美国国民财富的1/3，现在这个比例约为1/2。20世纪中叶，收入最高的1%，这个所有家庭中的幸运尖顶，占有美国国民财富的10%，现在这个比例约为1/4。如果你就是其中一员，你可以感到庆幸，但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财富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他们的收入比重从未超过个位数。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层收入比重降低了15个百分点，这部分财富转向了收入最高的10%。人们也常用首席执行官与工人的平均工资之比，来衡量主要影响中产阶层的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在我年轻时，这个比例约为20：1，现在达到300：1。对于美国而言，这些趋势是不健康的。

我经常用一种简单分类法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经济阶层的状况。按照这个分类法，非常重要的中产阶层是这样一些人：只要愿意并有能力工作，他们

就能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并且可以通过更辛勤、更努力的工作来改善他们的舒适程度。顶层人群即使不工作生活也能过得很好。而底层人群是这样一些人：即使他们愿意勤劳工作，也挣不到足够体面生活的钱。我们社会的经济学不适用于中产阶层，我们社会的大部分公民即便愿意也能工作，仍然无法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这在21世纪越来越司空见惯。此外，美国梦包含这样一个假设，有才能又勤劳的公民可以自由地更上层楼，包括脱离底层进入最上层，而懒惰和无能将让人滑向底层。随着钱权越来越集中，而把下面各层的机会抽吸干净，这个假设就不再成立。

人们可以用大量篇幅继续强调与此相同的观点，或许没有必要再重复。这种论述已经比较常见，因为这个问题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全面关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最近撰写了一本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注]，缜密地证实西方的财富和收入分化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该书论述深奥冗长，但是它在全球巨大的销量让出版界很惊讶。此书的确非同寻常地好，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内容，非常值得一读。平等的下降趋势不是统计学上的异常、偶然或扰乱良好趋势的短暂波浪，这个转向的确非常糟糕，它真正地开始转到一个恶性发展的方向上。

此外，除了担心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合乎情理的担忧。公司权力的不断集中同样威胁着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如果你担心游说者们和捐款的超级富豪们在当今政治的每一个方面都影响太大，那你不算是杞人忧天。在美国历史上，公司在国会的权力起起伏伏。今天这个权力可能是自特威德[注]大亨（Boss Tweed）和马克·汉纳[注]（Mark Hanna）幕后操纵以来最大的。统计数据表明，筹到最多竞选捐款的人绝大多数是选举的赢家。一位在参议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参议员现在大约用1/3的时间筹款，每两年改选一次的众议员则情况更糟。

这个趋势把民主带入了险境。我们所珍视的政府治理模式并非理应如此。你越了解世界上的各种政府，就越应该爱惜我们的民主，也应该更明白民主之花是多么脆弱。民主远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必然存在，它在历史上是稀有和脆弱的。民主的产生和存活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都很罕见。世界上，美国和瑞士是两个最古老的有效运转的民主共和国。美国政府中有些人试图把我们的民主体系移植到其他地方，但民主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普选领导人，还有比通过民众投票选举领袖更多的要求。民主的真正特征在于正当程序、少数权利、新闻独立、保护各种自由以及教会与国家的有效分离。没有这些基本要素，多数只会变成一位聪明的幽默家所说的：12只狼和1只羊投票决定拿谁当午餐。[注]

民主的基本核心要求以健康的多元主义措施作为前提条件，即一个金钱和权力广泛分布的社会。民主与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可以和谐

共存；而且民主并不等同于繁荣。美国非常依赖市场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繁荣保障……只要我们能保持我们的挑战型和创新型文化。威胁在于，我们可能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少数人和少数机构攫取几乎全部成果，并制定可能为他们的私利服务的所有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中。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民主。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民主肯定不是最自然的政府形式，它可能只是勉强符合人的本性，但它很可能是人类非常伟大的发明。今天，我们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不断上升的程度严重威胁着民主的继续存在。如果我们的多元主义逐渐销蚀，那么美国最耀眼的一颗宝石也将随之而去。

我在此引用的主要是收入或工资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比财富的统计数据更容易获得，因为税收机构保存了这些数据并可在抹掉个人身份后公布。因此，财富数据更为重要。公众不容易获得也更难读懂财富数据，但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比收入不平等大得多。最顶层1%的人收入大约是中位收入的14倍。[注]最顶层1%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至少是家庭中位财富的70倍。[注]2012年，金字塔尖的这些人总计拥有至少6万亿美元的净财富，大致相当于2/3的底层家庭的财富。[注]这是事实，因为最穷的10%没有积累任何财富，而中产阶层的财富大体上局限于退休储蓄和房产。然而，财富比收入更能决定社会经济阶层，更容易传承给下一代。这个区别长期存在。此外，最有特权的那些人的财富在2012年并没有停止增长，目前可以合理地估计，这个财富至今有8万亿至9万亿美元。

有些政治经济学者会告诉你，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在一个有流动性的社会中，差距大会激发人们的求胜之心。但是，随着差距拉大，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却在迅速缩小。越来越少的家庭牢牢掌控越来越多的财富，这意味着勤劳诚实工作的人的报酬越来越少。图2.1基于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制成。[注]人们可以合理地怀疑，一个对各种缺乏天赋者过度严酷的纯粹精英社会，与一个冒险（如果采取过激的重新分配）用平等取代繁荣的平权社会，二者如何达至平衡。这是一场公平的辩论，但是很少听到有任何人在原则上维护世袭贵族制。纯血统的贵族们往往缺乏效率、公正和创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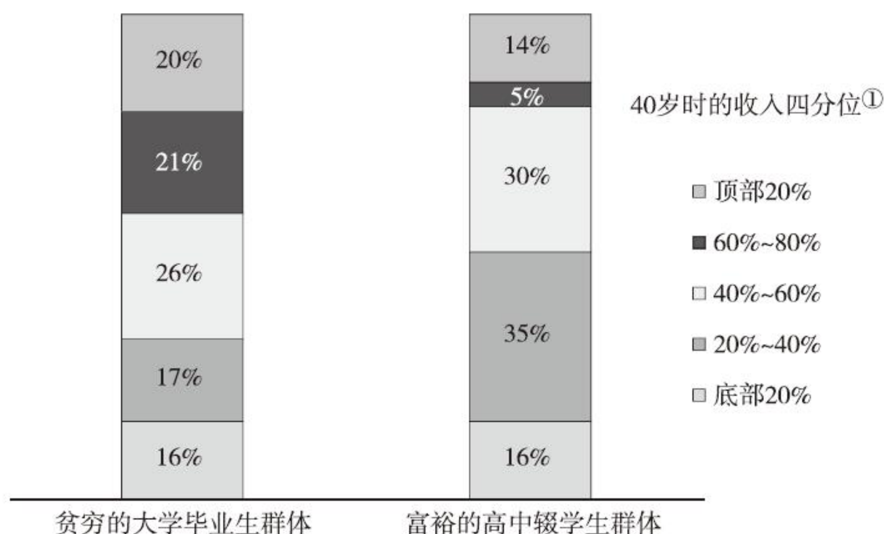


图2.1　两个出身不同的群体在40岁时的结果注

图2.1对比了两个差异很大的群体在40岁时的收入。左边是出身于低收入家庭（简称为“贫穷”）的大学毕业生在40岁时的收入。这些人由于天赋、毅力和奋斗而获得大学学位。右边是幸运地出生在中高收入家庭（简称“富裕”）的高中辍学者在40岁时的收入。这些人缺乏能力、纪律和读完高中所需的其他品质。图2.1显示，这两个群体在40岁时沦为低收入群体的概率都是16%。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在每个档次都稍有优势，但优势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大。高中辍学的富裕学生在40岁时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19%），与从最底层起步辛苦打拼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20%）大致相同。这样，大学毕业生在40岁时进入中高、中等、中低收入群体的概率（64%）与高中辍学者进入这3个群体的概率（65%）差不多。如果跟踪收入极高的百分之几，而不是只看整个高收入群体，贫富差距的代际黏性就更为明显。事实上，这远非是以精英制度治国应有的形象，而且它让人开始怀疑下述常见观点：教育成就是一把神奇的开门钥匙，足以确保积极的结果。的确，教育程度高将有助于让你的收入更上一层楼，但几乎难以超过父母富裕的差劲辍学者。

遗憾的是，你可以从图2.1的一系列结果中看到类似世袭贵族制的模式。其实历史上的各种贵族制反倒留下了某些值得称道的东西。美国既不是纯粹的精英制，也不是受到恰当控制的民主社会。这个结果是基于五等收入分析而非财富分布分析。如果利用财富分布数据做同样的研究，其结论可能更极端，更令人不安。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比过去更不平等，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而非减退，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社会流动性是否已经降低仍然值得讨论，也引起了足够多的学术争论。研究社会流动性的经济学家使用两个标准的指标。一个检验的是绝对流动性，即把整个群体的平均收入与同一个样本的父母的平均收入按实际美元价格进行代际比较。因此，同代比较就是把整个群体的当前收入与同一个群体20年前的收入进行比较。另一个则检验相对流动性，其想法是，比较一个样本的个体成员在起止时间的不同收入等级，即在开始时所处的收入阶梯档次与他们在结束时所处的档次加以比较。如果个体成员最终的收入等级明显不同于初始值，就表明有流动性。最终值偏离观察者依据初始值所做的预测越大，就可以说流动性越大。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下，如果每个人（或每个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那就说明完全没有流动性。人们通常采用这两种测量方式来衡量。根据绝对检验方式，美国的情况并不太糟糕。根据相对检验方式，它显得基本上还可以（如图2.1所示）。问题在于这两种测量工具的衡量机制无疑都很容易遗漏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因此都给出了虚假的安慰。

请设想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结构：在衡量的起始点，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10000美元，中低收入群体11000美元，中等收入群体12000美元，中高收入群体13000美元。然而，高收入群体平均收入100000美元。这个社会的中位收入为30000美元，不到高收入的一半。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测量，中位收入升为70000美元。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增加3倍，为300000美元。中高、中等、中低、低收入平均值分别为10500、11500、12500和13500美元。就绝对流动性而言，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呈上升趋势，因此，想要维护这个恶劣社会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就此声称流动性在上升。如果不检验五等收入群体各自的内部变化，这个说法就能成立。而主张衡量相对流动性的经济学家将会探索这个混合体的内部。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经济学家发现，75%的低收入者随机流向其他3个群体……但高收入群体始终都是同一拨人。在捍卫现状的人手中，这个检验也能用来反映社会有合理的流动性。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问题在于这个想象的社会阻挡了大多数人获得真正的成功。最后，86%的社会财富成了生而有之的禁脔，任何外人都遥不可及，除了从出生起就继承这些财富的人。而且，比例还在扩大，被分化的财富的百分比在继续扩大。这个社会图景类似黑暗时代的封建贵族社会，农奴们是流动的但毫无意义，因为贵族们几乎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归根结底，对流动性的测量既可以是有益的，又可以是欺骗性的。当这些测量聚焦于从底层向上流动或关注购买力的加权变化而不只是统计参与者的数量时，它们就很有意义。心怀叵测意欲维护极端分化的统计学家在维护长远的等级差别利

益时，很容易回避事实真相。当你听说我们的社会依然有令人羡慕的流动性时，请你细心检查其方法，不要被准确但不坦率的统计结果欺骗。精英集团攫取的国家财富和收入比例越大，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流动性就越小。不幸的是，美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

关于是否应该提高最低工资，目前的争论很激烈。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不是我在此处关注的重点。对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可以相当精细地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经济阶梯最底层的特殊困境。第二部分研究的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的收入和财富分布，囊括中低、中等、中高3个收入等级。影响其结果的因素包括：工资政策、工会的作用以及下一章将要阐述的各种教育问题。第三部分是顶端高收入群体的财富隔离的问题。这3个部分都很重要，所以不要因为我专注于最后一个部分而认为其他两个部分就不重要了。我专注于此部分，是因为它在多年来的不平等辩论中是受到认真关注最少的一个部分，部分是因为我并不认为各种反贫困计划和工资分配的温和调整就能从日益强化的财富隔离中释放出大量空间。如果这一点无法实现，财富攫取现象将无法逆转，饱受压榨之苦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份额也就只能略有改观。

在当前的辩论中，支持提高最低工资者敦促我们关注养家糊口的低薪劳动者，他们顽强拼搏却仅能获得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反对者说，强制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损害小微企业，他们认为，缺乏培训和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雇主，是因为雇主认为不值得以法定最低工资水平雇用他们。我担忧的是，如果美国的巨大经济引擎所带来的财富增值继续流向公众中发展越来越小的一撮人，那么上述所有人就都将是受益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雇主认为缺乏对低收入者的同情心，认为不值得以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雇用他们。我在这里专注于如何能够扭转财富流向失衡的政策。

当人们开始探索为什么超额财富会聚积在极少数财富阶层时，请注意美国不是遭遇这种分配挑战的唯一国家。有些欠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批评的那些财富不平等的国家中，有一些处于财富不平等的顶峰，却依旧在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改进。中东各国从来都不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没有财富平均分配的价值观。即便在分配相对平均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也已经重新出现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俄罗斯已经有了新型的寡头；而中国在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时，也可能面临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风险，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措施控制这种风险。然而，在不平等程度长期持续扩大方面，美国明显列为发达国家领头羊，美国具有独特之处，这不仅是统计意义上的，也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榜样。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沿着相同的轨迹紧随在美国身后追赶。其他欧洲强国，包括德国和法国，虽然落后一截，但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注)

造成这种格局有多重原因，有些带有时代烙印，特别难以应对。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精英在不经意间把自己隔离成为内聚力越来越强的永久的上层人群。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最有声望的大学吸引了各地最好的学生，他们不可避免地相互来往，并且常常和智力相当的人结婚。这种植根于出人头地欲望的魔力，必然会放大世袭的阶层区隔。我曾经做过学者，我就见证了最有天赋的学生们的这种扎堆趋势，这将使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再次相聚在华尔街或者硅谷。

另一个原因是知识经济的扩张，它往往让很多人与高薪工作无缘。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所发生的正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古老文化演进趋势的延续。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食物通常是共享的，最佳的猎手或采集者只是吃得比普通群体成员好一点儿。很久以后，随着技术和组织在农耕生活中流行起来，最好的农夫的生产力和财富可能比技艺、知识、耐心欠缺的邻居强许多倍。随着工业技术的产生，一个杰出的实业家的生产力可能比一个劳动者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但是现在，由于几乎毫无制约的金融杠杆扩大了一个商人的盈利和亏损，而且还有一些巨型公司仅由少数领导者进行经营，有权势者可能比无权势者多挣数千或数百万倍。

技术无疑是这种收入和财富转弯的动力。除了狂热的勒德分子[注]，没有人怀疑技术有助于创造财富。没有人会认真地建议我们应该少用技术。但是，在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上，技术进步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技术复杂精准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大蛋糕会产生更多产品可供分享，可以人人有份儿；另一方面，与劳动力相比，更多地使用资本，导致收益更多流向高技术所有者或者有高价值产出的高技术（例如大数据）所有者。此外，技术偏爱有知识的工人，有技术、有知识的人将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今天，这种转移的力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而且将来也很有可能持续扩大。

皮凯蒂关注的是另一条强有力的论战路线。他观察到，多数投资很少的人认为，其财务状况只会在经济总体增长的条件下才能改善，较富裕的人则认为，他们获利是与自己的资产投资增值速度有更相关的比例关系，而且财富收入几乎总是比经济总体增速更快，除了遇到全球性的大危机。这些现象都真实存在，它们导致现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困境极难解决。但我们必须解决它，因为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首先应从公共政策着手，而不是继续放任经济或技术力量恶化不平等。美国的税收系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非常差劲，过于迎合财富的巨额积累，使财富形成承袭制而不加干预。

公司权力的集中像个人财富的集中一样，威胁着多元化民主，并且它还在增长中。然而，这个问题比个人财富水平的不平等更难解决。

虽然公司权力集中的推动力不同于个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推动力，但是这些力量同样重要。在公司内，权力的集中更甚于财富的集中。人们从数据中看不出公司权力在整体上比过去更为集中。这也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少数行业的集中趋势非常明显，即使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年轻时代，大银行还没出现。银行业遍布众多小型的储蓄所和借贷机构。自1980年起的10000多起兼并之后，今天排在前10位的大银行拥有了美国大部分存款，而它们起步时，只拥有美国1/5的存款。与之类似，食品消费者也难以忽视食品行业的联合。1993年以来，20家最大的食品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增加了2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美国又得益于大量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它们往往从已经名满江湖的竞争对手中拿到市场份额，从而降低集中程度。随着巨型企业的兴衰，新的竞争对手不断迎头赶上。在我儿童时期的那些销售额最大的公司，只有约10%的销售额在我下一代的儿童时期仍名列前500强。这一切当然都不坏。企业家创新精神也许是解决权力集中的最佳方法。

对于那些处于共同控制状态的公司而言，权力的集中和公司的影响也在扩大。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扩张就是一个表现，它推动权力集中的方式是经济学家建立的各种指标所无法测量的。这些公司被戏称为“收购”公司，它们人很少却很能干，支配着大量公司，但又往往把这些公司作为独立实体来经营。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着超过2万亿美元的公司资产。它们每年操纵数千起私募股权交易，而且其中许多发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从分散的大众持股转变为私人伙伴关系控股。这些被收购的企业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仍然被视为独立实体，导致权力集中研究低估了它们的实际集中程度。

美国商业的有效集中在过去50年内增长了，这是个合理的猜测，但公司游说费的增长则确定无疑。需要申报的职业游说是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行业。企业运营官们及其律师实施的不需要申报的合法游说可能更为广泛。竞选捐款花钱更多，并越来越成为受保护的公司言论自由。在最高法院的“联合公民案”判决之后，我们可以预料到公司不仅花更多钱从政府那里寻求优惠，而且花钱的方式更为隐蔽。法院的这个判决只能被理解为鼓励强大的公司之手干预政治。在法律意义上，这个判决是下述概念被误导之后的加强版，即公司也是自然人，有权获得权利法案的宪法保护。最高法院在1886年南太平洋铁路案中就走上了这条邪路，人们认为它的思路意味着“强盗大亨时代”（Robber Baron Era）来临了。可耻的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或此后几十年的自由派法官占优势的时代的最高法院都没有纠正这个致命的错误。现在要纠正就更难了。权利法案

旨在保护脆弱不堪的人们免受国家的固有力量和潜在暴力的伤害。完全无法想象，我们的建国者会把这些权利授予这种利维坦，它们接近永生，生来没有良心，又没有身体无法入狱，还控制着比多数选民多出几个数量级资产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享有特权，大而不倒，生来缺乏良心，能控制绝大多数选民。

当然，我不是说首席执行官（CEO）个人道德有问题。事实上，我知道他们的道德标准也许还会高于常人，并且明显高于激烈竞争场合的道德标准。缺乏道德或公共政策理念的是这些公司本身，其高层领导觉得个人道德难以适用于公司机构；在这些公司里，除了利润最大化以外，每件事都可以随心所欲。这些公司内的集体决策，特别是长期决策，只有一个目标，即与价值观无关的利润最大化。归根结底，成立公司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同样，公司拥有的任何权利都是来自法律的纵容，而不是来自自然界、人类的尊严或其他人要求它们遵从的道德规范。它们既不像我们这些脆弱的人那样需要宪法保护，也不遵从道德戒律。它们不应是选举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但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在选举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人们不要幻想从中找到任何利他的动机。没有人要求把我们的民主范式从“一人，一票”变成“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一张有巨大影响力的选票”。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大公司的态度发生了有利于它们的转变。过去，学者和决策者们经常会问，是否公司“大就是坏”。现在，有深度思考的领导者往往关心如何帮助我们最大的公司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统治地位。1992年初，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注告诉我，恢复美国银行业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他的一项使命。他说，日本银行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不加纠正，美国将被迫成为二流国家。这位候选人的想法并非正确，但还是有见地的。最后，日本为其银行业的超大规模付出了代价，而美国政治则滑向了提升银行业地位的下坡路。回顾过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似乎是最后一个遵循西奥多·罗斯福注（Theodore Roosevelt）所赞赏的反垄断理念的总统。在这个国家内，公司行使权力从来不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兼并增加市场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也会受到怀疑。企业有责任证明兼并有利，它们认为体现这种权力任何扩张的合理性均在于消费者可以获益。这个非正式责任现在却完全转嫁到了政府身上，今天的年轻一代知道“反垄断”是什么意思的都已经很少了。

反对限制公司规模和权力过大的常见理由是，我们的企业规模是有益的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这种力量可以把效率最大化。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刹车”将损害效率，从而使经济全面停滞不前。这个论据表明，产业趋向于集中是由于规模经济促进运营效率，这是过高估计了运营效率对收益大小的影响。事实上，经济不会随着规模扩大而更加有效，规模扩大的

主要收益来自品牌优势。与之类似，大公司业绩较好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政治力量，或者因为协助竞选而获得政府优惠，并不是越大越好。财务业绩往往随着规模扩张而增大，但是并不相应提升效率或消费者利益。

规模大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大公司能够收购小对手，而小鱼从来不能吞食鲸鱼。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增加某些效率优势，但也可能是为了碾压更精致、更有创意的企业。如果大公司通过得到资金、品牌和政治力量战胜或收购更有创意的小对手，则规模大可能成为有害的源头。即使规模效率的确代表扩大规模的自然因素，我还是认为，为了不可估量的多元化民主，放弃一点儿规模效率优势是值得的。

全球化也是增加公司权力的一个因素。国界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力量权衡的重心已经从公众转向公司；公众主要通过所在国政府实现其意愿，公司则超越政治边界。现代公司在国内处境不佳时，可以把资产和受质疑的运营转移到较宽容的地方。在提议限制公司权力时，下述论调常常出现，即限制将导致公司移迁。全球化确实难以防止人们向限制最少和税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移民。一些主权国家有着在其境内实施保护工人和环境的意愿，但这正在败给那些把经营转移到限制较少的国家的大公司，它们还可能转移其经济收益到有能力忽略保护工人和环境的国家。同样的论据也适用于加强反垄断的呼声。如果我们的企业规模小，外国企业规模则不断扩大，根据现有的规则，外国企业最后就可能收购和控制我们更多的经济领域，这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拥有社会赋予它们的资产权，但没有完全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根据美国《独立宣言》，它们的权利既不是“不言而喻的”，也不是“不可剥夺的”(注)。公司部门对于促进经济繁荣是重要的，就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但是它的经营必须服务于自然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道德或经济原则迫使我们默许在美国做生意的公司（无论是外国的或者是在美国注册的）的要求，它们希望随心所欲地降低福利标准雇用生产工人，并忽视环境保护。政府强行施加这方面条件的责任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有时缺乏的只是严格监管的魄力。

对于美国本地注册的公司，约束其不受管辖的行为比较困难。对于想享用美国市场或取得美国公司的控制权的那些总部在国外的公司，则难度更大。美国本土公司不停地为进入外国市场和在外国公司中自由拥有权益而游说，它们毫不迟疑地认为，同样的权利应给予它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然而，如果美国允许外国竞争者不受限制地兼并美国公司，允许其掠夺式压榨工人、不重视环保或依仗政府大量补贴而不公正致富的公司参加收购竞标，过段时间我们就将发现，自己正在为越来越不像话的老板们工作。

国际贸易竞争应有合理的标准，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最大化做好准备；但是，其公共行为标准不应降到最低。如果我们将遵纪守法的权益者聚集起来，大概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属于很少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之一，我欢迎华盛顿两大党围绕它进行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一些贸易条约的谈判有许多自由度，谈判往往是奉我们的国际公司之命而开始的，然后这些公司在谈判和批准的过程中起着啦啦队领队的作用。为了使一些条约在自由贸易与保护工人和环境之间做出平衡，它们还必须有对立面。平衡只能在激烈争论中才有可能达成。扼杀贸易机会的做法很少能满足（经济或政治的）国家利益，但它同样会阻止滋养以外国为基地的市场恶霸、压迫式的雇主或环境破坏者。应合理限制市场准入和控制恶意的公司兼并，不应否认贸易的永恒基础是比较优势原则。这对于草率而不受制约的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解药。

很难按任何标准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力。事实上，很难让公司遵纪守法，个人反而容易些。许多公司知道挑衅策略会招致处罚，但它们甘愿冒险赌博。偶尔接受轻微处罚或降低短期收益的处罚，对它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毫不避讳。纪律处罚可以毁灭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自尊或抱负，但很少看到一家公司会有此遭遇。在任何足够大的群体中，它的领导者都倾向于把集体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藐视权力当局，妄自尊大，放弃内在修养，不担心受罚。但是，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1/3的美国当然不必惧怕当家做主。如果美国的谈判代表要求其他地区全部无条件实行公司全球化，并允许各国公司无限制地进入美国，那美国就不可能做世界领袖了。自由贸易和互通有无都是好事，但这就像自由市场和有组织的体育比赛那样，需要有规则和裁判使之正常运转。有人提出：我们不能做任何大公司不喜欢的事，不能在贸易谈判中提出负责任的公司行为标准，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大公司把生意进行外迁。我希望大家拒绝这种论调。

在更加完美的世界中，美国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所有商业领域都有许多竞争者，每个竞争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市场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美国甚至从一开始就需要有一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硬的反垄断政策，这需要转变理念，后者难以界定当然也无法指望迅速变成现实。最高法院同样有责任扭转方向，对公司的政治活动施加必要的限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个人仍毫不动摇地呼吁召开一次制宪会议，通过修宪缩短这个不确定的过程。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制宪会议不大可能提出受欢迎的修正案，也难以保证其不对宪法进行破坏性的修改。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很不理想：公司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天平仍将长期不平衡。然而，天平的两端甚至在目前就有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取得进展：一个机会是知识的进步。若在事实和理论两方面对公司的政治作用了解得越清楚，就越有可能最终改变天平的重心。翻天覆地的伟大启蒙运

动[注]与公众意见的巨大转变可以否定预测，然而那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也将是人类未来的一部分。我希望人们最终意识到并纠正把虚拟的法人当作真实的自然人这个错误。与此同时，我们至少可以抓住机会，按照法院的要求，敦促国会更清晰地公布竞选捐款，并把其效果最大化。

有些观察家仍然没有认识到个人财富和收入集中的趋势是一个威胁。事实上，过度集中的经济不仅会损害民主，也会破坏繁荣。

由于自然人有更深的地理渊源、道德标准和忠诚度，对处罚更敏感，所以与限制全球范围内灵活的公司权力相比，个人财富和影响力的增长较易限制。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识到近年来中产阶层的收入陷入了停滞状态。比较有争议的是，是否任何强化的纠正措施都会使情况更糟。在你决定选边站之前，请先认真思考内心对公正的理解。如果你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可以看它能否恰当对待最不幸的人或者如何对待努力工作的普通公民，那么把经济增长的全部成果交给富人，就不利于国家走向公正社会。根据约翰·罗尔斯[注]（John Rawls）的观点，在公正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事先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收入层级，几乎所有人都清晰了解他们属于经济分布模式中的哪一个十分位区域；而美国社会显然不够格。

我认为大多数人不会因富裕家庭的高中辍学生与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在40岁时挣得一样多而感到骄傲。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勤奋努力工作的中产阶层家庭挣得也很少，他们的子女正在被逐步挤出顶级大学，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贫穷到有资格去领取助学金的地步，也没有富裕到足以支付子女学费的地步。我希望大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公正。我和我的妻子多次到国外旅行。国外许多人也许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不愉快，富人几乎不与绝大部分居民分享任何东西。我们看到少数人的炫富消费，与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我无法想象这能让人心安定。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贫富差距将很快达到反乌托邦的程度，就像H.G.威尔斯[注]（H.G.Wells）的短篇小说《时间机器》中所描写的那样，但是即便当今社会出现一点点类似的风气，也足以令人心神不安。

“法律之下有平等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门上的这则格言是对公平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宣示。没有任何国家完全符合这个简单的道德要求，美国也没有。一位司法评论家说：“在当今的美国法庭上，有罪的富人被告比无罪的穷人被告有更好的机会。”无论这个尖锐的批评是否准确，我们的国家的确一度在人类历史上最接近这个理想，现在却与之相去甚远。失控的财富差距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目标，只会拉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裂隙。《纽约客》杂志的一幅古老漫画暗示我们应该憎恶这个恶化的趋势。一位律师坐在桌子后面问客户：“你的案子很难办，琼斯先生，你买得起多少钱的正义？”

正在扩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对于我们的民主有多重不利影响，这足以令我们担心。一方面，美国有可能彻底失去稳定；另一方面，公民可能完全无法参与。事实上，极端的不公正就是推翻政府的理由。全面的革命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一次警告金融集团的讲话中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我的政府是你们与革命之间仅有的东西”。[注]奥巴马知道富人们不大可能很快面临被吊在电线杆上；尽管如此，他夸大的言辞中包含了一个信息。较少诉诸暴力的动荡在历史上曾经频繁发生。人民不再信任主流政党，或者转向那些做出夸张的英雄般承诺的候选人，这使你想起那些带来许多历史伤痛的“骑在马背上的人”[注]。已经令人失望的低投票率继续降低，这会扩大紧盯单一议题的选民[注]力量。你不会喜欢他们的影响力，除非你是其中一员。对于有被遗弃感的人来说，犯罪更有吸引力。如果未来的经济成果不与中产阶层分享，最可能发生的是，美国将失去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以及使之成为伟大国家的统一精神。

由于最贫困社区的投票率低而上层人数很少，愤怒的中产阶层可以随心所欲投票做任何事情。这可以矫正困局，或者相反，也可以利用投票权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不必搞突然袭击。茶党运动在右边，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左边，但事实上二者都是中产阶层的挫折感所生，谁知道下一场更可怕的激进运动是什么？

“一人，一票”，这个美国理想很有吸引力，也令人自豪，但最初只是“一个有房产的白种男人，一票”，但是美国在这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进步。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注]每一票都是平等的，但当选者在两次选举之间的其他日子里倾向于按捐款比例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喜欢“一美元一票”。金钱的影响力永远是民主的污点；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捐款者有足够多不同声音时，金钱的不利影响就会降低，事实和诚实就会从不和谐的声音中浮现出来。一个特殊利益者的得利可能导致另一个特殊利益者的亏损。如果有足够多的肥猫试图吃光对方的盘子，那就没有一只猫能吃得太多。这就是多元主义，多元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其优点，即并非每件好事都有一个捐款者做靠山，也不是每个作恶者都有一个富有的反对者。

多元主义的对立面是集中。经济繁荣共享水平的每次减弱，大公司市场份额的每次增加，都会降低多元主义的优势。随着捐款者越来越少、越来越慷慨，为巨头企业游说的预算越来越丰厚，作为纠正钱权对民主政府不良影响的多元主义逐渐消失。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多元主义正在迅速消失。

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是对繁荣——你个人的繁荣——的威胁。这个论点毋庸赘言。对于未能分享任何好处的那些人，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喜悦

是最小的。这是严峻的现实，它本来应该是底层民众的现实，如今却越来越成为中产阶层的现实。同样严峻的现实是，与比较平衡的财富分布相比，整个蛋糕在超级集中的经济中变小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寡头和权贵通常是低效率的引擎。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告诫世人，垄断者将从削减生产中获取超额利润。一旦繁荣无法共享，教育和机会也不能共享，经济体中许多潜在的精英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头重脚轻的系统容易瘫痪停机。

当财富集中在顶层并可以世代相传时，经济能力和资源将不再容易流向那些能利用它们让整个经济体得益的人。这是社会流动性问题的核心。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明智地指出了流动性下降的问题所在，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根据世袭遗传因素挑选一支奥林匹克队伍。任何认为世袭贵族能成为社会前进的最大推动力或创新支持者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在历史上，美国的领导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没有预见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但他知道经济力量集中的危险。共和党人老罗斯福总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采取了行动。他的堂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任上也这样做了。我们应该超越党派的认识框框，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认识，如果集中问题不受制约地发展，整个经济发展将随着时间而趋于迟缓。

解决个人财富和收入集中的办法是有的。为约束个人收入集中所进行的改革可能听起来有些极端，但是所得税过去也曾被认为是极端的。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阻止我们的多元化民主滑向个人和公司的贵族社会；但是你也许会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与西方的自由市场价值观相容的办法来改变我们失败的路线。不平等问题根深蒂固，有一堆效果不佳的办法可用，而且近期没有明显的例子证明哪些国家经历了严峻的不平等问题，最后又摆脱了它。如果这还不能使你气馁，在通向任何可行办法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很明显的障碍。事实上，我要坦率地承认，要解决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集中问题，可能是本书提及的5个基本社会经济问题中最难的一个。然而，人们不应该忽略它，因为在我们塑造留给下一代的社会的过程中，它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

一小撮人比其他人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而且把财富传给后代，这种情况绝非无法限制。终生积累是对资本增值不征税或少征税的结果，完全纳税的正常收入很少能够积累财富。托马斯·皮凯蒂建议，每年征收国际协调一致的财富税可能是合理限制财富累积的最佳办法，但他承认这条路不大可能。我同意他的观点，国际统一的财富税在理论上是建设性的办法，

我也同意目前这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无论如何，征收财富税不在讨论范畴之内，因为即使在最勇敢和最有说服力的领导下，它也不会被美国公众所接受。

然而，我们国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可用工具。最没有争议的工具已经使用了许多年，只需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对短期投资利得的税率比长期投资利得高得多，这是合理的。这个差别可以大大扩大。投机性及其他短期利得的税率应该比普通收入的税率高。短期利得对于经济显然没有多少好处，它几乎完全得益于繁荣的经济。税率与持有应纳税投资的时间长度成反比的阶梯税法，以及资本利得头5年内不扣税，将是重要的前进步伐。利息也应按投资者持有优先股的年限成比例征税。受到严厉批评的还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管理人的附带收益所享受的减税。这不是给竞选资金管理人的慷慨回报，不该把这些收益当作他们的通常收入来看待。

强力改革税收政策在概念和影响方面更接近财富税，而且理论上在单个国家内是可行的。目前，美国的国税局只对收入和变现利得征税，对消费和未变现利得完全不征税。我倾向于对这四项都征税，而且税制结构要非常简单，让税务咨询业插不上手。消费税是一个有效的收入源，如果生活必需品的税率低于奢侈品，并对最昂贵的消费累进征税，就可以增加收入；如果使用统一税率，就会减少收入[注]。许多国家有增值税，而且比我们的所得税还简单。增值税可以减少对所得税的依赖，可以大幅降低和简化所得税，还能减少逃税行为，缓和多数极端仇视税收分子的不合理狂热。

然而，每年对未变现利得征收几个百分点的税，可以真正影响国家的财富分布。上层人群的大量财富就藏身于此。比如，如果一位富裕的投资者在1974年购买并持有价值100万美元的无红利股票，如果按标准普尔[注]（Standard&Poor）500指数计算股票业绩的实际增值，它的现值达9000万美元，但至今未缴一分钱的税。对于大多数生活不受经济起伏影响的富人来说，未变现利得才是财富之源和藏身之处。[注]

这将是历史性的彻底改革。如果有人严肃地提出这个建议，就会不断有人大声疾呼这没有可行性。但是，所有最重要的社会政策改革最初似乎都不可行。一些重大计划，例如所得税、禁用童工法和社会保险等，只有在它们实施很久后，才能证明其不可行性被夸大了。对流动资产（如证券和银行存款等）的升值进行跟踪和征税并不复杂。反对者会高叫，对未变现利得征税将毁灭非流动资产（如艺术品、家庭农场和私营公司的股票等）的价值。我的反驳是，你最重要的不动产，即你的住宅，几乎可以肯定早已被政府估价征税[注]。真正的家庭农场，如果你相信它们有特殊的伦理价值，可以在某个限度下按照损害最小原则得到豁免，前提是豁免不能由公

司拥有者和大农庄主享受。同样可以按照损害最小原则，在适当限度内，豁免大多数人拥有的艺术品，但真正昂贵的艺术品可以定期估值和征税。

下面要考虑的就是未上市私营公司股票的征税问题，我自己的大量资产就是采用这种未兑现资本利得的形式。我很钦佩的一位风险投资家和公司政治家、已故的本诺·斯密特（Benno Schmidt）曾经告诉我，有一个企业主管的妻子开玩笑地称其丈夫为“老不兑现的”，因为他们的大量财富已被套在他创建的企业中，使她只能动用很少的财富。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要想把我持有的普利茅斯·洛克公司的资产出售一部分，换取现金支付每年增长的税款是一件复杂的事。我们的股票未上市，也没有组织过拍卖，目的是希望卖出更高的价格。股价在纸面上将随时间而增值，反映了公司规模和价值的增大，但这个增值并不是以现金的形式拿到手，除非是公司派发红利。许多新公司不一定有红利，而已站住脚的公司面对扩张的市场机会派发红利并不明智。所以，企业家怎么会为未兑现利得而缴纳这里所建议的利得税呢？

这正是自由市场可以很好解决的问题。资金需求会促使金融市场开发新的产品。贷方有一整套各式各样的贷款模式满足缴纳税款的现金需求。在货币流通性有问题时，贷方可把这些贷款模式作为承诺支付的条件，并把私营公司股权作为附加抵押。因为欠债而日夜不安的人对我们的公司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公司早日发放红利。我会喜欢这样吗？当然不会。但归根结底，我们少数人感受到的利益损失与所有人从繁荣和谐的社会得到的利益相比微不足道。如果国家在普利茅斯·洛克公司成立早期就实行对未兑现利得征税的政策，那么这家公司仍能沿着几乎同样的轨迹前进，而且我和我的同事会很快习惯纳税。我们会很快忘记依靠免税积累财富的那段快乐时光。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一个税基扩大涵盖向未变现利得和消费的简单税收结构，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解决财富向顶层集中这一问题的关键一步。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修改遗产税和赠予税，这些税目前只能勉强符合初衷。选民通常比被选举人更聪明，“死亡税”不得人心是个罕见的反例。那些财富很少的选民似乎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在生前和去世时应该缴纳的税太多了。如果你也这么看，可以说你的善良愿望违反了你的利益。

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这个现象。这种费解的“背离”现象有几种解释。比较常见的解释是，贫穷的选民可能渴望有朝一日也富起来，通过在商场上大获全胜、日常经商或中彩票。他们不希望税收妨碍自己艰难的致富之路，他们受梦想激励，情愿付出高昂代价：让富人骑在头上。你迁就了这个可悲的逻辑，但你不会觉得它合理而有趣。第二种解释是，最富的人拥有极大的公共舆论引导力，向大众推销对高收入阶层征税将毁灭自由和资本主

义的理论。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是，中产阶层对于上层人群并无不满，事实上还会因为每个人在追求上进而心怀感激。你可以说，某人有一艘豪华游艇不是个问题，只要你有能力买一条新船钓鲈鱼。如果这是税务迷局的心理基础，那么，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明白自己完全无法再更上一层楼，这种心理很快就会自生自灭。

一种更持久的解释是，中产阶层纳税人担心从企业界精英那里征收来的税金大部分浪费在税务官手中，政府慷慨大方地资助那些不恰当的生活方式。这样看待问题的人不期待任何税收从我所属的收入高层流向他们，所以他们宁愿看钱留在我们这些创造工作岗位的人手中。只要负责任地使用税收，这种论调就不能成立。

遗产税应该更有效地实施，这意味着取消信托业现在享受的税收优惠。

公众应普遍支持的第一项税收是遗产税和赠予税，现在这项税收正受到野蛮的攻击。很难证明，建国者们不喜欢这种税收的形式。其来历可追溯到1797年，那时制定了征收一项与遗赠成比例的临时印花税。根据需要，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和美国—西班牙战争时又征收了一段时间。现代形式的遗产税和赠予税是在1916年通过的。像其根源一样，它的逻辑驱使社会脱离世袭贵族体制，走向按努力工作和才能给予回报的体制。最浮夸的反对意见认为，它剥夺了家庭农场和小企业的所有权。然而，这个问题已经通过设定最低税收门槛而得到妥善处理。2015年，资产低于540万美元的人不必付任何遗产税或赠予税。对于已婚夫妇，免税资产额加倍；所以，大多数富裕家庭的免税额超过1000万美元。即使知道有这项规定，我仍很惊讶每年只填写了约1万份的联邦资产报税表，比过去少很多。填表的这些人中只有约5000人纳税。注数据显示，只有20多家农户和小企业的资产在最近一年缴了遗产税。

联邦遗产税和赠予税汇集的总收入约为200亿美元。注这在几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算不了什么。这个数目只是勉强超过2014年联邦全部税收的0.5%。所以，反对遗赠税的另一个理由是，这项税收成本大于收入。但是，这只是因为这项税收充满漏洞。你可能还记得，美国人中最富裕的1%，约1.6万户，在几年前粗略估计有6万亿美元的净综合资产。注现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400个富人的财富超过22500亿美元，这个名单上的财富平均值是57亿美元。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400位亿万富翁的平均年龄是66岁，可以预期这些人中每年有5至10位逝世。相应地，仅仅这一小部分人的遗产就能提供每年250亿至500亿美元的税收。人们广泛引用下述估计，在今后55年内，约有60万亿美元资产将会代代相传。所以，收入在哪里？它们被税收漏掉弄丢了。

很多税收漏掉完全没有道理可言，未变现利得的“递升漏洞”就是其中一个。遗赠的未变现利得，可以不必按原始拥有者生前的应计利得缴任何所得税。这就完全取消了缴纳所得税的责任。在上例中，某人依靠资产、运气和巧妙手段，购买了100万美元的股票，持有几十年后升值为9000万美元。让我们假设股票在这位拥有者逝世时被遗赠给已缴过联邦和州财产税的子女。其继承者在最终卖出股票时必须纳税，这些股票像是花9000万美元买来的。如果原始拥有者卖出这些股票或者继承者以真实的购买价格卖出，这8900万美元的利得在应缴纳数千万美元的所得税时会发生什么？没事，这只是给活着的后代的赠品，增加其家庭财富。有些人把这个诡异的处理归入为所得税漏洞而非资产税缺陷，因为它免除了利得变现时需要缴纳的税。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放弃征收资产税，因为死亡提供了对未兑现利得征税的最佳机会，而这个漏洞对于资产规划和投资决策影响巨大。这个“递升漏洞”只会导致永久的财富世袭，越早废除越好。

信托是资产税征收的另一大漏洞。这不是说信托本身不合法。让我们假设你有一个脑部受损的家属，可能是打过仗的受伤老兵，他的未来需要在你逝世后得到保障。你可以设立信托基金用于照顾这位家属；这份信托由聪明而有同情心的受托人管理，让你在黄泉之下可以安心。滥用信托现象不会出现，因为这是一个体面社会的底线。然而，与利用信托把大量资产传给健康的后代相比，这种信托涉及的资产规模很小。由于富豪们在国会有很大影响力，政府识相地给这些人的信托大量免税优惠，以保护其财富转移。而一般人多数将用不着信托。信托通常只对那些资产超过一定门槛的人才有用，但恰恰是这些人最没有必要获得税收优惠，除非你想要的是一个财富世袭的社会。

信托有很多种。有委托人保留年金的信托（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GRAT）、慈善导向的年金信托（Charitable Lead Annuity Trust，CLAT）、明知有缺陷的收入信托（Intentionally Defective Income Trust，IDIOT）、明知有缺陷的委托人信托（Intentionally Defective Grantor Trust，I-Dig-It）及其他有各种逗人野兽名称的信托。这些不是自然界的野兽。它们是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式的怪物，只为集中于富裕家庭的资产世袭服务。如果刨根问底，我也许只会把慈善导向的年金信托称为弗兰肯斯坦的善良的未婚妻，因为它至少保证在信托期间向慈善机构定期支付颇大金额。其他形式的信托通常与公共目的无关。每种信托形式都有其理论和细则；这个领域太复杂，我难以在此解释每种信托如何运作。然而，某些形式背后的手法很容易识破。

首先要知道，如果这些信托不能节省家庭税费，不能避免资产被不受欢迎

的索赔者和配偶抢走，大部分信托不会为委托人所用。这些资产会大大增加你的收入所得税，这是事实。我支持这个说法，但如果别人与我本人财务情况类似，也没有做信托，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何选择。一些常见信托的本质在于，税法允许通过信托安全合法地获取大笔资金。富人往往把财富传给后代，他们会为后代设立信托。他们把正在增值的资产纳入信托，为此愿意缴纳全部赠予税（如果在慷慨的免税额和其他可钻空子之余还有什么要缴的税）。当这些资产增值时，它们大体上仍在委托人或经过巧妙选择的执行人控制之下。信托时间越长，增值越大。受益人得到这笔信托时，他不再需要缴税，因为委托人已缴过税。

理性的政策由此变成了昂贵的蠢事，对此还有几点可以补充。首先，最重要的是，委托人逝世后税收优惠的扩大，除了实际上已缴过的税之外。当信托金额低于免税额时，无须纳税，即使最终遗产数额巨大。更有甚者，富裕家庭有办法解决不能免税的过量遗产问题。某些信托能以可观的利率开出本票（注）用于“购买”这些资产。购买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这不是正常交易。在开出（通常按政府债券的相同利率）本票之后，受托方用这笔资产投资的利得属于受托方，在委托人逝世时不纳税。在很多情况下，委托人可以代表受托方对任何中期收入或已兑现资产增值缴纳常规税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额外支付不缴纳赠予税或遗产税，无法否认的是，这是在向受益者转让潜在的巨额财富。只有在把信托内或其他资产完全按转让给下一代时的实际价值缴纳遗产税时，才算是按规则缴纳了确切数额的税。但很少有精明的富人真正缴纳符合或接近这个标准的税，也没有一个精于算计的信托律师会选择这样缴税。

举一个可能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再次看看前面讨论未变现利得时提过的例子，我们现在对它做个修正来展示信托的用途。假设委托人在45岁时拥有的财富足以把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交给信托，换来一张本票。请设想，这位委托人利用信托和本票是因为他的子女已接受过超出免税额的赠予，因此若没有信托这个手段，将来他们在接受遗赠时需要纳税。股票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长期平均业绩稳定升值，直到委托人在40年后去世。现在假定当时购买本票的利率是4.5%，这事实上比当今的低利率时代信托业开出这种本票时要求的利率高几倍。这不涉及转让赠予，因为信托方用本票支付了股票的全部法定价值。多年来，受托方按其本票当初确定的利率向委托人支付的利息，足以在委托人去世时把信托总值从9000万美元降至约5000万美元，但这5000万美元可以免税从受托方转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为了财富的永恒世袭，这样做甚至优于“递升法”。直到受益人出售股票之时，都没有应缴的资本利得税。如果你认为如此巨额的遗赠在最高资产税率为40%的法律之下可能会征收几千万美元的税，请再想一想，事实上纳税总额是零。

对于这个富豪家庭，财产税和赠予税的免税额通常足以使每人500万美元和每对夫妇1000万美元的财富逃避任何纳税，并提供一笔不错的遗赠。富人明白，他们在世时就要早点把它们赠予出去。由于未超过纳税门槛，一笔1000万美元的赠予，在30年里每年按5%升值，并假设没有其他应纳税收入，30年后成为免税的4300万美元[注]。按股票市场的历史记录，更有可能的是10%的年利率，这样就有17400万美元[注]。对于一些想把更多财富传给后代的超级富豪而言，信托和本票就能完成这个把戏。有人往往引用爱因斯坦说过的（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宇宙中最强的力量是复利效应。但这只是动力的一半，另一半动力是国会对有影响力的富裕选民和政治捐款人的热情。当提交信托的资产（可能是风险投资、对冲基金的权益或私募股权投资）比整个市场升值更快时，信托业所起的作用最好。但是这里的“标准杆数”[注]可能得远低于门槛，即利率低于没有风险的政府债券利率。在经济平稳时期，资产通常是随时间而升值的，这时很少需要投资天才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谋求高于政府债券的利率。

在有亏损的情况下，信托效果是最差劲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由于对信托数量没有限制，可以用不同资产的多次冗余信托让亏损的影响和可能性最小化。据说，有一个著名的富裕家庭合法利用约30个不同信托来确保最少的纳税。法律上允许的信托，实质上是你和其他像你这样的人送给从信托中得益家庭的礼物，特别是送给希望把10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交给后代的那些家庭的礼物。这是你本人也许都不知道的诸多税收礼包之一。

某些信托有另一个诱惑，即委托人在信托期间不必放弃对信托资产的一切监控措施，就可免除大量潜在的税务责任。如果信托财产是一家公司的股票，委托人或他的受托人（往往是从其最好的朋友或最信任的律师中挑选的）可能有股东的投票权，这至少能有效地不让有可能对他的利益投反对票的人知道股票的所有权。如果这个信托包含珍贵的艺术品，它可以依然悬挂在他的客厅内，只要受托方收到恰当的租金。支付超过市价的租金还可以把又一份免税现金交给受托方，并最终转交给受益人。支付低于市价的租金则只是允许这个资产廉价地留在委托人家中，同时为遗赠税目的而把它当成已转让资产。如果信托资产是一座宅子，委托人可以在一段确定时间内依旧作为其主人安全地住在那里，只要与所谓独立受托人（当然是由委托人选择的）安排好支付“公正”的租金。一种被称为“合格的个人住宅信托”的信托结构正好可用。与此同时，孩子们将不能（至少在信托把它转交给他们之前）把这座珍贵的家庭宅邸滥用于举办吵闹的音乐聚会、吸毒，或支持帮派或平等主义的政治组织。委托人最终得到的税收利益是为这座最后将成为遗赠的宅邸提前纳税，而不必完全放弃遗赠出去的宅邸。拜我们的税法所赐，这位委托人可以既吃掉这块蛋糕，却又保留着它[注]。

最近，被形象地称为“王朝信托”的优惠增长得更快。联邦政府允许各州决定信托的最长期限。在一项反对永久性的强制规则下，大多数州坚持信托须在最后受益人去世后21年内终止，而且设立信托者在设立时认识这个活着的受益人。现在有20多个州取消了这个限制。现在，委托人可以设立时间长达100年或不定期的信托。新规则通常还不要求委托人住在提供优惠的州内。这个王朝信托的唯一瑕疵是越过子女直接传给孙辈、曾孙辈或更远的一代时，必须缴纳联邦“越代税”；越代税因此就成了反对征收资产税的人们的政治靶子；不过，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有效。近年来，人们看到了很多王朝信托。

现在把上文提到的各种税收优惠汇总一下。你看到的是一幅紧密的连环保险图景，富人的资产在美国从未遇到过一个收税者。首先，未变现的累积利得是免税的，可能是因为某些形式的资产被认为难以按定期支付现金分类，特别是当它们缺乏高流通市场时。其次，如果资产被保存到所有者去世并传下去，这些资产中的大部分被赋予一个新的纳税基点（一个想象的买价），而且累积利得是永远免税的，虽然仍要缴联邦和州的资产税。为了避免缴纳这份税，资产所有者可以把这些资产交给信托，并在这些资产累积利得之前缴纳赠予税，或者把它们出售给一家信托公司，让这家信托公司按逻辑上不合理的低利率持有过量利得。在精英治理的社会中，遗产税是最公平、最有用的税种之一；但美国最大的资本源泉，即家族内部传承的累积资本利得，却很少遭遇阻碍。相应地，代代相传的财富差距的最大根源也不受约束地被保留下来。

未变现的资本利得应该每年征税。这还不够，应该取消允许在死亡时把应计利得的购买基价“升级”的税法条款。现在请再考虑取消继承税的议价基础，尤其是取消信托优惠。每项建议都有优点也有漏洞，应该尽可能地封堵漏洞。如果国会为公共利益着想采取行动，就可以同时从源头上堵住一切漏洞。将来，资本利得是良好投资的报酬，并有助于国家的资金配置。对于某些家庭而言，不依赖欺诈的信托是有同情心的必要之举。然而，目前的资本利得减免税毁灭了财富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而且，监管信托的税法已沦为笑柄，成为企图按照血统掌控财富的游说者的玩物。

即使假设这里提出的建议都成为法律，依然会有大量（或巨量）财富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目前的资产税不能阻止多数成功人士把累积财富传给后代。比较恰当的是，把以上那些建议视为恢复国家理性而非彻底平等。即便你支持慷慨的继承，你仍然可以支持取消对积累大量财富传给后代所给予的大量不必要补贴。取消这些补贴有助于民主事业、精英治理、税收以及下一代的经济前景。

不平等问题的重心在于，对增值财富征收合理税款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一个人的累积资产必须在其生前和死后更有效地征税。

美国是大多数西方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领头羊，却正在滑向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世袭贵族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是极其负面的。这对任何人都是经济杀手，而且对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成就的多元民主也是破坏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要有阻止或减缓这个趋势的工具。在税收系统方面，合理和协调的国际合作能够产生奇迹，但这可能性不大，幸好并非非此不可。改革不平等、过于复杂的所得税制度收效甚大。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新的形式普及税收，既不要太烦琐，也不要太复杂，应该以增值税的方式对每笔交易征收累进消费税，应该取消短期投机资本利得免税及基金管理者的附带收益。

这个方案的核心要点在于，未变现的投资利得必须计入纳税基数，而且应彻底取消信托税务利益从而提高遗产税。这些改革与当下的政治风气不一致。但是，如果说本章还有值得汲取之处，就请记住这些改变是你生活并为之自豪的国家复原的关键一步。

解决公司权力集中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尽管我希望如此。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作为民主对立面的公司权力不受制约的危害。必须让公司权力小于其依法为之服务的公共权力。加大反垄断政策的实施力度是有用的一步，过去太不严格，最好以更高的标准重新实施反托拉斯政策。为此，我们需要改变现在恣意放任全球化的做法。商业公司终究不是个人，而是法律创新的产物，它们的价值只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们的法律和优良传统所蕴含的共同利益。

短期内无法完全恢复平等，实现有社会流动性的美国梦，但本章提出的一些核心建议将避免我们的多元社会继续衰败，防止形成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这些也是当务之急。

---

1. 流动性即社会流动性，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人不是永远贫穷低下或永远富裕高贵的，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或幸运的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译者注

2. 例如投资于股市或房地产，由于股价或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在账面上获利，这个获利在出售股票或房地产之前被称为未变现的利得。——译者注

3. 所谓香蕉共和国，是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

4. “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于2011年9月17日，约1000名示威者带着帐篷到华尔街长期据守，意图反对美国政治的钱权交易、两党政争和社会不公。10月8日，数千人在首都华盛顿示威游行，这个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席卷全国。11月5日，纽约警方强制清场，以流血告终。——译者注

5. From 2009 to 2012, 91 percent of income gains went to the top 1 percent of earners.See 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with 2014 Preliminary Estimates),” June 25, 2015, 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4.pdf, accessed June 30, 2015.

6. “茶党”（Tea Party）是主要来自共和党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草根组织，没有统一的中央机构和党纲或党章，它主要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1773年，波士顿群众为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而把3船英国茶叶倾倒入海中，从而引发了美国的独立革命。“茶党”的名称由此而来，意味着应开始搞国内革命了。另外，茶党的口号“税收已经够高的了”（Tax Enough Already）的英语字头恰巧是TEA（茶叶），这也是“茶党”名称的来历之一。——译者注

7. Heidi Shierholz and Lawrence Mishel, “A Decade of Flat Wages: The Key Barrier to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Rising Middle Clas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 21, 2013,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a-decade-of-flat-wages-the-key-barrier-to-shared-prosperity-and-a -rising-middle-class/, accessed July 10, 2015.

8. 把从最低收入值到和最高收入值的收入分布分割成相等长度的10段，每个分割点的位置称为一个“十分位”。离最高收入最近的那个分割点处对应的收入值就是“最高的十分位处的收入值”。——译者注

9. See note 1, Figure 1.

10. Richard Fry and Paul Taylor, “A Rise in Wealth for the Wealthy; Declines for the Lower 93%,”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3, 2013, http://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3/04/23/a-rise-in-wealth-for-the -wealthydeclines-for-the-lower-93/, accessed July 9, 2015.

11. 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是把收入分布中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加后除以2，也就是整个收入分布线的中点处的收入值。中位数不变意味着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即收入分布线拉长了，而中间值不变。——译者注

12. Drew DeSilver, “For Most Workers, Real Wag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Decad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9, 2014,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0/09/for-most-workers-real-wages-have -barely-budged-for-decades/, accessed January 14, 2015.

13. Arloc Sherman and Chad Stone, “Income Gaps Between Very Rich

and Everyone Else More Than Tripled in Last Three Decades, New Data Show,"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June 25, 2010,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3220, accessed April 11, 2015.

14. See note 1, Figure 1.

15. See note 1, Figure 2.S 9.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R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CBO.gov, October 25, 2011, Figure 2,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42729, accessed January 14, 2015.10.Lawrence Mis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org, Issue Brief 380, June 12, 2014, http://s1.epi.org/files/2014/ceo-pay-contin ues-to-rise.pdf, accessed July 3, 2015.

16. 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国民收入有三分之一（33%）的份额被10%的最高收入者取走，现在约有一半（50%）被他们取走，即多取走了50%-33%＝17%。最底层的20%家庭在总收入中拥有的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2%）。中产阶层承受了失去国民收入中的15个百分点（15%），这样才能使最高收入者们多取走17%＝2%＋15%。——译者注

17. 《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9月出版。——译者注

18. 特威德（1823—1878）全名威廉·特威德，因在纽约市胡作非为而被称为"大亨"。他本是毛刷厂的工人，娶了老板的女儿而发迹，1863年成为纽约市议会主席。他通过印制假钞和编造假合同等行径致富，并取得纽约市民主党的绝对权力，可以提名他圈子里的人担任议会和市政府的要职。后来"东窗事发"，在1872年被以204项罪名起诉，判处13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期间逃到西班牙，又被引渡回美国，死在狱中。——译者注

19. 马克·汉纳（1837—1904）是商人兼共和党的政客，他在40岁时成为煤炭和钢铁业富豪；他在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以创纪录的资助使麦金莱当选总统（1896—1900）；他从此进入政界，成为美国国会的参议员（代表俄亥俄州）。1900年，麦金莱遇刺身亡，汉纳也退出政界。——译者注

20. This quotation is often attributed to Ambrose Bierce but the documentation may be unreliable.

21. Alan Dunn, "Average America vs.the One Percent," Forbes, March 21,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moneywisewomen/2012/03/21/aver age-america-vs-the-one-percent/, accessed July 14, 2015.One can

join the upper 1 percent with only seven to eight times the median income, but the mean income of this group is much higher.

22. Robert Gebeloff and Shaila Dewan, “Measuring the Top 1% by Wealth, Not Incom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12, http://economix.blogs .nytimes.com/2012/01/17/measuring-the-top-1-by-wealth-not-income/, accessed April 11, 2015.

23. The average net worth of a family in the top 0.01 percent is ＄371 million.Since there are about sixteen thousand such families, their combined net worth is about ＄5.96 trillion.See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0625, October 2014, Table 1, http://www.nber.org/ papers/w20625.pdf, accessed July 5, 2015.

24. “Adult” refers to people at age forty.See Richard V.Reeves and Isabel V.Sawhil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Definitions, Trends, and Interventio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October 10, 2014, https://www .bostonfed.org/inequality2014/papers/reeves-sawhill.pdf, accessed July 7, 2015.

25. 把从最低收入值到最高收入值的收入分布线划分成相等长度的5段，这样就有4个分隔点，每个分隔点称为一个“四分位”，其中一个是离最低收入值最近的四分位，另一个是离最高收入值最近的四分位。为了看懂这张图，译者在下一页的译文中用括号内添加百分数的数值计算加以说明。——译者注

26. 反乌托邦（Dystopian）的社会指不平等的、不人道的、极权主义的社会。1868年，英国哲学家兼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密尔（John Mill）在英国下院的演说中第一次使用“反乌托邦”这个词。密尔是自由党人，强烈主张人权和平等，包括给女性以选举权等。——译者注

27. 这个社会的收入的中值是（10000＋11000＋12000＋13000＋100000）/5＝146000/5＝29200美元，约为30000美元，最高值100000美元的一半是50000美元，即30000美元少于最高值的一半。——译者注

28. “一段时间以后”，收入的中值是（10500＋11500＋12500＋13500＋300000）/5＝348000/5＝69600美

元，所以作者说，“现在的中值是70000美元”，仅为高收入群体平均收入值300000美元的约23%，富者更富了。——译者注

29.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为300000美元，而这个设想的社会总收入是348000美元，所以在这个最后时期，高收入群体拥有300000/348000＝0.86的财富，即86%的社会财富。——译者注

30. 历史学把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因为在那段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迟滞，而且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译者注

31. 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3 (Summer 2013): 3 - 20, http://eml.berkeley.edu/～saez/alvaredo-atkinson-piketty-saezJEP13top1percent.pdf, accessed January 14, 2015.

32. 最初，勒德分子是指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一些因害怕技术进步会使他们失业而破坏机器的人。内德·勒德（Ned Ludd）是第一个破坏纺织机的工人。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勒德分子，他们认为技术对社会的损害大于效益，因而仇视和反对技术。例如，他们恶意地暗中把病毒输入互联网。——译者注

33. Robert M.Adams, “Consolidation and Merger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nking Industry from 2000 Through 2010,” Federal Reserve Board, August 8, 2012,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 S feds/2012/201251/index.html,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34. Their market share rose from 39.9 percent in 1993 to 63.8 percent in 2013.See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Ers .usda.gov, May 11, 2015, http://www.ers.usda.gov/topics/food-markets -prices/retailing-wholesaling/retail-trends.aspx, accessed July 5, 2015.

35. Mark J.Perry, “Fortune 500 Firms in 1955 vs.2014; 89% Are Gone, and We're All Better Off Because of That Dynamic ‘Creative Destruc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deas, August 18, 2014, http://www .aei.org/publication/fortune-500-firms-in-1955-vs-2014-89-are-gone -and-were-all-better-off-because-of-that-dynamic-creative-destruction/, accessed July 6, 2015.

36.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nual Staff Report Relating to the Use of Data Collected from Private Fund Systemic Risk

Reports," Sec.gov, August 25, 2014, http://www.sec.gov/reportspubs/special-studies/im-private-fund-annual-report-081514.pdf, accessed January 14, 2015.

37. Lobbying Databas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Opensecrets.org, 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 accessed April 13, 2015.

38. 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做出了“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它放宽了对公司和工会的竞选捐款金额的限制，允许它们出钱为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而做广告和宣传，这个判决推翻了63年前制定的限制，奥巴马总统称之为“打开了金钱潮水般涌入政治的闸门”。——译者注

39. “强盗大亨时代”是指剥削致富盛行的19世纪末；这个称呼最初出现在1870年8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后来流行起来，例如19世纪末的《纽约时报》就用过这个名称。——译者注

40. “进步时代”是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1890年至1913年；这是以政治清廉为主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改革时期，例如，女性有了选举权，废除了移民必须通过语言考试等。——译者注

41. 这里指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基斯，他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输给了共和党的老布什。——译者注

42. 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以区别于他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即“小罗斯福”）是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8），他要求国会立法限制托拉斯垄断经营，国会未通过；他就通过司法途径起诉了44个托拉斯公司，他被称为“托拉斯的驯兽师”。——译者注

43. 美国《独立宣言》中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作者借用这两个词，但反其意而用之。——译者注

44.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从英国开始蔓延到欧洲大陆的摒弃封建束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大解放；其代表人物是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狄德罗等思想家。——译者注

45. 约翰·罗尔斯（1921—2002）是美国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著有《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他主张公平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名义迫害少数、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违反正义。——译者注

46. H.G.威尔斯（1866—1946）是英国的科幻作家，费边主义者，即主张

由资本主义通过改良渐进到社会主义；他假想利用一种“时间机器”飞到遥远的未来，回来后叙述他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宣扬费边主义。——译者注

47. Eamon Javers, “Inside Obama's Bank CEOs Meeting,” Politico, April 3, 2009, ht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0409/20871.html, accessed January 14, 2015.

48. “骑在马背上的人”指美国历史上的西部牛仔式的强者为王。——译者注

49. 普通选民在选举总统时往往不看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整个执政纲领，只看谁对自己关心的单个问题（例如，移民、堕胎、控枪或对外战争）的政策，把票投给在这单个问题上合乎自己心意的候选人。——译者注

50. 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是在选举年的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如果11月1日恰巧是星期二，如2016年11月，那就要顺延到下一个星期二，即11月8日。——译者注

51. Joseph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ew York: Norton, 2013).

52. 亚当·斯密（1723—1790）首创资本主义经济学，他主张让“看不见的手”运作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也反对垄断；他著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的圣经”。——译者注

53. 物体的重心越低就越稳当。财富积聚在社会的顶部，使社会成为头重脚轻容易失稳的系统。——译者注

54.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的第3任总统。——译者注

55. Peter Coy, “An Immodest Proposal: A Global Tax on the Superrich,” Bloomberg Business, April 10, 2014,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4-04-10/thomas-pikettys-global-tax-on-capital-may-not-be-a -crazy-idea, accessed January 27, 2015.

56. 若统一的税率定得过高，普通人就不得不节衣缩食，少买生活必需品，富豪们也可能少买一些奢侈品，来自消费税的总收入就会减少；若统一的税率定得过低，普通人多买不了多少生活必需品，但是来自富豪们买奢侈品的消费税收入就会减少很多，从而也使消费税的总收入减少。——译者注

57. 标准普尔公司是世界级的权威金融分析机构，它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

投资人提供美国500家上市公司股票的综合信用评级。它比只采样65家美国上市公司的道琼斯指数更为全面。自1974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约90倍，所以1974年以100万美元购买的无红利股票现在值9000万美元。——译者注

58. The combined aggregate value of two of the largest asset types, publicly traded shares and homes, is around ＄50 trillion.See Cory Hopkins, “Combined Value of U.S.Homes to Top ＄25 Trillion in 2013,” Zillow .com, December 19, 2013, http://www.zillow.com/blog/value-us-homes -to-top-25-trillion-141142/, accessed July 12, 2015; 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rket Value of Publicly Traded Shares,” The World Factbook 2013 - 14,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 -factbook/rankorder/2200rank.html, accessed July 12, 2015.Share ownership is more concentrated than homeownership.Appreciation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alone would be over ＄2.5 trillion annually at 5 percent and ＄5 trillion annually at 10 percent, respectively.

59. 美国的私有住宅每年都要向当地政府缴纳房产税，而且每年由地方政府指定的精算师对房产进行估值，按估值调整纳税额。——译者注

60.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Statistics of Income (SOI) Division, Estate Tax Data Tables, Table 1, “Estate Tax Returns Filed in 2013, by Tax Status and Size of Gross Estate,” November 12, 2014, http://www.irs.gov/uac/SOI-Tax-Stats-Estate-Tax-Statistics-Filing-Year-Table-1, accessed July 5, 2015.27.Chye-Ching Huang and Brandon DeBot, “Ten Fact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Federal Estate Tax,”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rch 23, 2015, http://www.cbpp.org/research/ten-facts-you-should -know-about-the-federal-estate-tax, accessed July 5, 2015.

6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5 to 2025,” CBO.gov, January 26, 2015, Table 4-1, “Revenues Projected in CBO's Baseline,”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49892, accessed July 5, 2015.

62. See note 14.

63. Kerry A.Dolan and Luisa Kroll, eds., “Forbes 400: The Richest People

in America 2014," Forbes, September 29, 2014, http://www.forbes.com/forbes-400/, accessed April 11, 2015.

64. 如果多年前用100万美元买进股票的人在生前就卖出这些升值为9000万美元的股票，他就必须为变现的8900万美元的利得纳税。但是他临终时把这些股票遗赠给后代，这就好比他的后代是以9000万美元的价值得到这些股票的；如果他们以9000万美元出售这些股票变现，他们就被认为是没有利得，所以就不必缴纳利得变现的税。这就是所谓的"递升漏洞"（Stepped-up Loophole）。——译者注

65. 委托人把资产交给信托，受托人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信托中支付给委托人固定数额的年金，在信托终了时将剩余资产归还给最终的受益人。这种信托是按信托设立时的资产值而不是按终结时升值了的资产缴纳赠予税，所以在资产增值的情况下可以节省税费。如果委托人在信托期满前逝世，则信托内的资产将纳入遗产内，缴纳遗产税，这是一个缺点。所以这种信托的期限依委托人年龄和健康情况而定。——译者注

66. 这种信托在一定期限内每年将一定比例的信托收益捐赠给某个特定的慈善机构或慈善项目，信托的本金不用于慈善事业，在信托到期时将本金归还给委托人或其继承人，不必缴纳遗产税。——译者注

67. 这是一种投资性的信托，即受托人持有能产生稳定收入的资产，例如，办公大楼的租金，把收益转交给委托人，缺陷是委托人在每年填写报税表时必须把与信托有关的收入归入应纳税的收入内。——译者注

68. 这种信托的受托人是受托资产产生的收益的受益人，委托人在每年报所得税时不必把受托人经营受托资产得到的收益计入。这些收益（被称为推迟的收益）在委托期满时才一起归还给委托人，那时委托人可能已没有别的收益，从而可按低档的税率缴纳所得税。——译者注

69.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在181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弗兰肯斯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他从停尸房取得不同尸体的器官，拼凑成一个善良而丑陋的怪物，怪物要求弗兰肯斯坦为它造一个像后者的未婚妻那样善良的新娘，弗兰肯斯坦答应后又食言，怪物怒而杀死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最后弗兰肯斯坦病逝，怪物自尽。——译者注

70. 本票是一方签字开出的给另一方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无条件地以现金形式付款的票据。——译者注

71. 按年利率5%的复利计算，1000万美元在30年后成为4321万美元。

——译者注

72. 按年利率10%的复利计算，1000万美元在30年后成为17449万美元。——译者注

73. “标准杆数”是引用高尔夫球的术语。——译者注

74. 宅邸已被委托出去，你却还住在那里；这就好比是，蛋糕被你吃掉，你应该没有这块蛋糕了，但是你却仍然有这块蛋糕。这是美国人关于“两全其美”或“里外通吃”的习惯说法。按中国的说法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意思。——译者注

第三章　教育

教育本应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骄傲和喜悦。但恰恰相反，由于教育方法上的严重错误，美国正在使下一代遭受失败。中学给大部分学生提供了虚假的承诺和不足的课程。大学正在成为大多数人付不起费用的地方。文化和体制的障碍使得要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困难重重。解决这些问题最可行的途径是制订一个全民为国服务计划，为那些不上大学而直接工作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同时为那些能上大学的人提供资助。

几年前，我的妻子和我出席了时任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院长查尔斯·韦斯特[注]（Charles Vest）主持的一个餐桌即席讨论，议题是美国的教育状况。他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设想一个由世界各地教师组成的大会，投票表决选出世界上教育体系最好的国家。他说，唱票员在投票结束后宣布，美国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获得全票，在本科大学教育方面获得半数票，在从幼儿园到12年制[注]教育方面却只得到零票。他的结论是，这可能是美国前进中的极大弱点，但是它本不应如此。

今天，美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教育的学术质量，也在于它为社会和大多数人服务的功效。问题不只在于从幼儿园到12年制的教育。确实，美国的整个中学教育成果从未进入过世界前12位国家之列。那些可能不会进入大学的孩子得到的服务很差，部分原因是想确保全体居民得到统一服务的善良意图。然而，它对于进入大学的那些孩子来说同样服务不足。对于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质量，而在于费用。太多的家庭觉得大学教育费用昂贵到上不起学的地步，导致一些学生半途而废或者背着沉重的债务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虽然最佳实践[注]的解救方法并不能解决美国教育的全部问题，但是总体上改善各年级的教育质量和我们的国际排名还是容易的，不足在于政治。教育者非常了解什么是最佳实践。

表3.1是一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世界各国教育水平排名研究结果。[注]有些人认为，这些数据有偏见，因为这个测试排除了美国的私立精英学校（数据保管者否认这个指责），却囊括了很多美国乡村居民和新移民，来自某些国家的移民可能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然而，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说，排除这些偏见就能让我们的排名大大提前。

表3.1　世界各国教育水平排名（OECD）

1. 新加坡	19. 新西兰
2. 韩国	20. 捷克共和国
3. 日本	21. 法国
4. 列支敦士登	22. 英国
5. 瑞士	23. 冰岛
6. 荷兰	24. 拉脱维亚
7. 爱沙尼亚	25. 卢森堡
8. 芬兰	26. 挪威
9. 加拿大	27. 葡萄牙
10. 波兰	28. 意大利
11. 比利时	29. 西班牙
12. 德国	30. 俄罗斯
13. 越南	31. 斯洛伐克
14. 奥地利	32. 美国
15. 澳大利亚	33. 立陶宛
16. 爱尔兰	34. 瑞典
17. 斯洛文尼亚	35. 匈牙利
18. 丹麦	36. 克罗地亚

（续表）

表3.1显示美国排名第32位（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列入，它将排名在顶尖或者紧挨着顶尖的位置，美国则退居第33位），在几十个经济上与美国无法相比的国家之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仅仅分析社会方面的原因通常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对比已经实施和尚未实施的政策可能较为有用。把合理的最佳实践标准应用于我们的所有学校并不会把美国推到第一位，但它肯定能让我们的排名提前。

我的妻子和我都花时间研究过波士顿的中学教育。我是一个评议小组的负责人，该小组每年提供10万美元现金奖励进步最快的公立中学。我们把这个奖励称为“学校进步奖”（School on Move Prize）。小组的工作令人愉快，成员们每年都能看到6所公立学校的成功故事，而不只是阅读一系列通常令人失望的结果。评奖小组从大量的申请者中挑出3家，然后访问这

些学校。符合下列标准的学校是优胜者：最近4年提高了标准化考试得分的客观成绩；有清晰的战略及令人信服的用于取得这些成绩的方法；有其他学校也许可以仿效的经验。现在，我已在这个小组任评委9年，看过波士顿的约50所公立学校的书面资料，访问过其中的20多所。我的妻子凯西也积极地介入一家私立中学，我们的孪生子女之一就在那里上学。

我们还介入波士顿的两所很不相同的中学，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凯西是一所当地州立特许中学[注]的董事会成员。这所学校用抽签的办法录取学生，这是由法律规定的，它招收的学生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方面与波士顿学区的学校类似。这所学校得以年复一年地把它的孩子们（大多数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里）从全州8年级考试[注]成绩最差提升到全州名列前茅，与来自波士顿市郊最有特权的社区[注]的学生成绩持平。我一直担任一所公立中学的非正式顾问，该校似乎无法从波士顿学校排名榜的底部爬上来。依照标准考试成绩，它通常位于或接近最后一名。我对这所学校的跟踪观察历经该校3任校长，他们都是有天赋和才能的，但至今未能解决它的问题。

我不能说这两所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学内的学生是完全相同的，虽然表面上他们在家庭收入和种族方面类似。州立特许中学必须由父母或监护人主动提出入学申请，所以可以假定，它的学生来自有人照顾他们和关注他们行为的家庭。虽然申请进入州立特许中学不要求填写调查表、提供文章、支付学费[注]或参加面试，但是要求学生家庭主动提出申请本身就引入了一个非随机因素。与此不同，我跟踪地区的公立中学的许多学生历来是由行政中枢分配的，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向学区分配办公室提供任何择校偏好。我们可以猜测，这将产生负面的作用，特别是有些学生来自功能严重失调的家庭。由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州立特许中学优于地区公立中学，它们的许多差别很容易在实践中发现。

首先，让我给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把特许中学概念引入波士顿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不是对波士顿所有特许中学的普遍认可；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好得多，这毫不奇怪。这更不是认可全国其他地区的这类学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记录，而且它们在整个质量分布图谱上的声誉各不相同。我钦佩波士顿的最佳特许学校，不是因为它们是传统公立学校的对立面或潜在的替代者，而是因为它们能帮助地方上管理的地区公立中学系统。它们不受地区公立中学受到的某些内在或外在的制约，它们能试验出较好的办校方法，并为其他学校指明途径，就像传统公立中学体系中获得“学校进步奖”的那些学校那样。只要采用我们亲眼看到的州立特许学校和公立学校的许多最佳实践经验，我深信，美国的12年制学校能得到大大的改善。

在凯西所服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许中学里，访问者可以马上发现一些明显的特征。学生们着装统一：白色或蓝色的有领衬衣，深色的长裤或裙子。他们早上准时到校，进校门时挨个向校长问好。迟到和违反纪律的学生只有在家长或监护人陪同下才能进校门。教师们大都是年轻和热情的。几乎每个教师都认识每个学生，而不仅仅是自己班级的。最令人注意的可能是，特许中学不像公立中学那样下午放学早。特许中学学生每天在校时间约10个小时，离校前能做完家庭作业。这是因为学校有一批住校辅导员，他们大都是来自好大学的休学一年的学生(注)，他们同意做一年辅导员以换取住宿、伙食和少量助学金。每年申请辅导员工作的大学生远超职位数。批评者们指出，过去，特许中学中9年级学生人数远大于12年级学生人数，因为大量学生受不了每天长时间在校而选择回到公立中学(注)。显然，现在的数据看起来已经比较好了；不管怎样，由于这是学生们的自愿选择，我认为这很正常、可以接受。人和人不一样，学校并不是监狱。获得“学校进步奖”的学校往往也有较长的留校时间，其中几所学校还有辅导员计划。而学区管理的公立中学没有相同的自由度，也不能完全模仿特许中学。然而，在使用简便可行的工具上，获奖学校有某些共同之处可以供其他学校学习。获奖学校自校长以下的领导层都很强大、团结合作。校长们通常都与他们的教师在课程、帮助学生及问责标准上密切配合。他们共同努力，都希望学校有所进步。在衡量学校进步方面，他们通常是客观、不含糊的。每个获奖的学校都收集了超出学区要求的学生数据，大多数学校使用的学习差距评估工具都超出学区所要求的标准。这样就可以把学生行为和成绩的表现准确地提供给学生及其家长，从而培育他们尊师重教。这些学校还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针对学生的学习、健康、社交和情感需要，提供课堂以外的高水平帮助。

以下8点计划有望把美国的教育成果排名从第32位提高到个位数以内。这些最佳实践已在许多地方多次得到了证明。

1.增加学龄前教育。各派专家基本上都认同幼儿园和学前教育计划在许多方面是有帮助的。一位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守派告诉我，他更愿意用普及幼儿园义务教育取代高中3年义务教育，这是不花钱的交换。我想他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实际上两样都支付得起。不过，关键在于年轻人头脑非常灵活，很难在很小的时候让他尊重和喜爱学习。但是不管将来做什么，早教至少是有帮助的，而且是必要的。世界上的其他繁荣国家招收3岁儿童进学前班的比例几乎是我们的两倍。(注)

2.延长在校时间。让学生下午早早回家是不利的，他们越早回家就学得越少，而且越容易惹麻烦。在中学阶段，最佳的在校时间应该是8个小时左右。应该延长在校时间，让大多数学生从多出的时间中获益。完成家庭作

业没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在课外活动中得益，包括艺术、音乐和体育。家庭作业成绩低于标准的学生可以在离校前花更多时间在学校监督下完成作业。

3.关注个人。家庭环境强调努力学习和遵守纪律的孩子们能够在几乎任何形式的学校中茁壮成长。然而，如果家中没有这些正面的强化教育和密切的监管，学校就必须尽可能努力地提供这些。这可能要求某些地方的学校规模小些，而辅导员（付费的和免费的）人数多一些。能干、体贴和有同情心的教师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没有密切的关注及对良好的学习成绩给予个人奖励，我们就不能期待学生会重视学习。

4.加强数字化管理。标准化测验是有争议的，但它们是改善教育成果的必要手段。然而，只靠它们是不够的。学校的领导有许多评估工具监管每个孩子的进步。这些工具应被教师们广泛地用于评估每个孩子的需要及使其找到最有可能持续进步的方法。此外，如果没有“共同核心国家标准”注，并且大多数学校的课程也不统一，就不可能完成系统改进的重任。标准化的计划和测验总是不断改进的，没有它们导航，我们就找不到走出茂密森林、转向改善的途径。

5.培训领导者。坚强有力和富有灵感的领导总是能使学校办得更好。应该选用心中有大关怀和雄心壮志目标的校长和学监。培训学校领导的计划就像教育学院培养研究生一样重要。他们的培训应确保他们一上任就有办法和动力最大限度地赢得他们的关键支持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合作。

6.灵活雇佣。教师的质量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要寻求最佳的教师，就要改变以往的雇佣标准。学区不应只寻找全职教师。有3—5年经历的有活力的理想主义者与毕生奉献于教书的老教师的组合，可能优于单纯雇佣上述两类教师中的任何一类。基于言论自由的理由，终生聘用在大学至关重要，但中小学并不以此为目的。一方面，合同买断条款可以为教师的收入提供更有用的金融保护，又不影响校长不断寻求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给予优秀教师的工资过低而不是过高，所以聘用期规则的任何改变都不应减少收入。对有杰出表现的教师应给予奖励，可以作为提供附加工资的一种建设性方式。

7.加强纪律。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家庭环境有缺陷的那些学生，往往需要教导他们尊师重教。这个目标不会自动实现。有纪律的学校环境不需要看起来严酷无情。大多数孩子会发现，有秩序可以使他们感觉更放心和愉快，而不是压抑。尊敬教师和学校的其他职工不是可有可无的规定。校服（即使只是宽松规范的）、学校爱国主义及其他象征工具也有助于提供秩序、安全和归属感。如果要在学校大门外依然保持恰当的尊师重教，那么

家长们和社区共同参与制定和维护纪律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8.利用现代技术。对下一代的教育要有所不同。讲课视频、书籍和测验将可以用平板电脑从互联网上打包下载。我希望有更灵活的、自动改进的教科书，随着学生的进步而修改课程，并通过测试学生的个人熟练度和需要来验证。讲课视频可能更像是电影，伴随着可供选择的有趣的图像。测验可能更像是学生们喜欢或者至少不讨厌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受学生欢迎的，而且肯定不必担忧。信息时代正在给我们提供一些奇妙的工具，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学校能得到它们，而不是仅提供给那些买得起它们的社区。

然而，只采用这些最佳实践是不够的，即使这可以为它们的有限目标而服务。在美国，学区为学校的标准和预算而承担的责任太大。

美国与排名更高的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明显差别之一是，美国的学生构成、课程和预算都有广泛的多样性。美国有14000个学区，每个学区制定它自己的大部分标准，而且大多数地区可以决定自己学校的预算。20世纪90年代，许多州立法者和教育官员不关心学生在表现上存在的巨大差异，甚至没有建立全州统一的语文和数学标准。到了2009年，美国的州长们才同意设定共同标准，催生了上述“共同核心国家标准”。[注]这是一个难得的进步，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发展中的共识，即标准化检验尽管尚不完善，但已在这里站住了脚。

尽管如此，教育经费的不同依然是改善我们国家学习成绩的最棘手障碍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或不同的公共教育意愿。学校经费与学区支付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众所周知。社区之间的收入不同是造成差距的主要因素，更不必说美国各社区和各地区之间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距。50个州和州内各地区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不同，从占州总收入的8%到稍多于2%。[注]按人均计算的教育经费，最高的州与最低的州之间的差距超过2：1。最高的是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阿拉斯加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约州。最低的是犹他州、爱达荷州和俄克拉何马州。[注]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佛蒙特州的经费最高，每个学生接近2万美元；而亚利桑那州排在末尾，用于每个学生的经费只有7000美元。[注]人口普查局通过对全国各地学区经费的调查确认了这个分布水平。[注]14个州按收入水平呈递减分布，其他各州中只有15个州是递增的。[注]

这些经费问题本身不会得到改善。在绝对意义上，它们正在恶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州的学校教育经费一直在下降。[注]自那时以来，35个

州减少了拨给学生的经费，其中有14个州减少了10%以上。[注]俄克拉何马州是经费减少之首，每个学生的经费减少了23%。[注]悲哀的是，削减最多的州的教育成绩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美国的教育传统相反，除了让联邦政府缓解这些差距之外，可能没有别的可行办法。

无法回避且令人气馁的事实是，我们按国际标准的排名之低，已经让我们无可辩解。而且，它还像州的经费趋势那样陷入不断恶化的境地。只有20%的美国青年学历比父母高，而29%的学历比父母更低。[注]

美国的教育问题比考试成绩问题严重得多。在大学阶段，学费支付问题比高中平均成绩问题更不好处理。中产阶层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然而，我们令人失望的全国成绩却是美国教育中最易处理的问题。越来越上不起大学和缺乏对不上大学者的职业培训，更值得我们关注，更需要我们最终找出根本性的答案。现在，大部分高中生都有机会进入某类大学。[注]然而，只有一半被录取的学生能一直读完4年大学，这是我们教育系统的另一个失败之处。[注]对于这个低毕业率最普遍引用的理由是费用问题。许多大学生付不起应付的费用而在入学1年或2年后退学，失去了他们宝贵的受教育机会。即使那些出现在毕业统计表中的胜利者也往往是通过借债而得以毕业，而且债务重得使他们找不到能偿还它的工作。如果父母有钱，这不是个特别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对于中产阶层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上大学的整个经历，即从申请到毕业，近几年来，对于许多人而言越来越艰难。有些大学偏爱低收入、高收入而不是中等收入家庭的申请入学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是大学把它们的财务延伸到向社会经济地位低端提供资助的一个偶然结果。这个延伸本身又来自它们原则上承诺的增加多样性，并且至少接近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分布。其直接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然而，这个趋势也间接地有利于富裕家庭的申请入学者，因为学费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原本就不是问题。这种杠铃式的做法[注]使富裕者补贴最贫穷的大学生，并使大学有资金用于它们的多样性支出。受损的是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们，他们通常在数量和来源上占有大多数入学名额。他们现在被从两端挤压，把越来越多的名额让给收入更低家庭的人和支付学费有余力家庭的人。如果这是公开的秘密，那么急速增长的大学费用加重了中产阶层学生的负担就根本不是秘密。

大学学费的增长率远高于通胀率，对此已有许多讨论。1978—2008年的30年期间，整个生活费用大约涨了3倍。[注]在同一时期内，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中的医疗费部分增长了将近6倍，增长速度快于CPI本身。[注]然而，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学费轻松突破了这个可怕的增速，几乎增长了10倍。[注]2014—2015学年，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学费年均为31000美元，[注]加上10000美元或更多的生活费，全部费用超过美国家庭收入中位值的75%[注]。[注]毫无疑问，最具学术性的精英大学及最昂贵地区的学费最高。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1年级大学生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现在估计达7万美元。[注]哈佛大学（我们的儿子是那里的本科生）估计约为6.5万美元。[注]布朗大学[注]（他的孪生妹妹的学校）的费用也差不多。[注]当然，这些顶级大学有外来的捐款，使它们能慷慨补助许多需要助学金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超过70%的学生能得到相当多的财务补助。[注]布朗大学收到的捐款要少得多，它能补助约50%的学生。[注]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大学能付得起像常青藤盟校[注]那样的学生财务补助。大部分大学在录取新生时是不谈财务补助的。你可以设想，几乎没有任何私立大学会不考虑穷富，因为这是它们一个重要的特色。州公立大学比较便宜，它们的全部费用大约是私立大学的一半。[注]然而，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不下去。在税收减少的年代，州公立大学会被迫提高学费和杂费，增速甚至快于私立大学。从2009—2010学年到2015年，四年制私立非营利大学的学杂费按实际美元价格计算增长了10%。[注]同一时期内，四年制公立大学对本州学生的学杂费增长了17%。[注]

中产阶层的孩子们来到大学时，已经克服了各种对他们不利的申请歧视，但压力远未结束。在收到捐款较少的私立大学，许多学生发现自己1年级还能拿到助学金，此后几年就没有了。我最近悲哀地听到，从我们所在城市的最精锐的公立中学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半能正常念完4年大学。在大学的后几年内缺乏资助，是这些优秀学生不能读完全部学位课程的最常见原因。学习之外的工作是可以找到的，但过多的工作会使大学的经历变得空洞：占用学习时间和完全消耗掉参加课外活动的时间。因此，对于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来说，利用学生贷款可能是另一种途径。

人们很难不喜欢学生贷款这个概念。它巧妙地适合生活的自然周期：一个生活资料不足的年轻学生借钱接受大学教育，期望在以后的人生中获得更高收入，并足以付清这笔贷款。这一切都挺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也有它的缺陷。学生贷款的负担随着急速增长的大学费用而升高。约70%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在读完大学本科获得学位文凭时仍有债务。[注]私立非营利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债务负担超过3万美元。[注]

自2006年以来，美国大学生和毕业生的上学债务总额增加了两倍多，从约50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你可能像我一样惊讶地得知，美国的学生债务超过信用卡债务或汽车贷款。

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度的学生贷款将触发下一轮经济崩溃，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大学毕业生的重负无法承担；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富裕的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不妙的处境。如果缺钱的中产阶层（学生贷款负担几乎全都落在他们身上）没有别的经济麻烦，我就不必如此担忧大学贷款问题。经济地位更低的人，如果足够幸运进了大学，更有可能获得全额助学金，而经济地位更高的学生不需要申请贷款。如果就业市场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能更好些，中产阶层会更能接受现状。但是，我们的就业市场很不景气、很棘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2014年7月，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4.3%，与国内整体失业率5.3%及我童年时的3.8%形成鲜明的对比。

学生贷款的利率是在这些日子里受到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本科生在2015年按照联邦计划贷款的利率是4.25%。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参议员多次指出，这比美联储的银行拆借利率高得多。他和其他一些人还指出，房贷和消费者借贷在利率下降时可以重新融资，学生借款者却自始至终陷在最初的贷款利率中。在国会走廊的另一侧，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比调整利率更好的做法，是把学生自动录入“一个以收入为基准的统一偿付系统”。也许他们两位在这类计划上能达成一致。但与此同时，我可以有信心地说，中产阶层家庭大学生身上的贷款负担不是我们国家应该为之骄傲的事。至少，它使那些背着这种负担的人在心理上失去自信心，而且贷方还承受着信用风险和回收贷款的负担。它还可能把年轻人驱离低工资的服务，例如，课余教书和一些不赚钱的工作，或者首先是把他们驱离大学。资助大学教育是一项精细的国家投资，它既有益于个人，同样也有益于国家；我们应该注意使其不产生麻烦的后果。

贷款成本和学费增长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在有些观察家质疑，大学教育投资的增值是否正在下降。在过去，我经常看到4年大学教育可以有7位数的附加值。然而，据《彭博商业周刊》最近估计，即使按照彭博认为的非常宽泛的假设，普通大学毕业生30年的回报也只有353000美元。根据这项研究，工程院校产生的纯回报两倍于人文艺术院校，只有极少数院校能达到从前宽松估计的7位数收入。况且，这种衡量都是低估和高估的混合物，应该把它们分为几个组成部分才有研究意义。经济分布阶梯顶端的孩子们在40岁时挣得比底端的孩子们多，这是与教育无关的。可以保险地打赌，任何层次的教育都不如幸运地出生在父母有充裕

资金可供捐助和有得力朋友的家庭里。教育成才的故事温暖人心，但赢得某些人所谓的“子宫彩票”却更加宝贵。

自力更生者在入学申请过程中就处于弱势。随后，他们将面对越来越高的学费。再往后，如果他们取得贷款，就将在步入生活的新阶段时背着沉重的负担。最后，他们可能发现自己的学位不像有特权的室友那样有价值。社会流动性是体现学位价值的关键。随着流动性下降和财富向顶部集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就下降了。

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流动性为零的社会，明显也是学位不能提供向上流动力的社会，无论学位多令人羡慕、多难获得。大多数美国家庭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教育费用的暴涨让人越来越支付不起，另一方面是教育回报在收入和财富阶层分化的影响下在下降。我看不出这两个方面中任何一个的状况会在短期内有所缓解。这个局面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是一个根本性的威胁，我们必须大力解决，而不是小修小补。真正的解决需要有政策引导，否则美国就是没有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目前的教育制度对不上大学的人而言更加不利。在职业和技术培训上，美国人尴尬地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我第一次访问这所我后来介入的陷入困境的中学时，我马上注意到，它的走廊里有许多常青藤大学的旗帜。这些长三角形旗帜旨在鼓舞人心，但我明确怀疑它们对年轻的心灵是否伤害大于好处。我请一位校长调查该校几年前的9年级学生从四年制大学毕业的比例。数据不太完整，他和我共同做出的估计是不到1%。整个学区的同类数据虽然比这个好，但百分比也只是勉强超过一位数。我最近碰巧看到芝加哥的统计数据，成绩不比波士顿好，可能更差些。

毫无疑问，中学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教育成果的原始统计数据应该能说明这一点。大约60%的美国中学生能够上大学。这群学生中约20%或1/3在拿到学位前就选择退学；另有约10%在拿到副学士学位后选择退学。这意味着只有30%多的美国年轻人读完了学士学位。这个比例在上升，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大学毕业生群体现在只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3。

波士顿的学监们习惯于对刚进入大学、需要进行培养的中学生发表一些标准化的官腔讲话。这种讲话往往志趣高远，但明显不现实。最近，这些学校官员提出了一个较有意义的目标：培养每个中学生进入大学或就业。这才是中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提供职业培训和

人文学科的课程。衡量为进入大学或从事有意义的职业所做准备的充分性，这远比通常的衡量中学生毕业率更重要。中学生毕业率往往只是比入学率稍重要一点儿而已。

上文说过，一位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直接取消高中3年义务教育，实行幼儿园义务教育。自由派的前劳工部部长建议把中学最后1年与严格的职业培训计划的第一年相结合。他说，“在现代美国，我们往往把‘机会均等’的‘机会’与获得四年制通识教育的‘机会’混淆成一回事。‘机会’应该被理解为学到为谋得一份好工作所必需的本领的‘机会’。”[注]良好技术培训的关键在于，教师和雇主共同制订培训计划，学生和雇主共同介入该计划的实际培训课程。最有效的副学士学位计划与非营利组织[注]可以把学习与实习结合在一起。波士顿就有两个最佳的职业培训计划，按照它们与重要雇主签订的合同，既培训了孩子们，又能使他们真正开始工作。

让所有学生明白自己的选择，并资助他们做有用的准备，这有利无害。但是这些步骤还不够。自愿的个人计划的规模还远远不够，从来都不够。你应该在某一天随机访问某地的某个街区，统计你看到的闲坐在他们家门口的人数，虽然这不是做严格的分析工作。但这有助于在激情和本能层面摸清问题。由于浪费了所有这些有潜在技艺的人力，并承担着一切与之相关的社会成本，我们对不起社会的大部分人，也对不起我们自己。在学校业绩差距最大的地区，仍然存在包括积极寻找工作者在内的可怕的失业率。

欧盟长期以来就很强调职业教育。自1907年起，英国就在贸易学校提供技术培训。从1994年开始，英国就已有政府资助的“现代学徒制”计划，它提供了“在求职道路上的高质量培训”；政府承诺把学徒制作为英国教育制度的主要部分。德国可以说是职业教育的领导者，多达2/3的德国学生参加了职业培训计划。[注]德国法律规定，州政府、工会以及贸易与工业协会共同负责职业培训。在德国，22岁以下的青年人中有51%的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学徒培训。[注]每3家德国公司中就有1家为学徒提供见习机会。在说德语的其他国家中也有类似的职业教育体系，合格的学徒资格在各国均获得承认。在荷兰，约50%的学生初中毕业后进入4种职业计划之一。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对职业培训和技术培训花费很大力气。在瑞典，几乎所有初中义务教育毕业生都有机会分别进入14类职业导向的高中和4类学术性高中。职业培训包括3年内15周的现场培训。在芬兰，几乎全部学生在读完9年制综合中学[注]后，选择为进大学做准备的学术性高中，或者进自由职业学校。在挪威，一半初中毕业生进入9类职业学校之一，通常包括2年的校内教育和2年的公司学徒实习。

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多年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职业教育结构。澳大利亚为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的中学生提供培训，继之以有合同约束的传统行业学徒和服务业见习机会。

我们的国家忽视一流职业培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地中学教育资金问题导致最需要资金的地方得到的资助反而最少，尤其在税收紧缩时代；另一个是害怕过早就业会产生不公。

在职业培训和技术培训方面，美国处于少数派阵营。我们依靠个人主动性和市场力量来教育和安置年轻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来讲，特别是缺乏资源的有色人种，这是不幸的。显而易见，这种消极影响会导致社会永久的就业不足和失业阶层。连续几代人很少就业的公民群体，又将导致其家庭成员饱受各种困苦，让社会的其他部分为之承担各种费用。所以，我希望大家扪心自问，为什么美国不能像其他所有国家那样制订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答案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很奇怪地达成了一致。我们这个时代对税收的逆反心理让保守主义者不支持这些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彻底解决问题将需要超出社区范围的筹资，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破坏了他们所珍惜的地方控制权(注)。

自由主义者和不在少数的保守派同事找了一套不同的理由回避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培训制度的基础是大概从学生14岁起就予以跟踪，看他们是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还是技术培训。左派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注)，他们担心密切跟踪十几岁的孩子，即使是名义上的或自愿的，对于大器晚成的年轻人或标准化测试不出其天赋的年轻人而言会造成严重而不可逆转的不公。另一个担心是，鉴于在高中的统计数据中经常可看到的成绩差距，如果我们的技术培训与大学教育两条道路的差异太大，将会发出一个分裂种族、肤色人群或民族的信号。这个最后的幽灵，有时被称为“软偏执”，在一些较为同质性(注)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而美国却往往无法同这些社会相提并论。

事实上，怀有善意的思想家们担心的是这个分裂信号代表着一种危险，但我们可以努力避免触发这个令人不满的信号，只要不给年轻人设定幻想的乌托邦目标，就不必排斥对他们今后生涯极其有用的职业培训。这条路很难走，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走。美国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不是偏执狂，两党的多位前总统也都呼吁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

我成长在一个公开跟踪学生成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从7年级开始，约有240人的年级分成24人一组的10个组。学术上最有希望的学生分在7-1组，仅次于此群体的学生在7-2组，以此类推，直到7-10组；这个7-10

组今天可以称为特殊教育组。随着排列序数增大，学习材料的学术挑战越来越小，而课程则更倾向于职业教育。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分在哪一组。今天，这种方式令人反感，理由可以理解。然而，困难的是，我们允许各种不太明显的跟踪学生成绩继续存在。成绩好的学生为了学习有挑战的课程，可以选择进入严格考试的公立中学，或为上大学做准备的精英私立中学。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可以选择接受特殊教育。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缺乏区别性对待，这对中等学生中的学习成绩较差的那些人更为不利。缺乏区别性对待已成为美国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以赶上发达世界其他国家的障碍。

美国原本可以在高中课程中设置有意义的职业培训和技术培训课程，这是能做到的。我们可以强调自愿选课，多给一些灵活性，以便在高中后几年改善学生的人生路径，但就是没有这样去做。一个较现实的替代办法是集中关注高中之后的几年，那时跟踪学习成绩不那么令人反感。对于大器晚成的人而言，在18岁以后跟踪其学习成绩并不带有同等的不公正；随着被跟踪者年龄的增长，这个人和其他人都比较容易看出忽视职业培训的不良后果。没有人能否认成年人的生活会在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投资高中毕业后职业培训的一个战略是，设立更多、更好的副学士学位级别的职业培训。我将很高兴看到这样做。不幸的是，预算控制及对不公的恐惧依然结合在一起，使这些努力变得边缘化。针对高中本来可以做更多努力，即使是以弱化的形式跟踪学生，但这可能仍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文化。

消除美国教育弊病的最佳办法是全民为国服务。这对于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有利。它可以为那些不上大学的人提供技术培训，而对上大学的人提供资助。同时，它将以建设性的方式加强爱国主义，而且必然会大大促进经济的有益产出。

有几个理由使全民为国服务（Universal National Service）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注]。第一，这是我们每个人对身为这个宽容、自由、富裕国家的居民就可得到好处表示感谢的一个途径。爱国主义动机对于一个项目而言并不糟糕。第二，有许多建设性工作需要年轻劳动者组织去做，这些工作在经济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第三，全民为国服务的团队必然会增进社会融合，这是作为各民族大熔炉的国家精神的健康滋补品，否则这个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就会过于严重。自从开始讨论这个概念以来，这3个理由在全民为国服务概念支持者们的应景辩论中都提到过。这些都是很充分的论据，但近年来它们的说服力还不足以催生出动力。

然而，第四个理由需要我再做进一步表述。如果我们排除其他国家使用的公开跟踪学生法，全民为国服务对于教育系统而言就可能是最佳的补充和配套，目前的教育系统对于富人之外的其他人都危险地功能失调了。你最

初可能觉得全民为国服务对于解决教育弊病太间接、太肤浅，对于一个小问题来说可能过于宽泛；但是，实际上它是唯一现实的药方，能给我们提供美国该有的教育成果。如果解决难题的明显路径行不通，有时候曲线救国不仅必要，本质上甚至更为有力。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号召我们：“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知道，当时没人认为这是陈腐的老生常谈或者乌托邦。现代版全民为国服务就是对肯尼迪号召的积极回应。大约从肯尼迪出生时起，人们就讨论过全民为国服务。早在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的一篇广为摘引的短文中号召，“招募所有年轻人”“消灭邪恶”“驱除年轻人身上的孩子气”。[注]小罗斯福总统的平民保育团[注]（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是这个概念的第一次大规模体现。虽然这个计划没有体现出充分的全民性，但CCC曾经安排250多万团员在4000多个营地工作，他们种植了超过30亿棵树，建立了数百个公园，人们至今仍然受惠于此。[注]

在一段停顿之后，人们迎来了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队”[注]（Peace Corps）。和CCC一样，它的普遍参与性差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峰时期，和平队约有1.6万名志愿者。[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把服务内容扩大为就业团队[注]（Job Corps）、启蒙计划[注]（Head Start）、社区活动（Community Action）及美国志愿服务队（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VISTA）。他呼吁制订一项计划，使“美国的每个青年人有机会，有责任感，至少花几年时间为这个国家及世界上的其他人服务”。[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注]（Jerry Brown）在1976年设立了州一级的CCC，它（就像布朗本人一样）存活了几十年，至今还在做类似工作。这些计划都很好，但它们都太小，不足以解决大家所关心的教育问题。

为国家和有需要者服务，不是一个特别党派化的问题。1988年，时任州长的比尔·克林顿[注]及其他人建议，只在大学生为国家服务期间提供联邦资助。克林顿说服国会设立一个名为“美国志愿队”[注]（AmeriCorps）的为国家服务的新计划，来自两党的49位州长签署了一封致国会的信，支持该计划的增强和再次授权。[注]这项计划获得了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的坚定支持。美国志愿队人数达到5万。为了发起又一次全国青年的志愿服务计划，克林顿总统及其前一任总统老布什在1997年召开了一次两党高峰会议，与会者有4位至今仍健在的曾任总统，会议由科林·鲍威尔

（Colin Powell）将军主持。[注]2002年，小布什总统提出了要求每个美国人服务两年的计划。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奥林·哈奇（Orrin Hatch），联合民主党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作为2009年《服务美国法案》（*Serve America Act*）的坚定支持者，扩大了美国志愿队计划，增加了5个新的服务计划。[注]但是，所有这些计划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全民为国服务计划。

虽然确切的细节不像概念那样可以简单构建，但我对于全民为国服务计划的想法是：要求每个年轻人在17—22岁之间的某个时期，在一个选定的领域至少服务1年。在自愿的基础上，第二年可以继续服务。指派给年轻人从事的工作领域包括以下三类之一：军队、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由参加者自愿选择。联邦政府现有的一切青年服务计划都将纳入这三大类之中。每一类都给予报酬，当然报酬的多少取决于能否达到足以吸引适当数量的志愿者。军队方面的需求是明确的，报酬肯定是最高的，可能要求服役两年。全民为国服务计划应代替军队自取消征兵制以来的全部志愿招募工作。今天，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军队仍然是种族最多样化的大组织，并且，全民为国服务计划将使它更加多样化[注]。何况，如果按家庭收入衡量，今天的军队并不特别多样化。

不难确定，维护和建设美国的基础设施是有潜在用途的工作。表3.2是美国土木建筑工程师协会发布的关于美国基础设施情况的评估报告结果。[注]这个协会的评估基础是“能力、条件、资金、未来需求、运营和维护、公共安全和适应性”。

表3.2　美国基础设施评估数据

基础设施	评估数据
航空	D

基础设施	评估数据
航空	D
桥梁	C +
堤坝	D
饮用水	D
能源	D +
有害的垃圾	D
内陆水系	D –
防洪堤	D –
港口	C
公园和游乐场	C –
铁路	C +
公路	D
学校	D
固体废弃物	B –
运输	D
污水	D

该协会评出的C级是中等，D级是不好。这个评估提出，到2020年底，基础设施所需投资额是惊人的36000亿美元。[注]一位智者曾告诫说，你永远不应去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理发[注]。或许这个国家的土木建筑工程师们类似那位理发师，有意高估；但我没能发现有这方面的专家直接表示不同意这个估计。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正在损耗，需要认真对待。

许多青年人可投身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经济的绿色环保、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代表着投资于未来的经济繁荣。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时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提出大规模建造美国州际高速公路计划时说，“这个计划将比美国政府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采取的任何单项行动都更大地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它对美国经济，以及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创造的就业及开发的乡村地区，影响不可估量”。[注]年轻的工人团队将解决原本棘手的人力不足问题，他们在为社会服务方面，机会很多。在美国志愿队、资深团队[注]（Senior Corps）、为美国学习和服务[注]（Learn and

Serve America）、和平队、为美国而教（注）（Teach for America）及其他计划下，志愿者们已经在做全民为国服务计划所鼓励的许多事，而且永远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就我们的社会心理而言，我无法想象不同背景的人们为共同目标而一起共事有什么不对。几乎每个人在谈论时都表明，“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征兵有助于把不同的居民、移民，工人和农民，融合在一个为世人所羡慕的国家中。但人们从不愿意信任他们了解得很少的那些人。如果每个人对来自一切阶层和祖先的人们敞开胸怀并一起工作，错误的成见和狭隘的怀疑就肯定可以减少，同情心和国家凝聚力就肯定会增加。对于有特权的人而言，这个混合将提供有益的警示以及一堂关于我们基本共同感的课。对于其他没有特权的人而言，这个混合不仅有这些正面教益，而且有来自培训和工作的经济收入。

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强制性是最常见的问题。我们必须宽容对待某些身体和心理功能有缺陷的年轻人。这种例外与概念性和原则性问题不沾边。但是，一个健康的青年，在向他提供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宽泛的职业选择方案时，他却直接拒绝参加，你会想，他有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吗？但在我们的社会里，难以想象有人会因此而被送进监狱。我是在越南战争时期长大成人的，我记得有一位大学同学因烧掉了兵役卡而被从学校带走并送进联邦监狱，当时我心中充满了对伦理与政策之间的复杂斗争。我们许多人难以支持对一个拒绝为国服务的年轻人实施刑事处罚，无论这个过失是基于道义或宗教原因，或者干脆是不成熟的年轻人所表现出的任性固执。然而，我希望你能支持使他失去任何与全民为国服务有关的具体奖励，并施加某种非刑事惩罚。例如，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根据那些人直接拒绝为国服务的时间，推迟他们社会保险的退休年龄。我们也可以拒绝给予他们本来能得到的政府奖励和补助。我们可以在他们完成全民为国服务之前拒绝给他们从事某些政府工作的资格。但这些制裁之中没有一项是涉及把某个年轻肇事者从家里拉出来并关进监狱的。此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不会转变自己的观念去完成他曾拒绝过的社会服务，并不是所有参加者都是年轻时就能为社会所用的。

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全民为国服务的传统伦理可能作为一个最佳答案还有欠缺，然而，它就是一个答案。全民为国服务能为某些大学生因学费高昂而苦恼的问题提供缓解之道：服务的一部分报酬可以用于大幅降低学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个方式能使学生贷款计划从喜忧参半之事变成确定的福祉，而且它能把中产阶层从目前无法以合理方法寻求教育的噩梦中解救出来。如果对强调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的计划运用得当，全民为国服务甚至可以为那些不上大学的人带来更大恩惠。对于许多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是救命的。此外，对于那些第二年继续留

在志愿服务中的人而言，全民为国服务团队甚至可能升级为授予其副学士学位。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的每一个人，都将有机会在那里学到必要的技能和规矩，从而改变他们人生的航向。

对于强制性的全民为国服务还可能遭遇另外一些反对意见。2013年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中有一篇文章列举了13条反对理由。[注]2002年，布鲁金斯学会在出版物中列举了5个理由，把全民为国服务描述为“已过期的坏主意”。[注]更有才智的是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注]（Gary Becker）及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注]（Richard Posner）在2007年的一篇博客上列举了他们反对强制服务的理由。[注]这些反对全民为国服务的人用攻击性的语言指出，这个概念违犯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禁止奴役），这不能令人信服。其他大部分比较讲理的一般反对者立足于用各种方式分析绩效比的数据。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估计，一项服务计划每人每年的成本约为27000美元。[注]由于每年大约有400万美国人达到18岁，这项全民计划的成本每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批评者们说，我们还得加上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这是由于把年轻人从他们工作的私营部门抽调出来，以及投入更多力量弥补因志愿者离任而中断的工作。他们还希望加上由于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教育推迟1年或更长时间而增加的成本。

这些成本论证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实施一个服务计划时，当然应该尽可能节俭。然而，每个人的成本不一定是27000美元，或者只是接近这个数字。阿斯平研究所[注]（Aspen Institute）发表的一份研究估计，现在全民为国服务计划的成本更可能是每个全职人员16000美元。[注]节俭要求给不同类型的工作支付不同层次的成本费用，使劳动力的供需平衡，仅此而已。它要求允许民间服务团的大量工人留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让住宿费用降至最小。它要求尽可能利用与服务目标一致的现有建筑和项目，最大限度地结合参加者进行选择。最后，对许多参加者来说，这意味着把教育补贴作为一部分工资，但降低或部分免除学生贷款的利息可能比全额的工资更有吸引力。对于那些经检验符合需要的或者以低工资超时服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选择直接保留奖学金。

虽然全民为国服务计划不需要花批评者们所想象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成本，但即使只是一半的费用也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拨款。然而，批评者提出的论据是，它故意混淆总成本与净成本。在这个案例中，从总值到净值必须扣除每年雇用的400万劳工的产出值。若依照这种简单化的总成本论据，没有人能相信小罗斯福政府时期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注]（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和CCC是合格的明智开支项目。如果不考虑收益，艾森豪威尔的高速公路计划也可以被认为是奢侈之举。中国近

几年来用大量资金建设高速铁路、公路和城市的新住宅，也可以被视为浪费而一笔勾销。但真实的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

在一项计划不产出任何经济效益时，净成本就是总成本。所有的全民为国服务项目的有用工作的产出都为零，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肯定会对现在的经济产生直接刺激，以及对未来在提高经济增长方面产生某些收益。职业培训把人们送上工作岗位，而不是送入监狱或纳入救济计划，这也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节约。在全盘计算后，我们这些支持全民为国服务的人看到的是它提供净效益而不是净成本。阿斯平研究所的研究有把握地认为，在公共赞助年轻志愿者项目中的经济效益与成本之比已经接近4：1。[注]它估计，对于涉及老年人的项目的狭义的效益比（只计算纳税人的利益）接近2：1。[注]同一个资料表明，假如这些计划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比值还可以有更大的改善，可能会使全部效益5倍于成本。这是一个支持者的观点，实际上这个比值也许不会如此骄人。我们应当允许对一个假设性项目的预期结果不受客观准确性的制约。我们要坚定表态，忽视经济效益而侈谈成本是一种诡辩。回顾前面几章中关于提高收入的建议，包括取消不产生效益的税收开支和对生产起反作用的信托和资产遗赠，它们能极大地驳倒诡辩者们所鼓吹的总成本一说。

关于如何解决教育问题的简单答案是，全民为国服务不仅是解决美国教育问题的一个明智答案，它也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答案。

美国的教育没有恰当地为这个国家或其绝大多数选民服务。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美国的教育成果令人失望。中产阶层子女从大学入学申请开始就被不公正地筛除，即使他们可以入学，也会背负着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学费。虽然贷款计划对此能有所帮助，但此后的债务负担仍可能压垮他们。不能上大学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以及更多来自经济底层家庭的孩子们在高中毕业时仅学到很少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他们从事未来职业的准备与基础。美国只提供极少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机会，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给它们的青年普遍地提供这种机会。

其实，有许多途径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从全面改善中学教学质量开始——这可以用已确立和证明了的最佳实践来完成。从理论上来讲，虽然高中也许能加强职业培训，但两个难以逾越的潜在障碍迄今拦在路上：资金需求与当地可得的资助之间不匹配，是我们社会的棘手特征；世界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跟踪青年人业绩与我们文化中的人权主题是不相容的。此外，高中教育不能解决上大学会产生的财务负担。

全民为国服务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乍一看并不明显。然而，它对于美国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提供了符合其文化现实的答案。由于它对爱国主义和社会和

谐方面的有益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途径。正确的计划可以通过用为国服务换取上大学所需的经济资助来实现，并为高中毕业后结束学术培训的那些人提供他们缺乏的职业培训。它也以有效的产出形式为其他人，为军队、为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各种社会服务部门提供好处。对于孩子和国家来说，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型。

---

1. 查尔斯·韦斯特（1940—2013）是机械工程学教授，他在1990—2004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期间专心研究教育问题，著有《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全球互联网》（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from World War II to World Wide Web）。——译者注
2. 美国的12年制中小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6年称为“Grade School”或“Primary School”（初级教育）；后6年称为“Secondary School”（中学教育）；中学6年又分为“Junior High”（初中）和“Senior High”（高中）。——译者注
3. 最佳实践是指在各种方法中能产生最佳结果（例如，保证质量，最佳的绩效比或最安全的施工等）的一种方法。在许多行业中都设立了最佳实践标准，经过检验满足标准的行业或产品，被授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证书。——译者注
4. Three entries for China have been omitted from the original OECD listing.If included, and depending on how the three entries are weighted, China would rank at the top — in either first or second place.See OEC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Results from PISA 2012, United States,” http://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US.pdf, accessed July 18, 2015.
5. 州立特许中学是公立中学中持有特许证的中学，它不同于州内其他局部地区的公立中学。——译者注
6. 美国中学的8年级考试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初中毕业考试。——译者注
7. 美国大城市的富裕家庭通常居住在环境和安全性较好的郊区。——译者注
8. 美国的地区公立中学对本学区的居民不收学费。——译者注
9. 美国有不少大学生为了增加社会知识而休学一年（包括在考上大学后先休学一年的中学毕业生），从事社会工作或到世界各地考察。——译者注

10. 学生在9年级毕业后选择上比较轻松的地区公立学校的高中。——译者注

11. OECD, “Indicator C2: How D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s Differ Around the World?,” in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Chart C2.1., “Enrolment Rates at Age 3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2005 and 2012),” http://www.oecd.org/edu/EAG2014-Indicator%20C2%20(eng).pdf, accessed July 18, 2015.

12. “共同核心的国家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是指美国现代史上的大规模教改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1）反对“应试教育”，不能增强学生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教学和考试对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有害的；（2）素质教育应体现在家庭关系和师生关系中；（3）不应把教师当作政府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例如，贫困是影响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教师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译者注

13.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 “Development Process,” http://www.corestandards.org/about-the-standards/development-process/,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14. For data on gross state product, see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road Growth Across States in 2014,” News Release, June 10, 2015,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regional/ gdp_state/gsp_newsrelease.htm, accessed July 18, 2015.For data on state S spending on education, see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2012 Census of Governments: State & Local Finances,” http:// www.census.gov/govs/local/, accessed July 18, 2015.

15.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3, 2013 Annual Survey of School System Finances, June 2015, Table 8, “Per Pupil Amounts for Current Spending of Public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 Systems by State: Fiscal Year 2013,” http://www.census.gov/govs/school/, accessed July 18, 2015.

16. “Rankings & Estimates 2013 - 14: Rankings of the States 2013 and Estimates of School Statistics 2014,” Nea.org, March 2014, https://www.nea .org/assets/docs/NEA-Rankings-and-Estimates-2013 - 2014.pdf, accessed April 12, 2015.

1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3, 2013 Annual Survey of School System Finances, June 2015, Table 18, “Per Pupil Amounts for Current Spending of Public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Enrollment: Fiscal Year 2013,” http://www.census.gov/govs/school/, accessed July 18, 2015.

18. Bruce D.Baker, David G.Sciarra, and Danielle Farrie, Is School Funding Fair? A National Report Card, Fourth Edition Education Law Center, Spring 2015, http://www.schoolfundingfairness.org/ National_Report_ Card_ 2015.pdf, accessed July 18, 2015.

19. Michael Leachman and Chris Mai, “Most States Funding Schools Less Than Before the Recession,”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y 20, 2014, http://www.cbpp.org/research/most-states-funding -schools-less-than-before-the-recession,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20. Ibid.

21. Ibid.

22. The particular category referred to is twenty-five-to-thirty-four-year-old non-students.See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Table A4.4, “Educational Mobility Among Non-Students, by Age Group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2012),” http:// www.oecd.org/edu/Education-at-a-Glance-2014.pdf, accessed July 18, 2015.

23.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llege Enrollment and Work Activity of 2014 High School Graduates,” BLS.gov, April 16, 2015,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hsgec.nr0.htm, accessed July 18, 2015.

24. About 56 percent of first-time degree-seeking students who entered college in fall 2007 had completed a degree within six years.See Doug Shapiro, Afet Dundar, Mary Ziskin, Xin Yuan, and Autumn Harrell, Completing College: A National View of Student Attainment Rates — Fall 2007 Cohort, Signature Report No.6,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5, 2013, http://nscresearch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NSC_Signature_Report_6.pdf, accessed July 18, 2015.

25. 杠铃式的做法指像杠铃的重量在两端那样，把重点放在富裕家庭和贫

困家庭两端，用富裕家庭给自己子女所在的大学捐款来补贴贫困家庭的学生，从而使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在入学率方面吃亏。——译者注

26. 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The Cost of Living Calculator,” https://www.aier.org/cost-living-calculator, accessed January 18, 2015.

27. William J.Baumol, The Cost Disea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This source reports that the increase has been 250 percent since the early 1980s.The text extrapolates backward to estimate change since 1978.An excerpt from the book can be found at http://yalepress.yale .edu/yupbooks/excerpts/Baumol_excerpt.pdf.

28.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Table 320, “Average Undergraduate Tuition and Fees and Room and Board Rates Charged for Full-Time Students in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by Type and Control of Institution: 1964 - 65 Through 2006 - 0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7/tables/dt07_320.asp, accessed April 13, 2015.

29. CollegeBoard, “Average Published Undergraduate Charges by Sector, 2014–15,” CollegeBoard.org, http://trends.collegeboard.org/college - pricing/figures-tables/average-published-undergraduate-charges-sec tor-2014 - 15, accessed January 18, 2015.

30. 31000＋10000＝41000美元是2014—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值的75%，因此那一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值应该是约54700美元，因为54700×0.75＝41000。——译者注

31. The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in 2013 was ＄51,939.See Carmen DeNavas-Walt and Bernadette Proctor,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U.S.Census Bureau, September 2014, http://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4/demo/p60-249.pdf,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32. Columbia University, “FAQs,” Columbia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https://undergrad.admissions.columbia.edu/ask/faq/topic/381, accessed July 21, 2015.

33. Harvard University, “Tuition and Expenses,” Harvard.edu, https://college.harvard.edu/financial-aid/how-aid-works/cost-attendance,

accessed January 18, 2015.

34. 布朗大学在美国东北部的罗德岛，是8所常青藤盟校之一，2014年，它约有7亿美元以奖学金、助学金或贷款的形式资助约50%的学生。——译者注

35. Brown University, “Tuition & Fees,” Brown.edu, http://www.brown.edu/ academics/gradschool/courses-manual/tuition-fees, accessed January S 18, 2015.

36. 常青藤盟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及达特茅斯学院。“常青藤”最早应追溯到1937年的一份《纽约报》，因为其报道了它们校园内的大楼外墙均被常青藤覆盖。——译者注

37. See note 18.

38. Costs rose from about ＄28,500 to about ＄31,200.See CollegeBoard, “Tuition and Fees and Room and Board over Time, 2004 - 05 to 2014 - 15,” CollegeBoard.org, http://trends.collegeboard.org/college-pricing/figures-tables/tuition-fees-room-board-time-2004-05-2014-15, accessed July 19, 2015.

39. Ibid.Costs rose from about ＄7,800 to about ＄9,100 over the six-year period, an increase of about 17 percent.

40. Project on Student Debt, “Student Debt and the Class of 2013,” Institute for College Access & Success, November 2014, 18, http://ticas.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ckfiles/pub/classof2013.pdf, accessed July 20, 2015.

41. Ibid.

42. Outstanding student loan balances rose to nearly ＄1.2 trillion at the end of 2014 from about ＄500 billion in 2006.For 2006 data, see Meta Brown, Andrew Haughwout, Donghoon Lee, Joelle Scally, and Wilbert van der Klaauw, “Measuring Student Debt and Its Performance,” Staff Report No.66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pril 2014, http://www .newyorkfed.org/research/staff_reports/sr668.pdf, accessed July 21, 2015.For 2014 data, see “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http://www.newyorkfed

.org/householdcredit/2014-q4/data/pdf/HHDC_2014Q4.pdf, accessed July 21, 2015.

43. “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In terms of total household debt, student loans were 10 percent, auto loans were 8 percent, and credit card loans were 6 percent.

44.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Youth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July 2014,” Bls.gov, August 19, 2014, http:// www.bls.gov/opub/ted/2014/ted_20140819.htm, accessed July 21, 2015;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 Bls.gov, July 2, 2015, http:// www.bls.gov/news.release/ empsit.nr0.htm, accessed July 21, 2015; and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Databases, Tables & Calculators by Subject,”S Bls.org,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 LNU04000000?years_option=all_years& periods_option=specific_periods&periods=Annual+Data,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45.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ederal Student Aid,” Studentaid .ed.gov, https://studentaid.ed.gov/types/loans/interest-rates, accessed July 21, 2015.

46. 美国人通常把国会的两党形象地称为国会走廊的两侧。——译者注

47. Marco Rubio, “Rubio Comments on Obama's Student Loan Announcement,” Rubio.Senate.gov, http://www.rubio.senate.gov/public/ index.cfm/press-releases?ID=1eb3a4c8-64cd-41b2-aff8-d0669234 a159,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48. 增值指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比一般职工高，这相当于花钱（即投资于）上大学得到的回报。——译者注

49. 彭博是Bloomberg的音译。迈克尔·布隆伯格是纽约的富豪，他的彭博资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财经资讯企业，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办事处，《彭博商业周刊》是国际商界必读的著名刊物。——译者注

50. Louis Lavelle, “College ROI: What We Found,” Bloomberg BusinessWeek, April 9, 2012, http://www.businessweek.com/ articles/2012-04-09/ college-roi-what-we-found,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51. Ibid.

52. “子宫彩票”是指有富裕的母亲，即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译者注

53. 9年级学生即初中毕业生。——译者注

54. “Boston's Education Pipeline: A Report Card,” Boston Indicators Project, 104, http://www.bostonindicators. org/~/media/Files/IndicatorsReports/Reports/Indicator%20Reports/Education%20Pipeline.pdf,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5. Melissa Roderick, Jenny Nagaoka, and Elaine Allensworth, “From High School to the Future: A First Look at Chicago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College Enrollment, College Preparation, and Graduation from FourYear Colleges, Report Highligh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sortium on Chicago School Research, April 2006, http://ccsr.uchicago.edu/downloads/p82mini.pdf,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56. 副学士学位是毕业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相当于大专）时被授予的学位。——译者注

57. William C.Symonds, Robert B.Schwartz, and Ronald Ferguson, Pathways to Prosperity: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Preparing You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port issued by the Pathways to Prosperity Project,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February 2011, 10.

58. Robert Reich, “Back to College, the Only Gateway to the Middle Class,” Robert Reich's blog, http://robertreich.org/post/96377869820, accessed January 22, 2015.

59. 这里指给实习生一定的报酬，不从实习生身上取得盈利的实习单位。——译者注

60. Eoghan Harris, “German-Style Apprenticeship Is What Our Youth Need,” Independent, http://www.independent.ie/opinion/columnists/eoghan-harris/germanstyle-apprenticeship-system-is-what-our-youth -need-29507676.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61. Ibid.

62. 芬兰的9年制综合中学即从小学到初中，它规定孩子们从7岁起免学费和伙食费，直至16岁初中毕业。——译者注

63. 在资本主义社会，投入资助就有控制权。一个地区接受外来资助，就会受到外来的控制。——译者注

64. 美国的自由派把跟踪和关心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认为是违反人权的监控。——译者注

65. 同质性是指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等方面比较单纯；美国是移民的大熔炉，缺乏同质性。——译者注

66. 全民为国服务的想法最初是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查尔斯·兰格（Charles Rangle）在2003年提出的，他建议中学生（每年50小时）和大学生（每年100小时）必须参加为国服务志愿活动，从事清扫环境、照顾老年人、重建基础设施等工作。这个想法未能获得国会通过。——译者注

67. William Jame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1910), Constitution.org, http://www.constitution.org/wj/meow.htm,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68. 平民保育团是小罗斯福在1933就任美国总统时提出的“新政”（New Deal）的一部分，目的是解救经济大萧条时无技术的失业青年劳工。每年有30万名17—28岁的青年人参加该团队，从事开发和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团队为成员提供衣、食、住，还有每人每月30美元的工资（相当于2015年的547美元），其中25美元必须寄回家。该团队共实行了9年，在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止。——译者注

69. Joseph M.Speakman, “Into the Woods: The First Year of the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Prologue Magazine 38, no.3 (Fall 2006),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6/fall/ccc.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70. 和平队是肯尼迪发起组织的，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其他国家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和美国人民及其多元化社会，也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其他国家。中美关系解冻后，和平队被允许进入中国。——译者注

71. Peace Corps, “1960's,” Peacecorps.gov, http://www.peacecorps.gov/about/history/decades/1960/,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72. 就业团队由政府的劳工部负责，它通过对16—28岁无业者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培训，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对社会的满意度。——译者注

73. 启蒙计划主要是关注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实施全面的入学前早教。——译者注

74. Lyndon B.Johnson, “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February 22, 1965, http://www. 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7438.

75. 布朗（1975—1983）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在1976年、1980年和1992年3次竞选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资格，都以失败告终；他在2011年73岁时又东山再起，当选为加州州长，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州长，所以本书作者说他的加州CCC“就像布朗本人一样”，存活了几十年。——译者注

76. 比尔·克林顿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是阿肯色州的州长。——译者注

77. 美国志愿队来自1990年克林顿说服国会通过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这个法案在1993年被修改为《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成立了负责实施此法案的信托公司，以增加服务机会和奖励参加职业教育的人。——译者注

78. Harris Wofford, “The Politics of Service: How a Nation Got Behind AmeriCorps,” Brookings, Fall 200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2/09/fall-civilsociety-wofford,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79. America's Promise Alliance, http://www.americaspromise.org/our -history,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80. “USA Freedom Corp: Strengthening Service to Meet Community Needs,” White House, Bush Record,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 .archives.gov/infocus/bushrecord/factsheets/needs.html,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81. 募兵制的参军者大部分是贫穷和失业的青年，富裕人家及有高知识和高就业率的青年不会为了挣军饷而参军。全民为国服务计划是自愿选择参加哪一类服务的，富裕青年自然也不会选择去工资最高但最艰苦的军队。——译者注

82.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2013 Report Card for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Overview: Executive Summary,” Infrastructurereport card.org, http://www.infrastructurereportcard.org/a/#p/overview/executive-summary,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83.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2013 Report Card for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reportcard.org, http://infrastructure reportcard.org/a/#p/home, accessed July 21, 2015.

84. 这位智者是巴菲特，他这样告诫的意思是，理发师总是想要挣你的理发费的，所以答复一定是“该理发了”。土木建筑师们总是倾向于夸大地说，到处都“该修建了”。——译者注

85. U.S.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The Quotable Interstate," Fhwa.dot.gov, http://www.fhwa.dot.gov/interstate/quotable.cfm, accessed April 12, 2015.

86. “资深团队”召集55岁以上有职业专长和技艺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孩子和年轻人提供顾问、咨询、经验和培训，并成为他们的伙伴。这个计划是在肯尼迪总统时代提出的，迄今已有27万人参加。——译者注

87. “为美国学习和服务”是根据1990年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设立的“为美国服务”计划；在这个法案于1993年被修改为《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时，这个计划改名为“为美国学习和服务”。它的预算主要以助学金的方式拨给12年制的中小学、高等学校及社区组织。2011年，国会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完全取消了这个历时21年之久的项目。——译者注

88. “为美国而教”是由温迪·科普（Wendy Kopp），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在1989年创办的。她的毕业论文启发她提出，顶级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先不就业，而是去贫困落后地区的中、小学任教两年，给那里的学生带来希望并改变他们的一生。她四处奔走，通过游说、筹款、联络大学毕业生及支教对象等，居然在当年就筹得250万美元并征召了500名大学毕业生，从1990年开始实施名为“为美国而教”的计划。——译者注

89. Conor Friedersdorf, "The Case Against Universal National Service," The Atlantic, June 26, 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3/06/the-case-against-universal-national-service/277230/,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90. Bruce Chapman, "A Bad Idea Whose Time Is Past," Brookings, Fall 200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2/09/fall-civil society-chapman,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91. 加里·贝克尔（1931—2014）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专注于经济行为的动机，而不是广泛的经济趋势。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力资本》。——译者注

92. 查德·波斯纳是美国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曾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著有《法律的经济分析》《正义的经济学》《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实用主义和民主》等。——译者注

93. Richard A.Posner, “Universal National Service,” Becker-Posner blog, S September 23, 2007, http://www.becker-posner-blog.com/2007/09/ R universal-national-service--posner.html, accessed January 23, 2015.

94. Ibid.

95. 阿斯平研究所，全称是阿斯平人文研究所，1950年成立于华盛顿，资金来自卡内基基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福特基金、盖茨基金等的资助和私人捐献。它的研究项目涵盖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及社会和教育问题。——译者注

96. The social cost of about 125,000 members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2 billion, or around ＄16,000 per member.See Clive Belfield, “The Economic Value of National Service,” Franklin Project of the Aspen Institute, September 2013, 1.

97. 公共事业振兴署（WPA）成立于1935年，是小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以解决当时大规模的失业问题。1935—1943年，WPA大约为800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1943年后，WPA撤销。——译者注

98. Ibid.

99. Ibid.

100.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Aid,” Harvard.edu, https://college.harvard.edu/financial-aid, accessed January 18, 2015.

101. Brown University, “Facts About Financial Aid,” Brown.edu, http://www .brown.edu/about/facts/financial-aid, accessed January 18, 2015.

第四章　医疗保健

美国每年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高于同类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是我们的综合健康状况并未因此而更好。找出我们比同类国家多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远比防止过度花钱容易。只有消除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建立所谓的单一付款者系统，才能实现全面的节约，虽然在这一系统中单一监管者机制比单一付款者机制更为重要。

在发达国家中，医疗保健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哪个国家最大呢？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我将会惊奇。答案当然是美国，而且比其他国家大很多。事实上，我敢打赌，对此感兴趣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核心内情注。令人气馁的是，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远多于其他发达国家，而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取得的成效却不如其中的大多数国家。这项超大规模的开支通过自付医疗费、医疗保险费和纳税等形式直接来自你的钱包。这项按照任何标准均超过同类发达国家的开支是每人每年数千美元，你应认真思考一下，你是否确实需要支付这笔钱。这只是简单说明而已，下面将列举一些事实来讨论为什么它们不该如此。

一份美国医学研究院注（Institute of Medicine）的报告根据一些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一些同类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在健康领域，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在以下9个方面较差：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低体重，受伤和杀人事件，未成年少女怀孕者和性传染病患者、HIV携带者和艾滋病（AIDS）注患者、吸毒致死者、肥胖症和糖尿病患者、心脏病患者、慢性肺病患者及残疾人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从另一个角度，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出生时的预期健康生活年龄注及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衡量，得出类似的结论。美国人在上述各个方面都不及其他发达国家，无论他们在哪个州。注英联邦基金会注最近根据医疗保健系统的质量和可获得医疗保健的程度公布了11个主要经济体的排行榜，美国排在第11位。注

另一个有用的比较是参照与我们同类的邻国加拿大的主要统计数据。加拿大男性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80岁，比美国男性多4岁。女性的预期寿命在这两个国家都稍长一些，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变。关于"预期健康生活年龄"的统计，结论也是类似的。美国的新生婴儿预期有69年的

健康生活，与性别无关；加拿大是72年。因此，无论花费多少，我们都不应该对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沾沾自喜。尽管外界不断吹捧，美国的医疗保健也不会出现在“世界最佳”的成绩单上。

“嗨，稍等一分钟，”有的人会说，“相对劣势不在于我们的医疗保健，而在于遗传因素、人口组成或者生活方式选择存在差别”。基因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尚不太清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的基因在整体上不可能劣于其他所有国家公民的基因。人口组成情况的资料较容易获得。我听到过一个基于人口组成的谬论：美国有比别的国家更老龄化的居民。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可能要比我们的同类国家花更多的钱而且有更高的死亡率，但是我们的预期寿命不应该更差。更重要的驳斥是，我们并不比与我们同类的发达国家更老龄化。我们国家的年龄中值约为37岁，排在所有国家的第二个四分位区间。年龄中值接近45岁的日本有更多的老龄人口，而且它的医疗保健成效也位于发达国家前列。加拿大也有老龄化的居民，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

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也许可归因于美国有较多的贫困人口，虽然占美国居民10%的最低收入者与其他同类国家位于收入底部10%的居民有差不多的收入。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现在正在逐渐减少的无医保的美国公民；在英联邦基金会进行抽样调查的时期内，他们可能比那些生活在有全民医保的国家居民更不愿意寻求医保。这几乎肯定会使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公布的排行榜中的得分受到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即使有某些优势的美国人（白人、有医保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在健康方面仍比其他国家的类似人群要差。也许，是因为我们经常吃得过多，或常常吸烟酗酒，或者比其他国家的人锻炼得少；但是，这些因素在取得的数据中并不显著。如果你去国外旅游，你可能会看到其他国家的吸烟和饮酒率更高，而且在美国健身迷似乎更占优势。我不敢肯定基因、人口组成或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形成上述结论方面有多少说服力。然而可以断定，如果我们有某些不良因素，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也未能克服。

现在让我们探讨费用方面的问题。美国现在每年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约为2.9万亿美元，占GDP的18%。除美国之外，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超过GDP的11%，欧洲平均不到10%。更糟的是，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增长率多年来超过通货膨胀率。在1990—2008年期间，其平均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奥巴马总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2009年说，“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最大威胁是火箭般上升的医疗保健费用，其增长甚至无止境”。在西欧，医院床位一个晚上的平均费用低于1000美元；而在美国，医院床位费每晚超过4200美

元，你可能宁愿不住。

德勤咨询公司（Deloitte Consulting）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我们采用的一些统计方法低估了费用。这些统计通常不包括美国人在各种替代医学和私人医生上的慷慨花费。这一费用同样不包括：为改善健康而在减肥、饮食保健和健身项目等方面的花费，因看门诊、购买营养补充品或订阅健康期刊方面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包括因请专业护理人员照顾体弱者和老年人而支付的监督护理费用。德勤咨询公司认为，在政府的“全国医疗保健支出账户（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Accounts）”中报告的每1美元对应着20美分的这些隐形费用。虽然下面将使用的数据与德勤咨询公司的报告不吻合，但是我确实没有理由怀疑德勤咨询公司的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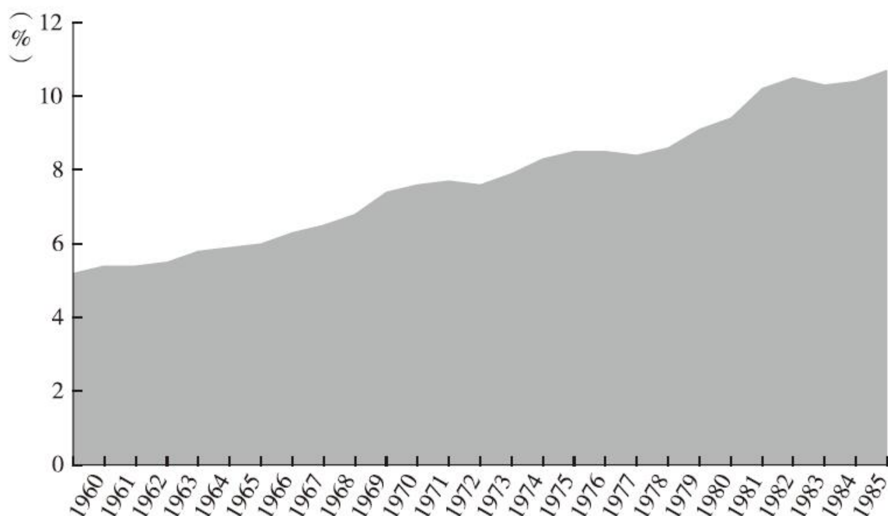


图4.1　美国医疗保健费用占GNP的比例（%）

这些几乎难以置信的费用，现在似乎令人不解地被许多医疗保健政策分析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似乎它们已经是“世界最佳”的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个特色。这完全不是实情。图4.1显示了1960—1986年美国医疗保健费用占GNP的比例。在图4.1中，1985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约占GNP的10%，这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际标准。1950年，这一比例约为4%。你可能愿意以下面的方式了解目前的支出差距：在我们的GNP达16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医疗保健的总支出约为3万亿美元，目前比1985年多

花的8个百分点，即约1.3万亿美元的花费是其他国家不花费的[注]。这是年度的数据。请想想，如果停止过分的花费而把节余的钱用于其他的个人和公共用途，那么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笔数目巨大的钱本来可用于增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按这个比例，每两年的节余就能支付一场战争的费用；当然，我不支持战争。据估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开战以来，美国共计支出了约5万亿美元。[注]或者，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修复美国的基础设施，可以重建学校和桥梁。另外，由于医疗保健费用中约一半是以公民纳税的形式支付，我们可以实施有史以来最大的减税。[注]

1万亿美元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大数额。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可以给人带来直观感受：1万亿张1美元的纸币首尾相接可以从地球连到太阳再回到半路[注]。一位朋友建议另一种量度。根据最近对纽约市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估计，假设有一位拥有1万亿美元的投资者能不靠房贷购买这个“大苹果”[注]里的每一栋非免税建筑，还能剩下100多亿美元用于重新适当地装修它们。[注]这就是我建议我们不应花费的数额。而且我必须重申，这是每一年的金额。

把医疗保健的全部支出，而不仅是超额花费，用直接的数字表达可能有助于明白这里面的实际情况。归根结底，无论是通过纳税或支付保险费的方式，你我都在共同支付美国全部的医疗保健费。目前，美国医疗保健的人均开支每年约9000美元，或者说是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约2.3万美元。[注]你可以把9000美元乘以你自己家庭的人数，得出你家每年大约花多少。我能找到的人均支出第二高的国家是6000美元的挪威。[注]挪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其医疗保健支出占收入之比几乎是我们的一半，所以那里“花钱的痛苦”减少一半。[注]日本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约为我们的一半。[注]图4.2直观地描述了这些情况。[注]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最高，这可不好。美国人每年直接、间接花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钱可能多于花在其他任一方面的钱。美国人每年在住房方面的开支约为1.8万美元，但这是每个家庭的支出，所以它少于每个家庭的医疗保健总费用。每年在交通方面的开支约为9000美元，这也是每个家庭的费用。每个家庭的食品费用接近7000美元。[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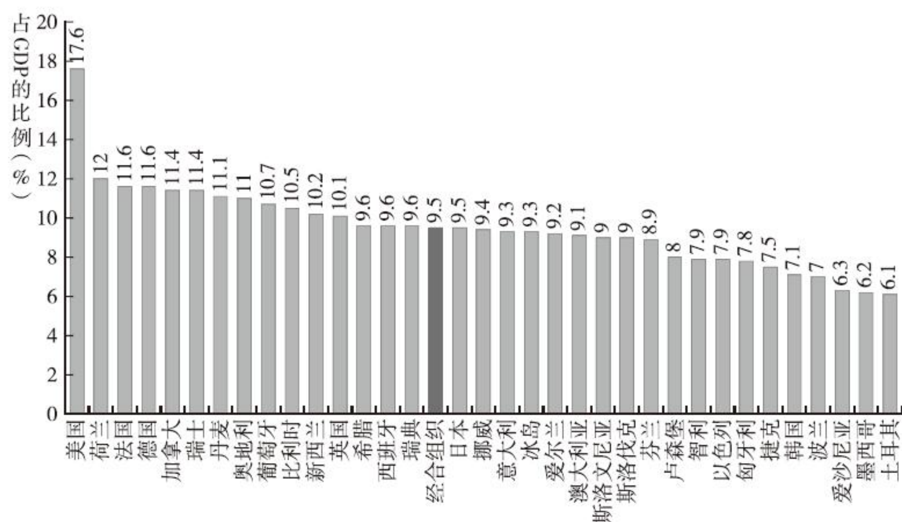


图4.2　2010年各国医疗保健总支出占GDP的比例

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组成几乎没什么神秘之处。5类费用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总额。许多分析家找到的第一类超支费用是医生和护士的收入。

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出现高额支出的主要驱动力是众所周知的。这一项超大规模的支出可以像“苹果”那样被任意切分，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费用超过其他发达国家。下面我所列出的5类费用清单包括：医疗部门人员工资，医疗技术和医疗检测费用，处方药费用，行政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临终护理费用。

医疗部门人员工资是一个敏感话题。我知道，几乎没有哪个医生或护士不抱怨工资太低。作为一个深深钦佩这个艰难行业的人（它比我自己的行业更需要牺牲和奉献精神），我不喜欢同医护工作者争论，何况他们大多数人的收入少于企业的高层主管。不过，在这项分析中更好的方式是不用与企业家做比较，而是与其他国家的医生进行对比。确认一些事实比解释事实更容易。美国医生的收入无疑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高，但是这不像苹果与苹果的比较。常见的区别是，在美国，医生中占较高比例的是专科医生。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全科医生比，专科医生要花费他们更多的青年时光用于培训，这是高工资的一个合理依据。如果我是一名专科医生，我也会期望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技术能得到回报；如果有人对我有权得到非常好的工资提出质疑，我可能会暴怒。然而，本书不打算为医疗系统的高收入而指责任何人，而只是对这个系统提出问题。所以合理的疑问是：我们的社会从比其他国家付更高工资给医生（包括专

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中得到了什么？

在美国，一个初级护理主治医生的年均收入是22.5万美元。专科医生的平均收入超过40万美元/年，这是美国所有重要职业中最高的平均工资，这对于我的职业是不可想象的。[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挪威、瑞典、葡萄牙或意大利的医生拿回家的钱平均少于10万美元/年。[注]在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医生的报酬平均接近15万美元/年。[注]我们的全科医生挣得比其他国家的全科医生多，我们的专科医生挣得比其他国家的专科医生多。此外，美国的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的收入之比约为3：2，这使得他们的收入平均值升高了；在任何地方，全科医生的人数比专科医生的人数多。[注]专科医生比家庭医生更难见到，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的人均就医次数是美国的1.5倍。[注]全科医生在不同类型的医生组合中占多数，这可能有利于社会大众；不过，我这样说并不十分肯定。当然，对于即将进入医学院的学生，激励他的是成为专科医生。

通常，激励导致结果。当激励影响到选择高级体面的职业生涯，因而产生对社会不是最佳的结果时，恰当的公众反应是冷静地评估能改变这种选择的政策。然而，在系统的激励与人类的本性互相作用而鼓励欺诈的那些地方，愤怒和要求更强的执法是比较多的反应。阿杜尔·嘉旺德（Atul Gawande），外科医生兼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在《纽约客》刊载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他举例揭露了某些医生的获利之路：不是为专业付出心血，而是在玩弄这个系统。[注]他的文章专注于得克萨斯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一个贫穷小镇——麦卡伦（McAllen）。2006年那里每个病人的平均医疗保健支出是1.5万美元，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也是埃尔帕索（El Paso）——另一个有类似人口结构的得克萨斯州——墨西哥边境城市——的两倍。这个支出差别是相当近期的，几乎都发生在此前的15年内。嘉旺德写道：

在2001—2005年，老年医保病人在麦卡伦比在埃尔帕索得到几乎多50%的专科诊断，而且在6个月内有2/3的病人看了10个以上的专家。2005年和2006年，麦卡伦的病人所做的腹部超声波检查比埃尔帕索多20%，骨密度检查多30%、超声波心动负荷测试多60%、为诊断腕管综合征而做的神经传导检查多20%、为诊断前列腺症状而做的尿流量检查多550%。此外，他们在胆囊手术、膝关节置换、乳腺或组织检查和膀胱镜检查方面多1/5—2/3。他们在安置起搏器、植入式除颤器、接受心脏搭桥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和冠状动脉支架方面是埃尔帕索居民的2—3倍。老年医疗保险

的费用是家庭护士的5倍。麦卡伦居民医疗费用超高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全面的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当然就使医务人员有较高的收入。麦卡伦发生的情况肯定是极端的和非典型的；嘉旺德在最近更新过的这篇文章中指出，许多过度医疗现在已得到遏制。[注]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并不显眼的麦卡伦现象几乎无处不在。这只是人的本性。医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有各种类型的道德和天赋借口可为自我辩解。在激励机制允许借助不道德地使用过度医疗服务策略致富的地方，少数人滥用这个“批发式”的结构，更多的人只是稍微谋一点儿私利而已。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不自觉地做出有害的行为。人的头脑有杰出的能耐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路线合理化，特别是在为一个病人选择正确的疗程和治疗方法时，按医生的道德条款[注]可以合法地使决策的合理性含糊不清。

你可以设想到处——甚至在比居民整体有更理想主义和更高道德标准的职业中——都有类似于麦卡伦的行为。对于有“高规格”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的病人，医生们有较大的自由度把几种可能的诊断中较严重的一种写入记录，从而抬高他们自己的收费账单。在获得许可的地方，他们能利用昂贵的网外供应商[注]针对治疗过程提供帮助和咨询。他们能主动选择去治疗另一个医生正在观察和照顾的病人。他们能任意地或保守地设计一个后续访问的时间表。几乎每一个与我谈论过这个问题的医生都确认，对于愿意请他们治疗的人，拐弯抹角地绕过价格控制是较容易的。在主动积极治疗中，这些拐弯抹角机会的可获得性对于骗子和对于真诚的信徒是相同的。

医疗保健市场特别易受这种方式的损害，因为这是一个不以竞争效率为前提的市场。医疗保健的消费者几乎从来没有获得过充分的价格和质量信息，或者是技巧和自由度，以便用比较简单的典型市场方式去选择医疗保健提供者。我们在看医生时几乎从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细节，也不大知道通过其他提供医疗咨询和治疗服务的人能得到怎样的不同选择，更不大知道我们做出的选择会给出什么样的数据结果及病情的控制概率。最重要的是，当健康受到威胁时，我们就会感到乌云密布。这时，我们中很少有人能与我们的生命所依赖的医务人员进行激烈的，即使是合理的，讨价还价。我们以一种十分不同于对待汽车经销商或对待像我自己的汽车保险公司那样的方式，去信任和依赖我们的医生和当地的医院。事情就是这样，也必然是这样，它也不大会改变。而且，除上述这些因素外，我们很少像在大多数其他商场里那样为获得的商品和服务而从自己的口袋中掏钱。

希望能够缩减医疗费用的某些人建议，把一些工作转交给护士和医生的助手去做。这些业务人员的培训费用比医生低，所以他们的收费也较低，而且他们肯定能比现在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我推测，这种工作量的转移可

能是未来的趋势。随着医疗信息的电子化及计算机诊断工具的更好运用，似乎将不可避免地鼓励更多人依靠护士和辅助性医务人员。现在还不值得冒险地猜测这到底能影响多少总费用，但是，有方向性地扩大医疗服务供应面应该是有帮助的。

此外，还可以要求更深远的改革。如果医生拿的是定额工资，而不是按他提供的服务成比例地得到收入，就可以减少对于过度治疗的激励，无论过度治疗是出于恶意或同情。许多地方已经在这样做，其数量正在增长。几年前，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注]直率地说："每个人知道那样做（医生拿定额工资）是正确的模式，问题是：你如何从这里走到那里？"[注]克利夫兰医院、梅奥医院、凯撒医疗集团[注]都雇用拿固定工资的医生，而且效果不差。[注]许多维护健康的组织都这样做。如果有足够的医疗单位以这种方式运营，我预期美国与其同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而且肯定将减少给予骗子们和过分热心的医生们唾手可得的果实。

然而在我们为高收入而狠狠打击医生之前，让我提醒你，这只是使我们的医疗保健费用超过国际标准的因素之一，而且它不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所以，不要把削减医生的收入当作改善过度付费状况的唯一途径。美国约有100万名医生，包括有医学博士学位和其他被承认的医学证书的持有者。[注]把这个数字乘以我们认为他们的收入超过外国同类人收入的最大值，我们可以想象费用对比的超过额达到1000亿美元。这里没有考虑这个差别是否来自更高质量的职业技能或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这个总额小于GNP的1%，接近0.5%。但事实上，美国比它的一些同类国家花费多十几倍。所以，关于医生高收入方面还有工作要做，即有可能用更好的激励手段为你节省开支，但是这里没有神奇的一揽子节俭措施。

至此为止，我还没有提到护士。这里有一个理由。你可能像我一样作为一个初学者而询问，护士的收入是否可能是美国医疗保健支出超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呢？OECD的一份研究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护士的收入仅仅略高于其国外同行。与要求达到研究生水平的其他职业人员收入相比，美国护士的收入约等于OECD抽样国家的平均值。[注]另一份资料显示，与许多国家相比，美国护士收入排名更靠后；而且它还指出，俄罗斯护士的收入只有美国护士的约1/8。[注]为了俄罗斯那些医疗保健工作者和他们的病人，我希望最后的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过度的医疗检查是导致医疗保健费用过高的一个因素。推动"过度检查"的是医院之间错误的竞争，它导致每一家医院都争相购买和提供最先进的技术，而不考虑正常的供需关系。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为

应对诉讼而采取的“防御性医疗”。

技术能救人命，恰当地使用技术无疑能节约费用，就像它在任何经济领域那样。然而，如果毫无限制地使用它，它也许会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对于医疗检查技术，它尤其是这样。这是一个花钱的源头，专家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不像对于医生的收入那样有分歧：消除过分使用医疗检查技术能节省费用。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未能找到一份可靠的资料估计美国每年花费在医疗检查方面的总额，但根据经验猜测每年约为5000亿美元。一份商业杂志在2009年报道，诊断费用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10%，但是其他资料给出的估计高得多。注这个领域中的学术论文作家们都使用的大致估计数据是，检查和诊断费用总额的1/3是被多余浪费的。注我们能说的是，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鼓励了大量不必要的检查费用。

美国的内科医学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编纂了25个医学专科学会的报告，认为有130种不同的常用医学扫描、检查和治疗应该被减少。这些学会在一个它们称之为“聪明地选择”的运动中联合发布了这些检查的清单，敦促病人质疑做某些检查的建议。注现在约有8000种不同的检查。注如果我们用这些检查得出一个病人有全部病症概率非零的结果，我们将使医疗保健业破产。最新的预算大克星是基因检查，冷泉港实验室的朋友告诉我，这种检查现在刚开始为医院提供有用的结果。然而一份医学杂志估计，分子和基因检查将很快占用全部诊断费的1/3。注

我个人最近的经历加深了我对医疗检查领域不正常现象的认识。我在刚过60岁时发现我的听觉在高频范围内有些小问题。我想我必须对此做一个常规的听力检查，这种检查要求你在听到测试的哔哔声时竖起一个手指。这个测试确认了我已知道的听觉问题，不过增加了量化数据。约在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为我做测试的医院的来信，建议我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测（MRI）。理由是我的两耳的不一样结果，最好扫描一下是否有一种稀有的内耳囊肿。许多人可能会立刻去做这个检查，但是考虑到我在医疗保健方面开支过多，我决定先做一些调查研究。

我的学术培训的一个主要部分涉及使用一种被称为贝叶斯统计注的方法，我很相信它。我不打算在此解释统计学理论，只想说明它是用于确定MRI是否有必要的一种理想的方法。这个统计方法符合直觉的逻辑。这种囊肿在居民中越是少见，它在任何个人的耳中被发现的概率就越小，这与检测的显示数据无关。MRI只是显示其偏离正常的统计结果。我的两耳不对称度检测完全没有超出正常范围，被怀疑有潜伏期囊肿是极其不寻常的

（即使它存在，它也不是特别危险）。运用贝叶斯统计方法进行概率计算，得出通过MRI发现囊肿的可能性是0.00003，类似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无视交通规则大摇大摆地行走而被撞死的概率，这是我的妻子预言我最终离她而去的方式。我拒绝这个检测。

这个听力缺陷的故事提供了一些教益。一个现成的教益是，病人会被轻易地说服接受做昂贵检测的建议。在此案例中，未受过统计学培训的所有人，除了天生的怀疑论者，都会去做那个MRI。公布的MRI价格很不相同，但是有资料报道，美国MRI的平均费用在1000—2500美元之间，其中可能不包括附加的医生费用。注对于我的案例，你或者你们之中与我有同样医保的其他人可能帮助我付了这笔钱。我难以指责那些接受医生建议的人，病人通常偏向于过度的检查而不是不足的检查。然而，更大的教训是与医院鼓励各种检查的动机有关。医院已经为MRI设备付了钱，这使一切求诊的人不得不帮助它收回成本。它能收回其成本的唯一办法是使用这台设备，尽可能满负荷运作。这家医院完全没有以此赚钱的动机。这是一家很好的医院，波士顿应该为有这家医院而高兴。把我的案例乘以100万倍，这个国家就有了你不得不为之付钱的过度消费问题。很明显的是，在美国医疗保健市场，医院之间的竞争不像任何奇妙的亚当·斯密式竞争那样受成本的有效制约。在这里，竞争往往意味着取得最先进的技术，并在有可疑病症时将其用于通常没有专业知识、没有勇气或没有经济动机去质疑专家建议的病人。

在这场谁做最多的医疗检查的赛跑中，美国无疑是领跑者。它在使用内科医学理事会列举的全部130种检测和扫描中可能是顶级的或接近于顶级；MRI属于容易得到最佳数据的一种检测。在一份2014年的研究中显示，在美国，每1000个居民每年做105次MRI。注西班牙的数量是65次。根据更典型的第一世界统计，法国是82次，加拿大只有54次。如果美国确实每年做3000万次MRI，每次的费用是2500美元，则每年花掉750亿美元。注这还只是过度使用的130种检测和扫描中的一种。我可能过于频繁地做PSA检测（为预防前列腺癌），我承认这是由于为一位因这个病而过早逝世的好朋友做抬棺者而引起的情绪反应。我不能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别的人。正如《科学的美国人》杂志报道的一位专家说过，“许多扫描检测就像撒网捕鱼，它们的产量很低”。注

达特茅斯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冷泉港为我们一小队人提供了反对过度检测的新观点。他说，检测不仅非常昂贵，而且往往对病人的害处多于益处。注每次医疗检测都要标定从假阴性到假阳性的衡量特征。有病而没有被检测出来的假阴性，被认为是对病人还有医生或医院的极大威胁。对严重

病症的漏诊会导致病人的健康危机，同时产生对医疗人员的诉讼。假阳性被检测设备的设计者和使用者认为是小得多的威胁，虽然会导致不必要的担心或有潜在危险的过度治疗。但是，医院仍倾向于把检测标定到产生较多的大多数人难以明了的假阳性[注]。

随着大量的检测并要使假阴性最少化，医务人员越来越倾向于把较低的阈值定义为有病。例如，本来是正常的血压，现在却被定为需治疗的高血压。按照美国心脏病学会[注]（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建议，舒张压低于120曾经是正常的，现在是80。收缩压的阈值过去是160，现在是120。[注]结果是，13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昂贵的高血压治疗。胆固醇和糖尿病的阈值也降低了，结果也是治疗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但并无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对病人有益。一般性的体内肿块被确定为癌症或前期癌症。由于许多可疑的情况从未发展成为真正的癌症，医学界却认为它发现和治愈了大量癌症，而病人们事实上并未遭受它们之害。你现在时而读到的治愈率和存活率数据，反映的必然是不可否认的真正医疗成就与对从未发生过的问题进行治疗的无法分清的混合。但这一现状通常导致越来越多的检测。即使从这些检测中可以得益，也实在难以看出何处是其止境。

某些医生提出，过度检查只是针对过度的法律诉讼系统的自然保护性反应[注]。这个观点值得同情。越来越多的对医生的诉讼案将引起昂贵的保护性应对。在我担任马萨诸塞州保险业总监及该州的医疗保健管理人之一的时候，我就曾质疑防御性医疗和侵权系统的成本，在支付了医疗和法律保险费之后，有一多半的钱用于支付原告的律师、应急处理和保险公司，到不了病人手中。我曾建议州立法机构更改关于可起诉的过失的定义。在现实中，往往只是由于不幸或悲惨的结果引起法官对病人或其家属的同情而判定过失罪。我的建议是鼓励扩大直接保险以覆盖大多数不良后果，而不必要诉诸法庭；医疗事故的赔偿只限于经仔细断定的严重过失。对于我的建议，唯一的反应只是《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审判官在读我的建议，并对他的同事说，“我想我将要生病了”。

尽管如此，改变玩忽职守法还是有意义的。你为了防御性医疗及其导致的过多检测和治疗支付的钱远远超过你应该支付的。同时，你还得再为医疗事故保险和侵权诉讼支付直接费用。即使你是不幸的受害者，你所得到的也会很少。《美国医疗协会杂志》（*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发表的一篇研究估计，在所有的检查和治疗中，至少有28%是防御性的，13%的费用是为了满足防御性的动机。[注]

众所周知，处方药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贵。导致美国人民医疗费用超

高，有部分原因是许多病人的非理性偏好，部分又是大医药公司的行为所致。

全国医疗保健账单中有约10%是源于处方药。[注]这里无须怀疑它们的重要性而去质疑它们的数量和费用，但很容易找到滥用药物的事例，尤其是在老年人之中。开处方药的动因往往打破了医生与病人之间通常应有的平衡：在检查和治疗方面，往往以医生的意见为主；在开处方药方面，医生却往往受病人的指引，而病人很少是有医学知识的。当一个病人请求一位医生做一个重要的手术，医生认为不必要或不明智时，医生的医德、正派和良知使其不能照办。但是在开处方药时，由于医疗风险和费用低得多，病人的要求常常可以无理由地被满足。几年前，我妻子的老姑母，年事已高，显得越来越糊涂。她的家人发现她每天至少服用12种处方药。随后，家人请来一位有责任心的医生进行咨询，她把药物减为两种，我妻子姑母的状况立刻就改善了。我不知道全部细节，但是我很了解这位姑母，我确信她曾坚持服用的那些药是几个医生所开的，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掌握全面情况。

药价也是一个问题。药价像其他的医疗服务一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处方药市场不适合采取竞争模式。此外，专利法更多地保护生产者，并鼓励研发，而不是限制系统的成本。许多人认为过分保护专利导致药价定得过高，以致只有第三方付钱，病人才能用得起这些药。专利法的权利平衡很难弄清楚，但是很容易发现专利保护提供了巨大商业利润的事例。我服用的降胆固醇药立普托（Lipitor）在专利保护到期后降价85%。在此之前，立普托在它的产品生命周期内的销售额总计超过1400亿美元，使它成为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药。[注]毫不奇怪的是，医药公司正在为争取更长的专利保护期并为有权在专利发布前排除其他公司挑战其专利而奋斗和游说。

非营利性组织无国界医生[注]（Doctors Without Boarders）曾指出，“假如制药公司得以参加国际谈判，它们的建议将使普通的竞争者极难进入市场，保持药价高企而使公众买不起，从而对公众的健康造成摧毁性的后果”。[注]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在2012年批准的12种治癌药物中，有11种药物的定价使每个患者每年的用药支出超过10万美元。[注]在过去的10年间，抗癌药价格平均提高了一倍。[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肿瘤学家已公开抗议，但无济于事。制药业巨头们被指责在使用一个诡计，即在一个药物的专利保护即将到期时将其撤出市场，用一种新的“改进的”品种代替它，从而开始重新计算保护期。这个策略的反对者们的胜利是，印度的法庭最近裁定抗癌药格列卫[注]（Gleevec）不

是真正的新品种，只是一个专利到期时的策略。这有助于为大量生产成本只是原始品牌药4%的普通品种药扫清道路。

像医院利用检测那样，还有另一些彻底腐败的情况。比较恶劣的问题之一是，某些医生的处方是否也受到制药公司佣金奖励的影响。制药公司直接给医生回扣，例如给那些在处方上开该公司药品的医生直接付佣金，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通过精心的伪装，仍可能有少量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不过这不大可能成为重大的系统性问题。然而，因公开推广药品而付费给医生是合法的。只是，合理推广与违法促销之间的界线又很模糊。非营利性的新闻机构为公众（ProPublica）说，一些涉及间接回扣和不正当营销的越界案例导致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结案费。这是一个像昂贵的检测一样的场面，人在那里的思想，甚至是高尚的医学界人们的思想，在需要自我辩解时能有奇妙的弹性。我不肯定有谁能知道，一位医生喜欢推荐某种药品是由于收了钱，还是基于独立的专业判断。即使把一切客观事实摆在桌面上，仍然不可能知道一位医生倾向于他曾口头推荐的处方药，是否是因为收到过酬金或者是事先确信该药品的效用。然而，酬金和偏向性开处方药的行为因直接付佣金问题而在潜意识中被关联，这对于病人和医疗系统的作用是同样的。

如果一家制药公司记录一位医生开处方用了多少它的产品，然后虽然没有正式的合同或固定比例的利润分成，给最赚钱和最忠诚的医生提供一份不费力的咨询合同、出国旅游机会、昂贵的餐饮，或者按照公司批准的稿子宣读的演讲费，其效果基本上是与佣金相同的。这就是ProPublica所说的常见之事。你不一定需要接受那个极端的估计就能断定：当人们信任的几家著名的制药大公司为这些行径而与当局达成和解时，肯定有某件事出错了。ProPublica的数据库详细列举了17家医药公司给医生们支付了约40亿美元的不当款项，这主要是通过与诉讼和执法有关的事件揭露的。

美国的医生每年大约要开出40亿张处方，相当于给每个公民开13张。据估计，多达1/5的美国人任何时候都在服用5种或5种以上的处方药。当然，这不包括非处方药、中草药和营养保健药。在过去的10年内，制药公司赚到的利润超过0.75万亿美元。它们不仅得到市场力量的帮助，而且得益于国会旨在帮助它们的活动（或对它们的活动无动于衷）。这方面有许多事例。立法制定的老年医保药品计划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在药品价格上讨价还价，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采购商通常像大型私人

买家那样通过谈判取得折扣。在大多数与我们同类的国家中，当一种专利到期后，不需处方的便宜药品能代替货架上昂贵的专利药品，而专利药品的原制造商被禁止向普通非处方药的供应者付钱以使后者停止生产，美国却不是这样。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估计，这种“付钱推迟生产”策略使消费者每年多支付超过30亿美元。在可以得到同类和同质量的非处方药时，美国是不限制品牌药公司直接对医生做广告的少数国家之一。这可能是制药公司为何花240亿美元直接向医生推销的部分原因，这是它们向消费者做广告的费用的8倍。

作为这个系统的最终付钱者，在药品使用和医生服务方面，你都面临两个问题：不正当的激励和因缺乏有意义的竞争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病人对于他们病情的了解远少于担忧，许多病人可能提出无理的要求。鉴于可理解的原因，医生倾向于在用药方面迁就病人诉求，使他们高兴。有些医生在建议用药时会推销一些药品，只因屈从于给他们奖励的制药公司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何况这样做并不太牺牲病人的利益或违背自己的良心。本质上，牺牲的主要是公众的集体利益，因为公众必须最终支付这些费用。

另一个导致医疗费超高的因素是临终护理。由于复杂的道德伦理原因和医院的财务刺激，太多的钱花在为推迟死亡时间的临终护理上，而不是造福社会。我们至少应该问问并且听从病人自己的愿望。

关于临终护理的哲学问题使保护病人的论据听起来很简单。从以下这些问题开始：多活一年对于你有多少价值？你在那时的生活质量或年龄，或者你的资产负债表，对于这个价值有多少影响？你看到你心爱的人稍微多活一些时间对于你有多少价值？谁应该决定什么时候停止花钱延长生命而让自然进程主导生命：病人？病人的家属？病人家属中最亲近的成员？病人的医生？医院的职员？或者只有上帝？如果你有理由相信恢复体面的生活质量已经不可能了，你能自己决定“拔掉开关”吗？你认为对待不负责任的病人，例如长期酗酒导致肝脏损毁，值得像对待模范公民那样吗？如何对待一个经常酗酒导致肝脏受损，但是发誓永不再沾一滴酒的酒鬼？

我们都知道一些使我们犹豫不决的故事。“60分钟”播过这样一期节目：一位有严重心脏病和肝脏病的女士，她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在养老院与当地医院之间往返。虽然她签署了一份生前遗嘱，拒绝那些不寻常的医疗措施，但仍有20几位专家出现在她的病床周围。美国公民们大概为此花了钱。《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位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后在医院待了一年的病人。他的医生说，“他从未被告知，他需要靠呼吸

机和肾透析活着”。当这位医生询问这位病人是否愿意回家接受临终护理时，负责动手术的医生才请他出院，不要回来。

我雇了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帮助我保持健康。她的母亲在不认识家人也无法与家人交流后仍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这位母亲的其中一个女儿，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坚持给她最大的护理，即使其他子女已为最后的告别做好了准备。我不知道她的护理费用为多少，但是根据医院的病床价格可以估计，这一年的护理费用必然在200万美元左右，这还没有算附加的重症特护费用。很少有认真研究医疗保健的学者想到这种极端的临终护理措施构成了我们大家分担的3万亿美元费用中的重要部分。

有些数据显示，在美国医疗保健费用中，有一大部分花在临终护理上。此外被广泛提到的是，老年人医疗保健费用中约1/3是用于病人濒临死亡时的治疗。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更具体地确认，美国医疗保健支出中老年医保部分的1/3是用在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治疗和护理上。我看到过基于广泛包容的基础计算出来的更高的临终总费用估计。然而，即使根据NIH的估计它也已达到美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约1/10。这些费用的3/4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因使用呼吸机、恢复知觉及其他临终护理技术而产生。这大约占到美国GNP的1.5%，或相当于0.25万亿美元。

这看起来显然太多，但是哲学理念的复杂性加上影响医院效益的经济激励使问题难以解决。一家受人尊敬的大医院的主管简洁而坦率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如果你来到这家医院，我们不会让你死”。在平均护理费用方面，各家医院大有不同。在梅奥医院的花费基本上是最低的，每个临终病人约5万美元，有些医院的花费约为这家医院的两倍。最贵的医院比低价医院提供更多的重症加护病房（ICU）天数和专家咨询。除了关于一个病人应留在ICU生活多久的常规辩论之外，人们甚至弄不清楚大多数医院的高费用到底能延长生命多久。达特茅斯学院研究员们的一份报告在其抽样中确定，最贵的医院与较少干预的医院有差不多的生命临终结局。

关于临终护理，我必须强调，病人垂危时应该听听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阿杜尔·嘉旺德医生，描述了一个比遵循国家规范更好且已在美国实践中得到证实的事例。他叙述的事例发生在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La Cross），那里的临终住院费用约为全国平均费用的一半，而预期寿命超过美国平均寿命。当地医务界的专家们似乎在1991年就开展了一项活动，征集医生及其病人事先做出的临终决策。他们定期地请住在医

院、护理院或生活助理机构的病人填写一张问询表，其中的问题包括：（1）如果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要求重新苏醒吗？（2）你要求采取像插管和呼吸机那样的积极性治疗措施吗？（3）如果你不能自己进食，你需要鼻饲或静脉输营养液吗？拉克罗斯市有85%的垂危病人在1996年填写过这种问询表，医生几乎都按照病人的要求办理。其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嘉旺德还指出，如果许多人简单地在家中去世，目前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改善。当然，在家中去世通常应该是由病人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选择的。她躺在自己的床上，穿着她自己的衣服，只有爱她的家人围绕在她身旁，就这样体面地辞世。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极其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不确定她就能多活几天。她在临终前拒绝进医院，甚至不让医生来访，担心医院会掌握决策过程。临终养老院关怀为她提供了她为自己选择的体面的辞世方式。嘉旺德甚至认为，病人在熟悉和充满爱的环境中实际上可能比在医院的重症加护病房活得更长一些，这似乎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注他赞同，在20世纪下半叶，虽然美国人在家中辞世的百分比从50%降到了17%，但是这个趋势现在正在逆转。在过去的5年里，选择亲人临终关怀或在家中辞世的人数比例回到了约50%。注这是一种利好的文化观念的转变。

虽然受欢迎的改变可能会发生，然而在撰写此书时老年医保仍然不支付与临终有关的预立医疗护理计划费用注；注同时，在医学院受过老年病学培训的医生占医生总数的比例很低，而且老年病专科医生的人数也在下降（自1994年以来减少了1/3）。这三者相结合就造成了浪费的机会。受人尊崇的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AS）的医学研究院最近建议，由老年医保和私营保险公司支付这个预立医疗护理计划。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商谈及填写预立医疗护理计划表制定了每小时的付费规则。注我希望你们大多数人同意，这不是许多人害怕的毛骨悚然的“死亡判决”注。NAS的医学研究院还呼吁对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进行更全面的改革，取消“不正当的财务激励”。注NAS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任美国总统期间设立的，它在需要比外行人更多科学知识的事务方面为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现在正是听取NAS建议的好时候。正如医学研究院的院长所说，“病人们没有以他们愿意的方式辞世……现在是我们的国家研发现代化的生命临终护理系统的时候了”。注

请记住，人的大脑不是（国会也不是）为了做出复杂的长远决策而进化的。但是在生命临终护理方面，我们和我们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必须做出一

些最后的决策。现代医学不能使人们的生命无限期地延长，但是发明那些在病人生命的尽头无限制地花钱的技术实在太容易了。拖延死亡比延长体面的完全清醒的生命容易得多，也无用得多。我对大多数病人想要苟且偷生的结局表示怀疑，何况在使用极端过度的治疗技术后是否确实能延长生命也并无定论。此外，即使这些技术有一点儿延长生命的作用，即使病人及其家属愿意用最极端形式的医疗干预，随着这些技术的价格和复杂性无止境地提高，社会也根本支付不起病人的费用。请问问你自己，如果每一个人在生命终结时在ICU中多花几天或几个星期的钱，世界是否确实会更好一些——而你会因此更穷一些。

最容易确认的过度开支是行政管理费用。单是这一个浪费的源头就足以证明需要有“单一付款者”系统，不过还有更好的理由建立一个统一系统。医院及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即使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政府计划，也永远不能提供合理的成本控制。如果我们的国家要解决费用和结果之间的矛盾，统一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请回想一下，我们国家的医疗保健费用占GNP的比例大约高出我们同类国家8个百分点。如果你做一个计算，把前面那些被我怀疑的挥霍都加到账单上，你就知道这个差距还需要更多的说明。我把造成差距的最明显的浪费事项，即管理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的方式，留到本章的最后进行叙述。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不知为什么很少或没有采用我们自己喜欢的有效益的市场解决方式，即用公司的方法支付医疗保健业营销和管理方面的一切内在费用。这可不好。

纽约市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一些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业行政管理费用，结论是：“差别之大出乎我们意料，与其他每个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异类。”[注]这项研究估计，行政管理费占美国医院开支的25%，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远远达不到这个数。[注]研究报告还发现，那些在单一付款者保健系统下运营的国家，其行政管理费用最低。[注]不久前，《新英格兰医学周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布过一项独立的研究，建议把行政管理的全部费用固定在医疗保健总支出的19%—24%。2003年更新的数据把它提升到30%。[注]在医疗保健业的总劳动力中，从事管理的人数增加了50%，尽管在此期间引入了许多受管控的医保系统[注]，信息技术自动化大量增加。今日，医疗保健领域中每4个雇员中至少有一个只做行政或秘书工作。[注]

我们可以把市场营销费用和信息记录，包括管理病人的账单和报销的费用合在一起，作为行政管理费的两个最大组成部分。社会保险，虽然不是一

个医疗项目，但承担了许多同样的任务，而其经费不到社保费收入的1%；它基本上不做广告，而且保持相对统一的记录。老年医保计划的运作比较费钱，但也不是很多，不到行政管理总预算的2%。[注]虽然老年医保的记录比社会保险的记录更加复杂，它还要求对各种老年医保的提供者[注]和各种病人有相对的统一，但是老年医保的预算中几乎没有广告费。批评老年医保的人倾向于认为其真实管理费用更可能是6%。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对于管理费用估计的差距，来自后者把参与医保C部分和D部分[注]的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包括进去了。无论包括的这部分费用是否合理，它的影响实际上很小。私人保险公司的行政管理费，包括市场营销费用，通常估计是保费的17%—20%。最近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注]（*Affordable Care Act*）有一个条款旨在将私人保险公司的行政管理开支限制在保费的20%以内，对于一些集体投保方式是15%。[注]即使这个法案能完全有效地实施，我怀疑，其作用最多只是使情况不变坏而已，却难以解决个人承担的高医疗费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长期为单一付款者的做法辩护，虽然通常没有多少效果。在思考本书的结构时，我认识到在我习惯性地支持单一付款者的论据中有一些重要的疏漏。反对者会立即将这些疏漏作为有力地抵制任何改革的论据，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单一付款者”这个词没有全面和恰当地描述这个最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们的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了单一付款者[注]，但是它并未有效地降低行政管理费之外的其他费用。这两点值得进行讨论。

“单一付款者”是当前常用的词语，但它实际上对于所需要的系统是一个贫乏的描述词。上文已分析了导致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异常高的一些因素：医生的收入不恰当地超过国际水平，大量使用高级的检测诊断设备，不能管控好医药产品的价格及药物的使用，非生产性行政管理的文书费用以及保险业和医疗保健业的大量广告，临终护理支出未得到有效控制。若有一个机构专门为美国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支付账单，这将有助于大大削减行政管理费用和降低某些营销成本；但是单靠这样的改变，无论使出多大的劲儿，还是解决不了多少其他领域的问题。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单一付款者、单一谈判者和单一监管者的组合系统。这个组合的最佳称呼可以是“统一的或单一的医疗保健管理者”。事实上，建立单一付款者模式本身就能节省大量的文书工作。把医生及其助手从各种形式的有时不合理的辩护体制中解脱出来[注]，这样产生的经济效益代表了能够想象的最简单的医疗保健节约。如果单一付款者也是单一的医疗提供者，至少在基本医疗方面负责收取保险费，并处理一切理赔和报销业

务，这样费用将会节省更多。在这个不完善的市场上，保险公司的运营费用，包括市场营销和广告费用，对于改善医疗质量的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作用。然而，这只是狭义的单一付款者概念能达到其有用性的极限。

为了在医药领域尽可能实现节省，我们还需要有单一的谈判者。政府应该摆脱那些为保护制药公司而制定的法律和程序，然后以大买家的身份参与市场谈判以取得最好的价格。市场的消费者在本质上从来不是有效竞争的典范。然而，市场供应者将在恰当的环境下积极挑战。如果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研发——我们对这个理由应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对创业和非营性活动的直接激励无疑将比主要使制药业股东受益的整体利润水平资助更经济划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第一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借鉴危险性和不良后果最小的模式。可以肯定的是，单一购买者能讨价还价，并取得比我们目前支付的更低的药品价格。增加使用普通药品将实现更大幅度的节省，只要我们停止无理由地保护强有力的专利拥有者。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专员曾指出，即使按目前的规则削减普通药品的使用，就能在最近的10年里节省超过1.2万亿美元。注 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运用可获得的市场力量不仅限于药品的采购。在同一些其他形式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包括医疗器械制造商、医生组织和医院）的谈判中，单一谈判者还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律师和谈判代表。

然而，即使有了统一的购买者和管理者，我们在降低医疗保健费用占GDP的比重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做。公众过多地使用处方药、医院浪费而又重复地采购昂贵的检测设备，尤其是临终护理上的过度开支，所有这些都需要予以处理。单靠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利用可获得的谈判力量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正如监管在某些领域可能过时一样，如果要在我们触手可及的每年一万亿或更多的美元中追求系统性的节省，一定程度的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应该如何加以监管，我远没有足够聪明到能提供精确的细节或经得住质询，而只能敦促通过监管来支持这一章前面所阐述的节俭措施。然而，我敢肯定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将在任何具体形式的监管进场干涉时来临。如果公众在文化上没有重大转变，且对每年释放出一万亿美元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利益没有深刻理解，那么监管将得不到广大公众必不可少的支持与拥护。

辩论中的另一个劣势是，一个反对者会质问，为什么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尚未显示出单一付款者系统的所有好处。众所周知，这两个系统控制它们自己的行政管理和市场营销费用比控制其医疗保健开支要有效得多。此外，我们都看到了引人注目的关于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存在欺诈的报告。在这两个项目中，控制费用的成就之所以有限，原因是为了产生更大影响，它们被故意设计成缺少一些必要的工具。它们确实是在它们领域内的单一付款者，但是它们作为单一谈判者是受束缚的，作为单一监管者更是

受限制的。

一个共同的不利因素是，政府的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是与私营系统并肩而行的，而私营系统对于医生的薪酬激励往往更高。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虽然对私营保险公司的激励往往比对医生的激励更复杂，但是整体上并不是更好。在自我保险的集体计划中，医疗费用主要由雇主承担，而私营保险公司则提取与医疗费成比例的管理费。由于保险公司的收入是在成本加利润的基础上随医疗费用而改变，因此几乎没有严格的成本审查。保险公司担心如果它们过于严格，其公司账户可能遭受损失。在有风险的计划中，保险公司确实有对于节俭的短期激励；但是如果它们试图勒紧缰绳，其账户受损的风险更大。此外，他们的长期增长是由医保市场的规模大小决定的，而医保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医疗保健利用率的上升。

在私营市场为医疗检测频率、药品用量和价格以及每一种医疗服务的报酬制定标准时，任何与之并肩而行的单一付款者项目极难做到更节俭。自1997年起，老年医保的法规已给出了“可持续增长率”的付款限制，使某些报销额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相关联。迫于压力，国会几乎每年都要修改这些规定。2011年，老年医保支付咨询委员会（Medicare Payment Advisory Commission of Medicare）建议削减某些医生的费用，但其实施至少被推迟到2015年，而且现在又被推迟了。此外，单一付款者在减少需要私营医保提供者为他们各自或共同的病人保持重复记账和发出收款单的系统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在这类费用方面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可提高效用的优势。在一般的医院里，行政管理支出达到每个病人约650美元。[注]医生的办公室也不得不维持由助手操作的昂贵的重复记账和报告系统。这些往往是固定成本，执行标准会计制度的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只能稍微降低一点儿成本。用一个分裂系统[注]的结果（其中一半以上是私营医保提供者的费用）判断现有的单一付款者系统是完全不公平的。

目前，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在私营医保系统一样，病人基本上不清楚他花费了多少医疗费用。费用自然没有消失，只是因为它被摊派到许多人的纳税单和保费中。当一项服务的购买与其价格的直接后果被分隔时，服务的费用和使用率将会膨胀[注]，这是必然的。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正确地指出，不仅病人在滥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而且新仪器设备的制造商能将它们的产品销售到一个对价格异常不敏感的市场上。[注]私营保险业对共同付费、自付额和投保者缴保费有各种不同要求，但是并不特别有效。老年医保有每年住院费用的自付额规定，但是对于住院后头60天的护理费没有附加的自付额。同时，老年医保有根据收入而确定的每年自付额以及一定百分比的自付医生服务

费。医疗补助计划则允许各州自行确定上述三个变量[注]，但是限制性的联邦法规和医疗补助计划客户的需求状况使其难以成为有意义的市场激励的平台。说到底，这些旨在谨慎使用医疗保健的激励措施没有一个是足够强大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道德观。美国人在购买其认为必要的物品时似乎对附加费用很反感。医疗保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有些观察者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了处在第一世界的其他同类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其他国家医保全面覆盖的有益经验显示，病人不需要为其医疗费用的可观部分负责。这些观察者对同类国家医保系统及其结果的观察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其结论在美国未必同样站得住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已沉湎于过度使用和过度消费而不能容忍削减它们，除非有强制的第一方[注]分摊支付制度。若有朝一日医生和病人都意识到要对医疗保健的总开支给予足够的关心，以维持支出与使用之间合理的平衡，这可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那时将对所有人恢复医疗保健费用的全额报销——不要病人缴纳大量保费。在此期间，如果我们希望在国家的医疗保健开支方面产生有意义的改变，我们将需要有自付额和共同付费额以及我们能调动的其他力量。

投保者每年所缴的保费对于使用多少医疗服务几乎没有什么有益的影响。这些保费的用处只是在自己付费与保险业付费之间分摊医疗保健服务的费用。在许多情况下，以年度为基础的自付额只有温和的刺激作用；而且在任何一年的自付额（由病人支付的）被用完后，购买医疗保健服务时就没有刺激作用了[注]。能恢复自由市场有利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病人在每次消费服务之后在共同付费中应付的自付额。一个经济上强有力的共同付费清单大约是为使用医疗保健服务恢复部分市场效率的唯一可用工具，而且这个共同付费清单能全面而严格检查投保者的财力以使其更有效或公正。这里的障碍是公众，因为公众似乎不明智地偏爱通过不显眼的医保税和保费机制来支付医疗保健费用——即使这样做的实际费用更高。在这个偏爱改变之前，政府的医疗保健计划将在政治上被迫接受失败的市场所提供的东西。只要我们的私营医保系统和公共医保系统并驾齐驱，我们的医疗保健支出将注定要超支。

不管系统怎么改革，目前的人口结构不利于医疗保健支出的削减。短期内，没有办法防止医疗保健费用在GNP中所占份额的进一步上升。然而，从长远来看，其他国家似乎有一些能控制费用的模式可供美国借鉴。

如果前面几页内容告诉我们，完善公共政策能在短时期内把医疗保健费用的绝对值根本性降低，那我就应澄清我的观点。更好地利用激励措施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从长远来说它们能抑制医疗保健费

用在GNP中所占比重的上涨，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未来十年美国医疗保健费用走势仍将是向上走的。这是因为人口结构因素也在起作用。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享受昂贵医保服务的人数与享受私营和公共医保服务的人数之比肯定会上升。所以，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率增长肯定比经济增长快，而且不是快一点儿。使费用上升压力增加的因素可能是《平价医保法案》的影响，它的支持者们立足于其公平合理性（我也因这个理由而曾是支持者之一），而不仅因其能控制费用。简单地说，它防止费用增长恶化的特色不大可能抵消给需要认真修理的现有系统增加一个健康可能低于平均水平的老龄化人口群体。有些专家把捍卫这项法案作为第一步；普遍性优先，然后才是效率。如果这个次序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将感觉舒坦得多。

《平价医保法案》确实包含一些控制费用上升的因素，近期的数据显示，医疗保健费用上升的步伐放慢了，这实在令人欣慰。好消息是，不仅总费用在放缓，而且政府项目的费用也有所放慢。[注]这表明，节约支出不只是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经济衰退应该主要影响私营部门。坏消息是，许多改善效应只是一次性的，不能期待它们起持续改善的作用。而且无论如何，趋势依然指向上升。影响医疗保健支出的因素如此之多，这使得从短期效果推断长期结论可能是错误的。趋势总是应该与波动区分开来，而且趋势依然在驱使费用上升。多年以来，没有相应的政策可以阻止这一上涨趋势。虽然公众知道应该更加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医疗保健支出占GNP的比例不是很快达到20%，我会感到惊讶。遗憾的是，你面前的机遇不包括迅速扭转费用变化的方向。威胁在于，若没有合理的政策行动，医疗保健支出占GNP的比例将不会停止在20%这一水平上，而且不会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善而改善。

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做得比我们好。每个国家均有一些做法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潜在适用的，而另一些做法不适用；有些模式很吸引人，有些则不是。我并不建议我们全盘模仿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以下概述主要是为了说明没有标准的模式。我们必须从现有的一系列模式中挑选出一套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相融合的体制，这样它才能为我们服务。英国有一个靠税收资助的全国系统。[注]每个公民都被覆盖，除了看牙科、配眼镜和开处方药需要自己支付一小部分费用外，其他基本没有自付费用。那里基本上没有我希望看到的市场激励。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初级护理医生是定期支付报酬的私人从业者，但大部分专科医生是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另外，许多医院都是公立的。

瑞士有一个混合型的全民医保体系，在瑞士，禁止私人保险公司在基本医疗护理方面谋利，但是允许在预先拟定医疗护理方面收费。[注]中国台湾

地区的行政管理费用节俭模式也受到广泛好评，它有一个共同付费与全民覆盖相结合的医疗保健系统。注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利用医疗保健服务，他们更频繁地看医生和开处方，然而日本的人均医疗费只是美国人的一半。在日本，各种医疗服务的价格是受严格管制的；对于付得起的人，有30%的费用是自付的，并可以根据收入和年龄下调。注德国，作为社会保险的发源地，它的医疗保健系统要素极多并较为复杂。它提供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服务，由非营利的私营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财务能力确定保费。保险公司能与医生讨价还价，而政府则通过全面预算程序帮助实行价格自律。德国还有一个为较少数人提供的平行的营利性私人医保系统。注同时考察这些做法，你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与我们类似的国家（或地区）使用的医疗保健系统设计得各不相同，但是它们至少都具有下列特征：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体系、有效的费用限制和满意的成果。若认为它们没有什么可供美国学习的，将难以置信。

我听到过的反对从其他富裕国家的医疗保健做法中学习借鉴的最普遍论据是，其他国家等待医疗服务的时间比美国长。我听说，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平均等待时间分别是：选择性的外科手术是1个多月；1/4的非急症病人等待超过一个季度，在一份调查中报道的是4个多月。这3个国家都表示，它们将投入更多资源以解决等待时间长的问题。注我认为，做这种比较是站得住脚的。我们的系统在这些情况下可能更有效率。然而，如果能节省更多的钱，我会为股骨或膝盖骨的复位接受较长的等待时间，而且也可能不反对为纯粹的选择性手术而等待。对于更严重的或有可能恶化的疾病，拖延是不可忍受的；我还没有找到可靠的分类数据来观察其他国家病人的等待时间是如何随着手术种类不同而变化的。然而，即使到处都有不该有的拖延，请想想，我们并没有得到更佳的健康结果。所以，任何这样的等待的影响不大可能是毁灭性的。治疗结果比治疗速度更重要。而且，我们的系统使我们每年的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这是其他国家承受不了的。美国的公众并不都对此有很好的了解，也不愿意放弃习惯性的奢侈行为，但是有时就是需要权衡。

解决医疗保健问题的办法是：美国现有的可悲而无效的医疗保健从业者之间竞争的系统应该被普遍的单一付款者和单一监管者系统所代替。同时，有许多宝贵的中间步骤可以被采纳，以改善这个系统内某些具体领域的效率；我们的目标是以与同类国家相同的成本取得不亚于世界级综合健康水平的结果。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你我都为我们得到的医疗保健服务付出了太多的费用，一年超过一万亿美元实在是太多了。医疗保健服务是好的，但是其结果并不比费用较低的同类国家好，超过12个零的费用简直大到不能忽视。

在效果方面赶上我们的同类国家，同时每年削减1/3的支出，这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目标。有些节省体现在你的纳税单中，有些是你的医保费，有些是你的自费开支。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美国人往往以我们的方式而自豪，并急于捍卫它。但是，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乌维·莱茵哈特（Uwe Reinhart）所问的，"号称'世界最好的医保国家'的花费怎么可能是世界最佳医疗国家的两倍呢"？注这确实是个问题。费用过高有几个推动因素。关于医生的收入，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当然，欺诈必须打击，但是不要指望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节约。只有少数医生存心做不道德的事；大部分医生只是按这个系统要求的那样去做，而且保持着比我们其余人更无私的利他主义。如果我们有一个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组合，像世界其他国家的组合那样，那就好了；我们可能需要让医生的助手们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上述无论哪一项改革都不能使整体支出有重大的削减。

只要医院之间存在不恰当的竞争，而且存在因美国的诉讼系统所导致的过度防御性医疗，就难以找到应对迅速增长的医疗技术费用的办法。技术将继续改进，它的费用自然没有上限。同理，目前没有降低巨额临终护理费用的现成途径，除非美国准备好面对这个现实而削减它。然而，我们可以取得某些实际进展，即坚持让病人事先说出对于其生命最后一些日子的选择，并且对医学界形成约束力。在药品方面，有比较清晰的逻辑途径可遵循。即使我们，特别是老年人，继续使用过多的药物，我们还是能采取一些措施降低成本。政府没有理由不利用大批量购买者的正当权利使处方药的成本与其他国家的成本保持一致。在这方面，需要克服的只是竞选捐款的政治活动注。

过度的行政管理费用是最容易对付的目标。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在美国建立一个推行健康保险和会计处理的单一付款者系统是最有力的首要措施。这个统一的系统将削减用于做广告与维护多个不兼容的记录和收费系统的费用，从而立即开始产生红利。更重要的是，它将逐渐允许在目前饱受不当激励所困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建立效率机制和质量激励机制。

你在今天不必要地为低于标准水平的医疗保健效果而支付的钱来自你的钱包，但是这个被误导的支出的受害者还包括尚未出生的几代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是这样的：由于老年人比较容易生病，花在医疗保健上的钱总是使财富从在职群体转移至老年人，留给年轻人的就很少了。试问问你自己，如果不得不选择，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倾向于把下一美元花在青年人身上的社会还是倾向于花在老年人身上的社会。然而，如果我们停止不加思考地花钱，我们至少仍能像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善待我们的长辈，而且依旧节省了钱。并非所有的开支和所有的货物都会产生同等的经济效益。

花在青年人和基础设施上的钱代表着将在未来有回报的投资。如果过度使用医疗检测设备、过度服用药物、在生命最后几天过度干预，那么所花的钱花掉就花掉了。

在对国家财政影响方面，单一付款者的医疗保健系统与恰当的成本控制相结合，将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机会。美国的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能节省数千美元，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将更有竞争力，未来我们的社会能有大量的资金追加投资——这一切都不会牺牲医疗保健的效果。如果用美元来衡量，修复（改善）美国医疗保健系统比其他任何可想象的国家政策改变对于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家都更有价值。它的好处甚至还不止于此。

---

1.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医疗保健系统很复杂，包括3个部分：（1）大部分职工（包括不工作的配偶和孩子）由雇主购买医疗保险或简称“医保”（Medical Insurance），部分人（约2700万人）自己购买，约4800多万的在职人员既没有雇主购买的医保，自己也没有购买医保；还有大量无业者没有医保。（2）社会养老保险或简称“老年医保”（Medicare）是65岁以上曾工作过的约4800万老年人享受的医疗保险，钱来自在职职工和老年人工作时每月缴纳的1.45%的工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医保入不敷出，成为美国社会争议的热点。（3）医疗补助（Medicaid）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给财产不超过2000美元的贫困家庭，特别是儿童的医疗服务。医保、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统称为医疗保健。医保有政府办理和私营保险公司办理两种途径；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则是完全由政府付款的，所以已经属于“单一付款者”系统。本章讨论的“单一付款者”主要是指医保的改革，即把医保统一到政府管理之下。——译者注

2. 美国医学研究院是在1970年根据国会的《国家科学研究院法案》成立的，起初名为医学研究所，2015年4月改名为国家医学研究院，成为“国家科学院”的一部分。它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每年从医学界选举院士；他们负责无偏见和有根据地向政府、业界和广大群众提供医学和保健方面的权威信息和政策建议。——译者注

3. HIV是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英语字头，如果体检发现HIV阳性，它最后会导致艾滋病；“艾滋”是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A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drome）英语字头AIDS的音译。——译者注

4. Institute of Medicine, “Report Brief: U.S.Health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horter Lives, Poorer Health,” Iom.edu, January 9, 2013,

http:// iom.edu/Reports/2013/US-Health-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horter -Lives-Poorer-Health/Report-Brief010913,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5. 健康生活年龄是活到出现生理或心理残障疾病之前的年龄。——译者注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ife Expectancy, Data by Country,” Who.int, http://apps.who.int/gho/data/view.main.680?lang＝en,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obability of Dying per 1000 Live Births, Data by Country,” http://apps.who.int/gho/data/ view.main.CM1320R?lang＝en, accessed July 22, 2015;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Data by Country,” http://apps .who.int/gho/data/view.main.1390, accessed July 24, 2015.

7. 英联邦基金会是2007年在加拿大（英联邦的成员国）设立的一家对冲基金投资公司，它资助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这份报告中的11个国家是（按英语字头排列）：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译者注

8. K.Davis, K.Stremikis, C.Schoen, and D.Squires,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2014 Update: How the U.S.Health Care System Compares Internationally,” Commonwealth Fund, June 2014, http://www.commonwealthfund.org/publications/fund-reports/2014/jun/mirror-mirror,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ife Expectancy, Data by Country,” Who.int, http://apps.who.int/gho/data/view.main.680?lang＝en, accessed July 22, 2015.

1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Cia.gov,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177.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elements of the discrepancies may arise from gun deaths, car accidents, or different ways to quantify infant mortality, but the basic fact of a comparison unfavor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seldom challenged.

11. See note 1.

12.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NHE Fact Sheet, Historical S NHE, 2013,” Cms.gov, http://www.cms.gov/Research-

Statistics-Data-and-Systems/Statistics-Trends-and-Reports/ NationalHealthExpend Data/NHE-Fact-Sheet.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13. OECD, "Compare Your Country: Health Profile," Compareyourcountry .org, http://www.oecd.org/els/health-systems/ oecd-health-statistics -2014-frequently-requested-data.htm, accessed April 12, 2015.

14. Ibid.

15. Sean Keegan et al.,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Projections, 2014 - 24: Spending Growth Faster Than Recent Trends," HealthAffairs, no.8, July 28, 2015, http://content.healthaffairs.org/content/ early/2015/07/15/ hlthaff.2015.0600.full.pdf, accessed August 2, 2015.

16.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Opening of the White House Forum on Health Reform,"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 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opening-white-house -forum-health-reform,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17.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ealth Plans, "2012 Comparative Price Report," http://hushp.harvard.edu/sites/default/files/ downloadable_files/ IFHP%202012%20Comparative%20Price %20Report.pdf,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18. 替代医学是指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非正规治疗方法，如针灸、中草药、食疗等。——译者注

19. Sara Thomas, Daniel Bachman, Abhijit Khuperkar, and Guarav Vadnerkar, "Dig Deep: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of Rising Out-of-Pocket Health Care Costs," Deloitte,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 Deloitte/us/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us-lchs-dig-deep -hidden-costs-112414.pdf,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20. George I.Kowalczyk, Mark S.Freeland, and Katharine R.Levit, "Using Marginal Analysis to Evaluate Health Spending Trends," Health Care Finance Review Journal 10, no.2 (Winter 1988): 123 - 29, Table 3,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92 920/table/t3 -hcfr-10-2-123/, accessed August 1, 2015.Also see Stan Liebowitz, "Why Health Care Costs Too Much," Cato Policy Analysis No.211, June 1994,

http://www.cato.org/pubs/pas/pa211.html, accessed January 29, 2015.

21. 从1950年的4%在10年间增加到图4.1中1960年的5%。考虑到这10年间的GNP总量的增加，保健费用的美元绝对数值就增加得多得多。——译者注

22. 前文提到“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8%，欧洲平均少于10%”。16万亿美元的18%是2.88万亿，即约3万亿；美国比欧洲多花费8%，16万亿的8%是1.28万亿，即约1.3万亿美元。作者在原著中混淆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GNP包括美国公民在国外的生产值。——译者注

23. Linda J.Bilmes, “The Financial Legacy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 Wartime Spending Decisions Will Constrain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3-006, March 2013,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 papers/citation.aspx?PubId＝8956, accessed July 22, 2015.

24. World Bank, “Health Expenditure, Public (% of Total Health Expendi ture),”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XPD.PUBL, accessed July R 24, 2015.

25. 此处原著有误。地球到太阳距离约为0.15万亿米，一半距离是0.225万亿米；因此1万亿张0.225米（即22.5厘米）长的纸币才能连接到太阳，再回到半路。实际上，一美元纸币长度只有约15厘米，所以1万亿张一美元纸币只能连接到太阳，不能再回到半路。——译者注

26. 20世纪20年代，赛马的骑师们把纽约的赛马场称为“大苹果”；后来在1977年，纽约市官方正式把该市称为“大苹果”，以突出该市的多元包容文化。——译者注

27. “Department of Finance Publishes Fiscal Year 2016 Tentative Assessment Roll,” NYC Finance press release, http://www1.nyc.gov/assets/ finance/downloads/pdf/press_release/press_release_2016_tent_assess_roll. pdf, accessed July 22, 2015.The tax valuations actually used in New York City are lower, by abatement or otherwise, than the city's own market value assessments, the values cited in the text.

28. OECD, Health Statistics 2014, “How Does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 OECD.org, http://www.oecd.org/unitedstates/Briefing-Note-UNITED -STATES-2014.pdf, accessed April 12, 2015.

29. OECD, Health Statistics 2014, “How Does Norway Compare?,” OECD .org, http://www.oecd.org/els/health-systems/Briefing-Note-NORWAY-2014.pdf, accessed April 12, 2015.

30. World Bank,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 http://data .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 accessed August 2, 2015.

31. OECD, Health Statistics 2014, “How Does Japan Compare?,” OECD.org, http://www.oecd.org/els/health-systems/Briefing-Note-JAPAN-2014.pdf, accessed July 23, 2015.

32. OECD (2012), U.S.health care system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leased on June 28, 2012.http://www.oecd.org/health/healthdata,Paris.http://www.oecd.org/unitedstates/HealthSpen dingIn USA_ HealthData2012.pdf.

33.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2014,” Bls.org, Table A, http://www.bls.gov/news .release/cesan.nr0.htm,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34.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January 2014, http://www.bls.gov/ooh/healthcare/physicians-and-surgeons.htm#tab-5, accessed August 2, 2015.

35. David M.Cutler and Dan P.Ly, “The (Paper) Work of Medicin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 no.2 (Spring 2011): 3 - 25, Table 2, http://pubs.aeaweb.org/doi/pdf plus/10.1257/jep.25.2.3, accessed August 2, 2015.

36. Ibid.

37. Esther Hing and Susan M.Schappert, “Generalist and Specialty Physicians: Supply and Access, 2009 - 2010,” CDC.org, http://www.cdc.gov/ nchs/data/databriefs/db105.htm#number), accessed July 24, 2015.

38. OECD, “Health at a Glance 2011: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November 2011, Figure 4.1.1, http://www.oecd-ilibrary.org/

sites/ health_glance-2011-en/04/01/g4-01-01.html?itemId=/content/chapter/ health_glance-2011-29-en&_csp_=785dba4abcba409e00e41ac61cf308b1, accessed July 24, 2015.

39. All references to Dr.Gawande's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re from Atul Gawande, “The Cost Conundrum,” The New Yorker, June 1,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06/01/the-cost-conun drum,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40. Atul Gawande, “Overkill,” The New Yorker, May 11, 2015, http://www .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5/11/overkill-atul-gawande, accessed July 23, 2015.

41. 医生的道德条款是指《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这是国际统一规定的在取得行医资格时必须举行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的宣誓。——译者注

42. 网外供应商是指没有与保险机构签约的医疗护理提供者。——译者注

43. 此处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指的是来自纽约州的查尔斯·舒默，他连任3届参议员，现在是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他的妻子是华裔部长赵小兰。——译者注

44. Gardiner Harris, “Hospital Savings: Salaries for Doctors, Not Fees,” 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7/25/health/ policy/25doctors.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The senator was Charles Schumer (D-NY).

45. 凯撒医疗集团成立于1945年，是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组织，有约1000万会员享受它提供的质量不低的医疗服务。——译者注

46. Ibid.

47. See note 27.

48. 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11: Doctors' and Nurses' Salaries,” OECD Publishing, June 2011, http://dx.doi.org/10.1787/gov_glance-2011 -32-en, accessed July 24, 2015.

49. Paywizard, “N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arn 8 Times More Than in Russia,” Paywizard.org, http://www.paywizard.org/main/salary/global -wage-comparison, accessed January 29, 2015.

50. Lynn Feldman, “Managing the Cost of Diagnosis,” Managed Care, May 2009, http://www.managedcaremag.com/archives/0905/0905.diagnosis .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51. For an estimate that waste in diagnostic testing amounts to ＄210 billion (quite possibly more than one-third of all testing expenses), see the Doctors for America website, Dr.Sachin D.Shah, “Cutting the Waste in Medicine,” September 10, 2012, http://www.drsforamerica.org/blog/cutting-the-waste-in-medicine, accessed July 25, 2015.

52. See “Choosing Wisely,” http://www.choosingwisely.org, accessed August 2, 2015.

53. See note 36.

54. Emad Rizk,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ing Presents ＄5 Billion Conundrum, Managed Care, April 2009, http://www.managedcaremag.com/ archives/0904/0904.moleculartesting.html, accessed January 16, 2015.

55. 贝叶斯统计是在两个互相关联的随机事件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计算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译者注

56. “MRI Cost and MRI Procedures Information,” New Choice Health,http://www.newchoicehealth.com/mricost,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ealth Plans in a 2013 report places the average cost of an MRI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1,145.That study con-tains interesting comparisons of co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ve other countries on a number of other procedures and drug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highest costs in all of the rankings.

57. OECD, “46.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xams, Total per 1000 Population,” OECD Publishing, http://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exams -total_mri-exam-total-table-en,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8. “Getting an MRI Head Scan,” Medtronic, http://www.medtronic.com/ patients/essential-tremor/living-with/mri-scan/,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59. Tara Haelle, “Putting Tests to the Test: Many Medical Procedures

Prove Unnecessary — and Risky,”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5, 2013, http://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medical-procedures-prove-unnec essary/,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60. H.Gilbert Welch, Should I Be Tested for Cancer?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61. 假阳性是本来无病，检测却显示有病。这只是虚惊一场，并使病人白花钱治疗不存在的病症，但是不会因漏诊而导致昂贵的法庭诉讼和赔偿。所以医院把检测设备标定到出现较多的假阳性。——译者注

62. 美国心脏病学会成立于1924年，是一个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非营利性组织，目的是提供适当的心脏病护理建议，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造成的死亡或失能。——译者注

63. For today's normal standard, se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http:// www.heart.org/HEARTORG/Conditions/HighBloodPressure/ AboutHighBloodPressure/Understanding-Blood-Pressure-Readings_ UCM_301764_Article.jsp, accessed July 25, 2015.For an older standard, see H.Gilbert Welch, MD, MPH, Lisa M.Schwartz, MD, MS, and Steven Woloshin, MD, MS, “Changing the Rules,” Dartmouth Medicine, Winter 2010.

64. 美国对于医疗事故的判罚极重，这导致医生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对小病也做全套检查（称为“防御性医疗”）；对医疗过程（包括与病人对话）做极其详尽的记录，工作效率极低；医生还必须为自己投保，保费极高，一旦惹上诉讼案，由保险公司赔偿。这三个方面迫使美国医生收费极高。——译者注

65. Michael B.Rothberg et al., “The Cost of Defensive Medicine on 3 Hospital Medicine Service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4, no.11 (November 2014): 1967 - 68, http://archinte.jamanetwork.com/article .aspx?articleid＝1904758, accessed July 23, 2015.

6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astStats, “Health Expenditures,” Cdc.gov, http://www.cdc.gov/nchs/fastats/health-expenditures .htm,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67. Simon King, “The Best Selling Drugs Since 1996 — Why AbbVie's Humira Is Set to Eclipse Pfizer's Lipitor,” Forbes, July 15, 2013, http:// www .forbes.com/sites/simonking/2013/07/15/the-best-selling-drugs-

since -1996-why-abbvies-humira-is-set-to-eclipse-pfizers-lipitor/,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68. 无国界医生的宗旨是全球人类都有获得医疗的权利。该组织曾获得199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在该组织在60多个国家有2000多名医生。——译者注

69.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Countries Must Fix Critical Access to Medicines Flaws in the Trans-Pacific Trade Pact,” May 7, 2013, http://www .doctorswithoutborders.org/news-stories/press-release/countries-must -fix-critical-access-medicines-flaws-trans-pacific-trade,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70. Experts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The Price of Drugs for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Is a Reflection of the Unsustainable Prices of Cancer Dru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arge Group of CML Experts,” Blood 121, no.22 (May 30, 2013), http:// www.bloodjournal.org/ content/121/22/4439#ref-2,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71. Ibid.

72. 格列卫是瑞士诺华（Novartis）制药公司生产的抗癌药，学名“甲磺酸伊玛替尼”，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该药已发展到第三代，其实都只是第一代的改进。——译者注

73. Kaustubh Kulkarni and Suchitra Mohanty, “Novartis Loses Landmark India Patent Case on Glivec,” Reuters, April 2, 2013, http://in.reuters .com/article/2013/04/01/india-drugs-patent-novartis-glivec -idINDEE93000920130401, accessed July 24, 2015.The drug is generally marketed as Gleeve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ivec internationally.

74. Ibid.

75. 为公众是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保罗·斯泰格（Paul Steiger）在2007年成立的，专注于调查性新闻，旨在为公众利益而揭露强者欺凌和剥削弱者的事实。——译者注

76. 结案费即执法当局判定的罚款。——译者注

77. Lena Groeger, “Big Pharma's Big Fines,” ProPublica, February 24, 2014, http://projects.propublica.org/graphics/bigpharma, accessed

January 26, 2014.

78. Lena Groeger, Charles Ornstein, Mike Tigas, and Ryann Grochowski Jones, "Dollars for Docs: How Industry Dollars Reach Your Doctors," ProPublica, July 1, 2015,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docdollars/, accessed July 24, 2015.

79. Ibid.

80. Craig W.Lindsey, "The Top Prescription Drugs of 2011 in the United States: Antipsychotics and Antidepressants Once Again Lead CNS Therapeutics," 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 3, no.8 (September 2012): 630 - 31,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cn30009 23, accessed August 2, 2015.

81. Wenjun Zhong et al., "Age and Sex Patterns of Drug Prescribing in a Defined American Population,"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88, no.7 (June 2013): 697–707, http://www.mayoclinicproceedings.org/article/S0025-6196(13)00357-1/pdf, accessed August 2, 2015.

82. Ethan Rome, "Big Pharma Pockets ＄711 Billion in Profits by Robbing Seniors, Taxpayers," Huffington Post, April 8, 2013, http://www.huffington post.com/ethan-rome/big-pharma-pockets-711-bi_b_3034525.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83. 老年医保是由联邦政府包干的，国会却禁止联邦政府在药品价格上讨价还价。——译者注

84. Wendell Potter, "Docs, Drug Companies, Insurers Drive Up Medicare Costs,"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August 25, 2014, http://www.public integrity.org/2014/08/25/15345/docs-drug-companies-insurers-drive -medicare-costs,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8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Chairman Leibowitz: Eliminating Pay-for-Delay Pharmaceutical Settlements Would Save Consumers ＄3.5 Billion Annually," FTC News Release, June 23, 2009,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09/06/ftc-chairman-leibowitz-elimi nating-pay-delay-pharmaceutica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86. "Persuading the Prescriber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Marke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Pew Charitable Trusts Fact

Sheet, November 11, 2013, http://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fact-sheets/2013/11/11/persuading-the-prescribers-pharmaceutical -industry-marketing-and-its-influence-on-physicians-and-patients, accessed July 24, 2015.

87. “拔掉开关”是指切断呼吸器的电源。——译者注

88. “60分钟”是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的时事新闻节目，创办于1986年；每个星期日在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7点至8点播出。——译者注

89. 60 Minutes, “The Cost of Dying,” CBSnews.com, November 19, 2009, http://www.cbsnews.com/news/the-cost-of-dying/,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90. 因为这位病人的医疗费用来自政府的老年医保，而老年医保的钱来自大家向政府缴纳的医保费。——译者注

91. Reed Abelson, “Weighing Medical Costs of End-of-Life Car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23/health/23ucla.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92. Michael Bell, “Why 5% of Patients Create 50% of Health Care Costs,” Forbes, January 10,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michaelbell/2013/01/10/why-5-of-patients-create-50-of-health-care-costs/, accessed July 24, 2015.

93. Baohui Zhang et al., “Health Care Costs in the Last Week of Life: Associations with End of Life Conversations,”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9, no.5 (March 9, 2009): 480 - 88, http://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2862687/,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94. Ibid.

95. See note 65.

96. John E.Wennberg, Tracking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hronic Illness: The Dartmouth Atlas of Health Care 2008, Dartmouth Institute for Health Policy and Clinical Practice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Research, 2008, http://www.dartmouthatlas.org/downloads/atlases/2008_Chronic_Care_Atlas.pdf, accessed August 2, 2015.

97. Jonathan Skinner and Elliott S.Fisher, “Reflections on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U.S.Health Care," Dartmouth Institute for Health Policy and Clinical Practice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Research, March 31, 2010, updated May 12, 2010, http://www.dartmouthatlas.org/downloads/press/ Skinner_Fisher_DA_05_10.pdf, accessed August 3, 2015.

98. Atul Gawande, Being Mortal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4), 178.

99. Ibid., 177.

100. Ibid., 6, 192.

101. 为了减少在撤除临终的生命维持系统时产生的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的争议而及早沟通和事先制订“预立医疗护理计划”，它强调对未来医疗的需求和期待，共同捍卫病人的医疗自主权，提升医疗护理的质量。医生与病人商定预立医疗护理计划是要计时收费的，老年医保不付这个费用，病人就只能自费。——译者注

102. Stephanie Armour and Louise Radnofsky, "End-of-Life Talk Proposed as New Medicare Benefit,"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8,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government-proposes-to-pay-health-providers-for -end-of-life-discussions-1436396400, accessed October 12, 2015.

103. Lara C.Pullen, "New End-of-Life Discussion Codes a Step Toward Reimbursement?," Medscape.com, http://www.medscape.com/view article/832017, accessed July 24, 2015.

104. “死亡判决”（Death Panel）一词来自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她指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是削减老年人医疗费和拔掉他们临终呼吸器的“死亡判决”。——译者注

105. Institute of Medicine, "Dying in America — Improving Quality and Honoring Individual Preferences Near the End of Life," Iom.edu, http://www.iom.edu/Reports/2014/Dying-In-America-Improving-Quality -and-Honoring-Individual-Preferences-Near-the-End-of-Life/Re port %20Brief.aspx, accessed April 12, 2015.

106. Pam Belluck, "Panel Urges Overhauling Health Care at End of Lif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9/18/science/end-of-life-care-needs-sweeping-overhaul -panel-says.html, accessed January 26, 2015.

107. Alvin Tran, “We're No.1, Not in a Good Way: Highest Hospital Administrative Costs,” WBUR, September 8, 2014, http://commonhealth.wbur.org/2014/09/us-highest-hospital-administrative-costs,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108. Ibid.

109. Ibid.

110. Steffie Woolhandler, Terry Campbell, and David U.Himmelstein, “Costs of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9 (August 21, 2003): 768 - 75,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sa022033,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111. 美国传统的医保是病人先付医疗费用，然后医保公司全额补偿给病人，称为“补偿性医保”。由于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院和医生收费虚高，现在市场上以管控型医保（Managed Care）取而代之；它对病人、医院和医生设置费用门槛，目的是压低医疗费用，谋求医保公司的自身利润。管控型医保减少了滥用医疗资源，但是如果做得过分，会耽误病人的合理治疗，造成严重后果。——译者注

112. Jeffrey Pfeffer, “The Reason Health Care Is So Expensive: Insurance Companies,” Bloomberg Business, April 10,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4-10/the-reason-health-care-is-so-expensive-insurance-companies, accessed April 12, 2015.

113. 2014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s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Hospital Insurance and Federal Supplemental Medical Insurance Trust Funds, July 28, 2014, 85, http://www.cms.gov/Research-Statistics-Data-and-Systems/Statistics-Trends-and-Reports/ReportsTrustFunds/downloads/tr2014.pdf,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114. 老年医保的提供者有政府和许多私营医保公司，投保者们的经济能力也各异。——译者注

115. 美国的医保分为A、B、C、D四个部分。A（住院）和B（门诊）是联邦的医保，C是私营保险机构办理的医保，D是药费的医保。——译者注

116. 《平价医保法案》由奥巴马总统在2011提出，强制美国5000多万无医保者参保，要求18岁以上的公民终生购买医保，政府给贫困者补助，保险

公司必须接受已有病者参保。此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译者注

117. Henry J.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Explaining Health Care Reform: Medical Loss Ratio,” February 29, 2012, http://kff.org/health-reform/fact-sheet/explaining-health-care-reform-medical-loss-ratio-mlr/,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118. 美国的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的费用完全是由政府支付和管理的。政府是“单一付款者”。——译者注

119. 医生成为政府的雇员，在医疗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可以节省医生的防御性保险费。——译者注

120. Margaret A.Hamburg, “Celebrating 30 Years of Easier Access to CostSaving Generic Drugs,” FDA Voice, September 24, 2014, http://blogs.fda .gov/fdavoice/index.php/2014/09/celebrating-30-years-of-easier-access -to-cost-saving-generic-drugs/, accessed July 24, 2015.

121. Steffie Woolhandler and David Himmelstein, “Why Canadian Hospitals Outperform U.S.Hospitals,” HealthAffairs, December 14, 2014, http://sph.cuny.edu/2014/12/14/why-canadian-hospitals-outperform-u-s-hos pitals/, accessed January 28, 2015.

122. “分裂系统”指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是公营的单一付款者系统，医保则既有私营又有公营。——译者注

123. 享受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的人不知道国家为他们提供这个服务花了多少钱，因此他们会大量利用这个服务，花自己看不见的钱。——译者注

124. See the Liebowitz source in note 14.

125. “三个变量”是指共同付费、自付额和投保费。医疗补助只给财产少于2000美元的困难户免费，对于财产超过2000美元的人还是要收取费用的。——译者注

126. 医疗保健费用的收支涉及三方：甲方是病人，乙方是收费的医疗部门，丙方是负责医保、老年医保和医疗补助的政府医疗保健系统。第一方即甲方。有了第一方分摊支付，享受医保者就在过分使用和过分花费方面稍微收敛一些。——译者注

127. 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根据投保者缴纳的保费确定保险公司的支付额和相应的投保者自付额。投保者用完自付额的同时，保险公司也就不再提供支付额。此后，投保者在这一年就必须全额自付。——译者注

128. Nathaniel Weixel, “New CBO Report Projects Long-Term Decrease in Medicare Spending Growth,” Bloomberg BNA, http://www.bna.com/new-cbo-report-n17179894686/, accessed January 29, 2015.Also se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Update to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4 to 2024,” August 2014, http://www.cbo.gov/sites/default/ files/cbofiles/attachments/45653-OutlookUpdate_2014_Aug.pdf, accessed August 2, 2015.

129. PBS, “Sick Around the World,” Frontline,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ickaroundtheworld/, accessed January 29, 2015.

130. Ibid.

131. Ibid.

132. Ibid.

133. Ibid.

134. Sharon Willcox et al., “Measuring and Reducing Waiting Time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Strategies,” HealthAffairs 26, no.4 (July 2007): 1078 - 87, http://content.healthaffairs.org/content/26/4/1078.full, accessed July 24, 2015.

135. Cited, with attribution, b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Director Peter Orszag at the Health Reform Summit of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 U.S.Senate,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 June 16, 2008, 3, http://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06-16-healthsummit.pdf, accessed August 4, 2015.

136. 制药公司捐款给竞选的议员们，使他们当选后阻止限制药品公司利用专利权谋取大量利润的法案获得通过。——译者注

第五章　金融改革

目前美国金融格局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巨型银行、不透明的对冲基金以及不可思议的杠杆衍生品交易。这些对国家发展、财富分配或商品经济都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没有一种是必要的。事实上，这3个导致过度和不稳定的因素，都是美国政府过去的一些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没有一个人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察觉它们的潜在危险。银行、对冲基金、衍生品交易的规模和影响力应该被削弱。这样做对美国人民有利无害。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谈到金融危机时，人们专心地听着。他传达的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阐述他将如何“彻底清除投资领域中的不良因素——银行系统、证券销售、蓄意鼓励证券投机、推销不良房贷及使公众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其他许多方面的不良情况”。注他召集了一批知识分子、老谋深算的前交易员和精明的政治人物，进行规模空前的金融部门改革。虽然使一切必要的规则和执行机构就位花了比他事先设想的更多时间，一个关于限制杠杆率和提高透明度的新体制被极其出色地建立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正确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确立的金融监管计划有助于保证国家在约半个世纪内有强劲、稳定和可信赖的金融市场，支持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民经济增长时期。

金融市场的作用是以明确的商业方式支持经济增长及促进实体经济活动。除了通过零和博弈从其他领域牟取利润，金融市场本身不生产产品，不会导致国民收入和财富大量增长。然而，金融市场是自由市场经济系统运行的主要润滑油。没有银行、金融票据市场和消息灵通的投资者们，资本主义将停滞不前。罗斯福总统及其团队对付的不是这些方面的缺乏或不足，而是它们的过度和滥用。一台机器有恰当容量的润滑油就能平稳地运转。润滑油太多会毁坏机器。金融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失控。随着股票市场崩溃和紧随其后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清算的时刻在1929年10月来临。由于许多相似的原因，2008—2009年也发生了自那时以来最糟糕的股票指数下跌。1929年政府吸取了教训，并在当时将其体现于公共政策制定中。这些教训与从2008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不尽相同。

这次崩溃涉及我本人。我从事金融市场监管工作多年。我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任职时曾试图使其他有实权的人相信，衍生品的过高杠杆率和缺乏透明度对我们的经济稳定是一个威胁。我的努力没有成功。回头看，这应该不足为奇。我在那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不出名的监管者，见解多于实证，也没有能力取得基本群众、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支持。在对立的那一边是竞选捐款人的

强大洪流及影响力日增的金融贵族，他们恼恨人们质疑他们的收入，并且正在酝酿全国性反对各种政府监管的转型革命。这不是罗斯福时代。

所有人都警告我不要逆风行事。他们说，一个人必须聪明地选择自己的战斗。失败对于头脑的损伤大于撞墙。反对我继续努力的第二个论据是，世界已经变了，对“罗斯福新政”的赞美已过时。世界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当然已改变了，需要用一些新的做法去应对。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时代，罗斯福政府采用的核心理念的一些主要成分并未过时。20世纪30年代采取的一些原则本来可以是对付2008年金融危机的有益参考，如果两党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抛弃它们。回到低杠杆率和高透明度，加上一些其他的改革，对于防止下一次可能更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必要的。某些“赞美诗”和关于市场的真相是持久有效的。

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家们知道，对于银行系统的信任需要政府提供保证并限制银行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还极其担心股票市场内的骗子和过高的杠杆率。

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情况是很恶劣的。恐慌从华尔街传播到整个经济体。失业率在最高峰时达到25%，而且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们。[注]作为对比，1929年经济崩溃前的失业率是3%。[注]GNP在1929—1933年4年间跌掉了将近一半，[注]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有些银行带走了存款者毕生的积蓄，还有3000家银行被兼并入其他银行。[注]与此同时在国外，法西斯政府统治的意大利、德国及日本，军队处于备战状态，而斯大林在苏联镇压最后一批唯心主义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那时，甚至有人担心我们自己的民主共和国不能幸免。我时常向抱怨我们当前面临日益艰巨的国内和国际挑战的朋友们指出，虽然我们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但是这还不像我的父亲从法学院毕业时所遇到的“大萧条”最严重时期那样坏。

在“罗斯福新政”之前，银行通常规模较小且资金不足。那时没有储蓄保险。你作为一家银行的客户，如果它倒闭，你就干脆直接失去你托付给它的一切。那时也有较大的以投资业务为中心的资金较多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产生另一类问题。它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为公司客户包销证券，即购买公司客户新发行的证券，并且（通常是马上）把这些证券溢价卖给外界的投资者。那时的银行往往利用吹嘘、承诺盈利的手段，把大部分的新证券推销给潜在的买家，其实它们明白，即使推销活动不成功，还能把未售出证券塞进由同一家银行管理的信托账户。信托账户往往在已逝世的委托人名下，他们往往是容易被说服的购买者[注]。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自己具有唯一的或者与一家法律事务所共有的信托决策权，这使它可以在涉

及舞弊时把有利可图的法律事务抛给后者处理。

各种冒险活动在股票市场更加猖狂。大量投资者在股价永远不会跌的幼稚幻想中被套住，无良贩子能把任何证券卖给他们。那时的经纪人没有许可证也不进行注册，而且只有对其很少的监管。证券公司往往像是电话银行，即所谓的“提包公司”，对易受骗的目标客户散布虚假的信息和不诚实的建议。同样重要的是，那时对于经纪人的保证金贷款[注]没有限制。这意味着投资者们可以几倍或许多倍地购买股票，只要他们承担得起。投入1美元能在任何上市公司中购买价值数倍的股票。个人或公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金融票据仓位的全部价值与他们为保持这仓位而必须投入的现金之间的差别被称为杠杆。杠杆在我将论述的金融改革中起巨大的作用，值得我在继续叙述之前先做一些解释。

如果用10000美元购买100股股票，股价涨了50%，那么股票的新价值是15000美元，即在初始购买价值基础上赚取利润5000美元，它代表在这项投资上有50%的收益。如果不是涨价而是跌价50%，那么最初的10000美元缩减至5000美元，这是50%的损失。这个例子是没有杠杆效应的投资。

下一步，请设想你做同样的购买，但是你借了7500美元购买这只股票。你只需投入2500美元现金去购买价值10000美元的股票。现在，对于股票涨价50%做一个计算。股票像在无杠杆时一样值15000美元，但是你只投入2500美元就赚了5000美元，所以你得到200%的收益。另一方面，如果股价跌了50%，总价值只剩5000美元，你在2500美元的投资上损失了5000美元，所以你的损失是200%。这是杠杆的作用。它潜在地大大增加你投入现金而赚或赔的百分比。无论借来的钱是否付利息，在目前这样的低利率时期，这并没有多少差别。

为了使这个例子完整，请设想你在弄清楚这一切后准备做无杠杆效应的10000美元投资。你极其自信地选择了一种绩优股票。所以，你不是借7500美元和投入2500美元现金，你借了30000美元并投入你最初拥有的全部10000美元现金，买了4倍价值的股票。你说，你负担得起建立40000美元的仓位，因为这只要你开出你先前准备好的同一张10000美元支票。现在，当股票涨了50%时，你赚到20000美元，是无杠杆投资现金收益的4倍。漂亮的买卖，不是吗？问题当然在于如果股价跌了一半，你损失的20000美元吃掉你原有的全部10000美元赌注，你还欠30000美元。你能按刚降低的股价以20000美元卖掉股票，把它还给贷款人，但是你仍将有10000美元的逾期未偿债务。你可能愿意持有股票，等待价格反弹。但是，如果你不能立即从另一个渠道筹到现金，这个贷款人将是你何时清仓的决策者。这类似于在失败后被剥夺权利，不管你是否愿意。类似你这样做出错误决策的其他投资者也被迫卖掉股票，这将促使股票价格更大幅度

下跌，这又可能导致更多的投资者赶紧卖出股票。这是杠杆的邪恶面。

在1929年初，我的祖父约瑟·斯通（Josh Stone）退休并且卖掉了他的制造产业，把他的几乎全部收益通过保证金贷款投入股票市场，大体上就是以上述方式。我不知道他借款或投资额的实际百分数。然而，你可以猜到结果如何。我的父亲，在那一年的2月满21岁，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1000美元的生日礼物。他的父亲在11月份要求他退还这笔钱，因为我祖父的财富在经济崩溃的头几天里一扫而光。他艰难地承受下来，再也没有工作。那时许多人跳窗自杀。

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改革包括：限制股票市场的杠杆率，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监管证券业的行为，制定国家特许银行的存款保险机制及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运作。

在罗斯福总统及其团队推行的最基本改革中有保证金的限制。在1934年，对于购买公开上市交易的股票，规定了最少应有45%的现金付款。自那时起，对保证金的要求时有变动，但是从1974年至今，投资者购买股票必须交50%保证金的要求一直保持着。注1934年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不仅是为了执行系统性的规则，如保证金要求，而且是为了监管经纪人的行为。那时期采取的举措包括：关闭提包公司，测试经纪人的能力及其对于规章制度的了解成为颁发经纪人许可证的条件，还为了把害群之马从这个行业赶出去或绳之以法而成立了执法部门，禁止内线交易。

同时，联邦政府通过设立存款保险解决银行业的缺陷。没有存款保险，银行的客户们听到银行岌岌可危的谣传，就有挤兑的风险。即使一家银行实际上没有麻烦，它也顶不住这样的“挤兑”，因为它在没有首先召回它贷出去的款项之前无力偿还所有存款。然而，贷款通常都是有时间条件的，不能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全部贷款。存款保险消除了客户因谣传而发生挤兑。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e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于1933年成立。

与此同时，国会禁止商业银行包销或分配公司的证券。内容广泛的1933年《银行法》（*Bank Act*）的这一部分内容长期保留着两位领头发起者的名字，现在仍被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注（*Glass-Steagall Act*）。注它有效地结束了未包销出去的新上市股票被堆积在银行的信托基金内，同时使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免受包销的影响。把商业银行从投资银行中强行分割出来，导致单独的实体摩根士丹利注（Morgan Stanley）及从一个家族贸易公司最终成长为世界巨人的高盛注

（Goldman Sachs）于1935年成立。这两家公司将在我的一生中处于投资银行业的前列。投资银行不受政府保护，它们的业务可能有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商业银行被预期在较低的风险程度上运作以保护存款者，并同样地保护新的联邦保险业者。这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核心。

联邦政府在1940年开始系统性地监管投资顾问业和投资银行业。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仍然适用于互助基金业。对于投资者和银行存款者，这个法案及早些时候的一些改革为一个健康、安全的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

在1929年经济崩溃后，罗斯福政府于1940年创议的最后一组重要举措是通过国会制定了《投资顾问法》（*Investment Advidory Act*）及同一年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法案催生了现代的共同基金，我将把这两个法案合在一起叙述，因为它们主要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对于汇集的属于投资者们而不属于管理者们的资金，这两个法案规定了允许的和禁止的操作。1940年《投资公司法》禁止投资公司买空卖空(注)及利用杠杆和向投资者募资控制商业企业。投资公司管理的资金要求在SEC登记，并详细报告基金的结构、情况、投资组合及投资政策。基金管理者必须按照《投资顾问法》注册，并遵守该法案对行为和透明度的要求。这两个新法律还涉及投资公司的管理、委托独立董事及限制给予投资组合管理者的报酬。《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像罗斯福时代的大多数改革一样，现在依然有效，除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但它们的重要性仍在逐渐消退，与其说这是对法案的废除，不如说是有时有回避和例外的情况。

在1933—1940年间立法的这些改革为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华尔街赢得了或者说重新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曾反对政府侵犯他们的业务的银行家们逐渐开始感谢因此获得报酬。20世纪40年代及此后几十年是金融市场及其机制强有力的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在我有了初步的华尔街经历（作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订单接送员）时，SEC是最受尊敬的政府部门，甚至证券公司老板们也不得不对SEC监管人员的智慧和正直表示勉强的赞赏。虽然他们时常抱怨SEC是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过分难缠的监管机构。然而，当我坚持要求他们举出监管部门无理纠缠的事例时，他们通常说不出来。我的结论是，令人畏惧的SEC监管部门恰恰在一个充满诱惑的金融中心保持了正直声誉，这奠定了其此后运行的平稳基础。与此同时，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成功使银行倒闭的威胁在公众心目中消退。“大萧条”触发的金融改革是政府行为编年史中非同寻常的正面故事。或者，至少在其开始解体之前是这样。

证券业和银行业的这些改革本来可以在此后5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完好

无损。但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对冲基金在许多年里大体上未被注意到或者被认为是无关大局的，从而撒下了放任的种子。最近，对冲基金被要求作为顾问机构在SEC注册，但是它的投资和买卖活动依然不受适用于共同基金的实际监管。对冲基金的丰厚报酬导致华尔街其他机构的危险仿效。

金融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从有序倒退到不负责任，从作为商务活动的服务员转变为经济的主人。政府采取的措施没有一项可以被定性为削弱限制。没有一位总统或一个政党能被公正地指责为故意杀掉“下金蛋的鹅”。十几个或更多的错误步骤，使我们在2008年登上金融危机的悬崖。它们值得被回顾，不仅因为最近的崩溃在其余波中伤害了中产阶层，而且因为这次崩溃还有重演的危险。

第一个错误步骤是允许引入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40年通过的那两个法案。SEC和国会的改革者们在那时曾打算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允许一个巨大的投资业在他们监管投资公司的新方案之外兴旺成长，但是他们无意中播下的恰恰是另一类果实的种子。这些种子被包裹在给予私人顾问和小额集资者的似乎无害和善意的豁免之中。编写一个合乎逻辑的剧情是容易的。要求投资顾问们和资金管理者们注册，而且相应的监管规则清楚地旨在涵盖受他们管理的大宗金融资产。监管投资管理者们的行为及其报酬的许多规则保护着天真无辜的投资者们（有时戏谑地称他们为“寡妇和孤儿”）以免上华尔街骗子们的当。对于透明度也有与路易斯·勃兰代斯[注]（Louis Brandeis）的格言“阳光是最佳的消毒剂”一致的广泛要求。

请设想，你是一位立法申请者，一只眼睛看着它的潜在效力，另一只眼睛注视着加快必要的国会批准进程。你接受富裕家族的代表们的来访，也许带着一个像杜邦（DuPont）或洛克菲勒（Rockfeller）那样高贵而熟悉的姓氏，他们请求你给予豁免。他们指出，这个家族的钱由一个家族办公室管理，客户中没有“天真的投资者”。他们解释，透明度将保护的是不需要保护的人，透明肯定会导致并不希望得到的外界注意，甚至可能增加使这个家族的孩子们成为绑架牺牲品的危险。[可怜的林德伯格[注]（Lindbergh）家婴儿的残忍死亡曾出现在1932年各大媒体头条。]他们说，如果有合适的豁免条款，这些富裕家族不反对关于透明度的立法。因注意到政治的现实和论据的合理，你可能会满足他们要求豁免曝光的愿望——我也会同意。

但是，任何一个好的改革家可能会问，确实应该有只对最有特权的美国家族有利的一项豁免吗？从逻辑和基本的正义上看，这个案例可以无任何伤害地普及到所有的“天真的投资者”。于是，监管豁免条款就可以与家族声

望无关地被客户不多于100个的全部集资者所利用，只要他们不以任何公开上市的方式招揽更多新的投资者。客户足够少的投资顾问们类似地得到《投资顾问法》的豁免。这些豁免在开始时是无害的，只涉及投资市场的极小部分。

后来，在1948年，《财富》杂志的一位特别聪敏的年轻记者阿尔弗莱德·琼斯（Alfred Jones）决定试试其在管理他人财富方面的技巧，他看到了豁免提供的潜力。在1952年末，他作为资金管理者设计了一个结构，使他能做《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禁止的几乎每一件事。根据市场的普遍动向，他两面投注：他做空（当他的股票贬值时赚钱）及做多（股票价格上涨时带来利润）；他利用杠杆以扩大可能的上涨（及下跌）效应；他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而不是共同基金或全面的伙伴关系。他得到的报酬是年费及超过预定利润部分的20%。值得注意的是，自那时起没有一个资金管理者对琼斯的结构创新加以重大的改进。它几乎是每一个现代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模板；而且，在最初打算只提供给极少数人的一系列豁免的保护之下，琼斯基金的这些追随者几乎完全处于监管之外。只是自2012年起，对冲基金的管理者被要求作为投资顾问在SEC注册，他们在注册后只被要求提供很少的公共透明度。对冲基金依然不受《投资公司法》的监管，它的管理者也不受《投资顾问法》的实际监管。

然而，使用“对冲”似乎是一种用词失当。它意味着通过包括做多和做空的组合投资（“对冲”的原意）防备市场重大波动引起的冲击。实际上，琼斯使用这个词的本意是有些股仓升值时另一些股仓会贬值。目前允许对冲基金这样做，但是投资管理者们实际上可以选择或不选择同时做多和做空，因此这已不完全是经典意义上的对冲。他们大多数利用杠杆和采用支付业绩的有限合伙形式保持着琼斯的投资技巧。当你听到“对冲基金”这个词时，请记住它的最佳定义：对冲基金是为许多投资者提供在《投资公司法》实际监管范围之外的专业资金管理工具。简而言之，对冲基金的主要部分就是不受监管的基金。

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冲基金的规模急剧增长，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它们的运作依然不受监管。渴望赚钱的资金随手可得，它与对冲基金的不透明性相结合，使违反公众利益的行为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

1968年有100多家对冲基金借用琼斯的投资结构，不过大多是小规模的。它们的资产并未大规模增长，直到约20年后的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的老虎基金（Tiger Fund）成为华尔街的焦点。由于对冲基金仍保持最小的透明度要求，我只能密切关注它们控制的资产。但

是，“巴克莱对冲”（Barclay Hedge）公布了一个大约的估计值。根据其1997年的数据，世界上被对冲基金管理的投资者资产只接近1200亿美元。如果这看似是一个大数目，请继续往下读。就在那时，出现了另一个逻辑上的不一致或潜在的不公正，这就像限制一项重要的豁免对权贵家族成员们的适用性必然使《投资公司法》的制定者不满那样。为什么对冲基金显然高于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只能被富裕人群获得？于是，许多大学跟随一些富裕的个人投资对冲基金，后者是对冲基金的初始参加者。退休基金也持续跟进。归根结底，它们能比那些有钱的个人更能经受投资失败，而且它们的投资利得是由广大的美国辛勤劳动者共享的。“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系统”（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Retirement System，CalPERS）成了早期的开拓者。《投资公司法》在1996年被修改，把客户限于“有资格的投资者们”的那些基金排除在监管之外，允许扩大参加者的数量，只要他们被认为是足够能抵御投资风险的。对冲基金的客户因此大幅度增加。

到了2004年，在对冲基金的资产达到1200亿美元之后仅7年，它的总资产达到了1.2万亿美元，10倍于前者。自2004年以来，经历了2008年的下挫之后，这个数字还是又增长了1倍。对冲基金的资产在2014年达到了2.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世界上只有4—5个国家的GNP大于这个数字。1940年投资法的立法者们如果听到事态已如此演变，会做何感想？你也应为此感到不安。

首先，退休基金使许多易受损害的“天真的投资者”进入了不受SEC监管的对冲基金。这使得豁免监管的整个理念成为某种笑柄。SEC是值得给予一些称赞的。在约10年前，它对于为了豁免而把参加有限合伙的一些投资者当作一个单独客户的概念发起了温和的挑战，但是作用不大并太迟。“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巡回上诉法庭”（U.S.Court of Appeal for the D.C.Circuit）认为这个扩大的监管超出了SEC的法定权限。众所周知，许多“天真的投资者”为其未来生活而把钱存放在退休基金中，而退休基金本身可以把钱投入某只对冲基金，成为后者的许多有限合伙人之一，但是这只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可以声称只有一位富裕的客户。此外，同一只对冲基金管理者还可以在通常的管理之下继续募集资金，每次只算作一个单独客户。

可以肯定的是，1940年投资法的立法者们永远不会认为今天在对冲基金管理下的大量资产符合豁免标准。此外，请别忘记，可获得的关于对冲基金规模的估计只涉及它代表客户管理的资产，而不是它控制的资产。被对冲基金控制的资产是它管理的总资产的许多倍；这就是杠杆的魔力。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冲基金领域内的运作是在“没有阳光消毒效应”下进行的。

不道德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比共同基金管理者更不会放过内线交易的机会，诱使管理退休基金的公共官员作为有限合伙人参加，更夸大过去的回报率或不诚实地逃税。我在华尔街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恶行是他们就近看到的某些对冲基金的主要手段。这类传说难以当作证据，因为“冒烟并不一定有火”。问题在于受监管的理财世界是对公众公开的，而对冲基金的情况是不公开的。在一些充满欺诈的案例中，基金的管理者在向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年轻职员贿赂以取得将影响股价的公司兼并信息时被逮住。这个基金管理者在犯罪而被逮住时将会被起诉，而且记录将被公布。所以，我们肯定能搜集一些这样的故事。你可以相信这些公然作案的事例不多，而且通常会被逮住，这类情况的记录反映了实际情况；或者，你也可以猜测我们在公开记录中能观察到的非法行径只是冰山一角。

毋庸置疑的是，一些盛行的聪明的投资策略是合法的，但或许这不应被允许，它们为市场的少数参与者提供优势而损害另一些参与者。你可能会涉及其中，如果某人利用可疑的手段抽走一部分你本来可得到的投资回报，那么你从自己的直接投资或传统的共同基金中的间接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将被降低。由于对冲基金不透明，而且其行为不受监管机构监管，所以主要流传的是逻辑推断和传闻。但是，因我从华尔街听到这类故事太多而不能不相信它们。这里是几个实例。一位华尔街的老手描述过，一家对冲基金支付薪水给全国各地的酒店服务员，请他们把一家大公司的财务高管访问有潜在兼并目标的城市的信息提供给这家对冲基金。多次访问可以为可能的收购活动提供足够详细的证据，从而导致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信用卡公司的信息对于这种目的能起更有效的作用。我被告知，有信用卡发行公司考虑向其支持的对冲基金提供它的信用卡。许多基金在交易所附近购买办公室，为了能在有轰动的新闻时抢在普通投资者之前几秒钟下单，或者在普通的商务进程中超过竞争的对冲基金。

一位财务主管告诉我，许多对冲基金下的订单数比它们实际要兑现的订单数要多几千倍，以便在得到一个买进或卖出的信号时使它们的订单数目居于最前面。这一大堆订单在交易真正发生前一秒钟被取消。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转资金并且塑造模糊的海外投资伙伴能帮助某些基金逃税。在SEC监管下，几乎听不到投资公司有这些行为；而当真相被揭露时，就能看到对冲基金的上述几种行为。这些行为，不论多么聪明，没有一个能为经济创造一点儿价值。

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战胜市场是极难的。只有在无人投资之处投资得足够巧妙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位有天赋的投资者通过辛勤的基本研究也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合法的行为策略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本。尽管你可能从交易员那里听到无稽之谈，对冲基金在市场上带来的交易量与公众利益无关；同样无用的是据说能在几秒钟内谋利的套汇。非正统的对冲基金交

易的纯粹效应是从我们这里拿走回报，降低投资的吸引力，以及因此而减少市场为经济增长而提供资金的能力。

虽然利润、业绩不是社会效益的精确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冲基金可能无法通过这个最狭义的检验。不能确定的是，经过恰当的杠杆调整后的对冲基金业绩是否确实有时优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注]《经济学人》（*Economist*）周刊的一张图表指出，在最近的10年里，对冲基金即使未修正其杠杆效应，表现也很差。[注]它总是有一条钟形的业绩曲线，即有些对冲基金表现得非常优异，这些基金的优秀业绩被许多业绩差的基金抵消了。另一方面，无人怀疑对冲基金的结构能使对冲基金的管理者获利。在对冲基金充斥的时代，旨在限制报酬方式的1940年法案失去了约束力。结果是，对冲基金的头目成了美国的新权贵。这个国家收入最高的许多人来自这个成员稀疏的阶层。检视当今向两党竞选人捐款的高层人士或者著名文化机构的董事会名单，你将发现对冲基金管理者占优势，这在仅仅几年前是没有的。我喜爱的几家非营利组织是对冲基金伙伴们慷慨捐款的受益者。事实上，由于对冲基金管理者通常比富裕阶层的其他成员有更高的智商，我也许有点儿赞赏他们在整体上比其他的慈善家更有能力选择送礼对象。然而，这不是以牺牲其他投资者为代价给予他们豁免合理监管的理由。

此外，对冲基金的丰厚报酬的发散效应超过任何直接损害。正如我的一位华尔街朋友所说，在1940年法案约束下的常规基金管理者因羡慕投资银行家的高收入，于是把自己管理的基金办成对冲基金；商业银行家妒忌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管理者的高收入，于是也去做对冲基金（因为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不能兼营投资银行）；这样就产生了大量对冲基金。否则，对冲基金管理者的报酬对于世界的影响就会小些。所以，我在对冲基金业的朋友很快就提醒我，对冲基金不是2008年经济崩溃的原因。银行才是原因。

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规模庞大而不灵活的特征变得明显了。“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今天也成为“太大而无法管理”的银行，而且与多元化民主不相适应。这是被广泛承认的，但是规模效应的优势防止了规模缩小。但是，以这个优势作为维持其危险和臃肿身躯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

兴起冲击“新政”监管体制的宁静局面的第二个波澜来自银行界。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改革方案时，主要的担心是资金不足和无保障的小银行太多。“大萧条”时的一些改革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发起者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的改革最终会导致相反的问题。他们冲过了头。今天，一些主要的银行太大，而且受到政府提供的过度保护。在我年轻时美国约有1.3万家独立的银行。现在的数目减了一半多。[注]在1950年，5家最大银

行的资产总计不到200亿美元。现在5家最大银行的存款约有5万亿美元。只看一个例子，1950年最大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资产总计58亿美元。今天，美国银行是美国第二大的银行，它拥有的存款达1.1万亿美元。在1960年，10家最大的银行约拥有整个银行业资产的1/5。现在，它们的份额超过总值的2/3。这个变化的大部分来自银行对一些与公众利益越来越不一致的法律变化的反应。

像对冲基金那样，这个发展在开始时是缓慢的。在1930—1970年期间，一些最大的银行实际上增长得比整个银行系统慢。在此后的20年里，许多限制银行规模的法律和监管被废除了，银行业快速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银行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大萧条”前的《麦克法登法案》（*McFadden Act*）禁止联邦特许银行设立跨州的分行，而且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后来把这个禁令扩大到在它监管下的一切州一级的特许银行。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吸收家族办公室附近的存款同时发放贷款。当大公司需要更大量的贷款时，一些较小的银行可以参加由货币中心银行发起的巨额贷款。但是，当地银行和货币中心银行都不能跨越州界设立分行。有些州甚至禁止银行在本州内设立分行。在银行失利的情况下可以有些许小的例外，允许银行控股的公司设立跨州的办事处，提供非银行性质的贷款补助。然而到了1956年，这些禁令被认为在弱化；作为一个妥协，这一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修改为在州政府的明确批准之下允许有跨州银行。令人惊奇的是，直到1978年缅因州才首先选择采用该条款，授权设立跨州银行，允许外州的银行控股公司在那里营运和改善银行服务。

其他各州也很快开始取消对州内银行和跨州银行的限制。1994年的《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及分行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把对跨州银行的其他限制全盘取消。这个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自1997年起在任何州设立银行，还允许跨州的银行兼并。这是当今的巨型银行发展史中的关键性事件。1999年通过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撤销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它允许银行完全介入投资银行业及非银行业（例如保险业）金融活动。这两个法案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从此之后，“太大而不能倒”诞生了。

“太大而不能倒”的最明显问题是：你和我作为纳税人，被要求无条件支持牟利企业，即使它们过于冒险。这样就诱使银行过度介入经济，从而导致

几乎有可能用到纳税人的钱。假设存在一个“赌博”活动。这个“赌博”每年使投资者赢100万美元或输1500万美元，估计赢的年数和输的年数之比是10：1。那么，每10个赢年就有1个输年，使投资者把赢来的全部钱输光，还要赔上一些钱。这对于个人似乎是很没有吸引力的活动，对于银行就更糟。无论是谁，都会拒绝。如果你管理一家需要高度信用的信托机构，你出现在如此易受害的冒险场合就是愚蠢。

现在把神奇的“政府支持”用于这个赌博中，看看会发生什么。在赢的几年里，银行可以把利得用于支付股票持有者的红利或给它的交易员和高管发放奖金。奖金和红利被拿走而从桌面上消失了，其中许多钱无疑被用于个人投资、家族信托或奢侈的消费。最重要的是，这些钱在赌输的那一年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回来的。对于这家银行和它的存款人，这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可以请政府作为后盾。如果你只是银行的一个交易员，这件事甚至可以处理得更好。当坏的年份来临时，你可以从这家银行离职；如果你还在那里，你肯定不会是申请救助的高管。在坏的年头，你的奖金可能会被取消，然而，历史表明这甚至也不是必然的。它可能只是被改称为“保留待发的奖金”。

这个例子当然是过于简化的。银行及其交易员不会真正参与他们知道会成为长期输者的交易。特别是就银行而言，最近的政府救助大体上只覆盖市场恐慌时期，以后会全部归还给政府。只要有政府认真介入支持的可能性及存在赢年多与输年少的不平衡，就存在着对于不谨慎的投机行为的激励，即使在输年的损失将是巨大的。银行只要考虑到其在有风险的长期交易中看起来有可能是赢家，这些因素就将使其更热切地铤而走险。只要纳税人的钱包敞开着，而且因运营失败所面临的市场处罚能被政府缓解，交易员和银行高管心中的正常克制就会削减。有杠杆的交易活动可能造成大规模损失及非常规影响。每个银行家都知道一句古老的格言：一个借钱少的人是欠债者，一个借钱多的人是银行的伙伴。当潜在的损失尚可被处理时，政府是一个监管者，但是具有系统性后果的亏损威胁会把政府变成一个无法躲避的——即使是不情愿的——伙伴。

这一切都不应该是新闻。美国公众对“太大而不能倒”综合征有多少了解？他们只是似乎不能摆脱它。至少可以说“太大而难以管理”和“太大而危及民主”相伴相随。对于“新政”时期的改革者们，储蓄保险的信念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华盛顿的政策措施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反面和可预期的正面影响。储蓄保险无疑使存款者觉得更安全而不大可能出现挤兑，但是它也使银行有压倒其他中介机构的内在优势及一系列扭曲的冒险激励。归根结底，储蓄保险是受限制的救助衍生品，而且因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随着取消对开设分行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限制，银行业在之后一段时期利用储蓄保险的支持汇集了大量资产。那时，它们

在资产负债表中将简单的存贷业务转变到它们认为更有利可图的交易业务。利用杠杆，它们成为庞然大物。

银行达到如此的规模引起了明显的政治民主问题。每一个政客都知道，游说媒体进行报道的费用只是为施加影响而有效使用的一部分钱。重要得多的是公关、在政治选举期间做广告、大量的捐款以及其他筹款技巧。尽管如此，有意义的是指出银行位列花费最多美元的游说者之中。[注]据报道，银行2014年的游说费用超过6300万美元。[注]据估计，金融界在过去10年内在游说者身上总共花费47亿美元。[注]如果这还不产生影响，我将惊讶，游说者自己也会感到奇怪。

不寻常的规模还破坏良好的管理。任何“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肯定是大而复杂且臃肿得难以管理的。我认识许多介入管理庞然大物的银行界人士和董事。我知道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通常是天才，确实有职业道德，并力图负责地做好他们的工作。然而请相信我，没有一位首席执行官或董事能监管这样的企业并保证避免系统性伤害，无论他多么有知识、才能和诚信。政府的任何监管机构也做不到。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困惑于为什么银行的行长们不能“以对银行本身也有利的心情保护股民们的权益”。这就是给他的答案。[注]2012年，摩根大通集团（JP Morgan Chase）的几个“魔鬼交易员”造成了尴尬的90亿美元损失[注]，这不是对该银行内高级执行官的才能或诚信的一个谴责。这是在证明，即使华尔街最成功的商业银行也不能恰当地管好自己的巢穴。不仅仅是相对于银行的执行官们，相对任何人的利益，这些银行都太大了。

这不仅是那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积极分子的观点。一些在世界上公共领域中最受信任和最有经验的银行业专家对于过大的规模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前主席比尔·伊萨克（Bill Isaac）说，银行变得“太大而无法管理，太大而不受监管”。[注]FDIC的副主席托马斯·霍尼格（Thomas Hoenig）建议干脆把那些最大的银行拆分。[注]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一位有影响力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现任委员，建议限制银行依靠除了存款之外的一切来源而增长，并阻止未来涉及任何最大银行的兼并。[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前总裁理查德·费舍（Richard Fisher）曾被引用过的说法是，“我们必须对它们封顶或拆分，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使它们在行业中的相对份额缩小。”[注]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怀着令人钦佩的乐观主义宣称，“争论已结束，限制银行最大规模的决策已做出，剩下要做的都是细节”。[注]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梅尔文·金[注]（Mervyn King）爵士，现在是洛斯伯莱的男爵金（Baron King of Lothbury），在他任期届满后大谈他在职时了解到的情况。在金大部分任期内，没有人认为他是极端分子。他说，规模巨大的国际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比制造业更把“谋利放在人民之前”，银行业改革的失败可能将导致另一次金融危机。他还说，“市场纪律不能施加于每一个行业，除了银行业。”[注]金呼吁拆分这个国家的大银行，并有声有色地补充说，“除非英国的金融监管者，英格兰银行，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以确保金融稳定，否则它将像一个教堂——只能做‘不多于传道或安排葬礼的事’”。[注]

当然，争论总有另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回想不起除了银行高管或与银行有咨询合同的学者之外，其他人有不同论点。但是，这不一定证明另一面的论点是错误的。有两类相关但不相同的反面论点。一类论点是，复杂的现代商业活动只有依靠世界上那些最大的银行才能进行；另一类论点是，美国比现在更严地监管银行的任何企图，都将使企业转移到国外，或者消失在对冲基金和其他不受监管的公司化组织的影子银行领域中。

第一类论点几乎完全是诡辩。一些最大银行的发言人会说，他们的公司客户需要他们那样规模的机构和地理分布。这个争辩肯定是有些道理的，因为现在的企业比“大萧条”前更复杂、更全球化。但是，借助现在的通信技术，世界各地的银行在必须应对全球需求时更易通过传媒互相合作。为了筹集巨额贷款，可以在几个小时内组成辛迪加银团。没有一个公司客户会确实要求它在银行有1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仓位。重要的是，如许多高层次的投资银行和贸易公司所显示的那样，对冲技巧并不需要与机构规模成比例。

的确，现代世界不能简单套用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方案。今日人们关心的事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不需要为太多的小银行没有储蓄保险而担忧。类似地，把包销上市股票中的失误塞进信托基金不再被列入最令人担忧之事。如果要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隔，条款不得不被重新设计。现在需要复活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理念，而不是那个法律的精确原始内容。现在对于银行业稳定性威胁最大的不是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的组合，而是有储蓄保险的大量存款与高杠杆率衍生品交易的结合。

监管者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如果银行受到更多的监管或行为限制，它将搬到其他地方去。假如在过去一百年里你选举的众议员们听到过这种威胁，我们大概会没有所得税、没有社会保险或其他安全保障网、没有童工法、没有医保、没有任何一项“罗斯福时代”的金融改革。那么很容易争辩说，对公众有利的一切创新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企业能干脆拔营走人，投

入另一个“主人的怀抱”。管辖权的争执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只是在我们让它发生时。我们不必让存在于税率低、监管少的天堂里的企业购买我们自己的金融公司的控制权；在某些行业，如银行业，限制它们在这里的活动是不难的。此外，我认为有良好监管的金融市场是资本吸引者。今日的金融中心在哪里？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它们绝不是世界上金融监管最少的国家，这三国在监管方面都是严格的。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世界上相对正直、监管相对完善的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繁荣得益于能干的监管者、市场的正直和相对的稳定，尽管有前述那些问题。

这似乎是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太多的美国人觉得我们需要在一切方面都是第一。仅在20年前，华尔街的专家们和许多政客警告说，日本人将吃掉我们的午餐，因为他们的银行业规模大于我们的。日本人从未能享用这个预期的盛宴。相反，日本规模过大的银行助长了它的数十年衰退。一个国家受害于跟随这种鼓吹手的错误号角，日本不是唯一的例子。冰岛、苏格兰和爱尔兰都受过这个调门儿的蛊惑。假如必须有一场国际比赛以确定哪个国家的银行最大，我宁愿看到美国队弃权。

进一步监管银行业务将导致金融交易及其专业精英从受监管的银行转向影子银行的领域，这个论据值得相信。如果我们允许对冲基金和“影子银行”具有银行的许多权限，允许不受监管的投资公司吸走本应受1940年法案监管的公司投资的资金，以及对海外美国经济实体一视同仁这确实可能发生。然而，有些人把这个论据说成是，由于我们天真地打开了谷仓的后门，我们现在不得不放弃关闭前门。较好的回答是关闭那扇后门[注]。

在20世纪末，衍生品交易从比较小的农业合同扩展成为以金融票据为中心的巨大商务活动。在开始时作为合法对冲的农业合同规模现在已与任何有用的商务目的不成比例，并且冲破了合理的杠杆监管约束。

压倒谨慎监管华尔街的第三个波浪是由衍生品市场的爆炸式膨胀驱动的。设立CFTC就是要监管这个衍生品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过衍生品。虽然它们不算是新事物，但它们的系统性重要意义是相当近期的事。最基本的金融衍生品之一，期货合同，在国内战争之前就已在美国使用了。关于期货起源的故事，始于中西部的农场主及把玉米或小麦运往芝加哥销售的谷物装卸机司机。他们发现，在运送大量在途中易损坏的谷物之前，先与买主签订初始合同是有用的。收成，即商业术语中的“实货”，可能正在等待运输或者还在地里。大宗谷物的经纪人与供应者签订“期货”合同，购买小麦或玉米，事先约定适当的交货日期和价格。

确定未来商品价格对双方都有帮助。由于需要预估未来的供需、财务和储存费用及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期货合同的价格可能不同于当时或“现

货”的价格。在期货合同谈判完成时，双方均拿到一份载明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这份合同被称为待运送的实物商品的“衍生品”。今日的衍生品仍然基本上是一个合同，按最初签订合同时规定的价格在确定的未来日期买进或卖出某种更有形的（或更持久的）货物或合同本身。这个合同实际上不表达任何真实资产的当时所有权，它只是脱离实物本身的一个载体，这是“衍生品”的根源。

这个纸面上的合同，即衍生品，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可谈判的正式法律文件。如果你能在合同存续期间找到其他愿意并能够与你进行现金交易的人承接你的合同，你不必运送或接收谷物。事实上，作为买进或卖出期货合同的中介，你完全无须介入谷物生长和运送的业务。在合同到期时，市场只需确保合同的一方能交货，另一方准备接货和付款。在合同到期前，是合同的哪一方无关紧要，只要合同持有者们的财务可靠。

在衍生品合同有足够的数量时，当年为处理现货交易而设立的热闹地公开喊价的芝加哥交易所开始做衍生品交易。这个市场逐渐成长壮大，交易量增多，但是直到不久前仍主要做农产品交易。在1921年，国会授权美国农业部监管期货交易。其目的是防止可能伤害市场的违约、囤积和做空行为，以及防止出现恶意操纵价格。这个市场在整个20世纪持续扩大，增加了越来越多种类的商品交易。这些商品包括诸如咖啡、牛、鸡蛋、黄油、鸡、五花肉（即未切片的熏肉）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市场上期货数量最大的依然是小麦、玉米和黄豆。但是，此时转型变化即将来临。

如果你回想证券市场内的对冲概念，你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当交易员拥有某些份额的股票并做空某些类似的证券时，他们被称为在做对冲。在他们的总仓位中的一个部分贬值时，他们预期另一个部分会升值而缓解冲击。当一位农场主有粮食在谷仓里，他还有一份以固定价格在将来卖出相应种类和数量谷物的合同时，这位农场主就相当于在做对冲。有些人肯定看到了把期货市场从农产品扩展到金融票据的机会，有些人没有看到。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CME）的领导人，一位有不同寻常远见的名叫列奥·梅拉姆（Leo Melamed）的人，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鼓励，勇敢地在范围较小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增加货币合同交易。[注]后来，随着美国私人拥有黄金的合法化，有了黄金期货合同。[注]再后来，CME引入了以美国国债为基础的合同，实际上是关于利率的期货合同。[注]不久，国债期货成为交易数量最大的品种。今天，农产品期货占全球期货交易比例不足10%。[注]衍生品市场主要是金融期货市场。

SEC对证券市场的严格监管使股票不能进入期货市场。SEC已宣布对于股

票的期权交易有管辖权，它肯定要把它关于杠杆率的理念和完全的透明度扩展到以股票市场指数为基础的任何衍生品交易。按照一个交易员为掌控一项期货合同而必须存入的保证金或定金来衡量，期货的通常杠杆率大约是10：1。SEC的职员们不相信这是审慎的。在期货交易中不公开仓位，是SEC不满意的另一个方面。在期货交易中，内线交易不算是犯罪，它被认为是大宗农产品的常规交易所必需的。美国政府由于认识到SEC不是快速成长的衍生品市场的宽松监管者，便在1974年设立了CFTC。[注]CFTC的委员们，除了极少数，都愿意为衍生品行业的增长提供一种不符合SEC哲学的环境。在里根政府的早期，以股票市场指数为基础的衍生品交易得到CFTC的批准，当时我是反对的。此产品一经批准便与利率期货展开最活跃交易衍生品的角逐。[注]

对冲的概念在商务中有广泛的应用。一家航空公司可以购买油料期货以对冲喷气发动机燃油价格的快速增长；一家美国公司持有销售其货物而挣得的外汇，它可以用对冲的方法应对汇率风险。一家电力公司可以用对冲的方法应对冬季平均温度下跌可能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这个多功能性及其对于商业用户的明显效益就是期货市场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要急于下结论认为非金融业的对冲者们是这个市场的主要用户。

交易员们将告诉你，为了保持市场兴旺，市场上需要有投机者和套汇者。事实上，从事非金融产品的对冲者在今日的市场上毫无疑问只占未平仓持有者的一个很小的比例，虽然界线是模糊的。对冲基金和银行业拥有大部分仓位，难就难在这里。

我从未质疑过对冲基金的价值。“机器中的润滑油”的比喻在这里正合适。衍生品市场的合法性是难以辩驳的，但是其范围之广、不透明及其交易的本质使其成为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纯负面之物。这个市场是好东西过多的最典型事例。大银行的出现，以及杠杆率和透明度不受监管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两者几乎全部构成了在2008年来临的金融风暴之源。然而，银行不仅陶醉于衍生品交易。场外交易的衍生品甚至比场内交易的合同更少遵从规则和透明度。几乎毁灭了美国几家最大银行的产品是场外交易的房贷衍生品。

联邦政府自1938年起介入了房贷市场，那时设立了“联邦全国房贷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通常所说的“房利美”（Fannie Mae），并允许银行扩大它们发放房贷的额度。[注]最初的想法是，银行可以签署房贷合同，然后把它们卖给政府支持的一家代理商，以便释放出更多的能发放房贷现金。在1968年，一个名为“吉利美”（Ginnie Mae）的姐妹机构，即“政府全国房贷协会”（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改进了房利美的技巧，创建了第一个

房贷支持的证券。[注]这些都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它们的价值根据房贷组合的偿付水平而上涨或下跌。吉利美认为它能通过把这些票据公开销售给个人和公共机构以增加投资者的资本，从而加强其实际有效的资本基础。很快，政府支持的其他房贷机构也发行了房贷衍生品，银行业也积极跟随着它们。许多监管方面的改变迎合和加快了这个市场的成长，它曾被想象为能增加美国住房自有率。到2008年底，以房贷为背景的证券市场囊括了约11万亿美元的证券化贷款。[注]

农产品期货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播下的对冲种子长成了金融巨人。农产品不再是期货市场的基础，也不再作为主要的对冲商品，衍生品交易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力，即它的杠杆率或实际交易只受少许监管甚至不受监管。这个生命力的中心是一些大银行，它们不久前才完全介入衍生品交易。你也许能猜到银行在美国拥有的衍生品仓位超过它们资本的许多倍，但你可能猜不到是多少倍。你也许能想到SEC允许股票市场2：1的杠杆率。或者，你可能回想起衍生品交易要求约5%的保证金，这相当于20：1的杠杆率。如果是这样，你想错了。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数据是，美国的10家最大银行拥有的未平仓衍生品仓位的估值超过200万亿美元。[注]顺便指出，这个数目几乎是全世界GNP总量的3倍。[注]就摩根大通集团而言，其衍生品仓位的估值大于其资产的230倍。花旗集团（Citigroups）的这个值相对于该银行资产的倍数还要高一些。[注]

但是银行家们会抗议说，我们与这些估值所隐含的风险相距很远。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有当银行持有的每一种衍生品的价值成为零时，损失的估值才会是几万亿美元。这当然不可能发生，因为有些仓位对冲的是货币、房贷或银行拥有直接所有权的其他合同，其中的许多仓位至少能部分地被反方向变动的仓位所冲抵。所以，实际的风险是多少？什么是实际的杠杆率？

问题是，在政府、银行或其他地方，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际的风险程度和杠杆率。银行家们会告诉你，他们建立了复杂、精细的数理统计模型，可使他们获知，在相反方向移动的一些仓位被相对“套牢”后，他们暴露在多少风险中。一般说来，监管者们认为这些数学模型是有用和可靠的。他们把基于这些模型得出的数据作为真实的“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在监管记录中被简写为VaR）予以公布。问题在于数学模型的一些结果并不可靠。事实上，它们从来就不可能可靠。不精确不是银行的错误，也不是建立数学模型的那些杰出的怪才的错误。根本就没有任何方法能立足于过去的数据把巨大的互相关联的系统建成一个数学模型。数学模型从未能反映似乎是独立变量的一切互动关系，更不能预测群众的心理和地缘政治的动乱，也无法解决被混沌理论物理学家称之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所造

成的"蝴蝶效应"。

同样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基于过去数据的模型从未能预报未来。这些"黑天鹅"[注]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至少是数学模型建造者们的知识中没有的，因此在可能发生事件的清单中被遗漏了，直到它们被看到和记录下来。铁的事实是，我们生活的宇宙实际上能产生无数的这种黑天鹅，其中有一些有可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些数学模型显示出衍生品在大银行网络中的风险接近于零，这很可能不能给你安慰。把一些估值作为风险的主要量度不是很有力；但是，它们作为普通量度是不坏的。仓位的估值越大，风险和杠杆率也就越大。

自金融衍生品普及以来，银行业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银行依赖存款和发放贷款。直到20世纪90年代，发放贷款额几乎等同于吸收存款额。[注]现在，这个比例约为75%。[注]同样重要的是，非传统的银行活动，例如有杠杆的衍生品交易，曾只占银行总收入和纯收入的一小部分。一项研究显示，非传统业务在2010年贡献了5家顶级银行的约40%总收入和80%净收入。[注]银行摆脱依赖存款和放贷业务的转变是不可否认的。

一个来自我的职业生涯的有趣轶事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普利茅斯·洛克公司的老板们对于长期借债从未感到放心，它也从未需要借债。2013年，我们曾收到早期投资者撤回现金的要求。那时我们付得起这个费用，但是不想在那一年通过全额返销削减我们的证券投资组合。所以我们决定克服顾虑，借了4500万美元。我们寻求的是低风险的资产抵押贷款。最著名的大银行之一很快并很专业地提供了这笔贷款；但是为了确信我们得到公正的价格，我们把这个机会展示给另一家大银行。那家银行为此事组成了一个高管团队并向我们报告说，他们在此时不做新的抵押贷款，但是可以卖给我们一批衍生品，它能比借钱更好地满足我们的目的。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衍生品业务对于银行是如此有利可图。答案主要在于，对于这些衍生品银行是可以随意定价的。顾客无法核查这同一家银行从一笔相同的买卖中收了前一个客户多少费用。这是一个很低效的市场，它对衍生品合同的原始发行者们和市场的运作者们很有利。更糟糕的是，今日的购买者们倾向于买进多于他们需要的衍生品。衍生品的本质是零和博弈。没有一个人输就没有一个人能赢。银行在衍生品交易中的利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能只有一个赔钱的输家——购买衍生品的非金融企业。除此之外，没有哪一个输家可以损失如此多的财富。然而，这些非金融企业恰恰是真正的繁荣所依赖的经济实体。没有人强迫这些非金融企业购买如此多的对冲式保护。一些企业表现出通过购买过多的对冲合同而保护自己是完全自愿的。我们这些主张市场高效的人认为，过于急切的买

家、不透明的价格及失衡的复杂性是不吉利的组合。

当我在1972年作为一位保险业经纪人的顾问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访问美国的一些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并使它们相信它们正在购买太多的保险。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它们过度地覆盖它们的风险。它们似乎不理解每一次购买保险需支付交易费、保险公司的管理费及预期利润，这意味着如果它们尽可能多地从母公司的总资产负债表中取得能支配的费用（因此是自我保险的），则公司遭遇像火灾那样的灾祸时的预期损失将是最低的。但是，部门化的组织结构激励经理们使他们各自部门内的风险最小，即使这对于公司整体是低效的。现在的企业是精明的保险购买者，然而正是同样的错误思维使它们购买过多的对冲性衍生品。

请想象一家商业公司，它在挪威采购某种商品，在瑞典销售另一种商品，在两地有两个不同的经理。在挪威的经理购买一种衍生品以抵御挪威克朗（Krone）的升值；与此同时，在瑞典的经理购买另一种衍生品以对冲瑞典克朗（Krona）的贬值。两个经理都不知道公司应该用什么货币为这些衍生品付款，所以二者都有可能买得过多了，而公司作为整体实际上需要少一些的对冲，因为它已经有另一笔交易正在进行。如果碰巧有同一家银行出售这两种衍生品给这家公司，它的数学模型可能会显示，这两个仓位在历史上互相对冲得足够好，所以这家银行根本不需要记录其纯风险有一个增量。虽然这两种货币的名称听起来相似，但是它们实际上不会协调一致地变动。挪威克朗与瑞典克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样的：互相抵销的两种货币仓位对这家商业公司提供某种内在的对冲，而它在这个例子中忽视了这个对冲带来的损失；但是那家银行可能声称没有完美的对冲。

一些非金融企业通常不支持有助于治理衍生品收费过高问题的价格曝光，但是它们应该支持。因为价格透明和费用降低比保护它们想象中认为不可缺少的对冲战略隐私对于它们更有价值。在一切种类的商务中利用衍生品对冲确实能降低风险，就像保险单能降低风险那样；但是，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对冲合同才可能对客户和经济平衡有效：（1）它们被以公正和合理的价格卖出；（2）它们对于一个企业的纯风险的降低足以证明购买它们的费用合理；（3）在情况恶劣时它们能被确实负责任的经济实体卖出去，不需要纳税人的补贴；（4）它们对经济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不大于它们为对冲合同购买者消除的风险。近几年来的衍生品不能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约10年，CFTC曾寻求对某些直接交易的衍生品的影响做出评论，这是在编写监管规则之前的征询。当时的CFTC主席曾被另一些关键的金融监管者——有些人说话相当严厉——要求不再继续她的征询。尽管她表示希望核查此事，但任命她的财政部也拒绝她这样做。在财政部要求下，国会通过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

（*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 of2000*），有效地结束了她的探索，并禁止CFTC将来监管这些衍生品市场。这个法案与《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及分行效率法案》及《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一起成为错误地导致解除金融监管的可怕的三重奏。这三个法案释放了美国政府支持甚至鼓励的信号，它们的支持者即所谓的“金融创新”倡导者，虽然不否认有节制的审慎的对冲是有益的，而且像自助柜员机（ATM）及一些人寿保险和年金无疑对公众是有帮助的，但实业界为之做最坚决斗争的所谓创新实际上是提高保密程度、增加杠杆率及为逃税创造新机会。任何时候你听到更多的金融创新呼声时，我劝你表示怀疑。沃伦·巴菲特在把高杠杆率的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毁灭性金融武器”时，他接近于诉说真理。[注]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伤害了华尔街，而且波及全世界。虽然避免了另一次“大萧条”，但是甚至到现在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房地产衍生品在2008年掀起了这场风暴的最初汹浪，然而把这场风暴变成危机的是金融机构本身的弱点。风暴将会再次发生，但是有了健全的机构就可以避免危机。

这不是一本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或随后的经济大衰退的书。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这甚至不是关于国会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通过的那些改革措施的书。然而，2008年的一些事件和大致情况需要在此简要叙述，即使只作为我们现在是如何易受金融市场不稳定之害的备忘录。

我们可以从2007年的早期开始叙述，那时谈论的依然是金融市场“不合理的活跃”。那年的2月，有一些不祥的震荡。房贷中介“房地美”，即联邦住宅房贷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Freddie Mac），停止购买次优级房贷及与其有关的证券[注]。在7月末，私营评级机构开始注视依靠房贷支持的一些证券。最大的次级房贷创始者之一，全国金融服务公司（Coutrywide Financial）警告说，它正面临“困境”，而且华尔街的贝尔斯登银行[注]（Bear Stearns）撤销了几个专做风险房贷衍生品的对冲基金。2008年1月，全国金融服务公司基本上垮了。它在政府的强烈鼓励下被美国银行收购。在同年3月，贝尔斯登银行垮了，监管者们敦促其把剩余资产廉价卖给摩根大通集团。此后，财政部增加了它给房地美和房利美的现有信用额度，并宣布它将在必要时购买这两家中任何一家的股份。这些快速措施后来被证明是不够的。那时，很少人认为情况已变成全面的危机。[注]

随着金融危机中恐慌迅速蔓延，2008年9月成为最戏剧性的一个月。联邦住宅金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政府保护之下。美国银行宣布它将收购濒临垮台的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Co.），后者在股票零售经纪公司中数十年来一直是全国的领导

者。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一家顶级的投资银行和使房贷衍生品证券化的机构，申请联邦的破产保护。使几乎所有人惊讶的是，美联储授权把一笔850亿美元的贷款给予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以帮助它在位于伦敦的衍生品交易部门失利后能生存下去。

投资者们开始怀疑华尔街上的这些最强大的公司能否度过危机。精明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开始投下大赌注。由于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阴影，SEC禁止做空金融业公司的股票，而财政部则请国会授权挽救银行，根据银行的状况用现金购买它们陷入困境的资产。华尔街最受尊敬的银行家们，高德曼·萨克斯（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被匆忙邀请来成立银行控股公司。政府急于发出信号：他们将有政府在背后的支持。财政部宣布，如果有必要，它将确保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在2008年9月末，政府关闭了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 Bank，WaMu），它剩下的资产像贝尔斯登银行一样被卖给摩根大通集团。

2008年10月，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它立刻体现为一个救助过程。美联储建立了对商业票据发行者的流动性支持，并承诺划拨更多的解困资金给受困的AIG。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大量增加了储蓄保险的覆盖面。接着，美联储帮助关闭了排名全国第四的瓦乔维亚银行（Wachovia），批准更大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兼并它。财政部以TARP的名义宣布将划拨2500亿美元购买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股票。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戏剧性时刻过去了，但是它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才刚开始。

人们尤其是美国人，通常有太短暂的记忆力。太多的人已经忘记2008年的那些事件杀伤力有多大。首先，有大多数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经济价值的损失。由于普通股投资、房产和退休资产的价值下跌，美国的家庭平均损失自有净资产的1/3。GNP持续下降，直到2010年才恢复增长。资产价格在几年后才得以恢复，但是已永远失去了从更早的GDP和GNP高峰上再增长的潜力，这可能要以万亿美元来衡量。这里还不包括这次危机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在依靠银行业的一些国家之中，英国特别受伤，但是这个疼痛并不只限于一些金融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将阻碍新兴国家中约7000万人在2020年摆脱贫困。

美国的失业率从2008年初的5%上升到2009年约10%，而且年轻人和少数民族的失业率更高。在这方面，近来有局部的恢复；但是，危机时期

的损失及许多美国家庭遭受的持续痛苦是抹不掉的。有些经济学家估计，这个困难时期使许多公司从结构上调整它们的雇佣模式，以便能裁减长期职工或减少全薪的职工。以增强经济实力为目标的财政支出计划，使国债从危机前占GDP64%，在6年后上升至103%。注救助计划至少暂时地会调拨你缴纳的税金，去弥补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赤字。取消房贷的抵押权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只是在最近才平静下来。历史将记录这使人极端痛苦的险情。美国未曾经历过能与上次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拟的另一次的事件，但是它可能会经历。不能轻易忘记那些年的痛苦或幸免于更大得多的灾难。你肯定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在开始解除监管之前，金融系统得益于某种周期性的强劲，其他的经济部门也因此得以增强。这些都因杠杆率的增加而消失了。银行业没有维稳经济，而是听任无节制杠杆产生滚雪球式的放大效应，并且在市场经受价格调整时因连锁反应被迅速波及。保守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通常把好年景时期的利润保留作为抵消储蓄率和借贷较差时期的缓冲物，以帮助这个国家度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性震荡。银行随着许多业务转向交易活动，获利方式变为模仿对冲基金和贸易公司。高薪的财务经理和投资银行家的智能竞争给经济增加了压力。失去缓冲的硬着陆是对于经济安全的一个打击，这不仅威胁银行业的安全，对整个经济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

美国一些最大的银行现在已经不起金融风暴，但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本性将继续不时地产生风暴。银行的杠杆、资本不足、资产能瞬时逃入影子银行系统中，以及在银行内部对冲基金粗野文化的复制，这些都将降低似船的银行抵御海，风暴的能力。与此同时，海洋却并不更平静些。基本自由作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特征，其一部分是无视设立的谨慎规则而去冒险的自由权及利用偶尔会导致风暴的方法去测试自由的限度。自由市场将永远不会停止产生周期性的泡沫、流行的狂热、非理性的过度活跃、喜怒无常的市场、钟摆式的摇晃、风暴，或不时产生投资者不愿遇见的其他过分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的近因是住房市场上的一次爆炸，公众和金融机构的非理性及政府的一些幼稚政策在那里造成了一个大泡沫；但是，下一次风暴可能将在其他某个地方刮起。我们的一些金融机构在1929年以前曾是易受损害的。在那之后，它们曾有一段时间相当坚固，有牢固的船身和持久的压舱物帮助它抵御风暴。但是，自从解除监管的狂热占了上风后，它们成为极易受损的船舶，而船上有许多无辜的旅客。

使崩溃变成危机的机制性缺陷包括过高的杠杆率、肆无忌惮的行为、透明度不足及银行规模过大。政府的行政部门感到萧条的威胁使它不能处罚违规者或专注于结构改革以治疗这些弊病。国会只采取了温和的方法去抵御弊病。

“新政”改革使之最小化的一切危险又出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的10年期间的房地产市场上。杠杆率太高，透明度不足，放贷者和房贷保险业者的包销和风险分析能力差。房贷经纪人肆无忌惮的推销活动及支持他们的银行未受到类似对待股票经纪人那样的监管。还有一些新的风险隐患。名为“信用违约掉期”和（Credit Default Swap，CDS）“附加债务责任”（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的房贷衍生品复杂得甚至连它们的发行者都弄不懂。死板的银行未能像较小的机构那样灵活应对。它们只是做其他从业者做的事。对于危机时期前的银行业情况的最简洁概括是一家顶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的诙谐说法：“只要音乐正在演奏，你就得起来跳舞。”[注]当房地产价格最终由长期的爬升转为下跌时，音乐停止了。

政府实施了救助行动并修改了法律。蒂莫西·盖特纳[注]（Timothy Geithner）写了一本有教益的书，他在2009年的黑暗日子里接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虽然盖特纳在改革认知方面与我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给人以诚实清醒的思考者和可靠的报道者的印象。他担心的是，我们将陷入另一次“大萧条”；他觉得无论如何，即使他受到人身攻击，他也有责任使公众看到危机在发生前很多状况就被遏制。他看到萧条的前景如此有威胁性，这使他愿意承受指责而给一切有系统性重要意义的机构提供它们所需的救助。如果我的隐喻是海上风暴，他的隐喻就是火焰。他写道：

明确反对政府救助受困公司的人们认为，救助是奖励那些使系统着火的纵火者，而救助目标应该是保护无辜的人，即使某些纵火者逃脱了对他们的全部法律制裁。避免萧条的潜在利益远远超过救助那些不值得救助的人所花费的成本。这似乎是奖励无能和贪婪枉法，即使这造成的印象是一个失控的、撒钱的、救助狂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这么多的管理失误的公司。[注]

他在采取行动的次序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他主张必须立即扑灭上述隐喻的火焰。到2008年9月，显然确实有必要救出一些主要机构，以使出现“大萧条”的概率最小化，不管它们如何不得人心。这可以与使未来不大可能再出现危机的一些改革相结合，虽然我怀疑这可能使这些改革在困惑的人民中更不得人心。有些公众要求进行刑事调查，这在逻辑上来自纵火的隐喻，但是同样忽视了必要的结构改革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今日的一些法律，而不是来自把这些法律利用到极限的那些人。我同意英国中央银行行长梅尔文·金的观点，“不要在此把个别银行家妖魔化，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故障。我们集体纵容了银行系统变得太大，我们给了它太高的社会地位和名声，而且我们没有恰当地监管它，以保证它有足够的资金。”[注]金融罪犯肯定存在，而且无疑自2008年以来应进监狱的人要多于

已在那里的罪犯；但是，若有人认为一些动听的起诉将保护我们不再发生危机，那就太天真了。在一个像我们这样考虑不周的金融结构内，一些集团在法律范围内造成的危害比在法外多。

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国会，这导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出台。在立法过程开始时，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寄予过高的期望。由于政府依然专注于建立对制造麻烦和处于麻烦中的机构的信任，问题复杂得足以使立法者们及媒体同样困惑，许多公众对救助感到愤怒，两党的超党派性不健全，金融业的捐款人和游说者加强了努力；因此，国会从未展示出对根本性结构改革的明显兴趣。改革的努力方向是建设性的，但是历史肯定不会把它的成果与罗斯福时代的成果相提并论。

为了应对公众意见，立法者把主要重点放在避免未来的救助上；这存在一些问题，你不应对此抱有信心，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没完成。设立一个预期有用的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机构，采取一些温和的、有潜在价值的措施，增加银行的法定资本，主要是对付房贷经纪业的胡作非为。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建议的一种遏制银行用资本交易的规则被包含在立法内。对冲基金的经理们终于被要求在SEC注册登记，这是走向对他们的行业实施有效监管的一小步，但仅此而已。立法未能有效地降低杠杆率、银行规模和对冲基金的不透明自主权。在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后的那天晚上，我恰巧同一位拟定该法案的国会众议员在一起。他说，“吉姆，你是唯一给这个法案打B分的人，但是记住，这是国会50年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得到过的最佳分数”。

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至少像崩溃之前那样危险。大银行、高杠杆率衍生品及对冲基金保密的代价远远超过它们能带来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金融部门的整个规模与它的经济价值不成比例。它吸走了商业部门为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所需的利润。

看看我们剩下些什么，并问问你自己，在这其中有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错误很多。你在这一章中看到了许多事实和论据，包括大量非金融专业的读者难以理解和消化的部分，但是这一切很容易被归纳。崩溃继而改革后的巨型银行在绝对值及占有市场额方面比2008年前更大了。[注]对冲基金业的规模和影响力继续增长，它的盈利不受严格审查，虽对市场或社会整体没有丝毫益处却一直在自由活动着。一些主要银行的衍生品未平仓及因此而产生的险情达到了新高度。[注]金融业作为一个整体，继续把太多的国家财富和精英人才引向基本上非生产性的活动。

今天的金融系统，甚至比2008年崩溃之前更缺乏应对风暴的稳健运行。更

多的资产堆积在数量更少的已经难以管理的公司经济体内，这是在救助期间一些竞争者被清扫出场或被兼并的结果。对于在最近的金融海啸中不是所有的船舶都沉没，你只应稍感安慰；现在的宁静海况不能提供适航性检验。但是可以肯定，海洋不会是永远平静的；下一次的风浪可能更猛烈，可用的工具可能更受限制，或者更缺少熟练的应对办法。我被告知，这个国家最大银行的主席曾说过，危机是“每隔5—7年发生一次的事件”。[注]他是正确的，风暴总是会有的，无论频率是多少，但是风暴不一定必然导致全盘危机。银行不必如此之大，它们的存在不必如此集中，它们的衍生品头寸无须如此错综复杂地互相联结或者有如此高的杠杆率。

在具体的金融创新中，这一次几乎使经济倒下的是一些房贷衍生品。它们被认为是新的更美好的美国即将来临的关键，那时更大量的家庭将能拥有自己的住宅。在这类期望方面，事实是有教益的。在“大萧条”结束时，稍多于40%的美国家庭有私有住宅；从那时开始急速增加，直到1960年达到62%。[注]此后，增长放慢了，在1980年家庭住宅自有率只有不到65%。[注]这是在有了房贷衍生品之后，但是是在证券化的房贷合同热潮确实站住脚之前。房产自有率的实际情况未受到注意。我看到的最近数据是自有率固定在65%。[注]如果我们想区别房贷衍生品的好影响和坏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它们在这次崩溃中的作用中注意到其坏影响。不必麻烦去寻找住宅自有率比例的上升佐证其有好影响。

在整个金融领域的大范围内，银行的规模是容易使我们之中任何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其他观察者讨论过的一个单独现象，但是大家都感到忧虑。[注]理论上，在一个稳定的或缩小的金融领域中应有一些正在增长的大银行，或者在一个膨胀的金融领域中应有一些正在缩小的银行。事实上，一些银行过于膨胀。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至20世纪中叶，金融行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大约增加了两倍，此后又增加了两倍而达到其巅峰份额，约为GDP的8%。[注]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利润增长。不久前，金融行业只拿走了美国公司利润的个位数百分比。[注]在新千年之初的10年中，金融行业拿走的公司利润超过总体的1/3，现在这个份额明显地回归到30%。[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业利润的膨胀大大超过了全国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增长。[注]这不是巧合。请记住，不生产货物的金融业利润大体上来自非金融业的创造。经济学家赞赏的及我们大家受益的商品利润来自增值，它往往来自成功的制造和技术，或者来自高效的资产配置，这就是风险资本家和投资者的赚钱渠道。金融活动，尤其是金融交易，大体上是零和博弈。一家公司赚的就是另一家公司赔的钱。

很难说规模、杠杆率、大银行的复杂性及对冲基金的不透明一起呈现，是否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或者金融业在经济蛋糕中独享的份额在增大是否值得尊重。两者都该使人难眠。前者可能使我们遭受另一次不必要的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衰退。后者使人们每天受损，与不稳定的经济无关。金融业占据如此多的精英并分享如此多的利润，对经济没有好处。在非金融业中，利润创造就业并可投资实现未来增长。在金融交易中，利润从后门溜出，其中大部分成为从业者的收入，几乎不创造就业，对于整体生产率没有什么贡献。为美国经济未来担忧的人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目前对金融业有利的不平衡状态使我们相对于那些相竞争的国家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我不知道中国经济中有多少利润是贡献给金融业的，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金融业拿走的蛋糕份额远小于我们的。

由于银行雇用的人数在几十年来大致稳定，而且对冲基金行业从来不是大雇主，金融从业者的人均收入及附加报酬随着金融业的扩大而增长。[注]甚至这样的衡量也可能是有误导的，如果把它认为是每个雇员的平均收入，因为增长的好处主要被位于金融业金字塔顶部的财务主管、理财经理和交易员所分享。这有助于补充本书第二章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增长着的收入和分配不平等。金融业上升到控制地位与相对他国美国资产分布更加不公之间有直接的相关性。美国经济的主要成分——稳定、增长和资产分布——同时一起失灵的时候，就是应该重新严肃思考的时候。

需要的纠正方法看起来可能极端，但是目前在金融中暴露的重大风险要求有重大的解决方案。容易的是：巨大的银行应该缩小规模，衍生品的杠杆率应该降低，对冲基金应该受到与共同基金同等程度的监管。一切必要的工具是容易获得的。

请允许我提醒读者，本书不是自以为能提供近期的政治路线图。本书试图提供的是最佳答案，不是受约束的具体解决文案。来自金融领域或政界的读者肯定将认为我的建议现在不值一谈。我同意并且也许将继续前进。我坚持认为，我们在本质上是有等级制的物种。如果你生活在早期的罗马帝国，一个公共政策辩论的好时代，你就能自由地向周围发表改变社会任何方面的思想，除了改变皇帝地位。在罗马帝国倒在“黑暗时代”[注]的堑壕中之后，质疑教皇的世俗和宗教权力就越界了。此后，教皇让位给国王们，后者的统治权必须作为神圣的权力被接受。过了一些时候，制造业的大亨们统治了这个国家。现在，少数人毋庸置疑地位于金融业的尖顶上。我提供给你的不是你能在他们的时代也终结了的时候改变等级制的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值得去了解。

关于金融领域的论述，本书有3个部分。我们应该提出降低银行规模和风险程度的政策建议。我们应该监管对冲基金，就像共同基金在《投资公司

法》监管之下那样，并通过最大程度的曝光以及提供资金的金融客户能容忍的风险程度，强调永远不会过时的透明度原则。我们还应该下决心大大降低衍生品市场的杠杆率。

为了达到所有这些目的，有现成可用的工具。限制银行规模的最佳途径是美联储逐渐强制实施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不要受软弱的国际资本标准的约束。[注]下一个最有希望的策略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调整它的保险费以反映系统性风险。如果监管者能抛弃保险费应反映人为建模得出的风险程度的观念，改为习惯于确定整体金融经济的风险态势，其他事将一蹴而就。这个方法将鼓励股票持有者自发促使银行缩小规模。在我看来，用市场驱动的方法缩小银行规模优于限制获得储蓄保险的银行的活动，虽然限制活动比什么都不做好得多。

监管对冲基金的最佳工具是一直存在的。需要做的是，对于任何控制的资产规模超过一定限度的对冲基金管理者，取消其获得给予共同基金的豁免待遇的可能性。

降低衍生品杠杆率的最佳方法是制定大额储备金的要求。[注]现在，银行可以不设立任何缓冲机制而随意把我们置于衍生品交易的风险之下。每一种衍生品交易都涉及风险。所谓的“基本风险”，即构成一对的合同不能结合在一起行动或者做反射行动。有双方对立的风险，即一项交易将不受或不能得到另一方的尊重。还有人为操作风险，它没有可预见的或合理的限度。任何认真学习衍生品业务的人能告诉你，使大量的头寸归零不大可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无论何时建立一个新仓位，总是应该伴随一个法定的储备金。这将增加对公众和银行的保护，同时遏制过度交易量的吸引力。仅举一例：如果最小的收费是一个假设性的头寸价值的0.1%，一个100万亿美元衍生品的未平仓交易将需要把1000亿美元放在一边作为储备金，这个不可能做到的数目足以使这个交易规模成为噩梦。按总仓位规模确定的储备金比例应该是由美联储法定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应该根据银行的总仓位而不是根据难以置信地被套牢的仓位确定保险费。收费与产生的风险相匹配将使交易量回归到合理的规模，一切都符合新监管制度的最低限度，而且不需要宣布有用的商务活动违法。总仓位的储备金要求将简单地承认一切衍生品仓位对于持有者和公众是有一定风险的。

我的建议没有一项属于产业政策或官方文献的范畴。这不是使华盛顿介入不归其管的私有领域。现有的法律和监管，以及由联邦政府提供储蓄保险和救市的历史所体现的保障，已经使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它只是未能有效地做好它应做的事。显然，目标尚未达到，除非银行规模缩小，杠杆率较低，对冲基金演变为共同基金，整个金融业退居它作为实体经济润滑剂的恰当地位，并安全、健康、安于分享它有权享受的在国民经济中的低比例

利润。

---

1. Franklin D.Roosevelt, “Fireside Chat 6: On Moving Forward to Greater Freedom and Greater Security,”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September 20, 1934, h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093034.html,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2.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1,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75, “Series D.85-86.Unemployment: 1890 - 1970,” http:// 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 CT1970p1-05.pdf,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3. Ibid.

4. See data for 1929–33 in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BEA .gov, Table 1.1.5,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ttp://www.bea.gov/iTable/ iTableHtml.cfm?
reqid＝9&step＝3&isuri＝1&904＝1929&903＝5&906＝a&9
05＝1933&910＝x&911＝0,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5.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Deposit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DIC.gov, September 1998, Table 5, “Commercial Bank Suspensions, 1921 - 1933,” https://www.fdic.gov/ bank/ historical/brief/brhist.pdf,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6. 银行挪用已逝世的委托人的钱，把它变成未包销出去的股票，只要银行能根据信托协议在规定的时间把信托账户中的钱转归委托人生前指定的人；银行可以擅自这样做，不需要说服无法沟通的已逝世的委托人。作者称已逝世的委托人是“容易被说服的购买者”，这是戏谑性的描述。——译者注

7. 经纪人的保证金贷款是投资者自己的钱不够，经纪人可以贷款给他炒股，只要投资者缴纳少量保证金；经纪人在投资者退回贷款时把保证金还给投资者。经纪人赚投资人炒股的交易费和保证金贷款的利息。如果股市下挫，经纪人会要求投资人增加保证金或在账户中增加资金。——译者注

8. For the current regulation, see 220.12 Supplement, “Margin Requirements,” in Fed.Reg.T 12 CFR 220, Federal Reserve Board,

Regulations,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ankinforeg/reglisting.htm#T, accessed August 15, 2015.For history, se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Market Data, “FRB Initial Margin Requirements — Percent of Total Value Required to Purchase Stock,” NYXData.com, http://www.nyxdata.com/nysedata/ asp/factbook/viewer_edition.asp?mode=table&key=52&category=8,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9. 格拉斯（1865—1946）是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1922—1946），在威尔逊总统时期担任财政部长，1946年在担任第6届参议员时逝世。斯蒂格尔（1873—1943）是亚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1915—1943），1943年在担任第14届众议员时逝世。两人都来自民主党。——译者注

10.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Historical Timeline,” FDIC.gov, https://www.fdic.gov/about/history/timeline/1930s.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11. 摩根士丹利原先是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Chase&Co.）的投资部门，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一家公司同时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服务而在1935年被分割出来作为投资银行。——译者注

12. 德国移民高德曼在1860年开始从事银行业，他的女婿萨克斯在1882年加入，1885年正式起名为“高德曼—萨克斯公司”，中国称之为“高盛”。这是一家投资银行。——译者注

13. 买空是投资者预测股价会上涨，但自己的资金不足以大量买进股票，于是以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从银行融资，待股价涨到预期程度时卖出股票，从利润中归还银行的钱。卖空是投资者预测股价会下跌，于是以缴纳抵押金方式借来股票卖出，待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时买进股票，归还出借股票者，从股票的差价中获取收益。——译者注

14. 路易斯·勃兰代斯（1856—1941）是美国的犹太裔律师，曾任最高法院的法官（1916—1939）。他在1980年撰文，第一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他终身为进步的社会事业服务，免费为穷人出庭应对诉讼，被称为“人民律师”“法律界的罗宾汉”。——译者注

15. 林德伯格（1902—1974）是美国的著名飞行员，他在1927年单人驾驶单发动机飞机从纽约连续33个半小时不着陆飞行到巴黎。他的20个月的婴儿在1932年3月1日晚上从家中被德裔非法移民劫走，留条索要7万美元赎金。林德伯格当天报警并支付了5万美元后，于5月12日发现婴儿已被肢

解。凶手在1934年9月被抓获，在1936年被处死。作者引入这一段故事的意思是著名的权贵家族有自己雇用的投资管理者，不希望他们的投资有透明度，以免遭盗贼、绑票或讹诈。——译者注

16. 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每个集资者的客户不能超过100个。——译者注

17. 阿尔弗莱德·琼斯第一个指出投资者的情绪使市场波动，而当时大家都只认为经济因素左右股票市场。他在1949年以10万美元（其中4万美元是他自己的）创立了第一只“对冲基金”，运用了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杠杆效应和做空。他限制自己的客户为99个投资者，以便利用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豁免。“对冲基金”这个词汇来自1966年《财富》杂志赞扬琼斯业绩的文章《无人可及的琼斯》。——译者注

18. “做空”是预期未来行情下跌，将手中股票或借来股票卖出，等价格下跌时买进归还；相反，“做多”是预期未来行情上涨，赶紧买进股票，在价格上涨后卖出获利。——译者注

19. A.W.Jones, “History of the Firm,” http://www.awjones.com/ R historyofthefirm.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20. Ibid.

21. 老虎基金由朱利安·罗伯逊在1980年以8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是他自己的）创立，以对冲基金模式运作，到1998年8月失利前基金规模达到220亿美元，失利后剩下60亿美元。即使失利了，它在18年间的平均年收益率仍达25%，它曾有过1996年50%和1997年72%的年收益率。1998年8月，它炒作外汇失利，先是误判卢布下跌，后又错估日元升值。此外，罗伯逊还不适应现代科技股的猛烈增值，他在2000年3月宣布结束老虎基金。——译者注

22. “巴克莱对冲”本身不是一个对冲基金，而只是一个统计世界上对冲基金的数据库，它实时发布统计数据；例如2016年10月9日发布3050家对冲基金在2016年8月底的基金回报率的算术平均值。它的统计自然不包括不公布业绩的对冲基金。——译者注

23. “Hedge Fund Industry,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BarclayHedge, http://www.barclayhed-ge.com/research/indices/ghs/mum/Hedge_Fund.html,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24. Ibid.

25. Ibid.

26. Goldstein v.SEC, 451 F.3d 873 (D.C.Cir.2006).

27. A valid comparison with hedge fund performance over a long time span would require comparing the composite fund results with a portfolio matching the S&P and then leveraged with debt to the same degree as the fund index.

28. The S&P 500 has outperformed hedge funds for a decade.See “Going Nowhere Fast,”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2,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568741-hedge-funds -have-had-another-lousy-year-cap-disappointing-decade-going,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29.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Commercial Bank Report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n Banking,” FDIC.gov, Table CB02, “Changes in Number of Institutions: FDIC-Insured Commercial Banks,” https://www2.fdic.gov/hsob/HSOBRpt.asp,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30. See “The Three Hundred Largest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sted in Order of Amount of Deposits on Dec.31, 1949,” in John Porter, Moody's Manual of Investments (New York: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1950).

31. Erik Holm, “Ranking the Biggest U.S.Banks: A New (Old) Entrant in Top 5,”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0, 2014, http://blogs.wsj.com/moneybeat/2014/12/10/ranking-the-biggest-u-s-banks-a-new-old-entrant-in-top-5/, accessed July 27, 2015.

32. See note 17.

33. See note 18.

34. Hubert P.Janicki and Edward Simpson Prescott, “Changes in Size Distribution of U.S.Banks: 1960–200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https://www.richmondfed.org/publications/research/economic _quarterly/2006/fall/pdf/janicki_prescott.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35. The top ten banks have about $10 trillion in assets out of about $15 trillion in assets for all banks.For data on the top ten banks, see note 277.For data on total assets, see H.8 Statistical Release, “Selected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August 14, 2015,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8/cur rent/h8.pdf,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36. See note 21.

37. 货币中心银行是全球性经营的银行，如花旗银行和曼哈顿大通银行等，它们只对政府、公司和其他银行借贷，不对个体客户借贷。——译者注

38.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Banking, "Bank Geographic Structure," http://www.ct.gov/dob/cwp/view.asp?a＝2235&q＝297892, accessed April 13, 2015.

39. Ronald A.Wirtz, "Loosening the Strings of Regu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November 1, 2004, https://www.minneapolisfed .org/publications/fedgazette/loosening-the-strings-of-regulation,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40. Ibid.

41. 《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也被称为《金融现代化法案》。

42. Matthew Sherman, "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uly 2009,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dereg-timeline-2009-07 .pdf, accessed July 27, 2015.

43.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Top Industries," Opensecrets.org,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indexType＝i& showYear＝2014,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44. Ibid.

4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Ranked Sectors," Opensecrets.org,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 showYear＝a&indexType＝c,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46. U.S.Congress,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ole of Federal Regulators," 110th Cong., 2d Sess.(Washington, DC: GPO, 2008), statement of Alan Greenspa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ttp://www.gpo .gov/fdsys/pkg/CHRG-110hhrg55764/html/CHRG-110hhrg55764.htm,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47. 造成这个损失的是摩根大通集团在伦敦的首席投资官办公室的交易员布鲁诺·米歇尔·伊克西尔（Bruno Michel Iksil），他专做债券衍生品的指数投资，在过去曾每年赚1亿美元，被称为“伦敦鲸鱼”。这一次他在债券市场大举建仓，市场走势与预期相反，损失了20亿美元，导致摩根大通集团的股价大跌，总计损失90亿美元。他被称为“魔鬼交易员”。——译者注

48. “The Safe Banking Act: A Summary Background and FAQ,” Demos.org, April 22, 2010, http://www.demos.org/publication/safe-banking-act -summary-background-and-faq,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49. Thomas Hoenig, “Global Banking: A Failure of Structural Integrity,” FDIC, December 13, 2013, https://www.fdic.gov/news/news/speeches/spdec1313.html, accessed July 27, 2015.

50. Daniel K.Tarullo, “Financial Stability Regulation,” Federal Reserve Board, October 10, 2012,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 S speech/tarullo20121010a.htm,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51. Richard W.Fisher, “Remarks at the SW Graduate School of Bank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June 3, 2010, http://www.dallasfed.org/news/speeches/fisher/2010/fs100603.cfm,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2. Simon Johnson, “The Debate on Bank Size Is Over,”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13, 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3/03/28/ the-debate-on-bank-size-is-over/,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3. 梅尔文·金曾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1998—2003）和行长（2003—2013）；离任后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洛斯伯莱男爵”，进入贵族院。洛斯伯莱在伦敦市北部，是英格兰银行所在地。——译者注

54. Jamie Dunkley and Andrew Hough, “Banks Warn ‘Hostility Will Push Us’ Abroad After King Attack,” Telegraph, March 12,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newsbysector/banksandfinance/9138630/Banks-warn-hostility-will-push-us-abroad-after-King-attack.html,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5. Mervyn King, “Bank of England Governor Mervyn King's speech to the Lord Mayor's Banquet,” The Guardian, June 18,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09/jun/18/bank-of-england-mervyn-king,

accessed January 25, 2015.

56. 这是隐喻式的描述。“谷仓”指金融市场；“打开了谷仓的后门”指让对冲基金和影子银行不受监管地进入金融领域；“不得不放弃关闭前门”指不得不放弃监管整个金融市场，因为从后门进来的对冲基金和影子银行业使监管不起作用；“关闭那扇后门”指不让对冲基金和影子银行干扰金融市场。——译者注

57. Leo Melamed, “Milton Friedman's 1971 Feasibility Paper,” LeoMelamed .com, http://www.leomelamed.com/articles/12-71FriedmanCato.html,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58. “Futures/Futures Exchanges/History,” GoldAvenue, http://info.goldavenue.com/info_site/in_glos/in_glos_futures.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15.

59. Don Chance, “A Brief History of Derivatives,” in Essays in Derivatives: Risk-Transfer Tools and Topics Made Eas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8),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266885 .ch2/summary/,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60. Will Acworth, “2014 Annual Global Futures and Options Volume,” Futures Industry Magazine, March 9, 2015, https://fimag.fia.org/articles/2014-fia-annual-global-futures-and-options-volume-gains -north-america-and-europe-offset, accessed April 13, 2015.

61. U.S.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History of the CFTC,” CFTC.gov, http://www.cftc.gov/about/historyofthecftc/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62. Scot Warren, “Innovate to Advance: 30 Years of S&P 500 Futures,” Open Markets, May 4, 2012, http://openmarkets.cmegroup.com/3215/innovate -to-advance-30-years-of-sp-500-futures, accessed July 30, 2015.

63. 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http://www.library.hbs.edu/hc/lehman/company.html?company=federal_national_mortgage_association, accessed January 13, 2015.

64. Ibid.

65. Efraim Benmelech and Jennifer Dlugosz, “The Credit Rating Crisis,”

Chapter 3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9 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http://www.nber.org/chapters/c11794.pdf, accessed July 28, 2015.

66.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s Quarterly Report on Bank Trading and Derivatives Activities, First Quarter 2015,” OCC.gov, http://www.occ.gov/topics/capital-markets/financial-markets/trading/ derivatives/dq115.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67. If estimates are correct about the worldwide notional value of derivatives, that total runs to more like twenty times the world's GNP.The aggregate GNP of the world was about $ 75 trillion in 2013, according to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2013,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and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July 1, 2015,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accessed July 27, 2015.

68. The equity capital of JP Morgan Chase was $ 236 billion in 2015 and $ 215 billion at Citigroup.For each, see “Balance Sheet,” March 31, 2015, Yahoo! Finance, http://finance.yahoo.com/q/bs?s=C; and Yahoo! Finance, http://finance.yahoo.com/q/bs?s=JPM, accessed August 17, 2015.The notional value of open derivatives positions at the former was $ 56 trillion, and at the latter $ 53 trillion, according to the OCC website.It can easily be argued that these leverage ratios and position sizes provide a mixed benefit at best for the owners of the banks — their shareholders.Because public-equity markets are fickle and not reliably wise, I hesitate to use market prices at any point in time to prove an argument.At times, though, they do seem to speak clearly.Shares in JP Morgan and Citigroup, where derivatives trading is most dominant, sell as of July 25, 2015, at 1.2 times book value and .95 times book value, respectively, while Wells Fargo carries a market worth almost 1.8 times its book value.The two larger banks sell for eight to twelve times trailing earnings, while Wells Fargo fetches fourteen times earnings.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is the scale of open derivatives positions.Wells Fargo holds open positions at only about one-tenth the scale of JP Morgan's.R The smaller, and more traditional, of these banks is now the most

valuable bank in the world, with a market value $42 billion greater than Morgan's.While such conclusions are necessarily conjectural, a reasonable guess is that shareholders believe the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bank will be less vulnerable to the next storm.See Emily Glazer, “Wells Fargo & Co.Is the Earth's Most Valuable Bank,”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2015.Th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employs a different but confirmatory risk index.Rather than notional value, it publishes a ratio with a derived measure of derivatives, Credit Exposure, as the numerator and regulatory defined Risk-Based Capital as the denominator.It computes a ratio of 182 times capital for Citi and 229 for JP Morgan.See note 48.

69. 天鹅通常是白色的，黑天鹅极少，且难以预测它会出现。伦敦经济学院的金融学教授纳西姆·塔列波（Nassim Taleb）用“黑天鹅”一词形容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极少见的未能预测到的事件。他著有《黑天鹅：极不可能事件的影响》（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译者注

70. “US Loan-to-Deposit Ratio the Lowest in 30 Years and Falling,” Sober Look, October 6, 2013, http://soberlook.com/2013/10/us-loan-to-deposit-ratio-lowest-in-30.html, accessed July 27, 2015.See also Steven W.Carlsen,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Banking and Insurance Through the Financial Crisis,” ETD Collection for Fordham University, January 1, 2013, http://fordham.bepress.com/dissertations/AAI3588206,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71. Ruth King, “Loan-to-Deposit Ratio Mov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Banks,” Market Realist, June 17, 2015, http://marketrealist.com/2015/06/ loan-deposit-ratio-moves-right-direction-banks/, accessed July 27, 2015; and the Carlsen source in note 51.

72. See the Carlsen source in note 51.

73. Berkshire Hathaway Inc., “2002 Annual Report, 15, http://www.berkshirehathaway.com/2002ar/2002ar.pdf, accessed July 27, 2015.

74. 美国有三家大型房贷机构：房利美（联邦国民房贷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英语昵称Fannie Mae）、房地美（联邦住宅房贷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英语昵称

Freddie Mac）和吉利美（政府的国民房贷协会，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英语昵称Ginnie Mae）。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吉利美成立于1968年，房地美是1970年根据《紧急住房金融法》（Emergency Home Finance Act）从吉利美分离出来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国会立法特许的公共控股的营利公司，它们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没有政府的信贷担保。吉利美有政府的信贷担保。——译者注

75. 贝尔斯登银行曾是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公司之一，它受次贷危机影响而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短缺。它在2008年5月被摩根大通集团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收购。——译者注

76. Descriptions and timing of events related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The Financial Crisis: Full Timeline,” StLouisFed.org, https://www.stlouisfed.org/financial-crisis/full-timeline, accessed July 30, 2015.

77. Ibid.

78. Ibid.

79. Jesse Bricker et al., “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0, no.4 (September 2014), Figure 2, “Change in Median and Mean Family Net Worth, 2007–13 Surveys,”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pubs/bulletin/2014/pdf/scf14.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0. See data for 2008–15 in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S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BEA.gov, Table 1.1.3,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Quantity Indexes,” 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9&step=1#reqid=9&ste p=3&isuri=1&904=2006&903=3&906=a&905=2015&910=x&911=0, accessed July 27, 2015.

8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Urges Countries to Redouble Growth Drive, Revive MDGs,” IMF.org, September 20, 2010,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0/NEW092010 A.htm,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2. U.S.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LS.gov, http://data.bls .gov/timeseries/LNS14000000,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3.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and 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Federal Debt: Total Public Debt as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FDEGDQ188Sbbb,"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 series/ GFDEGDQ188S/,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4. Michiyo Nakamoto and David Wighton, "Citigroup Chief Stays Bullish on Buy-outs," Financial Times, July 9, 2007, http://www.ft.com/ cms/ s/0/80e2987a-2e50-11dc-821c-0000 779f d2ac.html, accessed July 27, 2015.

85. 蒂莫西·盖特纳曾任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2003—2009），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一届任期内任命他为财政部长（2009—2013）。他根据国会通过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拨款救助了陷于次贷危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及此后濒临倒闭的一些大银行。——译者注

86. Timothy Geithner, 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4).

87. Graeme Wearden, "Sir Mervyn King: Don't Demonise Bankers," The Guardian, May 19,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3/ may/19/mervyn-king-dont-demonise-bankers,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8. Stephen Gandel, "By Every Measure, the Big Banks Are Bigger," Fortune, September 13, 2013, http://fortune.com/2013/09/13/by-every-measure -the-big-banks-are-bigger/,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89. Mayra Rodríguez Valladares, "Derivatives Markets Growing Again, with Few New Protections,"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14, http://deal book.nytimes.com/2014/05/13/derivatives-markets-growing-again-with -few-new-protections/,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90. Al Lewis, "The Coming Financial Crisi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0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325 20457946561 0191507216,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91.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Census Bureau, "2010 Census Shows Second Highest Homeownership Rate on Record Despite Largest

Decrease Since 1940," U.S.Census Bureau Newsroom Archive, October 6,2011,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 2010_census/ R cb11-cn188.html,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92. Ibid.

93. Ibid.

94. See, for instance, Benjamin Landy, "How the Financial Sector Consumed America's Economic Growth," Century Foundation, February 25, 2013, http://www.tcf.org/blog/detail/graph-how-the-financial - sector-consumed-americas-economic-growth,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Jordan Weissman, "How Wall Street Devoured Corporate America," The Atlantic, March 5, 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 archive/2013/03/how-wall-street-devoured-corporate-america/273732/,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and Thomas Philippon, "Why Has the U.S.Financial Sector Grown So Much? The Role of Corporate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134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tember 2007, http://www.nber.org/papers/w13405, accessed July 26, 2015.

95. Thomas Philippon, "Has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Become Less Efficient? O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4 (April 2015): 1408 - 38, http:// dx.doi.org/10.1257/aer.20120578, accessed August 16, 2015.

9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Tables," BEA.gov, Table 6.16A, "Corporate Profits by Industry," 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Html .cfm?reqid = 9&step = 3&isuri = 1&903 = 236,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97. Ibid., Table 6.16D, "Corporate Profits by Industry," http:// www.bea.gov/ iTable/iTable.cfm? ReqID = 9&step = 1#reqid = 9&step = 3&isuri = 1&903 = 239, accessed August 16, 2015.Also see Benjamin M.Friedman, "Is Our Financial System Serving Us Well?," Daedalus 139, no.4 (Fall 2010): 9–21, http:// 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abs/10.1162/DAED_a_00038, accessed August 15, 2015; and Benjamin M.Friedman, "Overmighty Finance Levies a Tithe on Growth,"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6, 2009, http:// www.ft.com/intl/cms/s/0/2de2b29a-9271-11de-b63b-00144feabdc0

.html, accessed July 25, 2015.

98. Michael Mandel, “A Bad Decade for Nonfinancial Profits,” Bloomberg Business, Econochat, March 4, 2009, http://www.businessweek.com/the_thread/economicsunbound/archives/2009/03/a_bad_decade_fo.html,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99. See Richard Henderson, “Industry Output and Employment Projections to 2022,” Monthly Labor Review, BLS.gov, December 2013, Table 1, “Employment by Major Industry Sector, 2002, 2012, and Projected 2022,”http://www.bls.gov/opub/mlr/2013/article/industry-employment-and -output-projections-to-2022-1.htm, accessed August 16, 2015.

100. 黑暗时代（Dark Age）是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古史上一段时期（公元400—1500）的称呼。这段时期开始于西罗马的灭亡；在这段时期内，封建割据和战争频繁，社会发展停滞。——译者注

101. As this chapter was being completed,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announced new rules that would move somewhat in this direction.The affected banks will consider the step larger than this author, but the direction is commendable.See Federal Reserve Board press release, July 20, 2015,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bcreg/20150720a.htm, accessed August 16, 2015.

102. This approach was first suggested to me by Steven W.Carlsen, PhD.See note 51.

结束语

没有理由绝望。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正在垮塌。按历史标准，我们的包容性民主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尽管有一些暂时的尴尬问题。美国的军事力量确保它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美国的经济长期以来是——并且依然是——世界历史上最有竞争力的；它将继续待在金字塔的顶部，只要我们能保持无所畏惧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企业文化。然而，美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我向读者推荐了公共政策的5项改革，在逻辑上这是5项容易的改革，它们有助于使美国保持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它们能使美国人更端庄、体面。从政治角度看，这5项改革中没有一项是容易的，它们事实上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是值得去争取。以下是简要的方案：

1.联邦政府应该停止承诺其无计划的拨款。在社会保险方面，这个问题对于下一代的老年人最严峻。国会应该停止提供昂贵的赋税减免，因为它只为无用的政策目标服务。在这些税务支出中最浪费的挥霍是给予公司和个人支付的债务利息税前抵扣。社会保险系统可以依靠停止随预期寿命的增长自动扩大养老金权益而得到保障。公司和个人支付的信贷利息税前抵扣政策应该完全被取消。

2.当今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最大的威胁是产生一个富裕的贵族阶层。我们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果实都被在财富和收入顶尖上的那些人拿走了。为了治理这个问题和恢复中产阶层的经济实力，同时为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保持一个安全保障网，我们必须采取某些听起来像是一百多年前的征收所得税那样极端的但是必要的措施。我们必须开始对资产增值但尚未变现的利得征税，无论这些资产是以什么形式被持有；我们还必须立即堵住通过信托规则的漏洞和过多的豁免而流失的遗产税。

3.美国的中小学教育系统及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在过去为我们服务得不错。然而，今天这二者都需要有重大的改善。中小学的课程对于那些不准备攻读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的人很不合适，他们占居民的大多数。大学的昂贵费用对于除了被录取入学的最富裕学生之外的所有人，是毁灭性的，这也必将毁灭他们的高等教育前途。一些国际组织衡量我们这个繁荣国家教育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虽然理论上有可能在教育领域内部单独纠正这些问题，但是体制的障碍使这个目标难以达到。全国为民服务计划可以对教育方面的一些缺点提供一整套有力的解决办法，同时提供其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美国的医疗保健业花费约占GNP的18%，世界上的其他发达国家平均只稍多于这个比例的一半。然而，美国人民的健康程度却差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这笔费用超过每年一万亿美元。国家本来可以把大量的钱花在更好的用途上。针对美国私营和公共医疗保健的混合体，没有与此相应的改善过度花费的方法。我们只有在单一付款者、单一谈判者和单一监管系统的框架内才能提供合理的医疗保健、可感觉到的激励和高效率的管理。从每年一万亿美元中省下的钱将是目前可得到的对经济的最大推动力，而且恰当的经济刺激将实际改善美国的医疗保健成绩。

5.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对华尔街的结构和行为的改革曾为美国奠定了一个使之繁荣了50年的金融业基础，并使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那时，金融业未给商业和公众带来风险。大而复杂到难以管理的银行（它们的失败会把我们都拉下水）的出现、众多对冲基金的诞生（它们的安全和业务活动处于监管范围之外）及衍生品的增长（它们几乎以无限制的杠杆率进行交易），导致以削弱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的金融业暴增，而且对于实体经济没有相应的贡献。银行应该缩小其规模。对冲基金应该停止存在于对共同基金适用的安全监管结构之外。衍生品交易应该有准备金的支持，使它从目前不可思议的数量减少为一个极小的部分。

我并不认为这些改革将是容易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它们将有助于巩固美国的价值观和提高它的繁荣。况且它们不是号召美国公民以利他主义的精神采取艰苦卓绝的措施，或做出高贵的牺牲。我把它们阐述为呼吁对我们的社会尽义务或尽责任，这些改革是为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经济利益，因而很有必要。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代表他的给养不足的军队告诫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时说，“为公正无私的原则而战的人数，相对而言，不多于海洋中的一滴水”。[注] 此书提供的这5个建议都是为了你的财务利益，更是为了你的孩子们的经济利益。它们也将有助于确保美国的民主。

华盛顿的演说不是我在撰写此书时想到的唯一引语。对于愿意处理这5个问题的总统或国会议员，我觉得必须提供一位伟大人物也是我个人心目中的英雄的下述告诫。亚当·斯密曾担心过他那时的商务大亨们，他称之为“垄断家们”，他关于如何对付他们的警告同样适用于对付任何权势人物的联盟，包括那些组织对抗这些改革的人。斯密清楚地看到直率的改革者将会遇到的敌手的力量，他在1774年写道：

支持每一项加强垄断建议的国会议员肯定不仅会获得理解商业的声誉，而且会使他们在数量和财富有巨大重要性的团伙中获得名望和影响力。反之，如果有一个人反对他们，而且这个人有足够的权力能阻挠他们，他们曾得到最大赞扬的刚正不阿、最高级别的职务、最伟大的公共服务都不能

保护他们不遭到最邪恶的侮辱和诋毁及人身攻击，有时还会有遭受来自狂怒和失望的垄断家暴行的真实危险。(注)

在几乎两个半世纪之后，斯密的告诫依然具有强大力量。面对他说的那些诋毁名誉、侮辱、暴行，以及甚至有可想象的现实危险的冲突，我认为这些都是最值得进行的战斗。对于接受我提出的对5个基本问题发起挑战的领袖，至少有以下安慰：亚当·斯密将为你而骄傲，而且一个满怀感激的国家将在某一天颂扬你。

---

1. George Washington, in a letter of September 24, 1776,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often referred to as “On Recruiting and Maintaining an Army.” The letter is reprinted in full on the website American History, http://www.let.rug.nl/usa/presidents/george-washington/on-recruiting-and-maintaining-an-army-1776.php, accessed July 22, 2015.

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IV, Chapter II.

致谢

我必须向很多人致谢，而且必须首先向应该为本书而致谢但在此处被遗漏的人们致歉。本书始于我与波士顿检查员俱乐部的一位朋友、同事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衣帽间里的谈话。我们讨论合写一本书。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观点相似但不全相同时，他鼓励我单独写一本书并把我介绍给埃克·威廉姆斯（Ike Williams），后者成了我的律师兼代理人。与此同时，我的兄弟基尼·斯通（Gene Stone）——一位作家——强烈地鼓励我著书，他成为我写每一个句子的主要顾问。一位老朋友，经济学教授本·弗里德曼[注]（Ben Friedman），也敦促我努力。我为第一稿聘请了职业援助，因为我在空白纸片或电脑屏幕上开始写作时感到很困难。我雇了一位杰出的写作者，迈克·布莱恩（Mike Bryan），他通过大量的视频会谈逐个主题地采访我，然后把采访到的内容誊写、编辑成初稿。虽然我不认为书中还存留着初稿的语句，但是若没有迈克的帮助，我就没有开始写此书的信心。

在我开始写一系列草稿时，我请教了许多专家。他们之中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建议的有杰克·皮蒂（Jack Beatty）、戴维·艾尔伍德（David Ellwood）、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戴维·莫斯（David Moss）、丽贝卡·亨德逊（Rebecca Henderson）、诺曼·罗森绍尔（Norman Rosenthal）、杰弗里·阿诺德（Geoffrey Arnold）、汤姆·达克尔（Tom Daschle）、莱蒙德和雅娜·卡拉马洛（Raymond and Jaana Calamaro）及克莱顿·尤特（Clayton Yuetter）。此外，还有朋友及朋友的朋友，我向他们请教某些章节的专业见解。不要认为这些读者一致同意我，他们只是第一批读者。事实上，有些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鲍勃·珀臣（Bob Pozen）、吉姆·罗斯福（Jim Roosevelt）和阿莉西娅·芒内尔（Alicia Munnell）阅读和评论了“财政平衡”这一章，特别是关于社会保险问题。珍妮特·戈尼克（Janet Gornik）、克里斯托弗·休士敦（Christopher Houston）、卡罗琳·奥斯汀（Carolyn Osteen）和鲍勃·洛德（Bob Lord）对“不平等”这一章提出了建议。这4位律师都专注于关于信托的那几页。迈克尔·戈尔特斯坦（Michael Goldstein）、劳拉·珀利尔（Laura Perille）和欧文·斯戈特（Irvin Scott）评论了“教育”这一章。阿列克西斯·珀臣（Alexis Pozen）、芭芭拉·皮埃尔博士（Dr.Barbara Bierer）、罗伯特·奥斯汀博士（Dr.Robert Osteen）和乔纳森·奎克博士（Dr.Jonathan Quick）对于“医疗保健”这一章提供了专业评论。我从阿兰·列维坦（Alan Levithan）、斯蒂夫·卡尔森（Steve Carlsen）和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那里得到了最后一章关于“金融改革”的评论或帮助。

我不可能只靠自己做所有这些研究，甚至只做任何章末注。克列门斯·斯戈敦（Clemence Scouten）和丹尼尔·塔尔塔可夫斯基（Daniel Tartakovsky）承担了这些任务的大部分。克列门斯还在每个阶段帮助我做需花费大量时间的其他杂务。接下来，我要感谢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集团[注]（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的团队。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拉里·费什（Larry Fish）、商务出版部主任布鲁斯·尼可尔斯（Bruce Nichols）、本书的编辑亚历山大·里德尔斐尔特（Alexander Littlefield）和版本编辑芭芭拉·伍德（Barbara Wood），他们与我的关系都不同于我曾受到过传统告诫的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与他们合作有一种职业上的愉快。我暂时还不能感谢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集团可能雇来帮助推销此书的外界顾问们。因为现在尚不知道他们是谁。如果此书卖得很好而要出第二版，那时将有机会感谢他们。

对创作中的我在思维、情感及其他每个方面最重要的支持者当然是我的妻子凯瑟琳·道格拉斯·斯通（Cathleen Douglas Stione）。然而，不能要凯西对书中的任何错误承担责任。错误是我的。

---

1. 本·弗里德曼是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清算之日：里根及其后的美国经济政策的后果》（Day of Rckoning：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Reagan and Aafter）及《经济增长的道义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译者注
2. 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集团是美国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已有170多年历史。——译者注